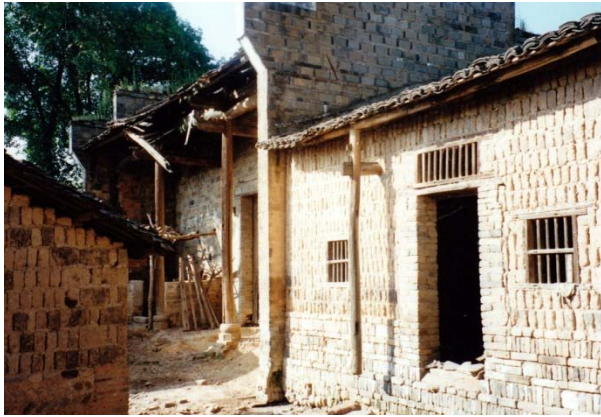


插队十年

—里陂上村杂忆



谨以此留给

夏苏舒、夏达中

夏建丰 2014年5月



2013年12月，全家福。

出版：Heritage Chinese Center

字数：263千字

书号：ISBN978-1-940666-99-0

目录

序一	6
序二	9
写在前面	12
1 毕业分配	15
2 初到里陂上	21
3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29
4 夏：双抢大忙	41
5 秋：铲茶山、摘茶籽和榨茶油	54
6 冬：修水库	66
7 衣	77
8 食	84
9 住	102
10 行	117
11 1975年——谓我何求	131
12 过年过节	142
13 赤脚和穿鞋	157
14 捐竹	164

15 铲田壩和筑田塍	170
16 碾米	177
17 抽水和捉鱼	183
18 砍柴	191
19 种菜	201
20 养猪、杀猪和杀猪宴	215
21 酿酒	225
22 做豆腐	231
23 狗的回忆	237
24 遇险	244
25 挨饿	254
26 受冷和烤火	260
27 剃头和修面	267
28 松光、火吊和救火	276
29 打铁、锯板和制篾	286
30 水灾	300
31 虫害	308
32 交公粮和瞒产私分	315
33 “红管家”	325

34 评工分·····	333
35 开会·····	339
36 不合作、撤职和查账·····	351
37 械斗·····	360
38 报纸和广播·····	371
39 生老病死·····	384
40 娶亲和嫁女·····	405
41 教育·····	413
42 人心思走·····	421
43 知青大返城·····	430
附录一上海的上山下乡运动·····	441
附录二全国的上山下乡人数·····	453
后记·····	454

序一

一段漫长的岁月，一条坎坷的道路。

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写的就是这段岁月的一个侧面、这条道路上一个身影：一位知青的十年插队生涯。作者夏建丰文笔质朴流畅，态度平和宁静，不雕饰，不滥情。跟我读过的其他同类作品比，此作大异其趣，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毫不着力地独树一帜。讲故事则娓娓动听，谈民俗则巨细靡遗，阅读时，常让我联想起宋朝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范成大是大家，不好跟他比文学上的成就，但就提供史料的丰富、翔实，恐怕要让本书作者出一头地。此作在民俗学、社会学上的价值，也不应忽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四十余年，身历者都已渐入老境。当年的环境、经历有差，后来的境遇、地位也不一样，当这些老知青回望来路，难免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的感慨，各有各的领悟。在某些老知青那里，那段岁月给与他们的主要是磨炼，磨炼的收获体现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农村是炼狱，终成正果证明了他们本就在黑暗中闪亮的优秀品质。在另外一些老知青那里，插队是被强加于身的苦难，苦难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后半生的失意、平庸、乃至困苦。农村是地狱，进去打一个滚再出来，阴森的寒气会纠缠人一生一世。具有上述两种极端看法的老知青，可能不多，但用今天投射昨天，用过往注解当前，是人情之常。所以两端之间自然有个模糊的分界，据说，一边是标榜“青春无悔”，另一边则慨叹“不堪回首”。本书对知青历史提供了有异于前二者的视角，是其尤为可贵之处。

二十世纪的1966年到1968年，正当文化革命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另一狂潮悄悄逼近。“战后婴儿潮”这个说法，我是到美国后才听到的。这潮水在西方涌上了海滩，在中国则是惊涛拍岸。从1960年代初开始，初中教育在中国的大中

城市开始普及。高中教育也有相应的、但远不成比例的发展。文革中的中学毕业生向何处去？升学，师资和校舍在哪里？就业，刚刚起步的工业如何容纳？海量涌入城市工商业的就业人口，即使收入水平再低，也将吞噬大量的工商业积累。在工业化的初期，这样的失衡难以避免。要么是普遍贫困下的停滞，要么是有人做出牺牲。为了牺牲，需要激动人心的口号，同样少不了强制。可以质疑口号所宣称的附加价值，可以谴责强制的正当性，但口号和强制代表的是不得已的抉择。在漫卷的红旗，在喧天的锣鼓中，知青走向中国工业化的祭坛。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平均增长率为7.1%。

这样说来，“青春无悔”和“不堪回首”岂非同属一派？二者的前提都是，我们本该是城里人。我们下乡了，小姐落难、书生蒙尘，我们为民族牺牲，我们为国家奉献。告别农村之后，混得好，我们有资格格外骄傲；混不好，我们有权利怨天尤人。因为我们被耽误了。据说，上山下乡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且慢，真是“整整一代”吗？知青1700万，当年中国的人口在八至十亿之间，其中约五分之四是农民。也就是说，将近有一亿与我们同龄的农民兄弟姐妹做出过跟我们同样的牺牲、同样的奉献，还要加上他们的父兄！没有人问过，他们的青春有悔无悔，往事可堪回首。就算是去问，恐怕他们也顾不上进行如此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思辨，天亮还得下地，从土里刨食，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为工业、科技、教育、国防输血。

知识青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也许是仅见的最自恋的群体。我自己也在这个群体之中，跟本书的作者相仿，曾插队十年。回忆文章不说了，我自己也写过几篇。单看文艺作品，除了诗歌、小说、绘画、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音乐，独唱的、交响的、汇演的、巡演的，从知青回城到现在就没断过。说“自恋”其实并不确切。我们是怕，怕被社会遗忘。王朝建立了，从龙的会论功行赏。革命成功了，革命者会受

到尊崇。我们也革过，也苦过，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早早下了岗，几乎全部人都已经退休，除了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人还记得我们这个群体。这也难怪，知识青年毕竟没有完成正常的中学教育，而时代已经不同了。

时代不同了，这回是几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是谓“农民工”，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很少得到城里人的平视和尊敬。

时隔将近四十年，本书作者仍然记挂着和他共同劳动、生活了十年的农民。

拨开一个个王朝的灰烬，传递文明的薪火；捱过一次次战争和饥荒，保存国家的生机；祖祖辈辈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守护民族复兴的希望；抛家舍业成群结队地走向城市，用血汗为古国的经济腾飞奠基；这就是中国农民。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曾与你们相伴；在那条坎坷的道路上，曾与你们同行——我们终生难忘。

刘力前 2014年11月

序二

我家开放式厨房柜台旁的小圆餐桌，是整幢房子里人气最旺的地方。就在这张小圆桌上，建丰支起他的手提电脑，滴答滴答、不紧不慢地“敲”出了这本初衷是要留给自己孩子们的《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

随着建丰对当年插队生活的记忆一段一段地诉诸文字，我和其他“插友”们脑海中多少尘封的思绪被一一拨开，牵出背后生动的故事；多少沉睡的场景被一一唤醒，重新鲜活地展现在眼前。

二十世纪的 1960 年代末期，我们这些在上海长大的中学生，被社会运动大潮席卷到了离家千里之外、陌生而又闭塞的小山村。万万不曾料想，在那里，我们竟然和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相遇。如今蓦然回首，就这一点而言，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这一感悟发生在我离开农村，甚至是离开祖国之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当年自己所浸润其中的江西农村的民俗民风 and 生活方式里，几乎处处有久远文明的因子存活着。例如就在不久前，研读词源时我惊喜地发现，“再”字甲骨文（𠄎）和金文（𠄎）的主体¹，居然就是村民称之为“簦(háo)”的捕鱼的竹笼（见本书 298 页的插图）！记得曾经好奇地跟着村民到溪流上“装簦”。如此说来，我何其有幸，曾经亲手触摸过三千多年前的文明源头！“尔牧来思，何蓑何笠。”这是《诗经》里记录的诗歌。回忆着自己在乡下曾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地沐浴在春雨中，吟诵起来便觉是亲口在与祖先遥相唱和，那横亘在我们中间的上百万日子的光阴，顿然消失了。

¹ “再”字的原意，为借这种竹笼可以重复使用的功能表示“重复”。“再”字的早期甲骨文符号“𠄎”，清晰而完整地表现了簦的外形与实现重复捕鱼功能的机制。

村民的方言里存有不少古字古音。比如称老人为“老者”、称回家为“去归”。当年，他们说话中“姊”和“弟”的奇怪发音令我十分费解。可是后来读《说文解字》，得知那些正是东汉许慎记录的读音时，我的心不由微微地颤抖了。在我认识的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中间，流传着《孙子算经》中的题目，流传着《增广贤文》里的格言，还流传着许许多多美妙动听的山歌、谜语、民间故事。村民们极少有人上过学，可是相处中他们从来不曾给过我“愚昧”、“没有文化”的感觉。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吃苦耐劳、敦厚本分、节俭卫生乃至精明狡慧，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城里现代的物质发明固然令他们感到新鲜无比，然而反过来，当地的民俗民风、生活形态和生存方式同样让我这个外来的“上海女仔”感到新鲜甚至震惊。建丰在这里记下的，正是在这贯古通今的文明里浸润了整整十年的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作所为。

在我的心目中，当年在江西农村感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所谓鲜明的“时代色彩”，都是和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建丰在书中描述了他参加整个公社的农民集中起来修筑水库的体验，而我则参加过数个县共同出劳力修筑“井冈山铁路”的“大会战”。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农民，自带工具、口粮和菜肴汇拢到离家几十里甚至几百里的地方，近乎无偿地参加社会工程的建设，何尝不是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服徭役的农民无数次地为兴建大型土木工程而聚集的某种再现？甚至在今天看来显得颇有些荒谬的“集体生产”形式，抑或不是《礼记·礼运》中所表述的“天下为公”之理想数千年后的一次重新闪现，甚或是一次勇敢的实验？

然而，同样万万不曾料想的是，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当年插队期间所遇到的这绵延了千百年的民俗民风和生活方式，正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在我们的眼前，崩溃着、消失了。在村民们对日益方便、快捷和丰沃的物质生活的陶醉中，崩溃着、消失了。近几年，当我们回

到当年插队的山村，满眼看到的是：便宜的塑料制品取代了各式各样的竹制品和陶瓷制品；高大的水泥楼房取代了传统的砖木住房；轻便的雨衣取代了蓑衣和斗笠。甚至连香醇美味的糯米水酒，也正在被廉价方便的啤酒所取代。十分依赖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水田里，已经少有活鱼，从甲骨文时代沿用至今的“簠”，想来也难逃寿终正寝的命运。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手工艺，在外来商业用品的冲击下奄奄一息。村民之间口说耳听的山歌、谜语、和民间故事，在现代媒体的大扫荡中枯萎凋零。乡间道路上，密集的车轮痕迹盖过了脚印，隆隆的马达声响吞没了乡音……淳朴的民风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豪华在挑战节俭，怠惰在挑战勤勉，贪欲在挑战本分，张狂在挑战敬畏。

这一切迅速的、难以阻挡的变化，是喜，是忧？是福，是祸？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文明的延续是需要记忆的，将自己曾经历过的这些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应该没有错。北宋晚期张择端画下的“清明上河图”，让八百多年之后的我们仍能看到当年汴梁的风土人情。或许，建丰这本记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江西山村民俗民风的小书，多少也能帮助将来的人们了解它所折射的绵延了千百年的传统文明。

我们所住的硅谷除了高科技以外，也以终年阳光灿烂闻名。建丰写作的小圆桌上，上午常洒有几方阳光。建丰说，年纪大了，太阳晒在后背上感觉很暖和，很舒服。键盘敲击声中，那几方阳光总在悄然无声地挪移开去——时间的脚步从来不会停留。我们把《插队十年》留给随时光而来的后代，当作他们回望今天的一个标记。

马立平 2014年11月

写在前面

从1969年3月到1979年2月，我在江西省永丰县鹿冈乡的里陂上村做农民十年。最后离开时，数次问我的村民朋友：“如果人的一世有六十年，以十年来算的话，哪个十年最重要？”村民们稍一思忖，很快就有相同的答案：“是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

这时候，我就用力地顿脚，用手指着地面，感慨地说：“我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就是在这里。”

妻子立平在鹿冈乡的高坑村七年，加上读书和工作，她在江西十一年多。

我女儿自懂事起，经常听我俩唠唠叨叨，叙说那些年轻时候做农民的陈年往事。女儿上学了，会把我们的事情讲给她的老师听。几乎每个听过女儿讲述的美国老师，大多会说同样的话：“你父母的经历应该记录下来，真是太丰富太有趣了，哪像我们在美国，从学前班开始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到学校教书，我们的生活真是很平淡。”

女儿回家，把她老师的话告诉我。我对女儿淡淡一笑，心里不以为然。这些美国的老师有些矫情了，他们一帆风顺地大学毕业了，还说生活很平淡。我从小到大，若能有他们那样的生活，该有多好！

当时在中学里，我们全班有五十三名同学，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可以有五十名同学考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文化革命过后，点来算去，只有四名同学进了正规大学的校门。

女儿自幼喜欢历史。她十岁的时候，我说到宋朝，她就问：“是赵宋还是刘宋？”平时有了机会，她常提醒我，应该把农村插队十年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历写下来。

那时中国的城市人口有一亿多人，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里的中学生，有一千七百万人下乡务农，这是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真值得记录下来吗？只是为了不拂女儿

的好意，我答应以后会“信笔由缰”地写一点回忆性的文章，题目就叫《浮生杂忆》。

女儿长大以后，在芝加哥大学修习历史，读了三个本科学位的课程，还上了一些研究生的课。她在假期回家时，经常会询问：“爸爸，《浮生杂忆》写了没有？”“爸爸，该动笔了吧。”嘿，我当时不过随口一应，她还认真了。

有一次回中国探望母亲，老人家已是耄耋之年，过了米寿。母亲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我有三个儿子，只有你这一支在美国……”

我听了以后心里一动。是啊，我这一支孤悬海外，我的子孙后代应该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何方人士，在故土都有何样情事。我作为这一支脉的“迁始祖”，应该尽自己所能，为孩子留下一些文字的资料。

记得以前看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家史小说《根》。作者经过十二年的考证研究，追溯到他的六代以上的祖先，是生活在非洲西海岸的冈比亚。书中反复地指出，人生十分宝贵的东西，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

一年前，悚觉自己的记忆力加速衰退，大脑仓库里许多鲜活的记忆，正在悄然隐去，再不动手写下来，就来不及了。

及至动笔甫始，发现自己写作文的能力和水平，依然停留在四十年前的中学时代，没有什么长进。略有沮丧之余，觉得反正也就这样了，能力有限，权当是在四十年前上作文课的时候，坐在教室里写作文吧。

我整理完相应的家谱和有关祖先的生平，写了几篇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感受，进入我人生中历时十年的“江西时期”，开始里陂上村生活之“杂忆”，断断续续地写了四十来篇作文。

农村生活的第一篇作文是“修水库”，女儿阅后感觉尚可，只是结尾似乎不够好，我立即遵嘱修改了。唯恐记忆有误，又把作文传给当年插队落户的兄弟们过目。果然，我把

“洋坳”误成了“羊坳”。

“插友”们对作文的臧否各有不同，有人说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于我而言，写这些作文的初衷，是给自己孩子看的，若能有一点史料的价值，很好，吾愿足矣。

当年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象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实和现今动辄几亿“农民工”进城相比，几乎不值得一提。再过几十年，我们都已故去，那些琐碎的往事更是烟消云散了。

我辈中，对当年的上山下乡亦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一拨人认为那是“蹉跎岁月”，不堪回首，也不值得回忆。另一批人觉得“青春无悔”，甚而有人在退休以后，带着在城里积攒了几十年的资源和人脉，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和当地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

立平和孩子是这些作文的第一读者。立平更是批改作文的语文老师，她鼓励我把里陂上村生活杂忆的作文归拢在一起，独立印成一本小册子，至少可以让我们当年在永丰县和鹿冈乡的知识青年们共享。

有人说，记忆就像筛子，少量留在筛子里的东西，也不怎么可靠。因此，作文中的舛误，还望当事人的有心人指正。

当年的知青，如今已垂垂老矣，我希望印刷时的字体能够大一点，好让我们这一辈老眼昏花的兄弟姐妹们，万一他们有兴趣的话，能够看得清楚些，不用太费眼力。

1. 毕业分配

196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已经两年了。

从1966年的6月开始，我们和全国的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停课闹革命”。为了“闹革命”，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窝蜂地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以及五花八门的造反“战斗队”，批判学校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批判各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好像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是真心地要保卫毛主席，要使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



文化革命初期，（从左至右）：建丰（作者）、建原、建新，均佩戴当时流行的毛主席像章。

到了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行了半年多，上海成立了新的政府“革命委员会”，要求各派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联合起来，学校里要“复课闹革命”。可是我们学校里的各派组织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根本没有条件“复课”，各派人马忙着“闹革命”。那情形就好像是打开了阿拉伯魔瓶的瓶塞，里面的妖魔跑出来以后，就再也回不到瓶子里去了。复课闹革命成了一句空话。

1. 毕业分配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革命的老师和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秩序，使得原本应该毕业的学生，无法正常地毕业。可是工厂里的老工人到了退休的年龄，依然要正常地退休。于是，上海的工厂里有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很多工厂希望能够尽快地招收新的工人，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建设。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学里有三个年级的初中生和三个年级的高中生，这六个年级后来统称“老三届”，我属于老三届里的“67届初中生”。

1968年5月左右，我们学校在1966年就应该毕业的66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了。5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市区的工厂，1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40%的同学等待以后再分配（俗称“待分配”）。

好像就在此时，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很快，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了上海所有的中学，我们学校也不例外，由“工宣队”来管理学校了。

到了1968年的8月，虽然没有人宣布我们这些1967届的学生已经毕业，但是我们已经面临着“分配工作”。分配的方案是：42%的同学到上海市区的工厂，8%的同学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50%的同学等待分配。

当时我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工作。哥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他的户口在大学里。按照当时分配的规定，像我这样的条件，可以分派到上海的工厂里工作，至少也可以到郊区的农场去。

可是当时正处在文化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父亲在接受“隔离审查”，被关在铁路局机关的一个房间里，交代他个人历史上的问题。房间外面日夜有人看守着他。父亲的问题没有查清，我受到牵连，很快成了“待分配”，

等待国家分配工作。

掐指算来，我从1958年9月到1966年的6月初，名义上读了八年书，中间除去一年病休（后来又跳了一级），实际上只读了七年书。

到了1968年10月左右，我们1967届学生的分配工作结束了，分派到上海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的同学陆续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

没想到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简单来说，毛主席要我们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农村要欢迎。”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经常要到学校里去参加政治学习，每个人都必须做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思想准备。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可能的去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林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插队落户，安徽省阜阳地区的亳县插队落户，江西省吉安地区的永丰县插队落户，以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独山县插队落户。另外，不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可以下乡到同一个地方去。农村有亲戚的，也可以去农村投亲靠友。

到黑龙江农场和云南林场去的同学，算是国家职工，每月有固定的工资，还有吃饭的食堂。但是到边疆的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到黑龙江军垦农场，路上要花三天时间。到云南边疆去，有一个星期的路程。

插队落户也是国家组织去的。学生以十个人左右为一组，由国家安排，插到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里去，集体落户，就是“插队落户”，简称“插队”。学生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农民一样记工分来取酬，叫作“同工同酬”。

至于到农村的亲戚家里去“投亲靠友”，那是属于学生

1. 毕业分配

的个人行为，国家基本上不管了。

我回家向母亲请教，我应该申请去什么地方。母亲说，江西比较近，又是吃米的地方，你申请去江西吧。



文化革命中，作者的母亲在家里的走廊上。

按照学校的规定，我们班级有一个去江西插队落户的名额，却有四个人报名。最后，老师说我身体弱小，决定让我去江西。我想，在父亲遭受“隔离审查”期间，自己能有这样的结果，应该是老师在暗中同情和照顾我呢。

去江西前，学校召集我们去江西的同学开会，我在会上遇见了68届乙班的崔应辉同学，定下来我去江西省永丰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具体分到先锋大队的哪个生产队去，得等我们到了那里，由先锋大队来决定。

接下来是注销上海户口。我凭着户口注销证明，购买了棕红色人造革皮箱一个，灰色棉毯一条，白色蚊帐一顶，米黄色搪瓷大口杯一个。我另外还买了手电筒、仿制的军用水壶、农村卫生手册等等。全部行李是一个铺盖卷和一个箱子。

（1989年，我把这个箱子带到美国，1993年第一次从美国回上海探亲时，箱子在上海虹桥机场粉身碎骨。）

临行前，母亲决定为我做一件短棉大衣。因为父亲的缘故，此时家里的存款已经被银行“冻结”，无法取出来，我们依靠每人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来度日。虽然家里还有布票，却已然没有余钱去购买做大衣的卡其布面料了。我看着母亲

在家中的衣橱里东翻西找，她先是抽出一条海虎绒毛领，又找到一段蓝色的人造棉布料。母亲抖了抖手中软绵绵的料子，说：“啐，将就点了，现在天天吃卷心菜。”

两天以后，我穿上了母亲做的棉大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面对即将远行的儿子，母亲的情意都缝在孟郊的《游子吟》里面了。几天后，我穿着这件新大衣，登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1969年3月3日上午，把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托运。下午，我到铁路局机务处的隔离室看望父亲，告诉他，明天我要出发到江西去了。我请父亲放心的同时，也请胆小的父亲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审查，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说的两条：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的意思，是请父亲尽量不要去抗辩。因为父亲的身边有人看管，所以其他的一切，均在不言之中了。

我看看旁边盯着我们父子俩的那个看管人员，他脸上的凶煞之气好像比以前少了一些，相对比较柔和了。也许是看见我即将下乡务农了，他生出些许的恻隐之心了吧。

3月4日午饭以后，我们到学校集合，上了一辆大客车，虹口区革命委员会的曲力主任上车来，和我们握手告别。



车厢上有毛主席语录

1. 毕业分配

到了上海北站，我在站台上的人群里，找到了前来送行的母亲。送别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启动。站台上的说笑声突然停止了，开始有了低低的哭泣声。哭声越来越响，很快哭声震天。母亲没有哭，她挥着手对我说：“自己多注意点。”我看着人群里的母亲，忽然想起自己的儿时，母亲用浓重的常州话教我读唐诗的情形：“车辚辚，马萧萧……，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是杜甫的《兵车行》。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我走的那天，她或许是受了火车站的站台上那震天的送行哭声的影响，意识到刚刚能为家里分忧担责的儿子远走他乡了，而尚在隔离审查的丈夫命运未卜，所以她在走回家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刚强能干的母亲啊，即使当初父亲四十多岁病危的时候，我也未见你擦过眼泪，所以我至今想像不出你大哭时的模样。

父亲则告诉我，虽然当时他没有来车站送行，但是他的“隔离室”在铁路局机关“老大楼”的六楼，靠着北站，窗子朝北，正对着车站的站台。他站在窗口看着我们的列车，伫立良久，直到我们的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消失在视野之外。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儿子走了。



作者读书的学校

2. 初到里陂上

列车是一色的硬座，车厢里很少有人哭，倒是有不少人在车厢里走动。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原来是我在中州路第一小学的同学吕振裕。他小学毕业后，考进虹口中学，这次去江西，分在鹿冈公社的立新大队（后为洋坳大队）。

3月5日下午，火车到了江西的樟树站，有一溜带着帆布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在等着我们。领行李，上卡车，车队向永丰县进发。我站在车厢里，身体随着汽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晃动，我紧紧地抓住车上的撑帆布篷的铁杠子。

天色渐渐暗了，卡车打开了头灯。

“快看快看！”不知是谁叫起来。我回身朝后望去，只见透迤的公路上，解放牌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明亮的头灯射出的雪白光柱在夜幕中移动，路边山上的树木随着光柱时隐时现。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新奇的景象。

车队到达永丰以后，我们在县城最大的永丰饭店住了一晚。

3月6日，卡车队分几路到各个公社。到鹿冈公社的车队中，我们的车第二个停下，其他的车晃晃悠悠沿着乡村简易的土石公路继续往前开。

“先锋大队到了，下车！”我们学校带队的工宣队小李师傅跳出驾驶室，到大队负责人老高家里讨论分配方案，他们要把我们分派到各个生产队去。

有一个同学得意地自言自语：“我研究过了，在农村，越是靠近大队部的地方条件越好。”（哈哈，他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他望着围观的老俵，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俵们看着我们这些据说是上海来的陌生人，大都不说话。一个老俵迟疑了一下，说：“先锋六队……袁家村……”

“好，我就要在六队。”那个同学说。

2. 初到里陂上

过了一会儿，小李师傅和老高过来宣读名单，只记得我和崔应辉是分到六队的。

大家已经知道六队是比较好的地方，有很多人不同意分派方案。想分到六队的那个同学很严肃地对农民说：“你们知道张春桥吗？他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我们上海的。”他话里的意思是让当地人不要小看我们。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张春桥是何方神圣。

一片吵嚷声中，小李师傅和老高宣布这个分配方案作废，改为自由报名。

“谁去先锋四队？”没人应声。静了片刻，崔应辉问：“四队有多远？”

“两里路左右，就在山那边。”四队来接人的张绍远队长应声答道。

崔应辉看看我：“怎么样？”

“我跟你。”我说。

崔应辉大声说：“好，我们中二乙班到四队，加上中三甲班的夏建丰一共七个人，到四队去。”我们学校是试行五年制的中学，学校里年级和班级的叫法和大多数学校不同。崔应辉是中二乙班的“头”，因为他们1968届的学生没有人分配到工厂，全部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所以每个班级到江西的名额要多一些。

“可以，不过人数少了，还要再加两个。”小李师傅说。

“我们中二甲班的两个女生过去，我们男生不要和他们在一起。”中二甲班的男生说。那时候，城里的初中学生中间“男女授受不亲”的现象十分普遍，男生和女生之间，平时基本上不说话。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跟着张绍远，向先锋四队（里陂上村）走去。身后那些还没有分配的同学，团团围住了小李师傅和老高。

我们走后，想到六队的那个同学如愿以偿，分在了六队。

而分到五队的同学立刻发现，五队离六队所在的大队部

只有二百米，而且还是公社所在地，太好了。

到里陂上村“插队落户”的九个同学是：中二乙班的崔应辉、薛志民、李桂英、王君薇，中二甲班的咸钊、郭芬，另外还有薛志民的姐姐薛和平、薛志民的邻居冯金生，最后是我夏建丰。我们四个男生五个女生组成了一“户”，却又和普通的农户不同，一般称作“集体户”，也称“知青班”，崔应辉任班长。

我们走了二十分钟，到了先锋四队，也就是里陂上村。

里陂上的村口有一道二尺高的木坎，我们迈过木坎进村，引来了零星的狗吠。狗们看见领头的绍远队长，就息住嘴，对我们摇摇尾巴，趴下了。几只猪在村里闲逛，时不时哼着用长嘴检查一下地面。三五只鸡缩在墙边，有的用爪挠一下头，有的忽然一抖擞，全身的羽毛张开，很像我母亲在上海晒台上养的鸡。

我们跟着绍远进了生产队的仓库。村民出工去了，只有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好奇地在仓库门口东张西望。多数孩子头上戴着传统的绣花虎头帽，颈上戴着银制的项圈，有的孩子头上则戴着呢子做的藏青色“解放帽”，是解放军戴的军帽样式。孩子们红扑扑的腮帮子上，明显有着黄褐色的皴皴条纹。有一个孩子死盯着我看，原来是发现了我新大衣上的海虎绒领子。他流出来的半截鼻涕正随着呼吸，一伸一缩地蠕动着。

绍远取出一挂红色的鞭炮，走到仓库门外，划一根火柴，点着了鞭炮，用传统的礼节来欢迎我们。在震耳的“叭叭”声和袅袅的青烟中，门口的那几个孩子兴奋地冲上去，紧张地搜寻着落在地上没有炸响的“哑炮”。我立刻回想起读小学以前，自己在上海的弄堂里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仓库进门的左边是两个木制的谷仓，墙边四散放着几架车谷的木制风车和一些箩筐。厅堂的中间有一些条凳，上面搁着铺板，这就是我们男生的临时住处。女生暂时住在村民家里。

2. 初到里陂上

我看见几架风车上一律用毛笔写着“先锋壹队”，而箩筐上有的写着“先锋一队”，有的写着“先锋四队”，心里有些不解，便问绍远队长。绍远告诉我们，19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时候，里陂上村就是“先锋合作社”的第一队。后来成立了“鹿冈人民公社”，我们是先锋大队的第一生产队。前两年巷口大队和先锋大队合并，里陂上村便成了先锋四队。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写着“先锋一队”的箩筐看上去旧一些。



箩筐，村民称作箩。

我又问绍远，里陂上是什么意思。还有，里陂上的“陂”字，为什么不念“皮”而是念成“逼”？

绍远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们村就叫里陂上，“陂”的意思是我们每年要在河里作陂引水。

绍远首先介绍村里的政治情况，他说，里陂上大多数人家姓张，只有两三家外姓人。没有地主富农，基本上都是贫农和下中农。不过，去年从永丰县城里下放来了三家，分别是解放前的伪保长、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

绍远领我们来到一幢破旧的大房子里，介绍说，这是原来村里的祠堂，解放后在土地改革时分给了村民。现在祠堂的后厅和两边的后厢房空着，准备让你们上海佬住。



1998年，里陂上村的祠堂是年久失修的砖屋。

我们进到准备给男生住的厢房里一看，宽不到三米，长约六米，黑乎乎的没有窗，泥土的地面。房间的一端是篱笆，篱笆的另一边是前厢房，住着村民周恩绍一家。

后厅里有人正在为我们煮饭，绍远说这是张发茂，原来也做过队长。李桂英马上说：“老队长好。”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里面的老队长是个立场坚定的好人。从此以后，发茂就成了里陂上的女知青口中的老队长，我们男生多半叫他发茂。

晚饭后，大家感觉累了，我们男生到仓库里，在铺板上打开铺盖睡觉。我翻出带来的学生字典，在油灯下查看，发现里陂上的“陂”字，按照普通话应该念作“杯”，陂的意思是池塘。这和绍远队长说的“作陂²引水”有些不一样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翌日起床时，只听见崔应辉在那里大叫：“袜子，我有一只袜子不见了。”我马上想到自己昨晚压在枕头底下的袜子，连忙翻开枕头一看，袜子还在。崔应辉最后在墙角找到他那只绛红色的袜子，已经给老鼠咬破了。发茂来叫我们吃早饭，我们抱怨有老鼠，他笑着说：“家家都有老鼠，仓库里老鼠当然更多了。”啊，课本上读过“官仓老鼠大如斗”，仓库里的老鼠确实厉害。

第二天，工宣队的小李师傅来里陂上村看我们，关照我们先不要出工。他认为大队和公社对知青的安置工作不够重视，做得不好，他正在和公社交涉，还准备到县里去反应情况。我心想，不让我们出工也成为他交涉的筹码，难道是他把解放以前上海工人罢工的传统带来了？

第二天晚上，吹熄了油灯，我们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在黑

²几十年以后，我看到书上说，从明朝开始，江西的山区有一种小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叫作“陂”。“陂，壅也”，“小港小溪截其流以为陂”。怪不得里陂上村在芮源水库建成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村民年年要砍下大量的脚柴（灌木），壅塞在村前面的小河里，作成一道陂，用来抬高河里的水位，引水浇田。这应该是里陂上村名的来源吧。我想，鹿冈地区的村名中，大凡带有“陂”字的村落，比如芦陂、潺陂、里陂上、东陂上，等等，都应该是坐落在小河边，因为可以在小河里作陂引水，所以成了村名的来源。

2. 初到里陂上

暗中睁着眼睛，静静地等待老鼠的出现。果然没过多久，老鼠们开始在楼板上活动起来，跑来跑去，跳上跳下，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墙角那边也有老鼠吱吱叫，有息息索索的响动。突然一只老鼠从我们睡觉的铺板上沙沙地穿过，我赶紧把头缩进被子，一动不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很快我们就离开仓库，搬到祠堂里住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吃饭用的方桌和条凳是从张梅发家借的，睡觉的铺板是从张发茂、张梅魁和周恩绍家借的，晚上点的油灯是张梅魁家的。水桶是借的，水缸是借的，连尿桶也是从村民家里借来的。



尿桶

我们还知道，根据上面的要求，生产队很快会在祠堂的厢房里开窗（没有玻璃），还会请木匠给我们打一张吃饭的方桌和四条长凳，给每人打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板凳（小板凳现在上海祥德路的家里）。当然还要用两只尿桶，男生和女生房间各一只。

又过了几天，工宣队小李师傅匆匆来到里陂上村，要求我们尽快出工。

他已经接到通知，这一次的任务结束了，他马上要返回上海。小李师傅说，经过交涉，永丰县按照民政部门的移民政策，会给供应我们六个月的商品粮，还会有一点安家费³。六个月以后，就全靠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了。

小李师傅走后的第二天，我们扛着锄头上到了水库工地，真正的农村生活开始了。那一天好像是1969年3月16日，应该是我隔离中的父亲发工资的日子，他不知道怎么样了。

日常生活离不开水，我们开始用水桶挑水了。我们的住处村子的一头，而村里唯一的土井却远在村子另一头的村

³当时国家安置知识青年，发放了安家费，各处的使用和分配有所不同。记得我们从安家费里曾得到每月15元、持续6个月的生活补助费，第一笔钱是由发茂带我们到鹿冈商店，给我们买了两个水桶（共4.50元），两盏煤油灯（共1.92元，男生和女生各一盏），每人买了一件蓑衣（6.50元），一顶斗笠（0.65元），一把锄头（镢仔，2.10元），还买了5斤鸭蛋（每斤0.80元）作为我们吃的荤菜。

外。（土井在 1990 年代废弃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机井，用电泵来抽水。）



左：里陂上村的土井 右：挑水的水桶

我们每次挑水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整个村子，有的老倬还会伸长脖子，看看我们的桶里有多少水。

桶里的水当然不多，我们男生挑水是每次两个半桶，水多了挑不动，走路时两腿会打绞丝，水桶里的水就会晃荡，人也被带着晃起来，就更加走不稳了。女生比我们更惨，她们两个人抬大半桶水，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跌跌撞撞地前行。记得有一次两个女生抬水，好不容易到了祠堂门口，走在后面的女生涨红着脸一迈门槛，脚下一绊，水桶摔到地上，散成了块块木板，桶里的水顿时在泥地上流淌开去。

住在前厢房的周恩绍赶紧过来帮忙。他用破开的竹子穿插成圈，重新给水桶打了一上一下两个箍，水桶修好了。他说：“你们用安家费买来的水桶，打的是‘花箍’，好看但不结实，我给你们打的是‘缠箍’，没那么好看，可是比花箍结实多了。老话说‘花箍花眼前，缠箍用三年’，好看不如实用。”

过了几年，我们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农活，挑水更是不在话下。挑起满满的一担水疾走，两只水桶里面仅仅是略有涟漪，水波不惊。可是里陂上村的老倬，尤其是村里的妇女，很多年以后聊起我们刚开始挑水时的狼狈模样，还常常会笑弯了腰。那是他们生活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和笑料。

十年以后的 1979 年 2 月底，我告别里陂上村的时候，

2. 初到里陂上

好几次问过我不同的村民朋友：“如果人的一世有六十年，以十年来算的话，哪一个十年最重要？”

他们稍一思忖，很快就有一个相同的答案：“是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这是每个村民成家立业的十年。

这时候，我就用力地手指着地面回应：“是的，我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就在这里。”

我带着一张中国人民银行的托收转账支票离开了里陂上村，支票的面额是人民币二千元。后来有人说，1979年的二千元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我也很想知道这些钱在当下的价值是多少。

如果按照国内水稻的收购价来算，当年一百斤籼稻的收购价是九元五角，现在是一百三十元，因此这些钱大约是人民币二万七千元。

要是换一种类似“购买力平价”的算法，当年我的收入除了养活自己以外，这笔余下的钱还可以养活至少两个人。我现在住在美国，美国的贫困线大约是年收入一万二千美元，两个人十年的最低消费就是二十四万美元。

当然，我个人这十年的经历，绝对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

我带着村民们自动自发送给我的锦旗，离开了里陂上村。锦旗的中间是四个字：“遗爱待民”，落款是“里陂上村全体社员敬献，79.2”。“遗爱待民”，好像有点古意的。

我是最后离开先锋大队的上海知青，大队决定免费用拖拉机送我到火车站。

里陂上村派了四个人坐在拖拉机上一路送我。

唉，我的眼睛怎么有点湿润了？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留在了这里，留在了里陂上村。



离开里陂上村时，村民送给作者的锦旗。

3.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江西省是中国主要的水稻产区之一，里陂上的村民祖祖辈辈种水稻。村里有六百多亩水田，其中三百五十亩在一个平整的大塍上（“塍”是较为开阔平坦的一大片水田），可算是整个鹿冈乡最集中最平整的塍。其余的水田分散在四周的山坑里，一色的梯田，最远的梯田距离里陂上村要走二十多分钟。

里陂上村的水田绝大多数种早稻，只有那三十多亩的“大水田”要等到春天雨季的大水（洪水）在田里流过后才能耕种，所以只能种晚稻。种晚稻，村民称作“栽大禾”（古书上亦如是）。另外，村里还会种三十亩左右的糯稻，糯米最主要是用来做米酒，那是村民常年必备的饮料。此外，端午节包粽子、过年打麻糍（把蒸熟的糯米打烂）也要用糯米。

一、守秧田

里陂上村是田多人少，平均每个全劳力要摊到三十亩水田。所以每年的农历正月一过，就要开始春耕，否则到时候忙不过来。

春耕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做秧田。普通的水田要耖三遍，耙四遍，“三耖四耙⁴”，把田弄得非常平整以后才能插秧，秧田还要增加一耖一耙，更加细腻。

中国的季风气候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年同期的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非常大，江南经常有倒春寒。有时明明已经是桃花盛开一片红，梨花怒放一片白了，倒春寒一来，气温猛然下降，又开始打霜了。只要打霜三四天，秧田里已经播下去

⁴三耖是指：1) 水稻收割以后，秋天“耖禾蔸”，2) 第二年早春“耖白水”，3) 栽禾以前的“顺田”。

四耙是指 1) 耖禾蔸以后的“耙岬老”，2) 和 3) 耖白水以后的“横田”，要耙两遍，先横耙一遍，再竖耙一遍，4) 顺田以后再耙一遍，就可以插秧了。

3.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还没有发芽的种谷就会烂掉，已经发芽甚至长到一寸左右的嫩绿秧苗也会成片发黄死掉。当时还没有大棚技术，我们曾经试过在田边烧几堆火试着让秧苗取暖，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农民想出各种办法来保证春天能有足够的秧苗栽到田里去。要不然，秋天收不到粮食怎么办？

首先，要错开播种的日子。每过几天播一批稻种，使得短暂的倒春寒不会一下子冻烂所有的秧苗。

其次，要有足够的余量。如果有五百亩早稻田，要准备六百到七亩田的秧苗。

第三，如果秧苗不够而别处有富余，可以去别处商量讨要，对方一定会慷慨允诺，而且分毫不收。人怎么能胜过天呢，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年会不会要向别人去讨秧苗。

第四，如果老天肆虐，使得友邻的几个队都缺少秧苗，就要设法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去偷。要是偷摘秧苗被当场捉住，停手回家就是了，对方只会厉声叱骂，不会加以处罚。毕竟作怪的是老天爷啊。

第五，因为怕有人来偷秧苗，所以必须派人看守秧田。秧田都是离村庄最近而且最肥沃的田，白天村民进进出出，没有人敢来偷秧苗。看守秧田是在夜晚，必须守在田头整夜不睡，虽然可以记一天的工分，还是比较辛苦，很少有人愿意看守秧田。

我仅仅看守过一次秧田，偏偏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吃过晚饭，我是生产队的记工员，要在村民拿来的“工分簿”上，记录他们当天的出工情况，叫作“记工分”，类似现今的“考勤”。记好工分，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我搬了两只打谷的四方禾桶，在秧田边上分别竖起来，足有一人来高。禾桶的上面相向拼拢，下面形成一个空间，放上铺板，铺上稻草。我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和手电筒，钻进禾桶，点上队里的马灯，开始看书。只要有灯亮着，就表示

这里有人在看守秧田，别人不会轻易冒险来偷秧。



用扁担来掬起打稻谷的禾桶，禾桶俗称“禾屏”。

我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疲倦，便打开了收音机。

晚上十二点多，天上开始洋洋洒洒地下雨了，滴滴答答的雨水沿着禾桶的边沿，漏到了我的“铺”上。我一阵手忙脚乱，没有什么实际效果。雨越下越大，流进禾桶里的水成了一条直线，从禾桶边上挂下来。我只好缩到禾桶的一个角落里，胸前抱着书和收音机，希望它们不要被雨水打湿。

突然，四周连片的蛙鸣声停了下来，只有雨水的沙沙声。我感觉有点异样，难道有人趁着下雨来偷秧苗？我顿时警觉起来，头伸出禾桶，试着观察我们的秧田。但是眼前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决定暴露自己，打开手电筒，朝着秧田一通乱射。一切正常。

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从禾桶的另一边伸出头去一看，愣住了。

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山脚下，有一长队的人影在悄无声息地缓慢移动。有人头戴大斗笠，穿着蓑衣，打着火吊。因为下雨，照明用的火吊周围有一团光晕。有人戴着小斗笠，身披化肥塑料袋做的雨披，手电筒的光柱晃动着，那是比较新潮的人。

相隔这点距离，如果有人说话，纵然是在下雨，我应该能够听见，村里各户人家的狗更能够听见，它们早就应该吠

3.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声连连了。可是我只看见人影在移动，却没有一点人的声音。我有点悚然。



蓑衣和斗笠

难道是鬼吗？我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我连忙打开胸前的收音机，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放的革命歌曲的音量放到最大。

那些人影肯定可以听到革命歌曲的声音，却没有一个人影朝我这边看。

足足有几分钟，眼前的景象才消失。

雨还在下，周围的青蛙们又恢复了大合唱。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如果那些人影真的是人，走过去了应该还会回来的。

我缩身坐在禾桶里，点着灯，开着收音机壮胆，眼睛望着禾桶外面的山脚下。

外面的颜色渐渐地从漆黑变成深灰，变成浅灰，变成灰白，村里的鸡叫了。那些人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天亮了，雨停了。我回到村里，向那时的队长张发茂报告昨晚的怪事。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到了那天下午出工的时候，发茂告诉我们，整个鹿冈最大的生产队，先锋六队（袁家村）的人今天上午一直在兴奋地谈论一件事：他们昨天夜晚冒雨走小路，经过里陂上村的北边，绕到芮源村去偷秧苗。他们得手以后，顺着大路，浩浩荡荡说说笑笑地回到了自己的生产队。

原来如此。

二、摘秧栽禾

每年三月开始春耕以后，就要做秧田，播撒种谷。看着秧田里绿油油的早稻秧苗一天天长高，到四月初的清明节过后，早稻就要拔秧和插秧了。里陂上村把拔秧叫作摘秧，把插秧叫作栽禾。这个季节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我们刚下乡，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农活不会干，每天就是摘秧和栽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集体化生产。除各户少量的自留地由农民个人自行耕作外，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由队长安排和指挥。村民出工、收工，要听从队长的号令。清早，生产队长的哨子响过第二遍，我们这些“上海佬”也跟着大伙，三三两两地来到秧田边，卷起裤脚，下到冰冷的水田里，开始学习摘秧。

秧田里的水有两寸来深，早稻的秧苗很密，不难摘。右手摘起一小把秧苗放到左手，右手继续摘秧。等到左手的秧苗有一大把了，就抓紧秧苗，在水里洗净秧苗根部的泥，然后用一根稻草（村民称作“杆”）拦腰扎紧，这样就是一只秧。很快，秧田里响起一片咚咚的洗秧声和大伙的谈笑声。

队长看看东边升起的日头，差不多到收早工的时间了，他一声吆喝：“吃饭！”大伙便就着田里的水，纷纷洗脚回家吃早饭。这里吃饭的“吃”字，村民的读音是“恰”。

早饭以后，我们把早工时摘好的秧，堆装在篮攀里，挑到大田边上。村里的妇女也来了，她们带来了用杉木做的蘸秧的秧盆，加进一点买来的“钙镁磷”肥料，又从田里捧了一些泥浆和水放在盆里，和肥料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秧苗的根部在秧盆里的泥水中蘸一下，沾上肥料。这样可以使秧苗栽下以后返青快，长得好。里陂上村十来岁的孩子多数辍学在家了，他们在家长的催促下来到田里，负责给我们栽禾的人递送秧苗。

派两个人负责在田里“打格子”。他们有两根一样长的

3.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细竹竿，加上一大团缠绕在木棍上的长长的稻草绳。二人分别站在一坵田两边的田塍（田埂）上，量出一竹竿的长度，用草绳两头的木棍插进田塍，让草绳笔直地穿过整坵田。然后他们沿着草绳插秧，到田中间会合。移开草绳从远处看，刚插下的秧苗就是一条绿色的直线。打格子的人反复操作，田里就有了一一个个同样宽度的绿格子。

细竹竿长三尺五寸，是上级派来的干部亲自监督村民制作的，这是每个绿格子的宽度。格子里要栽六蔸禾苗，禾苗的间距是五寸，正好是上级领导要求“合理密植”的尺寸。

可是里陂上的村民认为，每蔸禾苗要吸收的养分是一样多的，他们习惯在靠近村子的好田里栽得密一些，远处山坑里的薄田要栽得稀一些，怎么能用一根竹竿来规定死呢？等干部一走，村里就重新制作了细竹竿，长度是四尺二寸，在附近的田里就用它，到了山坑里再放开一尺。

栽禾的人负责把绿格子填满。抓起一只秧打开，握在左手上，左手拇指从中轻轻捻出五、六根秧苗，右手取过了分出的那些秧苗，栽到田里，双手的配合很像发扑克牌时的动作。在格子里栽禾，每行栽六蔸，人逐步往后退。秧苗栽得太浅会漂起来，栽得太深会闷死。我们很快学会了栽禾，而且仗着年轻，栽得飞快，赢得村民们一片喝彩。



打格子栽禾

栽完一坵田，直起腰来，沾满了泥水的双脚站在田塍上，挺挺酸胀的腰身，转动僵直的脖子，顺便看一下四周。旁边

一坵田里是我们昨天栽下的尚未返青的禾苗，少量泛黄的禾叶平躺在水面上，不如脚下刚栽的禾苗那么鲜嫩。再远一些是我们前几天栽的禾苗，它们已经返青了，直立在田里，一片青绿，禾叶正随风摆动着。

我沿着田塍，走到要栽禾的那坵田边，田里的水还有些混浊，说明这田刚耙好不久。抬眼望去，不远处有村民正在耙田和耖田，间或传来了使唤耕牛的吆喝声。远处没有栽禾的一大片田里都灌了水，不很规则的田塍把它们分隔成了一面面各不相同的镜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一阵和暖的春风吹过，带来了树林里鸟的叫声：“……鸪的鸪鸪……鸪的鸪鸪……”，村民说，这种鸟的名字就叫鸪鸪。鸪鸪？好像就是斑鸠吧，记得小学里有一首歌：“小斑鸠，叫咕咕，我家来了个好姑姑……”

远处有另外一组村民正在栽禾。我听不见他们的喧闹声，多数是因为他们栽禾的时候和我们一样，节奏太快，顾不上说话了。远远望去，他们个个戴着斗笠，多数人在弯腰栽禾，好像是趴在水面上。有人站起身来，接过小孩递送过来的秧，朝两边张望了一下，又弯下腰去，继续栽禾。

村民只要出工就可以“记工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往往会有“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到了栽禾的时节，必须要抓紧农时，否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年的收成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为此，里陂上村分成了两个“耕作组”，展开劳动竞赛，按照栽禾田亩的多少来记工分，看谁拿的工分多。到后来的几年，“耕作组”越分越多，只要两家以上就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组。按照这种趋势，一家一户分田单干是早晚要发生的事。

“面朝黄土背朝天”，我整天弯着腰摘秧和栽禾的时候，常常会想，为什么一定要先摘秧，再栽禾呢？有没有更加简单方便的办法来种水稻呢？

有一年，上级领导说可以搞“水播水育”的直播法实验，就是直接把少量的稻谷按照一定的间距播在田里，任其生长。

3.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说是这样既不用摘秧，也不用栽禾，还节省了种子。

里陂上村选了一坵好田来做直播实验。我们把发了芽的种谷直接点播在耙平以后的田里，没几天就长出了嫩绿的秧苗。因为有一点缺苗的现象，我们又补播了一点种谷。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是，在水稻秧苗生长的同时，各种杂草也在生长，除草十分困难。最终收割以后，我们用大秤一称稻谷，这坵田的亩产比较低。

按照村民的说法，摘秧的时候，秧苗的根部受了伤，栽到大田以后，禾苗为了恢复正常，就拼命吸收养分，所以长得特别快，产量会高一些。而直播法的秧苗根部没有受伤，长得慢，产量就低了。

我后来看到书上说，摘秧栽禾这种称作“秧播”的技术，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随着大规模的移民，从黄河流域传到长江流域来的。“秧播”主要是为了去除杂草。秧苗长到七八寸高，拔出来移栽到没有杂草的大田里，几天以后就恢复正常生长了。它们和身旁才刚刚发芽的杂草来争抢阳光、水分和肥料，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优势。“秧播”的结果是产量提高了。

“秧播”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水稻在大田里的生长期。比如一种早稻的生长期是一百十天，它在秧田里生活三十天，移栽到大田里以后，只要八十到九十天就成熟了。水稻最怕打霜和冰冻，如果早稻收割以后紧接着栽种“连作稻”，大田里全年的绝对无霜期必须得在一百九十天左右（其中包括了割早稻和栽连作花费的时间）。里陂上村每年从四月上旬到十月中旬绝对无霜，完全符合要求。要是没有“秧播”技术，村里的大田一年只能收割一次水稻。

每年春天栽禾的时节，我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在春风和煦，艳阳高照的日子，我只穿一件蓝色的汗背心下田栽禾，让温暖的阳光触摸我的肌肤。穿了一个冬天的长衣长裤，我的肌肤已经返白。即使我每天栽禾只晒半天，身上还是会麻辣地疼几天。

经过一个春天的锻炼，到了盛夏，我的皮肤已经晒成了古铜色，再毒的日头也不怕了。有时候在田里工作，突然下起了阵雨，我那经过阳光晒烤的肌肤特别紧致，就像牛皮一样，雨滴落上去不会散开，而是紧缩成珠，飞快地滑落到田里。

我从田里回去吃饭，有时候把蓝色的背心脱了，别人会以为我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那是我身上没有被太阳晒黑的部分。

说来可笑，我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只需穿一件汗背心，这样洗起来比较方便。我当时不知道，阳光中的紫外线会使人容易得皮肤癌。但事实上，我在农村的十年里面，里陂上村并没有人得皮肤癌。

几年以后，我在里陂上村基本学会了各种农活，唯独摘秧还是不行。摘秧的快手一个早工可以摘二百只秧，我最多只能摘一百只，而且秧的根部对不齐。照村民的说法，那杂乱的秧根就像是“黄蚁上树”，参差不齐，这样会给栽禾的人带来困难，还会降低秧苗的成活率。

记得曾在什么书上读到，好像是苏联早期的领导人列宁说过，要向资本主义的工业学习其合理的部分，用来提高生产效率，比如“泰罗制”，它把制造工艺和工序分解到最简单，让工人重复进行最简单的劳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动作，就可以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弯腰摘秧

3.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我想，肯定是我摘秧的过程中有不必要的动作，才造成摘秧的效率低下。于是在一天出早工摘秧前，我跟队长说，今天我不要早工的工分，我要学摘秧。队长困惑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我猜想，他心里一定觉得很奇怪。

那天早上我没有下田摘秧，而是蹲在摘秧最快的人身后的田塍上，仔细分解摘秧的动作：

右手的手心向后，食指和水面平行，伸入秧丛，食指贴住水下的泥，一下两下三下，手中一大把秧，就势往身边一拖，秧苗出水……左手洗秧的同时，右手去抽扎秧的稻草……。

这天晚上记工分的时候，记工员还是给我记了早工的工分，说是队长关照过了。

从此以后，我一个早工也能摘二百只秧。

早上摘的秧，应该可以满足整个上午栽禾使用。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有时是早上摘秧的人手少了或者是偷懒了，有时是上午栽禾的人“发鸡爪疯”，突然兴奋起来加快速度了，总之是秧不够了，却还没有到收工吃午饭的时候。村谚说：

“栽禾是霸占，割禾（割稻）是抢劫”，听着怪吓人的。其实意思是说，栽种和收割的季节性很强。栽禾时要用一切办法，尽快把所有的水田用绿色的秧苗占住，这就是“霸占”。同样，在割禾时也要用一切办法，尽快把成熟的稻谷抢回家里来，这就是“抢劫”。用文明的语言来说，就是“抢种抢收”或者是“抢收抢种”，反正脱不了一个“抢”字。

因此，我们平时可以偷一点懒，但是栽禾的时候不行。一旦发现秧快要不够了，队长或者组长会立刻点将，选几个摘秧的快手马上赶去秧田里摘秧，以最快的速度向栽禾的人提供“弹药”。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是会被点名去摘秧，我可是村里有名的摘秧快手啊。

现如今的里陂上村，已经是在育秧盘里育秧，不用摘秧了，栽禾也被抛禾所取代，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了。这几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三、蚂蟥

我很早就听说水田里会有蚂蟥，可是我们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到农村去劳动，只参加过割稻和割麦，田里是干的，没有水，所以没有和蚂蟥打过照面。

在里陂上村摘秧的第一天，我卷起裤腿，小心翼翼迈进水田，双脚踩进细腻秧田泥土，清冷的感觉沁入心田，很刺激。

工作了一会儿，我觉得到小腿上好像有点异样，仔细一看，失声叫了起来：“哎呀，是……蚂蟥！”我急忙从泥里拔出腿，在蚂蟥的上下左右用力拍打。书上说，这样拍打引起的震动可以使蚂蟥受不了，它会停止吸血，自动脱落。书上还说，如果掐住蚂蟥硬拔硬拉，有可能拉断蚂蟥，使蚂蟥的头部和吸盘留在伤口里面，会引起伤口感染发炎。

一定是这只蚂蟥没读过书，不知道书上的道理，它不肯脱落。村民张寿仁见蚂蟥不肯下来，边走过来边笑着说：“一只王蛭。”他过来掐住我腿上的蚂蟥，一拉一甩，蚂蟥就飞到了下面一坵田里面。哦，这里把蚂蟥叫作王蛭（蛭的读音如“气”），好文雅的古字古音呢。我仔细地检查小腿上的伤口，伤口很小。我不知道蚂蟥的吸盘是否断在伤口里面，伤口还有一点渗血，书上说蚂蟥有抗凝血素的，这血什么时候能止住呢？

寿仁看我一脸忧愁，笑着说：“我来给你打一个箍。”他抽出一根绑秧的稻草，仔细地压在我腿上的小伤口上，再在腿肚上绕一圈，打一个结，箍住伤口，起到了绷带的作用。

虽然大家都在弯着腰摘秧，我还是看见有人瞟我一眼，嗤嗤地偷笑，还有人在低声议论刚才的事情。我有点为自己刚才的举止感到不好意思了，就马上弯腰低头，继续摘秧。

后来我知道，稻草、松针和多种树叶本身就有消炎止血的作用，比单用卫生院里那白色的绷带要好一些。我在里陂上村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蚂蟥叮咬而引起伤口感染的事情。

3.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从那以后，如果有人从水田里上来，腿上用金黄色的稻草打了三四道箍，我知道那人只不过是让蚂蟥叮了三四次而已。

村民说：“王蛭听水响”。只要人一下水田，蚂蟥听到水的响动，就会一扭一扭地游过来。是吗？蚂蟥没有耳朵，怎么能听见？应该是蚂蟥感受到了水波的震动才向震源方向游过来的吧。

还有一种办法对付蚂蟥，就是在腰上绑一个小竹罐，里面放些石灰。从腿上抓下蚂蟥，放入竹罐，蚂蟥几秒钟以后就一动不动了。

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好处是，很多人一起下水田，田里蚂蟥的总量不变，每个人被叮到的概率要小很多。人多了，大家还可以互相关照，有时蚂蟥刚叮上来，甚至还在水里游着向你靠近，就被其他人发现：“老夏，有王蛭。”我便立刻看看自己的双腿，再用眼睛扫描一下附近的水面，看看蚂蟥在哪里。

即便如此，蚂蟥也常常有得手的时候。一天早上摘秧，收早工回来吃饭的时候，薛志民穿着黑色凉鞋走在我前面。刚进大门还没到饭桌前，我发现志民右脚凉鞋的后跟处，正在往外滴血，便赶紧叫住了他。他脱下鞋一看，凉鞋后跟处有一滩血，他立刻冲到最近的水塘里去洗脚洗鞋了。

蚂蟥悄悄叮在你腿上，而你却没有发现，它就开始吸血。它的身体可以从一寸长一分宽开始，慢慢变胖，直到变成一个食指的模样。蚂蟥吸饱了血以后会自动脱离，这时候的伤口比较大，由于蚂蟥带有抗凝血素，伤口会继续出血，而你却感觉不到。薛志民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听村民说，过去水田里的蚂蟥更多。这几年用了虫药（农药）和化肥以后，水稻的产量增加了，可是水田里的蚂蟥和小鱼少了很多，泥鳅挖不到了，连天上的老鹰也少了。

我知道，我们平时往稻田里喷洒农药和施撒碳酸氢铵肥料以后，常常会有成片的一寸多长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在水面上。天上的老鹰飞下来吃了有毒的小鱼，也会呜呼哀哉了吧。

4. 夏：双抢大忙

几十年过去了，每逢想起当年里陂上村每年的双抢大忙，我的心里就会后怕。双抢的持续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会把人逼到体力的极限。

双抢包括抢收和抢种。抢收是尽快地收割早稻，抢种是在割完早稻的田里尽快地种上二季晚稻，也就是村民俗称的连作稻。

初夏时分，艳阳高照，淡蓝色的天空中，有几朵白云在缓慢踱步。里陂上村那大片绿中泛黄的稻田里，稻子在和煦暖风的拥抱下欢快地跳着摇摆舞。经过了扬花、吐穗和灌浆，稻穗已经沉甸甸地弯下来了。

开镰收割的日子一天天地近了。



水稻成熟，开镰收割的日子一天天地近了。

开镰收割以前需要“估产”，抽样估计每亩田能收多少稻谷。我曾经在里陂上村口的稻田里，选了最长的一个稻穗，细细地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七十多粒稻谷，说明这块田的亩产应该会有一千斤。可是离村子越远，亩产就越低。到了山坑里的冷水田，亩产往往只有一百多斤。

里陂上村里为即将到来的双抢修补和添置了相应的器具，仓库里的两个木制谷仓也已经清扫干净，只等着新谷入仓了。

一、抢收抢种

到了七月中旬，稻穗上八九成的稻谷已经发黄成熟了，可是稻穗的下部还有一点青绿色的稻谷，再有十来天才能成熟，要是现在就开镰收割，未免有些可惜了。但是双抢要持续将近两个月，如果不提早开镰，以后来不及收割时，田里的稻穗会由于过熟而自动掉落，反而损失更大。应该动手抢收了。

开镰的第一天，天色刚刚发亮，我们带着割稻用的各种用具，踏着浓重的露水，来到了田头。割稻的时候村里分成了很多小组，以家庭为单位，一般是两家在一起，共用一个脱粒用的禾桶。

割稻的人弯着腰，唰唰地用带着尖齿的禾镰飞快地割稻，把割下来的稻做成大小适于双手合握、便于脱粒的“禾坎”。



把割下来的稻做成大小适于双手合握、便于脱粒的“禾坎”。

当割清了一小片稻田，便由两个人把禾桶拖下田，负责打稻。他们用竹编的折子把禾桶上方的三面围好了，以防止打稻的时候稻谷撒到禾桶外面去。打稻的人双手握紧禾坎下部，把稻穗部分用力朝着禾桶的樟木做的脱粒板上砸去。咚的一声响，谷粒“撒拉拉”地落到了禾桶里。要用力打四五下，才能把稻穗上已经成熟的谷粒打下来。打稻的两个人在对打的时候，你一下，我一下，响亮的“咚咚”声在晨曦里，在清湿的空气中四散开来。

很快，四处响起了打稻的声音，有节奏的“咚咚”声此起彼伏，仿佛敲响了丰收的大鼓。



用禾桶打稻，俗称“发禾”。

太阳慢慢地往上爬，露水不知不觉地干了，禾桶里的稻谷越来越多了。

捡稻穗（禾穗）的孩子三三两两地来到了田里。他们只有四五岁，腰上系着装稻穗的竹篱子，有的孩子走路跌跌撞撞的，好像还没有睡醒。

正在割禾的人看见自己的孩子或者弟弟妹妹来捡稻穗了，有时会悄悄地落下一点稻穗，让他们捡回家里去喂鸡喂鸭。少数调皮的孩子会乘我们不注意，一把拉出还没有脱粒的禾坎上的稻穗，匆匆地塞进腰间的竹篱里。

割稻是抢收，速度越快越好，常常一不小心，禾镰就会割破手指。手指割破了，看着血慢慢地流出来，滴在地上，大约要过十秒钟，才开始感到麻辣辣的疼痛。直到现在，我左手的每个手指上，当年那禾镰拉过后留下的疤痕，还是隐约可见。



作者当年割稻用过的禾镰

4. 夏：双抢大忙

国家推广的矮脚水稻虽然产量高，脱粒却很困难。只要“咚咚”地打稻两天，后脑壳会震得发痛，十个手指尖上的皮也磨掉了，开始出血，俗话说十指连心，非常痛。我们从来没有工作手套，得用橡皮膏缠住手指，才能继续工作。村民们会用旧衣服撕成布条，缠在手指上继续打稻。

1970年代初，永丰县农机厂开始制造滚筒式的脚踏打谷机。打谷机很贵，要一百多元钱才能买一架，又很重，在稻田里拖动更吃力，可是大家很喜欢用。毕竟用打谷机脱粒比禾桶脱粒要轻松，至少手指不会磨出血来了。



侧翻的打谷机是为了防止下雨时进水。
稻草扎成圆锥形，村民俗称“总杆”。

到了大约上午九点钟，我们饿得发慌，是回去吃早饭的时候了。打稻的人用谷筛来筛去禾桶里的少量禾秆，然后把稻谷装进空箩里。与此同时，割稻的人开始把脱粒以后的稻草一把一把地扎好，在田里竖成一个个圆锥的形状。这样，稻草很快就可以晒干。到了冬天，稻草既可以作为耕牛的饲料，也可以垫在篾席下面，使得村民晚上睡觉可以暖和一些。

我们从稻田里把稻谷挑到生产队仓库后面的晒场上。晒场上铺放着几十张晒谷子用的大篾席（晒簟），每张大篾席有七尺来宽，十几尺长。

上午的太阳刚刚从松树林后面探出脸来，温暖的阳光斜斜地洒落在晒场上。负责晒谷的妇女们头上的发髻盘得光溜溜的，宽大的裤脚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摆着。她们手里拿着晒谷用的谷耙，站在大篾席上，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眼睛发

亮，笑吟吟地招呼着我们把稻谷挑过去。



左：用晒簟来晒干稻谷右：晒谷时用的谷耙

仓库保管员用大钩秤来称稻谷。他一边记录，一边朗声说道：“老夏，一百二十八斤，去皮（箩重）八斤，记一百二十斤。”这是晚上给我记工分的依据。

我把箩里的湿谷倒在晒场铺着的大篾席（晒簟）上，挑着空箩回去洗脸吃早饭。晒谷的妇女在我身后飞快地把稻谷耙开耙匀了。根据天气的好坏和气温的高低，每隔一段时间她们要“翻谷”，用谷耙把稻谷翻一遍。

到了下午，晒干了的稻谷进仓前，她们要“车谷”，用风车把已经晒干的稻谷吹去其中不饱满的瘪谷，然后把新谷收入仓库，成为我们的口粮和交给国家的公粮。



风车。用手把摇动木制的叶片，吹去瘪谷。

4. 夏：双抢大忙

抢收之后马上是抢种。割完早稻的田刚空出来一到两天，田里就开始放水、犁田，再用耕牛拉着木头做的滚子，把水田粗粗地碾平以后，当天就栽上第二季稻（连作稻）的秧苗。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各级领导都要求增加连作稻的面积。里陂上村是在公路边上，几乎每年都有公社的干部来村里“蹲点”工作。农忙的时候，他们经常吃住在村里，认真督促我们完成“抢收抢种”，特别是完成三百亩连作稻的抢种任务。

栽连作稻正是“七月流火”的时候。到了下午二三点钟，我们吃完午饭，开始下田栽禾。田里的水晒得滚烫，时常会有晒死的小鱼星星点点地翻着白肚皮漂在水面上。我们在初春时节下田舂耙，脚会冻得发红，在盛夏的时候下田栽连作，脚却会烫得发红。加上白亮的日头一动不动地钉在天空，我们就像是在烤箱里，挥汗如雨。额头上的汗水往下淌，顺着眉毛流开去，使我第一次知道了眉毛的实际功用。可还是有少量的汗水流到眼睛里，腌得眼睛麻麻辣辣的很不舒服。

田里没有一丝风。有个村民说：“汗珠子都流到屁股沟了，我来喊一点风过来，凉快一下。”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喊起来：“喔呵！……喔呵！”

很多人直起弯了很久的腰，伸长了脖子，凝神屏气，盼望着能有凉风吹来。说来奇怪，村民喊过之后，经常会感到有一丝微微的热风拂过，虽然聊胜于无，但是“喊风”好像很少有失败的时候。

我也学着喊风：“喔嗨！”大家哄地笑起来了。村民张寿仁说：“老夏，你这是在田里栽禾，不是在山上打招呼。”

村民平日里在山上砍柴时，要是发现远处的山头上有人，经常会大声地喊着“喔嗨！”，隔着山头打招呼。

下午五点钟以后，嗡嗡的牛蝇出动了。最讨厌的是一种小个子的青牛蝇，只要我们一不注意，它们就叮在身上。青牛蝇的口器是用来叮牛皮的，特别粗壮，一下子扎到肉里，比在医院里打针要痛得多。不过青牛蝇比较迟钝，我们用手

去拍打，肯定是一拍一个准。

晚上照例是记工分的时候。从双抢一开始，割稻、插秧、犁田等工作就不再是按劳动时间来记工分，而是改为按件计分。割三百斤稻谷，记十分；栽一亩连作稻，记十分；犁一亩连作田，记十分……等等。

二、“公家”的支援

在双抢的关键时刻，公社干部会调动鹿冈中学和小学的公办老师，有时还加上鹿冈商店等单位的职工，到里陂上村来支援双抢。如果犁田的进度太慢，他们还会调来公社的拖拉机，帮助我们犁田耙田。

每逢这种时候，里陂上村抢收抢种的场面非常壮观。两台“丰收-27”型拖拉机在轰隆隆地犁田，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全部参加割稻，来支援双抢的各路人马全部投入栽连作。一眼看去，真是热闹非凡，激动人心。

可是对于公社的好心支援，村里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方面，里陂上村虽然是接受支援的受益方，可是也要付出相应的对接成本。我们要专门派人安排他们的劳动地块和劳动工具。另外，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干部，村里要把他们派到各户人家去吃饭，给各家的妇女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和负担。如果另起炉灶为干部们开伙，这不仅要占用村里好几个劳动力，还要增加村里的支出。

再者，来支援的人的劳动效率自然不会很高。他们常常是拖拖沓沓地来，慢吞吞地下田以后，一边轻松地栽禾，一边轻松地聊天。他们有人戴着手表，时间一到就轻松走人。

还有，看着拖拉机带着四铧犁，在里陂上村的大田里哗哗地犁田，真是很爽。可是过后一结帐，犁一亩田要收一元五角，比自己用牛耕田要贵一些，村民心里就有一点点不爽。

同时，我们还必须接受一些闲言碎语，别的村子老是说我们里陂上村拿共产党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总之，有人来支援当然是大好事。只是加上了我们的付

4. 夏：双抢大忙

出以后，从经济上来说，性能价格比不是很高。

另一方面，来支援我们的人，也自有他们的怨言。

有一次，听到准备去替班的拖拉机驾驶员在抱怨：“热死了！”，我就发问：“你们平时开拖拉机跑运输，难道不热？”

“拖拉机在马路上跑得快多了，有风，没有这么热。”

“可是你们犁一亩田要收我们一元五角，可以赚不少钱啊。”我说。

“哪里的话。我们一天可以犁田四十亩，收你们六十元钱，可是要用加倍的柴油。而我们到县城跑运输，来回只要半天，身上还干干净净，不会沾到一点泥水。我们运一车货到永丰，收五十元，还省油。如果来回都有货拉，就是一百元。”

“是公社领导要你们来的吧？”我问。

“确的是。领导不逼，谁会来？回去以后，我们光是把拖拉机洗干净，把耕田的轮子换成运输轮，就够我们忙好几天了。”（鹿冈人总是把“的确”说成“确的”。）

后来我参加了鹿冈公社举办的农机学习班，上海来的陈老师说，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时候，上海的工程师参照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图纸，设计了一款中型“丰收-27”型拖拉机，还设计了全部的工艺和装备，准备在上海生产。



丰收-27 型拖拉机

可是国家说江西的工业很不发达，又是革命老区，所以决定在江西开建一个拖拉机厂，专门生产这款上海设计的拖拉机。

我问老师：“上海不是又生产了‘丰收-35’型拖拉机了吗？有35匹马力呢。”

老师说：“马力是大一些，但是整体性能不如丰收-27，那到底是成熟的拖拉机，在国外的农田里使用过很多年了。”

三、突击犁田

栽连作的期间，常常会因为犁田的速度太慢而影响整个抢种连作稻的进度。

负责犁田的大多是四十五岁以上的男性村民，他们的年纪大了，已经不适合做割稻和栽禾这样的强体力劳动。但是，犁田的那七八个人始终是每天只犁一亩多田。他们是长辈，是家长，村里人不好意思说他们。

好像是在我当大队支部委员的1977年，犁田也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在公社干部的不断催促下，我心里一着急，再加上有点年轻气盛，便决定我自己参加犁田，我要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



犁田用的“双脚犁”



耙田用的两种齿耙

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刚过，我找到村民张茂仁，对他说：“把你的‘打脚牛’给我，我今天来犁田，你去割禾。”茂仁平时说话有些结巴，他不情愿地把耕牛和犁具给了我，关照我说：“小心啊，它、它会打脚。”

这头“打脚牛”是村里体型最大的深褐色的黄牛牯，犁

4. 夏：双抢大忙

田的速度最快。但是它会用脚踢人。村里的各户人家都要关照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靠近这头会踢人的牛，以免被它踢伤。

“打脚牛”在水田里劳作的时候，也会时不时地朝后蹬踢一下，弄得使役它的人一身泥水，狼狈不堪。所以，除了养这头牛的张茂仁自己不得不用它来耖耙田，村里没有任何人愿意用这头脾气古怪的快牛。

我小心地牵着“打脚牛”，来到一坵 1.55 亩的水田里，我希望用半天来犁完它。

我把牛轭套上了牛脖子，左手刚刚摸到犁的扶手，还没有发出命令，牛就一甩脖子，开始向前疾走。我用牛绳使劲往后勒住，大骂了一声，牛的脚步才稍微慢了一点点。我趁着这机会，赶紧扶稳了犁。

“打脚牛”心里不高兴，开始频繁地“打脚”，溅得我满身是泥水。我很庆幸自己戴着近视眼镜，泥水不会溅到我的眼睛里。眼镜片模糊了，我用右手背一抹，一刻不停地犁田。说真的，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快的牛。

等到我犁完这坵田，正赶上其他犁田的村民回去吃早饭。我这才发现，自己三个多小时的一次早工居然犁田 1.55 亩，心里喜滋滋地透着几分得意。

我正准备回去吃饭，就听见有人叫我。我仔细一看，是一个公社干部，他正低着头，在我刚耖完的田里用脚使劲踩。我马上明白了，他是在检查我有没有漏耕。

他很快抬起头来，远远地看着我，笑着点了点头，还朝我晃了一下大拇指。

到这天晚上七点钟，我收工的时候，共犁了三坵田，合计 5.62 亩，因此记了 56.2 个工分。也就是说，我一天工作了十几个小时，赚了五块多钱。

第二天，村民周恩绍牵着他的小牛牯，犁田 4 亩；张四喜用他的小牛婆，也犁了 3.5 亩田。村里抢种连作稻的进度明显加快了。



用牛犁田，这是“三耘四耙”中的“顺田”。

每年双抢结束的时候，村里所有的耕牛不光是消瘦了，每头牛的背上都有一块地方，因为承受了太多的鞭策，已经溃烂了，日后会结成一块灰色的疤痕。

我用一头黄牛牯，一天犁田 5.62 亩的这个记录，应该绝少有人能破的。如今说给其他会犁田的人听，绝大多数人都是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我自己也有点怀疑，当年我真有这么牛吗？

自从里陂上村有了手扶拖拉机，它在双抢大忙时，常常由知青冯金生带着一个村民负责操作。手扶拖拉机在大田里日夜不停地轰鸣，一昼夜可以犁田或者耙田三十亩左右，为双抢的顺利进行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用手扶拖拉机耙田，速度比较快。

四、打夜工

双抢期间，我们经常要打夜工。打夜工有两种，一种是晚上十点来钟，我们来到连作稻的秧田里，开始摸黑摘秧，

4. 夏：双抢大忙

直到午夜过后才上床休息。可是我记忆更深刻的是另一种打夜工，那是在凌晨二三点钟起床，我们趁着月光去田里割稻。

白天割稻栽禾劳累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才赚到了一点睡觉的时间，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鸟叫声越来越响，我突然惊醒过来，这是队长在吹哨子，要去割稻了。

我迷迷糊糊地起来，懒得点灯，在厅里摸到了准备好的箩筐和扁担，晃晃悠悠地挑着一对空箩出了门。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居然会想起来，小学的课文《半夜鸡叫》里面，好像有这样的句子：“……刘打头的晃晃悠悠地走在前面……”那是一个地主在半夜里装鸡叫，迫使长工提早出工的故事。

一阵清凉的夜风袭来，我清醒了一些。虽然有一弯新月斜斜地照着，田塍还是比白天难走多了，远不如走在割清了稻田里更为方便。到了田头，我努力睁大眼睛，没有人。回身望去，不远处有几个挑着空箩的人影正在晃悠过来。

“是老夏吧？你没有老婆可以抱，来的这么早。”听声音，这是村民张寿仁，他和我在同一组。寿仁接着说：“唉，现在是传人种的时候，还要来割禾，真是的。”

我们在朦胧的夜色中割稻的速度，最多只有白天的一半。我弯腰割稻，得注意不要割到手。

脚踏打谷机在我的身后，一下一下地呜呜作响。踩着打谷机的党员张贤通纳闷地说：“怎么踩不动呢？打谷机也睡着了吗？”和他一起踩打谷机的寿仁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贤通睁大眼睛，低头仔细一看，气愤地把一坎稻草砸到寿仁脸上，骂了一句：“你这个偷奸买懒的家伙！”

原来，寿仁虽然也在打谷，他一耸一耸地做着踩打谷机的动作，脚却并没有踩在踏板上，而是空踏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贤通说：“歇一下吧。”我们便到田头坐下休息，寿仁则笑嘻嘻地忙着给大家发香烟、点火。他来到我面前，热情地叫一声“老庚”，把烟递过来，点燃了。同一年出生的人是“同庚”，可以互称“老庚”。寿仁是我在里陂上村唯一的老庚。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不由得想起，我俩曾经在白天一起到水库里游水。村民游水的习惯多是赤身裸体，我亦照样办理。游水上岸以后，并不直接穿上衣服，而是一边走，一边让太阳晒干身体。山路边伸出的细柴枝，直接划在刚从水里泡过的皮肉上，觉得特别疼，令人分外感念穿衣服的美好。身体晒干以后，我们在山路上，穿起了一直提在手里的衣裤。那时距离里陂上村已经不远了。

北京人把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称作“发小”，上海人把一起穿过开裆裤的“发小”叫作“赤屁股朋友”，意即一起光过屁股的朋友。我和寿仁可谓名副其实了。

现在是夜晚，月亮已经落下去了。新月起得早，落得也早。黎明前的黑暗中，天空是极深的蓝色，空气很凉爽。环顾四周，我们的烟头一明一暗地闪烁着红光。突然，树上有一只鸟叫了起来。紧接着，许多鸟儿吵个不停，声音越来越响。嘈杂的鸟叫声中，揉进了远处村里传来的微弱的鸡鸣。哈，村民养的家鸡虽然不会飞了，却还保留着一些鸟的本能，会在天亮以前啼鸣。

过了一会儿，鸟叫声慢慢地轻了。我知道，天快要亮了。

果然，天空的颜色渐渐淡了，周围慢慢亮了起来，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那么新鲜。鲜红的太阳悄悄地从屋背岭后面探出头来。远处黄灿灿的稻田里，一层轻柔的薄雾在慢慢地晃动。从村里偶尔传来了一两声狗吠和零星的鸡啼。有几户人家的屋顶上，已经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这是山村夏天的清晨，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低头注视着手中的禾镰，心里想，新的一天好像早就开始了，我马上要挑着满满的一担稻谷回去了。

5. 秋：铲茶山、摘茶籽和榨茶油

里陂上村民吃的食用油，主要是油茶山上出产的茶籽油。村里也会每年在田里种一点油菜，榨取少量的菜籽油。

在 1949 年解放以前，里陂上的村民几乎没有油茶山。

解放以后，按照其他村子的说法，里陂上村托了共产党的福，分到了原先属于先锋大队上头村里的地主的几块油茶山。村里另外还有一块油茶山坐落在禹山大队的贯下村，原先是属于村民张奉喜老婆的娘家，土地改革以后也归了里陂上村。

山上的油茶树都是几十年以前栽种的，仍然还在盛果期。油茶树的茶籽是圆圆的，呈红绿相间的颜色，大种油茶树的茶籽一般有核桃那么大。在贯下村的油茶树是小种树，茶籽只比鹌鹑蛋大一点点，但是茶籽的壳很薄，出油率也比较高一点。



山上的油茶籽成熟了，这是大种油茶树，茶籽有核桃那么大。

油茶山的收成时好时坏，每年不一样。年成好的时候，村里每人每年可以分到八斤茶油。如果年成不好，只能分到四斤左右。

我女儿从来不知道茶油，她听我说了以后，便上网到英文的“维基百科”去查找，发现茶油是最能抗氧化的食用油，

比橄榄油还要好。我不禁有些诧异。我知道在国内，前些年是橄榄油排第一，茶油排第二。究其原因，大概因为橄榄油是从国外进口的，得压过国产的茶油才对吧。

严格来说，村里铲茶山多是在初秋，摘茶籽是在深秋，那时田里的农活不多，“双抢”的大忙季节过去了。至于榨油，已经是来年春夏之交，相对农闲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三件事情都当作秋天的事情，凑合着写在了一起。

一、铲茶山

按照里陂上村的习惯，每年要到油茶山上去两次。一次是在初秋，正好有一段短暂的农闲，我们上山去铲茶山。另一次是在深秋，田里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便上山摘茶籽。每次上山，我们需要在山上一整天。铲茶山和摘茶籽比留在村里劳动要辛苦一点，因此生产队规定，凡是拿六分工分以上的劳动力必须要上油茶山，不准躲在村里混工分。

铲茶山的时候，我带着砍柴的毛镰，扛上山耙，山耙的把上挂着的是中午吃的午饭。

山耙的耙口比较宽大，有六寸左右。铲茶山的时候用山耙在山上一拉，就有六寸来宽的一溜，比用镢头铲山的速度快。遇到不是油茶树的各种杂柴，就要用毛镰砍掉。如果是一两年没有铲的生山，杂柴的根比较大了，我们还要带着挖土用的镢铗上山，才能把柴根挖掉。



铲茶山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旦看见油茶山上有细长的藤苗，上面长着瘦瘦的叶子，就知道有淮山（山

药)了。野生的淮山都很细小，最大的也只有手指那么粗。如果能挖到五六根的话，晚饭就可以多烧一道香喷喷的时鲜菜了。

有一次，我在铲茶山的时候发现，不知是谁在茶山上下的钩，缠住了一只竹鸡。竹鸡是一种鸟，比拳头还要小一些，很像是刚刚开始长出硬毛的小鸡仔。我解下那只竹鸡，它的腿已经断了。那天我把竹鸡带回去的时候，它已经死了。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竹鸡，它只有胸脯上的两块肉值得一吃，味道异常鲜嫩。

我们带上山的毛镰，除了砍掉油茶山上那些无用的柴枝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顺便去砍一些可以做锄头把和做扁担的木料带回里陂上。

在油茶山上吃过午饭，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就拿着毛镰在山里四处转悠。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棵大小适宜，长相绝佳的杜树，那是做扁担最好的材料，弹性和韧性都非常好，还不容易变形。里陂上村民认为，黄杨木的扁担最结实，但是弹性差一些。用杜树扁担来挑担，感觉比较松快。

我用杜树做成了一根称心如意的木扁担，最多可以挑一百四十斤。在扁担的两头我精心装上了钢制的螺栓，又套上了塑料套管，用来防止箩绳滑脱。在扁担的中间，用毛笔恭恭敬敬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曾经无意中听见鹿冈中学那位来里陂上帮助割稻的高老师对他的同事说，这字写得比印出来的还漂亮。这使我想起来，自己在中学里的书法比赛上曾经得过名次）。

我的扁担是里陂上村里的精品。我每年的插秧、割稻、挑土、交公粮和挑行李回上海探亲都要用到它。回到上海以后，我心爱的扁担一直放在武进路的老房子里。2006年老房子拆毁的时候，这根扁担不幸丢失了。

有一年铲茶山的时候，我带了两根做锄头把的杉树料回里陂上村。万一我正在用的锄头把断了，就能够及时换上新的。知青冯金生也砍了三根锄头把回来。

不巧的是，我们回村的路上经过袁家村的时候，袁家的村民还没有收工，正在田里劳动。看见我们多数人都带着做镢头把的木料回家，特别是有个村民还捎了一根直径有四寸来粗的杉树回家修猪栏，他们看不过去了。当时就有性急的后生喊了起来：“你们里陂上也太不像话了，去铲山还带这么多东西回去。”“你们以前有茶山吗？共产党给你们的好处也太多了！”

第二天，大队来了两个人，气势汹汹地召集里陂上的村民开会，宣布大队的决定。第一条是昨天大家铲山时带回来的木料不论大小，一律没收。第二条是登记造册，每根镢头把的木料计价六角，按照百分之三百罚款，每根计罚一元八角。

大队来的人一个一个地点名，里陂上的村民被这个阵势吓住了，绝大多数人都老实地交代了自己的情况。我当时有点不服气，觉得大队这样做不公平。砍几根镢头把又怎么了？其他村子里的人要用镢头把，不也是去铲茶山的时候顺便捎带的吗？为什么我们里陂上就不行呢？大队的人点名，独独不叫我和冯金生的名字，很明显因为我们是知识青年，可以例外。

我忍不住了，站起来说了几句不满的话，最后负气地要求大队对我也一视同仁，写上我的名字，我愿意交出那两根镢头把，附带罚款三元六角。

会场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大队来的两个人对视了好一会儿，最后写上了我的名字。

事过之后，我有一点后悔，觉得自己当时过于冲动了，我应该还是像冯金生那样，在旁边始终一声不吭，比较划得来。

后来我听说那两个人回到大队以后，向大队书记汇报情况的时候提到了我，说里陂上的夏建丰还真是吃硬（硬气），肯出来说话。

二、摘茶籽

到了秋天上山摘茶籽（木梓）的时候，我们挎着扁篱，担着箩，有人还带着长木钩，用来钩摘那些结在高处的茶籽。

山上的油茶树（木梓树）已经开满了油茶花，雪白的花瓣，明黄的花蕊。这些花谢了以后结出的茶籽，要到明年秋天才能采摘。所以我们摘茶籽的时候要注意保护这些花，以免影响明年的收成。



油茶花，雪白的花瓣，明黄的花蕊。

一些会唱山歌的中年男村民到了山上，看见了雪白的木梓花，往往会一段一段地唱起长长的情歌：“木梓树栽行打行……。木梓花开白又白……。木梓结果层打层……”，一直唱到歌中的女主角迫切地想要和自己的情郎结婚生孩子。村里那些尚未出嫁的女孩子会三三两两地停下手来，竖起耳朵，凝神细听。然后她们微微红着脸，一言不发，互相之间对望一眼，羞怯地偷笑。

我们到禹山那边的贯下村摘茶籽比较远，路上要走将近两个小时。早早地吃完队里免费供应的早餐，我们挑着空箩，一个紧接着一个，长长的队伍走在窄小的山路上，逶迤不绝。

记得有一年去贯下村摘茶籽，我紧跟在村民张寿仁后面。寿仁一定是刚才吃饭时喝多了饭汤，走上山路不久，就像牛在田里耕作的时候那样，一边走路一边开始小便。他分开了

双腿走路，在路上留下了“Z”字形的尿迹。行进在山路上不能轻易回头，否则脚下踩空了容易跌下坡去，所以走在寿仁前面的村民根本没有发现他奇怪的动作。

过了一阵，我也有了尿意，自然是学着寿仁的办法，方便了一回。在路上留下“Z”字的痕迹，颇有一番别样的感受，新鲜而刺激。

同在山路上的女孩子就不能如此便宜行事，她们只能爬上山去，避开人群，才能方便。待她们下得山来，回到路上，村里的大队人马早已走远，消失无踪，这些女孩掉队了。

我由此联想到，大凡野战部队行军打仗，要穿山越林，在狭窄的山路上“衔枚疾走”的时候，部队里那一色的男战士说不定也会边走边尿，才不至于因为这等小事而掉队，从而贻误了战机。

里陂上村里有规定，去贯下摘茶籽，只要摘满了一担就可以提前回家，记十个工分。可是贯下的茶籽是小种，摘满一担很不容易，而一担茶籽有一百三十来斤，走两个多小时挑回来，实在太辛苦了。因此大家情愿在山上磨一天工。

有一年去贯下村摘茶籽，我和冯金生决定尽快摘满一担，可以争取早点回来。到了山上，别人要先坐一会儿，等那些掉队的人都到齐了，才开始摘茶籽。我和冯金生一刻也不耽误，快手快脚地摘了起来。刚到午饭时分，我俩就一人挑着一担茶籽，下山回家了。

我俩经过前村大队的洲上村的时候，在村边的上海知青住处歇了一下脚，进去喝了一点水。洲上的上海知青小朱送我们到门外，看见了那两担茶籽，略微有些惊讶地说：“这是你们今天从贯下摘的吗？”我们笑着点点头，和他道别，然后起肩挑担，继续上路。从洲上到里陂上，还有四十分钟的路程呢。下午两点多钟，我和冯金生回到了里陂上。

过了些日子我到公社去，公社管知青的干部对我说：“洲上的小朱来聊天了，他以前只是听说里陂上的知青干活很猛，现在算是见识了。小朱说，那天你们走了以后，过了近三个

小时，里陂上的大队人马才嘻嘻哈哈地挑着装得不多的茶籽担子路过洲上村，小朱还专门出去看了。”

三、榨油

每年秋天从山上摘回来的茶籽，堆在了一起。到了冬天将尽的时候，茶籽的壳裂开了，由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负责把茶籽壳去掉（用茶籽壳薰出来的腊肉特别香），把茶籽仁晒干以后便可以榨油了。

先锋大队在公路边上建有一座榨油坊，各个村子只要到大队申请一下，大队就会安排好榨油的具体日子，派出一个包茶籽饼的师傅，来帮助各村榨油。

村民的习惯是女子不能进榨油坊，说是女子进了榨油坊会降低出油率。但是马立平说，她们村前小学榨油时，她进去过村前大队的榨油坊。这应该说村前大队思想比较开放，没有我们先锋大队那么多忌讳。

我参加过里陂上村的榨油。

我们把茶籽仁送到大队的榨油坊。榨油坊进门的左面是一具石碾和几口大锅，还有一处宽大的烘焙茶籽仁的平灶。

石碾是用来碾碎茶籽仁的。它的碾槽和碾轮的大小，和里陂上村碾房里的石碾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它可以使用两套动力。一套是水力，油榨外有一座转轮水车，可以与石碾的木轴连接。可惜的是，推动水车转轮的水不充裕，大队所在地的袁家村人只在当自己水库里有水的时候，才放水给本村用水力碾茶籽仁。至于其他各村要榨油的话，对不起，请使用畜力。

几口大锅，有的用来蒸已经碾碎的茶籽仁，有的锅安装成斜的，用来翻炒油菜籽。

进了榨油坊的右边，是一个传统的油榨，它用一棵巨大的樟树制成。樟树粗大的树干横卧在半人来高的架子上，中间凿出了一条长长的、一尺来高、横向通透的榨槽。榨槽底部和顶部的中央呈圆弧形，底部弧形下方是一条有一定斜度

的小方槽。小方槽稍低的一端，有一个小圆孔，那是出油孔，榨出来的油就从这孔流到装油的容器里。油榨旁边的梁上挂下来一根活动的吊木，吊木下端有铁环，与一段又粗又长又重的硬木中部的铁环相扣，那段硬木叫撞杆。撞杆与庙里和尚撞钟的撞木有些相似，只是更长、更重。那吊木连着撞杆的设施，总称吊锤，是打油的“主将”。榨油架下方的地上，散放着一些长方形的木块和木楔。那木块也叫枋，那木楔也叫尖，都是榨油少不了的“重臣”。

我们运来的茶籽仁还有一点多余的水份，所以先要放在平灶上烘焙到一定程度，然后放在碾槽里，用牛拉着石碾，把烘焙好的茶籽仁碾细。

有人在榨油坊里灶台上的大锅里加了水。锅里有一个用杉木做成的木桶，木桶上面的口径比下面的口径稍微大一些，叫作“甑”，读音是“赠”。它比我们平时蒸饭时用的饭甑大了好几倍。

我们把烘焙碾细了的茶籽仁放入甑里，盖上汽盖，然后在灶膛里加入上好的干燥劈柴，开始用急火来蒸大甑里的茶籽仁。

这时候，一直在旁边悠哉游哉的榨油师傅开始忙碌地准备起来。榨油师傅是大队派来的，他的技术活主要是“包茶籽饼”，所以也称“包饼师傅”。只见他把几十个直径约一尺、高度约半寸的油亮亮的铁箍堆在地上，又用稻秆稀疏地编拧成一扇扇直径两尺多的圆圆的“杆垫”，也放在一旁。

等到大甑里的茶籽仁蒸出了香气，每个人都变得脸色凝重，整个榨油坊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包饼师傅把一个铁箍放在自己脚边，对准圈中央再放上一个杆垫，随即提高了嗓音问道：“好了吗？”在锅边守候的人大声应道：“好了！”包饼师傅便大喝一声：“快！”

紧张的包饼和装饼的过程开始了。

守在锅边的一人猛地掀开甑上的汽盖，另一个人飞快地把碾细蒸熟的茶籽仁舀进一个一端有把的小木桶，一路小跑

几步，把木桶里蓬松的茶籽仁细粒倒在包饼师傅面前铁箍上的杆垫中央。包饼师傅光着双脚，立即站到滚烫的茶籽仁上。他一边烫得呲牙咧嘴，一边飞快地交替着双脚，就着铁圈的形状，把茶籽仁踩成厚厚的饼状，再用脚顺势勾起杆垫延伸在箍外的部分反折进来，把“饼”包起、踩实，这就是茶籽饼。

仅仅十多秒钟，师傅就包好了一个茶籽饼。茶籽饼重五、六斤，有二寸来厚，约是铁箍宽度的四倍。马上有人飞快地把包好的茶籽饼竖起来，装进油榨中间的榨槽里，从出油孔开始，整齐地挨个排好。整个榨槽可以装三十多个饼。我们只用了几分钟就装好了饼，这时候，榨槽还剩下小部分空间，在里面放上两块方木块（枋），再在二者之间插上一个硬木楔子（尖），木楔的大半截子露在外面。打油开始了！

由两个人面对面地握住吊锤的吊木，再将吊木下的撞杆扶成水平方向，榨油师傅把握着撞杆前端，握着吊木的两人用力推动吊木，撞杆的头便向插在油榨里的木楔撞去。木楔和撞杆的头上都装着铁圈，非常坚固。一下，再一下，木楔被一点一点地打进油榨，这就叫“打锤”。

才打了几下，油榨里滚热的茶籽饼刚受到挤压，就开始出油了。略微透明的金黄色茶油从出油孔流下来，汨汨地注入到下面的容器里，鼓舞着所有在场的人们。木楔打到底以后，就把它抽出来，在它挤出的空间里加进一块厚薄适宜方木，然后，再重新插入木楔，继续用撞杆打锤。

榨油坊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我们光着膀子，打锤越来越用力，方木越加越多，茶籽饼越压越薄，油却出得越来越慢了。

榨油的最后阶段——打“飞锤”的时候到了。打“飞锤”，是要把还剩在茶籽饼里的最后一部分油榨出来。“飞锤”，顾名思义，是要让吊锤“飞”起来。仍然由榨油师傅掌握撞杆的头部，而拉动吊杆的两个人，则尽力把吊锤向着油榨的反方向荡起来，荡到最高，简直要“飞”到屋顶了，再利用

吊锤下落时的惯性加速度所产生的动能，猛烈地撞击木楔。我们几人轮流上阵，用二三十下“飞锤”，压榨出茶籽饼里面最后的一点油。

包茶籽饼的师傅告诉我，必须要趁热打锤才能出油，茶籽饼越热，出油越多。打锤一定要一鼓作气，一旦把茶籽饼放进了榨筒，开始打锤了，就一定要猛打快榨，一气呵成，如果中间停顿一下，就会少出油，甚至不出油，这一榨的油就可能废了，只能中途退榨。



榨油是强体力劳动，需要光着膀子打锤。

里陂上村的男子常常会用榨油来比喻男女之间的性活动，一定要一鼓作气地完成，“退榨”是要不得的事。

一榨油打完了，榨油坊里弥漫着茶油的气息，我们想出汗却又出不来，这可能是茶油的蒸汽把我们的汗毛孔堵住了。榨干了的茶籽饼从铁箍中拿出来，这是茶籽枯，可以用作肥料。茶籽枯略有毒性，可以打碎茶籽枯，加上水，在夏天洒到水田里，药昏田里的泥鳅，把泥鳅做成佳肴。

整个榨油的过程需要二到三天，参加榨油的村民每天需要从家里用大竹罐带饭菜来吃。吃饭的时候，大家贪心地在饭菜里面添加了很多刚刚榨出来的新鲜茶油，反而弄得很不好吃，吃多了还会作呕。

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榨油的村民在吃空了的大竹罐里装上茶油带回自己家里，这是公开的秘密。可惜我一直没有

竹罐，做不到这真正的“揩油”。



装饭菜的竹罐

我还在这榨油坊里榨过菜籽油。把圆滚滚的油菜籽放在大锅里炒热、用木砵推散成两半，放入石碾的碾槽里碾细，之后的工序则和榨茶籽油完全一样。

但是菜籽出油比较慢，特别是到最后打飞锤的时候，要比榨茶籽油多打几十下，直到我们精疲力尽才能放弃，算是榨油告一段落。

记得我在回到上海以后，看沈从文写的《湘行散记》的时候，他描写的湘西的榨油坊和我们先锋大队的榨油坊十分相似，我感觉亲切极了。只是想到他笔下的湘西风情和我在里陂上的青春生活一样，可以说是永远地逝去了，心里不免有一点淡淡的伤感和惆怅。

日前我偶然看到了明朝的江西省奉新县人宋应星几百年以前写的《天工开物》里面的《榨油》篇，书里的插图似曾相识，书中的描述和我所参加的榨油工作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我忍不住要摘抄一点有关的内容在下面：

“凡榨木，其木樟为上。凡开榨，空中其量随木大小，辟中凿划平槽一条，下沿凿一小孔，一小槽，使油出之时流入承藉器中。

撞木与受撞之尖，皆以铁圈裹首，惧披散也。

属树木生者，然后碾碎，细者则入釜甑受蒸，蒸气腾足取出，以稻秸包裹如饼形，其饼外圈箍，或用铁打成，与榨

中则寸相稳合。

凡油原因气取，有生于无。出甑之时，包裹怠缓则水火郁蒸之气游走，为此损油。能者疾倾疾裹而疾箍之，得油之多，诀由于此，榨工有自少至老而不知者。

包裹既定，装入榨中随其量满，挥撞挤轧而流泉出焉。包内油出渣存，名曰枯饼。”



“名曰枯饼”，茶籽枯饼的直径约一尺。

几百年后的今天，因为我有了榨油的经历，所以能够感受到前人书本中的温度。

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人会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感受到我们的温度吗？难矣哉，难矣哉！

6. 冬：修水库

在农村十年，冬天农闲时节经常要兴修水利，多数是以大队（村）为单位，全大队的劳动力集中起来，修建一些小型微型的水库。这些水库中，能够灌溉五六百亩水田的水库就算是比较大的了。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不能无偿调用农村的劳动力，农民很难组织起来，很少在冬天兴修水利了。四十多年过去，这些人民公社时期修造的小水库还在发挥着作用。

我一共参加过五座水库的修建：先锋大队的芮源水库、芦陂水库、檀当水库、袁家水库，和洋坳大队的洋坳水库。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芮源水库和洋坳水库。

一、抢险——芮源水库

从 1967 年开始，我们先锋大队用各村的劳动力，为里陂上村修建的芮源水库，已经修了两个冬天，堆起的红土坝已经有八九米高，水库里面放水的水泥涵管已经修好，只要再堆高三米左右，挖好溢洪道，修好水库外面的灌溉水渠，里陂上村的全部农田就可以旱涝保收了。

1969 年初春，我们到里陂上村以后，开工的第一天，就是扛着镢头去修芮源水库，任务是往竹制的篮攀里装土。

当时还在正月里，村民们带着过年时吃的薯仔片和落花生等零食，懒懒散散地干活，看见我们来到水库的土坝上，便笑嘻嘻地围着我们看，有些热心的村民会过来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装土。

到了下午，太阳还未落山，我感觉吹到脸上的风有些冷了，有村民打了一声唢哨，叫了一声：“去屋里（回家）啰！”其他人纷纷嚷着：“去归，去归！”颇有一点古语的味道。我们知青跟在大伙后面，草草地收工回村了。

有个老年的村民看见我们扛着镢头进村，就笑着迎上来

打招呼说：“鸡食青年，是堆山塘回来了么。”他不知道什么是“知识”，很自然地把“知识”说成了“鸡食”，这可以理解。但是，他为什么把修水库说成“堆山塘”呢？

很久以后我才从书上知道，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民国的几百年里，江西省各地的人口快速增加。为了使栽种的水稻能够“旱涝保收”，增加产量，江西的农家兴建了各种水利工程。古书上说，当地有一种水利工程叫“山塘”，是“截堵山谷以为塘”，循循相传，怪不得里陂上的老年村民还是把水库称作“山塘”。

“修水库”则是解放以后，共产党来了才有的新名词，老年人还不习惯。

可是在水库上工作了才几天，春耕开始了，我们匆匆结束了当年的冬修水库工作，芮源水库的坝上一下子冷清了。



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江西人挑土的钩担和篮攀。

这一年的七月，我们开始收割早稻不久，连续下了几天暴雨。那天夜里，仍然是暴雨如注，我们已经睡了，突然听见急促的哨子声和陌生的喊叫声：“快上芮源水库，大坝要漫顶了！”

爬起来开门，探出头去一看，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已经穿好了蓑衣。他对我们大声说：“你们快跟我去水库，芮源水库。”

我和薛志民戴上斗笠，穿好蓑衣，扛着镢头，打着手电，冒着大雨，跌跌撞撞地跟着周恩绍和其他几个村民冲到水库的坝上，只见公社（乡）里的永丰县城下放干部聂道芬迎面跑过来，他操着永丰县城人的口音叫道：“好，好！终于来了！怎么才来了这么一点子人？”原来，刚才到村里吹哨子喊叫的就是他。他在公社担心芮源水库的安危，先是冒着大雨，打着手电到水库了解情况，然后赶到里陂上来吹哨子叫人。他吹完哨子又跑到芮源水库来了。

聂道芬原来是永丰县城恩江镇的党委书记，文化革命中受到冲击。他虽然下放到鹿冈公社当一般的干部，但是工作十分认真。（他应该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尚书聂豹的后人。）

我们来到水库的坝上，水库里的水面已经和红土坝面齐平，情况很危险。如果水库里的水涨得快，漫过大坝，就会破坝。水库一破坝，虽然下面没有村庄，可是这水库脚下山坑里的一百多亩田就完了，会有很多年不能耕种，而全大队两个冬天投入的劳动也都白费了。

天上还在下雨。

经过短暂的商议，决定在红土坝靠山的一边，抢挖排泄洪水用的溢洪道，同时聂道芬再去村里喊人，要多带一些专门开山挖土用的镢铤来。

我们十来个人分成三组，分段开挖。挖土的，装土的，挑土的，大家都很紧张，一声不吭，拼命地干。

坝顶不是很平，两面靠近山的部分高，中间低，水开始从低的地方慢慢地漫过坝顶。“水来土掩”，我们把挖溢洪道的土飞快地挑到坝顶，堵住溢过来的水。

聂道芬回来了，身后只跟着三

四个人。“这芮源水库就是给里陂上用的，村里的人却不肯



从左到右：篮攀、镢铤、镢头。

出来，真是冇良心！”聂道芬气呼呼地说。（“冇”字读作“毛”，意思是“没有”。）

我们终于挖好了一条三尺宽一尺深的溢洪道，把溢洪道头上的堵头一挖开，水库里的水便通过溢洪道哗哗地流进水库脚下的小江里。顺便说一句，里陂上的村民认为，江比河小，很大的江才有资格称为河。

我们挖的溢洪道还是太窄了，接下来的任务是把溢洪道拓宽到六尺。现在只需要挖土，不需要挑土，因为挖开的土块掉进湍急的流水，用镢头轻轻一勾，土就顺水流走了。

溢洪道很快拓宽到六尺，但是还在下雨，必须继续挖深溢洪道。这时候只能站在水中，用镢头探到水底，形成一定的角度，顺着水势用力一拉，镢头刨起的土块立刻被水冲走。就这样，溢洪道越刨越深，水库里流出去的水量越来越大。

派出一个人到坝顶看看，水面还是和坝顶齐平。但是雨越来越小了。



2014年，芮源水库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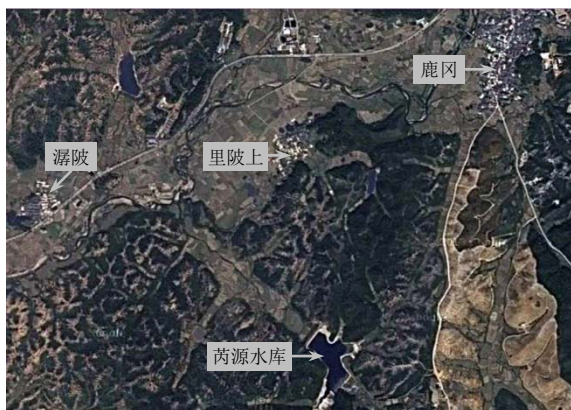
不知不觉天渐渐亮了，雨也停了。聂道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现在他又来了。原来，他到附近的前村大队强源村去叫人来芮源水库抢险，一个人也没有叫到。他一生气，回公社去睡了一觉。

“有鱼！撞我腿了！”在溢洪道里的村民张梅魁一边大

叫，一边举起镢头，试图击打一条从溢洪道里流出去鱼。他没有打中鱼，却溅了自己一身水。想来是天亮了，水库里的鱼睡醒以后，到水面上来玩了。这些鱼是大队放养的，可现在鱼儿顺着溢洪道往水库外面游，谁捉到就归谁所有。

“去屋里（回家）！”听到张梅魁的叫声，挖溢洪道的村民纷纷嚷着，一边收拾起农具，飞快地回家，聂道芬拦也拦不住。他看看天已经放晴，临时挖的溢洪道在哗哗地出水，水库应该不再有危险。他摇摇头，嘟囔了两句，回公社了。

挖溢洪道的村民们一回到家，放下用了一晚上的农具，马上拿着捉鱼的斩针、鱼叉和鱼篓，又飞快地赶到溢洪道边和小江边去捉鱼。我和薛志民都不会捉鱼，更何况志民脚底在水里被尖锐的山石划破了，上了药以后必须在家里休息。



里陂上村的位置和芮源水库

二、奋战——洋坳水库

1973年，我参加修建的洋坳水库和芮源水库的大小差不多，却由公社组织修建，这说明一直在洋坳大队蹲点工作的公社武装部的力量够大，能够调动全公社的人去帮他们打工。

我们先锋大队采用轮班制，把劳动力分成两班，每班一个月，去洋坳修水库。我们知青中，薛志民和冯金生是第一班，我在第二班。薛志民他们回来的第二天，我们这一班就

挑着各自的工具、铺盖、米和菜等等上路了。我还另外带了油灯和书。

两个多小时以后，到了洋坳大队，我们爬到一户农民家十分低矮、直不起腰的楼上，铺上稻草，打好了地铺，再爬下来，沿着山路上工地。

先锋大队最大的袁家村的人已经在工地上，见我们来了，就开始逐个评点：“高发有、周恩绍是强劳力……老夏也来了，好。”他们觉得很不错，里陂上派来的人大多数是干活的好手，里陂上知青的能干在整个大队也小有名气。

水库工地上是以大队为单位来计算完成的土方数量，依照土方来记工分。如果里陂上派些混工分的人来工地，出力不出力，等于揩了别村的油。别的村子特别是像袁家这样的大村庄怎么会让自己吃亏呢？

堆修这种小水库其实很简单，就是挖松土坝两边山上的土，挑到坝顶上的指定位置，由最终受益的洋坳大队派人来把坝上的松土一层一层夯结实。土坝顶上的中心点有根露出土面一米高的木棍作为标尺。如果这根木棍被土淹没了，表示土坝增高了一米，公社便和大队结算这一阶段完成的土方数量。每完成一立方米土，可以回生产队记十个工分。公社和大队不出一分钱，费用全部由生产队负担，这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徭役”的某种延伸吧。

一立方米土大约四千公斤，约合一百担土。里陂上来了十个人，人人都想每天拿十分，这就要有一千担土挑到坝上。我们作出的安排是：二人用镢铗挖土，二人用镢头装土，五人用篮攀挑土，最后一人负责在村里砍柴、煮饭和送饭。

挑土的人每天挑二百担土到坝上，任你紧走慢跑，最快三分钟一个来回，一天要挑担快走十小时才行。可见工作定额非常紧，这十个工分不好拿，远不如留在自己队里，冬天干活非常轻松。

我开始的两天是挑土。肩上挑着八九十斤的土，需掌握好平衡。从山上往下到坝顶之间，有一段 45 度左右的斜坡，

斜坡上有一些只能容下一只脚的“蹬”，两个蹬之间的落差有一尺半左右，挑土的人要飞快地往下跳着，才能冲下去。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的内脏在体腔内是有韧带拉着固定的。每在斜坡挑着重担往下跳一步，就觉得内脏震动一下，韧带一拉一扯，有一丝疼痛。下了斜坡赶紧跑到指定位置，倒完土再小跑着回去。

两天下来，两条腿像火钳一样直直的，膝盖不会转弯了，连收工回到住处要迈进门槛，都得侧过身子扭动屁股才能抬腿进门。五个挑土的人都是这副怪模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互相取笑着。

以后两天我的工作改为装土。挑土的人离我还有五六步，就把空篮攀抛过来。我顺手接住一只篮攀的纽，沿着地面往挖松的土里一插，右脚就势在篮攀底部用力一抵，篮攀里就装了三分之一的土。我再用镢头横着，狠命扒一下，扒二下，只要两下，一只篮攀满了。

如果来不及装土，挑土的人就会在身后齐声催促：“快，快点！”大家都想多挣点工分。第一批薛志民他们一回到里陂上，就知道他们每天赚了十六个工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比他们少。

在我旁边装土的是一个袁家村的后生，天生动作比较慢，扒拉五六下才能装满一只篮攀。袁家村的队长觉得自己的村子丢了面子，他狠狠地骂这个姓袁的后生：“你吃了牢食吗？你要死啊？是不是你刚结婚的老婆弄得你手脚发软？这两天你老婆也不在啊！看看你旁边的上海佬，人家装满一担，你才装一只！”

水库工地上有一个简单的草棚，算是工地的指挥部，洋坳大队的书记或者民兵连长带着一两个洋坳的上海知青在里面坐镇。有时公社也会有一两个干部来工地上转悠一下。

草棚上绑着一个高音喇叭，时常播放一些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有时也会喊点革命口号，打点快板书来鼓励大家；有时也会报告工程进度，表扬那些进度快的单位和个人。据说上

一班的时候，里陂上的上海知青就得到高音喇叭的表扬。

干了几天，我算来算去，每天最多只能拿到十二个工分，比薛志民他们那一班要少很多。

但是很快便发生了奇迹。

先锋大队书记的儿子属于袁家村，也在水库工地上挖土。想必是袁家老倭也像我一样算过了，只见书记的儿子瞅瞅坝上没有公社和洋坳大队的干部，便拿着挖土的镢铎飞一样地冲到土坝中心竖着的那根木棍标尺边，抡起镢铎就把木棍往下砸。虽然木棍下面垫了石头，木棍还是矮下去好几寸。

这样做，我们的工分可以增加，所有的人一阵低低的欢呼。只有洋坳大队在坝上打夯的人赶紧到指挥部去报告有人作弊。干部跑出来大喊大叫：“谁干的？谁干的？！”我们先锋大队和其他大队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有人作弊。”

“是洋坳的人乱话。”“木棍下面垫了石头，怎么敲得动？”

干部走到木棍边仔细看了看，好像没什么异样。他试着用镢铎敲木棍，木棍纹丝不动，敲不下去。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只能大声骂几句威胁一下，悻悻地回去了。大家发出了一阵嗤嗤的笑声。

袁家的队长忿忿地对我说：“我们队里没有来修水库的那些人，现在每天干活只有五六个钟头，也照样混十个工分。我们在这里拼死拼活，为什么不能多拿一点工分呢？定额那么紧，太不公平了。我们又没拿洋坳大队的工分，看他骂人的那个凶样。”

其他大队的人也偷偷尝试着把木棍往下砸，无奈木棍下面垫着石头，再也砸不动了。

有一天清早，我一到水库工地，马上发现土坝中心竖着的那根木棍的高度，比昨天收工时低矮了很多，便问我身旁的村民张寿仁，这是怎么回事。寿仁笑着说：“老夏你不知道么，袁家村的后生昨天晚上在水库上打了夜工挑土呢。”

当时我相信了寿仁的说法，只是心里有一丝困惑：昨天晚上没有什么月光，他们是怎么打夜工的？

6. 冬：修水库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那天晚上确实有几个袁家村的后生去打夜工了。他们把土坝中心的木棍标尺挖出来，取出垫在下面的石头，把木棍重新埋过了。袁家村真是厉害。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批修洋坳水库的民工施工结束，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村时，公社给我们开的证明是每人每天记十八个工分，比在村里干活的人多八个工分。我后来问薛志民，你们是不是用了类似的方法？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笑着说：“差不多，差不多，农民很聪明的。怎么能告诉别人呢？”

在洋坳修水库期间，我在收工以后溜达到洋坳的大队部，认识了在洋坳教书的夏元麟。他原来在我们华东师大一附中的中四乙班，跟着他妹妹夏元洁所在的虹口中学插队落户到了洋坳。从此以后，夏元麟每次到永丰县城办事时，来回的路上多数会顺路到我们里陂上村来歇歇脚，住上一晚，和我聊聊天，第二天再走路回洋坳。

有一次夏元麟来了，聊天时我随口问他，洋坳水库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很好。夏天热，我经常去去水库里游泳。”我说：“啊，我们修水库，你们游泳，这不是有人说的‘我种树，你乘凉，我种田，你吃粮’么？”夏元麟笑了，连忙说：“哪里，哪里，我也到洋坳水库劳动过的。”



洋坳水库

三、建涵管——袁家水库

最后一次参加修水库是袁家水库，正逢我当里陂上的生产队长。我对于这种平调的“徭役”虽然不感兴趣，但还是带了一些人去水库工地。毕竟我们里陂上村独享的芮源水库，也是全大队的人花了三个冬天才修成的。

修袁家水库的时候，我参与了修建涵管的工作。

先把土坝底部的花草树木全部连根砍光，清除干净。在两山之间的坝底中央开一条两米宽一米多深的沟，填进粘土（精泥），这样做，使得水库下层的水不会从土坝底部渗出坝外。

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用水泥来做水库出水用的方形涵管。涵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涵管和土坝底部那条新做的粘土沟相交成 90 度，贯穿整个坝底，基本上是水平的。另一部分涵管则转了 90 度，在水库里面和粘土沟平行，沿着山坡往上，每隔数米的距离有一个方形或者圆形的出水口。

这些出水口平时用相应的水泥盖子盖住。需要放水灌溉时，派人去拨开涵管上那个离水面最近的出水口的水泥盖子，水库里的水就哗哗地通过涵管流出去了。

先用木板在现场做好涵管的模子，然后把拌好的水泥石子（混凝土）铲进模子，捣实。过了几天，拆掉木板，一段涵管就做好了。



2013 年，芮源水库重新改建的涵管。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涵管不用钢筋。（一直到 2000 年代，我第 N 次回到鹿冈乡，乡政府正在落实“路面硬化”

工程。他们努力把通到各村的土石公路改成水泥路面，居然也不用钢筋，说是成本太高了。我想想也有道理，永丰县有水泥厂，好像没有钢筋厂。）

全部涵管做好以后，大队人马就可以开进工地，挑土堆坝了。

1990年代我从美国回到里陂上，到芮源水库一看，水库土坝的内坡铺了一层水泥板，每块水泥板五十厘米见方，这样大大减少了水库里的存水对土坝内坡的冲刷和破坏。我不禁回想起当年冒着大雨连夜抢挖溢洪道的情景，真希望芮源水库还能再用上几十年。

前些日子我想到，可以试着通过卫星地图查看芮源水库，便和马立平一起打开电脑屏幕，从卫星的地形图上找到了永丰县和鹿冈乡。

“……潞陂……里陂上……快看，芮源水库！”我兴奋起来。

“快找一下，我们高坑村的高坑水库还在吗？”马立平挤在旁边着急地说。

在美国自己家里的电脑上，我们找到了芮源水库、高坑水库和洋坳水库，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水库。

最近有人说，不能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记得以前还有人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你说呢？



高坑水库，浅色部分是村庄和田地，其余是山岭。

我们衷心期盼这些水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继续为乡亲们造福。

7. 衣

我上中学的时候，常听人们说“衣食住行”。可是人人都知道“民以食为天”，不吃东西是要饿死人的。为什么不是把“食”放在“衣”的前面呢？应该说“食衣住行”才对啊。

过了很久，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解释。

通常情况下，不吃东西要饿死人，那得有好几天的时间。

但是你能想像，即便是一家人，能够大家都不穿衣服，赤身裸体，哪怕是在房间里，走来晃去么？

……所以在很多时候，“衣”甚至比“食”更重要，可以放在“食”的前头，还是“衣食住行”吧。

穿衣裳好像是人类独有的，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一、棉布和“的确良”

整个鹿冈公社是传统的粮食产区，里陂上村民祖祖辈辈最拿手的是种水稻，特别是种水稻中的早稻。

村民要做衣裳的时候，他们可以凭着政府发放的购布券，再加上现金，去鹿冈商店购买棉布，回家来缝制新衣。可是很多村民家里的孩子多，能参加劳动挣工分的人少，家庭的负担很重。这些村民到了年终分配的时候，扣除了全家人的口粮，就没有余钱来买布做衣裳了。他们会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种一点产量很低的传统棉花来纺纱织布做衣裳。这种棉花的棉桃很小，绽开以后，雪白的棉花才有我们常见的核桃那么大。

种棉花得偷偷摸摸地种，最好不要让上面来的干部看见。干部看见村民种了棉花，就会嚷嚷说，自留地里只能种菜，棉花是经济作物，种棉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应该把棉花拔掉。不过他们往往是为了显示自己政治正确，说一下而已。只有极少数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不了解农民的生活情

况，才会鲁莽地去拔掉村民种的棉花。

摘了棉花以后要晒干，再用一个简单的木制工具来轧籽，把棉籽去掉，留下皮棉。我试着玩过，很容易。

村里的妇女吃过晚饭，安顿好家中的一切，便拖出放在屋子角落里的纺车，开始在油灯下或者松脂光下吱呀吱呀地用皮棉纺线。我很想试着玩玩纺线，可这纯粹是女人做的事情，心里不免有些犹豫。我想起在书上读到过，当年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在陕北的大生产运动中，曾经纺过棉线。我便不再迟疑，接下手来学着纺线。可是我纺的线一会儿粗，一会儿细，一会儿还断了，人家马上就夺回去，不让我纺了。



里陂上村纺线用的纺车

里陂上村里有两户中农的家里，有木头做的织布机，其他人家也会借用来织布，我猜想那很可能是七百多年前黄道婆时代的样式。

织布机两尺来宽，纺好的棉线紧密而整齐地纵向紧绷着，被机器上的“机关”分成根根交错的上、下两排，那是经线，另外有一个木制的梭子，里面装的是纬线。

织布的时候，坐在织布机前，用脚踩动织布机的踏板，那两排经线会交错移动。经线交错一次，就用手把梭子迅速横着穿过去，然后用一把直尺伸进去，把刚穿过去的纬线朝身边压紧。接着再踩踏板，穿纬线。吱嘎吱嘎，如此循环往复，可以看见布在一点一点变长。

一匹白布织好了，相对于到商店里买来的“洋布”，这

是土布，村民称它为“家织布”。当时有专门染布的人挑着担进村吆喝。村民听到了吆喝，就把白布拿出去，让人染成靛蓝色或者黑色，只有这两种选择。染布看上去很简单，用半个生锈的汽油桶架在露天，底下烧火。桶里面的水开了以后加入染料搅匀，再放入待染的白布，边煮边搅拌，过一会儿拿出来。这时村民得付钱了。



传统织布机，织出来的不是洋布而是土布，村民称作“家织布”。

然后村民再把染好的“家织布”用清水反复漂洗，晒干以后，就可以缝制衣服和裤子了。

年纪老一点的村民曾经跟我说：“当年红兵和白兵打仗的时候，红兵就说过：‘白布可以染成红布，有见过红布染成白布的么？所以红兵一定能够得天下。’听说现在的共产党，就是当年的红兵啊。”

手里有余钱的村民会去商店里买“洋布”，女孩子和成年妇女最喜欢的是阴丹士林蓝布，村民俗称“士林布”，做成衣裳穿在身上，鲜嫩素雅又大方。阴丹士林(Indanthrene)是一种化学染料，最常用的是蓝色。

村里男人讲究的是深蓝色的“卡其布”，厚实耐磨又硬朗。

有一年我买了一段卡其布带回上海，母亲说，那是单面的“粗卡其布”，没有上海的“双面细卡”那么结实挺括。

不管是“家织布”，还是“士林布”和“卡其布”，都是棉布。

在 1960 年代中期，中国的石油产量有了较大提高，政府开始进口一些先进的设备，利用石油工业的副产品来生产人工合成纤维。上海的商店里很快出现了一种合成纤维的布料叫作“的确良”。“的确良”是英文 Dacron 的音译（就像“尼龙”是 Nylon 的音译），后来又称作“涤纶”。

到了 1970 年代初，“的确良”在上海已经十分普及。用“的确良”做成的衬衫穿在身上，十分光鲜亮丽挺括。不久以后，上海又有了“的确良卡其布”，简称“的卡”，比一般用棉纱织成的卡其布更结实。

我们知青穿着“的确良”布料做的衬衫和外套回到村里，村里的男女青年十分羡慕，向往着自己也能穿上这样既漂亮又结实的衣裳。

直到我 1979 年离开里陂上村的时候，在鹿冈商店还是买不到“的确良”的布料。

二、缝与浆

目前的中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穿的衣服大多是从商店里买来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人的衣服多是母亲踩着缝纫机，亲手缝制的。而里陂上的村民少有自己缝制衣裳，他们一般会在娶亲嫁女和过年以前，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给全家大小做一批新衣裳，这是一件大事。

里陂上村里没有裁缝，要做衣裳的村民，先得到附近村庄的裁缝师傅家里，去当面邀请，定好裁缝来做衣裳的具体日子。日子一到，村民早早地赶到裁缝家，把做衣裳的缝纫机挑到里陂上村，放在自己家里。然后取出准备好的大段布

料。裁缝师傅跟在缝纫机后面到了里陂上村，安装好这种脚踏的缝纫机，问清楚要做什么衣裳，麻利地量一下身体尺寸，开始剪裁。不一会儿，缝纫机起了欢快的“哒哒”声。



老式缝纫机，用脚踏踏板来产生动力。

其他村民听见了缝纫机的声音，赶紧过来询问，做完这户人家的衣服后，是否能到他家去做。这样一来，裁缝一旦进村，没有十天半个月就别想离开。

裁缝的工钱是按天计算，做一天的工钱在二元钱左右，其中大部分要交到裁缝自己的生产队里去，作为队里的副业收入，裁缝才可以拿到事先约定好的工分。如果裁缝不交钱，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分不到队里的口粮，吃不上饭了。

做衣裳的村民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通常是每天中午提供一餐午饭，同时希望每天做出的新衣裳越多越好。所以乡村裁缝做衣裳的速度很快，一套成人的衣裳，一个裁缝只要半天多一点就能做好。如果是孩子的衣裤，一天能做二到三套。速度快了，做出来的衣裳自然很粗糙。

有的裁缝会带一个徒弟。两个人做衣裳，收两份工钱，徒弟一开始只能拿半份工钱，师傅拿一份半。师傅主要负责

裁剪和做纽扣等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徒弟则狠狠地把缝纫机踩得哒哒响，飞快地缝制衣裳。

里陂上的中老年人穿的衣裳一律是中式的。男式上装是对襟、立领、布扣。袖子比较短，袖口在腕上一寸，以方便劳作。女式上装的不同之处是面襟，扣子在右边，其余均一样。



阴丹士林蓝的传统女式上装

传统中式的男裤女裤，在裁剪时都不分前、后片，裤裆开得较深，且直统统的，不收裤腰，既没扣子，更无拉链，穿的时候把裤子提到腰间，宽大的裤腰在前面一折，用一根棉纱带系上就行了。男裤的裤腿只到膝盖下面五寸左右，裤口有一尺来宽，不用说卷裤腿下田很方便，就是真的要小方便，多数人把裤腿往上一捋就成了。女裤的裤腿要长一些，刚刚遮住脚踝。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青年人，都比较追求时尚，里陂上村也不例外。村里的男青年多数会要裁缝做袖子较短的“中山装”和遮不住脚踝的西式裤子，用上了黑胶木做的扣子。因为所用的布料比较薄软，乡村裁缝做西式服装的时间也不长，所以这些衣裳穿在他们身上，给人的感觉是软塌塌皱巴巴的，不如穿传统的中式服装那么好看。

村里的女权比男权弱很多，裁缝师傅最多为女青年做一些穿在里面的西式衬衫，外面大多还是用“士林布”做中式面襟罩衫。不过罩衫裁剪得十分合身，穿出了女青年婀娜的身段，男青年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文化革命”中，京剧《沙家浜》里，有一句新四军战士夸奖沙奶奶的唱词，人人耳熟能详：“缝补浆洗不停手……”。缝、补、浆、洗，我知道“缝”的意思，裁缝把裁剪好的布料“缝”起来，做成了新衣裳。新衣裳破了就要“补”，脏了就要“洗”。那“浆”是什么意思呢？我问母亲，母亲只是简单地说，在从前，洗好的衣服要“浆”了以后才穿。

到了里陂上村我才知道，村里的妇女在水塘边洗好了衣服，会倒上一些早晨煮饭时余下的饭汤，和衣服一起揉匀了，这就是“浆”，世代代，一直如此。饭汤含有淀粉，浆好的衣裳在竹竿上晾晒干后，摸上去硬邦邦的，穿在身上比较直挺。村民说，浆过的衣服更耐穿、而且不容易脏。

有一次，好心的村民把我的衣裳收去，洗干净了，浆好晒干，叠得整整齐齐的给我送回来。我穿着浆过的衣裳，觉得很很不习惯，一举手一投足都像被牵住了，好一会儿才能适应。最可怜的是我脖子短，直到下颏两边被浆过的衣领刷出了血痕以后，又硬又挺的衣领才变软了。

现代人改用洗衣机来洗衣裳，最后往往要加一点像饭汤那样有点粘稠的“柔软剂”，使得洗好的衣裳能够蓬松柔软，这和过去里陂上村民浆过的衣裳那种硬直挺括相比，是完全不同了。

8. 食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说到“食”，首先是要吃饭，里陂上村只生产稻米，吃的是米饭。光吃米饭不够，得有各种菜肴，营养才均衡。

现在有很多人在正餐之后要吃水果。虽然里陂上的村民没有“水果”的概念，却并不妨碍他们栽种、采摘和享用各种水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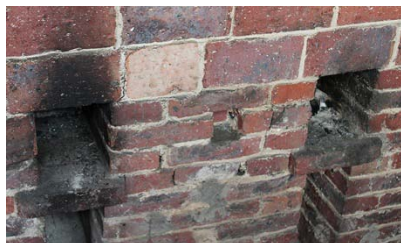
一、煮米饭

1969年我到了里陂上村，煮米饭的方式和在上海完全不同了，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煮饭。村民把煮饭叫作“务饭”，很古老的说法。

村里的家家户户都有烧柴的灶，绝大多数是用土坯砌成的，灶面上会抹一层厚厚的石灰，干了以后很光滑，也比较硬。多数人家的灶起码有两眼，分别放置一大一小两口锅。一般来说，大锅的直径在二尺以上，小锅的直径在一尺八寸左右。



2014年，村民用的两眼柴灶。



灶门口和铲“火屎”的火铲

村民是用木桶蒸饭。蒸饭的木桶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作“甑”（读“赠”音）。甑呈直筒形，上口略大，无底，直径在一尺二寸左右。在饭甑内圈下部的三分之一处，有一

个台阶。这个台阶用来放置竹子做的透气的甑篦，上面铺放松散的棕榈树叶。



饭甑和汽盖，饭甑里有甑篦和棕榈叶。

每天清早煮饭的时候，在灶上的小锅里放一些水，饭甑放在小锅里。再在大锅里放进半锅水，两口锅下面同时开始烧火。先用大火把大锅里的水烧开，然后放入洗净的米，继续烧开，搅拌数次。这时一定要睁大了双眼，密切注意大锅里的变化。

一旦米粒涨到只剩中间有一点点发白的时候，迅速用双手握住竹制的大灶篱（村民俗称“灶捞”），把米捞出来，放到小锅里正在冒汽的饭甑里，铺平，用筷子戳些透气的气眼，最后盖上饭甑的竹制汽盖，加大那口小锅的火力，直到把饭蒸熟。



灶捞的把有两寸宽，必须双手才能操作。

如果大锅里的米捞得太晚，米粒之间的空隙就太小了，小锅里的蒸汽不能依次通过甑篦、棕叶、米粒和汽盖，饭就再也蒸不熟，成了夹生饭。要是捞得太早了，就需要加倍的木柴和加倍的时间才能把饭蒸熟。

把米捞进饭甑以后，大锅里剩下的饭汤绝大部分用来喂猪。我们上海知青人人都相信，饭汤的营养非常好，村民居

然用来喂猪，真是太可惜了。

吃完早饭以后，村里的多数人家会把饭甑里的剩饭放到饭篮里，高高地挂在屋梁上悬下来的木钩上，让那些贪吃的狗们能够看得见，却永远够不着。



饭甑里的米饭和饭篮

中午和晚上做饭的时候，只要取下饭篮，把饭篮里的剩饭拿出来炒一下就行了。在里陂上村生活，一日三餐都吃干饭。从这一点来说，比在上海还要棒。村民从来不吃稀饭，更不用说专门煮粥喝了。

我们自然会想念上海的泡饭（稀饭），所以时不时的会在干饭里加点水，煮成泡饭吃。村民看见了，很快就传开去：“上海佬在吃鸭仔食！”原来，村民的习惯是会取一些剩饭，加进一些水，搅拌一下，然后拿去喂鸭子。

几个与我们熟识的村民会来尝一下我们的泡饭。他们尝过以后，都说泡饭不好吃。

二、面食和荞麦

里陂上村不种小麦，没有面粉，很少见到面食。“物以稀为贵”，客人来了，要是餐桌上有一碗汤面，那可不是供给客人填饱肚子的主食，而是名贵的菜肴，每人每次只能夹一小筷子来品尝。

如果有娶亲嫁女这样的大事，讲究的人家会专程去永丰县城买来油条，切成半寸长的段，放入肉汤里氽软，加上佐

料，端上餐桌，很能显出主人的品位，为主人增光。

在村民看来，北方人的面食，身价不同寻常。不知道我们南方人的白米饭，在北方有没有这样的待遇。

知青薛志民的父母是河南人，即便在上海，他家里经常吃面食，包饺子。到了里陂上村，志民仍然会怀念面食，时常给村民描述他家里饺子的美味和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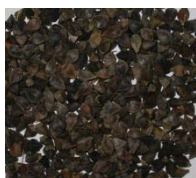
村民从来没有见过饺子，他们给志民说得涎水直涌，便起哄要志民让他们品尝这世上最美味的食物。可是村里不种小麦，也没有地方出售面粉，志民很无奈。

1970年夏天的“双抢”结束以后，上级领导要我们种一些“花麦”。队长买来了“花麦”种子，让我播种的时候，我看着灰黑色的有三条棱的种子，一下子想起了过去在上海，那破旧的枕头芯子里漏出来的“荞麦壳”。我恍然大悟，自己先前问了很多村民，却谁也说不清楚的所谓“花麦”，原来就是书上说的荞麦。

荞麦的生长期很短，很快长出了淡红色的细茎和绿色菱形的叶子，开出了白色的花朵，正是村民说的那种会开花的“花麦”，根本不像我们在上海农村里见过的小麦。小麦是禾本科植物，荞麦属于蓼科，它们不是一家人。



天气凉了，白色的荞麦花变成了灰黑色的荞麦粒，应该收割了。但是村民收荞麦只是用手拔，并不用镰刀割，不该说“收割”。然后把荞麦轻轻地在禾桶上磕几下，就完成了脱粒。



荞麦不是小麦

我们知青分到了十来斤荞麦，最兴奋的是薛志民，他自告奋勇，用村民家里的石磨把荞麦磨成粉，由他来剁菜包饺子给大家吃。志民终于盼来了机会，可以在大家面前一展身手了。

我和几个村民在一边观摩，祖籍河北的冯金生忙着充当下手。志民和好荞麦面，揪出一个个灰色的面团，信心十足地用擀面杖把一个面团擀成正常的饺子皮。他放上馅心，很

快就发现荞麦饺子皮的粘性太差，无论如何也捏不拢。

志民重新来过，把三个面团合在一起，擀成巴掌那么大的饺子皮，还是失败了。他最后把荞麦面团擀成直径约有六寸的面饼，放上菜馅，好不容易才做成了硕大无比的“饺子”。

等了很久，从未见过的荞麦“饺子”终于蒸熟了。我饥肠辘辘，但“饺子”实在太大，只吃了一个，感觉肚子已经饱了。口味呢？比上海的饺子差远了。几个村民为了尝鲜，分食了一个志民做的荞麦“饺子”，看得出来他们很失望。志民带着遗憾再三说明，以后一定要请他们吃真正的饺子。

荞麦终究不是小麦，荞麦粉不能用来做饺子。

三、菜肴

里陂上村民用来烧菜的铁锅固定在灶台上，直径在一尺八寸以上，比我上海家里的铁锅大多了。

锅铲也不一样。锅铲柄有一尺多长，七八分粗，圆滚滚的，用杉木做成，安装在铁匠打成的铁锅铲上。铲柄和铲面之间的夹角大约 50 多度。锅铲的操作方式和上海不一样，用单手握住锅铲炒菜的时候，很像握住了直拍在打乒乓球。

如果是烧一大锅的菜或者猪食，还可以双手握住铲柄，有点像在菜地里用双手握着锄头除草的样子。



锅铲



单手操作锅铲



双手操作锅铲

灶膛里的柴火不像上海用的煤气灶那样均匀可控，而是要根据烧菜的情况，随时往灶膛里塞一些柴，来调节火候。我们有脚柴、棍子柴、还有不同的劈柴，各种柴的燃点和燃烧速度都不一样，完全要凭经验来掌握。

我刚开始用这种柴灶来炒菜的时候，经常是很费劲地把柴点着了，放进灶膛里，赶快转到锅台边，往锅里倒一点烧菜的茶油。眼看着灶膛口冒出了团团的青白色浓烟，知道是刚点着的柴火已经熄灭了，连忙转到灶膛口，再重新点火。

更令我狼狈的是，有时候需要大火炒菜的时候，火头却越来越弱了，等到菜烧好了，灶膛里又熊熊燃烧起来……几番折腾下来，心里就着急。一着急，就出汗。一出汗，就用手去抹。抹时一不小心，就把摆弄柴火时手上沾的灶灰弄到了脸上……上桌吃饭时，自然会引来一阵哄笑。

我到了里陂上村，很快就发现许多村民会烧菜。如果一个人的菜烧得好，就会得到全村人的尊敬。村民之间也常常会互相交流各种菜肴的烧法。

村民家里常用的烹饪手法有炒、煸、煎、蒸、焖、礅。

炒：翻炒绿叶菜，比如炒蕹菜和炒苋菜。

煸：这是上海人的叫法，里陂上村民的发音是“腊”。用锅铲把食材压在锅底迅速移动、打散和翻炒，比如煸炒肉片。

煎：干净的锅里滴一点点油，把食材放进锅里，很少翻动。比如煎鱼，一面煎熟了，再煎另一面。

蒸：早上用饭甑蒸饭的时候，把放了腊肉或者辣椒的碗置入饭甑，可以把碗里的食材蒸熟。

焖：烧鱼的最后阶段，盖上锅盖焖一会儿，再起锅。

礅：“齿钵”是一种陶钵，内有细齿槽。食物放在“齿钵”里研搗捣碎的过程叫作“礅”。取出在饭甑里蒸熟的辣椒或茄子，放入齿钵礅烂，洒上盐拌匀，就是美味的“礅辣子”或“礅茄子”。



碾辣子的齿钵



齿钵里的碾辣子

村民偶尔也用一些其他的烹饪方法，如：炸、煮、熬、涑、煨、炕。

炸：做好的豆腐切成方块，用大量的茶油来炸，做成油豆腐，村民俗称“泡豆腐”。“泡豆腐”用的油太多，在食用油并不多的里陂上村，村民一般要两三年才会做一次。

煮：每年的“端午”时节裹了粽子，放在锅里煮，水面要淹没粽子。杀了牛，要煮牛杂碎，俗称“煮牛熟”。煮食物比较耗费木柴。

熬：为了收干食物里的水分的煮，叫做“熬”。秋天收了红薯，风干以后，糖份增加了，可以放到锅里熬出红薯糖。熬和煮一样，比较费木柴。

涑(读音“突”)：冬天到了，陶盎里放入猪脚和黄豆，水面淹没食材。把陶盎放到火塘里面明火的边上加热，让水面慢慢释出“突、突”的小泡，直到猪脚和黄豆完全“涑烂”。这“涑”的效果很像“炖”。我怀疑上海的家常名菜“腌笃鲜”里的“笃”字，是否应该是“涑”。

煨：冬天，把红薯或者鸡蛋埋在火塘里炽热的灰烬中煨熟，别有一番风味。涑和煨都要在冬天的火塘里操作，季节性很强，而且火太大容易焦，火太小不会熟。涑和煨这两种方法难度比较大，所以用得很少。

炕：春天来了，从水田里捉到了一批二寸来长的小鱼，放在锅里用微火慢慢焙干，称作“炕”。炕好的小鱼干储藏陶盎里，日后炒新鲜辣椒时，加入一些小鱼干，就成了村民餐桌上难得一见的荤腥。春天一过，小鱼没有了，有极少数的村民会把家里新做的豆腐“炕”成豆腐干。可是这种豆

腐干又紧又硬，口感并不好。

在分给村民种菜的“自留地”里，从春到秋，种着各种蔬菜，有辣椒茄子、蕹菜苋菜、黄瓜菜瓜、南瓜冬瓜、苦瓜丝瓜、葫芦豇豆、芋艿红薯、苘菜芹菜、香葱大蒜等等，在后面的《种菜》一篇里，会有相应菜肴的叙述，此处略过。

有些菜肴的原料不是人工种植或者养殖的，比如小竹笋、蘑菇、苦楮豆腐、田鸡（老咯）、野鸡、蛇、泥鳅和黄鳝。

小竹笋

当年里陂上村没有大的毛竹，山坳里有一片一片自然生长的小竹林，竹林里的竹子只有手指般粗细。春天来了，正值插秧的季节，小竹林里生机勃勃，冒出了很多“雨后春笋”。村民中流传有谜语“小时候包包扎扎，长大了披头散发”。前一句说的是笋，后一句说的是竹。村里的女孩子趁出工时中午休息的空隙，飞快地包上头巾，带上或扁或圆的竹篱，匆匆忙忙地上山“扯竹笋”。记得村里的女知青李桂英也曾跟着她们，一起去采竹笋。

下午出工之前，女孩们赶回来了，竹篱里面装满了手指般粗细、一尺来长的竹笋。队里收工了，她们回到家里，开始剥笋。用指甲把笋尖掐断一半，把未断的笋壳往下拉一寸左右，绕在食指上，顺势往下卷，“吱啦啦”的一声，一边的笋壳不见了，露出一溜细嫩光洁的笋肉。从那溜笋肉和剩余笋壳的交界处下手，另一边的笋壳很爽快地就剥掉了。

剥掉了壳的笋肉，一部分直接下锅做菜。炒新鲜竹笋的时候，要加一点去年晒干的红辣椒，更要多炒一点时间，否则竹笋会麻嘴。俗话说“山珍海味”，这就是“山珍”了，炒竹笋又香又辣，十分下饭。有点遗憾的是新鲜竹笋“火气大”，吃多了以后，嘴角容易溃烂。

吃不掉的笋肉，在水里煮熟了，放到竹制的圆晒箕里晒干，就成了金黄色的小笋干，每斤可以卖到一元五角。自家要吃的时候，把小笋干放在水里发胀了，随便怎么烧，都很好吃。如果是和肉烧在一起，做成村民说的“笋干交肉”，

那是顶级的美味了。

蘑菇

在小竹林里采竹笋，偶尔会采到雪白的“竹子菇”。这种蘑菇的菌杆很细，菌伞又大又薄，吃起来特别细嫩鲜美。相比之下，松树下生长的“松树菇”虽然厚实，却过于紧韧，嚼起来牙齿会打滑。油茶山上有一种棕色的“茶树菇”，个子比较小，口味在“竹子菇”和“松树菇”之间。里陂上的村民从小就知道，能吃的蘑菇只有“竹子菇”、“松树菇”和“茶树菇”三种，路边和林中常有各种其他的蘑菇，他们一概不吃。

苦楮豆腐

马立平插队的高坑村附近的山里，有很多苦楮树，树叶呈椭圆形，边缘有锐锯齿。苦楮树结出的褐色坚果叫“苦楮”，成熟以后，会自然脱落，掉到地上。到了秋天，里陂上村里的妇女和孩子成群结队，一大清早就出发，到高坑村的山里去“捡苦楮”，直到天黑以后很久，才浩浩荡荡地满载而归，回到里陂上村。

捡来的苦楮坚果内含有淀粉，可以做成“苦楮豆腐”来食用，做法很简单：碾去硬壳，把果仁磨成细粉，筛掉粗渣。煮一锅水，待其稍滚时倒入苦楮果仁粉，并搅拌均匀，等变稠凝固后，取出摊凉，切成块状，即大功告成，苦楮豆腐的味道清滑可口，又略带苦涩。加入红辣椒，再趁烫的时候吃苦楮豆腐，可以有效减少苦涩感。

（里陂上村另外一种大栎树的坚果，也可以用来做成



高坑村的苦楮树 金玮提供

“枳子豆腐”。)



苦楮坚果



苦楮豆腐枳子坚果



苦楮还可以卖钱，鹿冈商店每年都会收购苦楮果仁，每斤好像是八分钱，这是村民额外的收入。里陂上村有的人家靠着卖苦楮，一年可以挣得几十元钱。

田鸡

里陂上村的稻田里有数不清的青蛙，个头很小，才一寸多长，青绿色的背上有黑色的条纹，大眼睛上面有金色的眼睑。春天里一到夜晚，它们就“哇啦啦”地叫起来，我们不得不“听取蛙声一片”。曾经试着捉些青蛙来做菜，无奈它们太小，处理起来很费时，我们做了一二次就放弃了。村民不屑于吃这种他们称之为“蛤蟆”的小青蛙，他们吃的是田鸡。

田鸡的俗称叫“老咯”，个头很大，三到四只就有一斤。村民高发有自制的胡琴，就是用一只半斤重的“老咯”皮来蒙的胡琴面。田鸡的背上黑褐色，叫起来是“咯…咯…”，一声一声地叫，很响亮，有点像鸡叫，这可能是“田鸡”名字的由来。村民叫它“老咯”，说的可能也是它的叫声。



里陂上村的田鸡，俗称老咯。

田鸡会吃青蛙，村民就用青蛙作诱饵，去钓田鸡。用一根二尺来长的细竹竿，一头系上二尺多长的粗线，线的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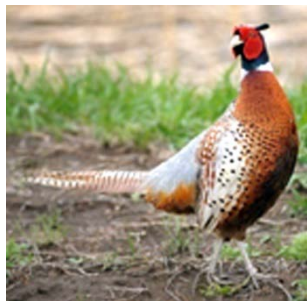
头绑住一只活青蛙的一条后腿。村民在平时听到田鸡叫的田埂上，伸出细竹竿，不断地轻轻抖动，让那只青蛙在稻田里的动静大一些。他把一片禾叶卷起来，放在嘴里吹口哨，模仿青蛙的叫声。

田鸡听见了，探头一看，看见了那只活蹦乱跳的青蛙，它兴冲冲地跳过来，一口把青蛙吞进肚里。村民的手一提，钓起了这只田鸡。

田鸡的肉异常鲜美，行笔到此，我忍不住要流口水了。水田里最美味的是田鸡，就像家禽里最美味的是家鸡。

野鸡

和家鸡相对的是野鸡。走在寂静的山路上，路旁数尺远的草丛或者灌木丛里，突然呼啦啦飞起一只受惊的野鸡，咯咯地惊叫着，嘭嘭地拍打着翅膀，着实吓人。村民传说，某村的一个老者，就是在走山路的时候，被野鸡吓死的。



野鸡

村民扛着鸟铳带着狗，上山去打猎，主要就是打野鸡。狗走在前面，它发现了隐藏在树丛里的野鸡，就会冲过去。野鸡一飞起来，村民扣动扳机，霰弹的弹着面很大，野鸡一般是应声落地。

野鸡的肉质较老，亦较粗，不如家鸡，但是野鸡汤非常鲜美，只有最好的家鸡汤方可与之相比。

蛇

里陂上村有眼镜蛇、五步蛇、银环蛇、竹叶青、蝮蛇等各种各样的蛇，但是村民不吃蛇。传说某村有人吃蛇，因为厨房里檩条上的尘灰落到了烧蛇肉的锅里，那个吃蛇肉的人一命呜呼了。每户人家厨房的檩条和椽背上都有尘灰，随时都会落到锅里，还有谁敢吃蛇么？我们知识青年敢吃蛇。

先是有别村的知青吃了蛇，里陂上的村民听说了，他们在田里打死了一条四尺多长的大蛇，送给我。这蛇一定是活了很多年，骨头非常硬。我那把当地铁匠打成的菜刀钢火不

够，等我把蛇分解完，菜刀的刀口多处卷刃，已经成了锯子。

蛇肉很老，有点酸，但是蛇汤很好喝。我在厨房里烧蛇肉，吃了以后居然没有死，村民十分惊讶。以后我吃了好几次蛇，然而村民没人向我学习，他们还是不敢吃蛇。

泥鳅

比较冷的水田里会有泥鳅，村民称作“黄鳅”。

炎热的夏天，冷水田里靠近田壩的那一边，特别是在两坵田之间流水的豁口处称作“田阙”的地方，比较阴凉，泥鳅会集中到那里乘凉。村民会把榨油时剩下的茶籽枯敲碎，放进木桶，带上一把木勺和一个竹篱，来到山坑里的冷水田。田里的水约有一寸深，在靠近田壩边约五、六尺的地方，不断用手挖起田里的湿泥，使其高出水面，围出一块六尺宽、十多尺长的区域。用木勺把田里的水舀进木桶，和茶籽枯一起搅匀后，舀出来泼洒到围出来的区域里。茶籽枯里含有的茶皂素可以杀死泥鳅，但是茶皂素又会自行分解，所以对人的身体没有不良影响。

不到一分钟，钻在泥里乘凉的泥鳅纷纷翻着肚子浮在水面上，只消把它们捡在竹篱里面就成了。运气好的时候，一饼茶籽枯可以捉回来二到三斤泥鳅。

泥鳅在锅中煎到两面金黄，加上少许佐料，吃口香酥鲜美。村民吃泥鳅可以不用吐骨，但是我不行。

黄鳢

比较深的泥田里会有黄鳢和少量的泥鳅，它们在夜间会从一坵田里通过“田阙”滑移到另一坵田里去。在田阙处安装上特制的容器“竹筍（读音‘狗’）”，黄鳢和泥鳅进去了就出不来。到了清晨，村民逐个检视竹筍，把捉到的黄鳢和泥鳅带回家，放在水缸里养起来。他们平时舍不得吃，要到有贵客上门或者有领导干部来吃饭的时候，才将水缸里养了多日的黄鳢和泥鳅打捞出来，做成时鲜的荤菜。

田螺

一到春天，山坑的梯田里会有很多田螺。田螺比上海人

平日里吃的“螺蛳”要大很多，它们在水田里基本上不移动，所以很容易捉。里陂上村有句歇后语：三个指头捉田螺——十拿九稳。我们捉来田螺，烧熟以后，仍然按照上海人吃螺蛳的方法，用力吮吸，村民看见了大为惊讶。他们是剔出田螺肉来，加入红辣椒，快炒出锅，味道香辣鲜嫩，更带有一点香甜。

领导干部，或者木匠、篾匠、裁缝师傅和剃头师傅等手艺人来家里吃饭，村民叫作“供饭”，他们会把最好的菜肴统统拿出来，还要互相攀比，看看是谁家里的饭菜供得好。

凡是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到村民家里吃饭，按照规定，每餐饭要付给村民二角钱和半斤粮票。但是真正执行规定，付饭钱给村民的干部，还不到一半。

有一次，公社武装部的肖部长在里陂上村吃午饭，轮到张四喜家供饭。饭桌上除了几片腊肉和几样蔬菜以外，还有一碟切成片的暗红色南瓜饼。村民家里多没有窗户，餐桌上的光线很暗，肖部长用筷子夹起一块南瓜饼放到嘴里，脸色倏然大变，连忙吐了出来。那是一只油亮的棕红色活蟑螂，被部长咬了一口，腿脚还在动。

肖部长放下筷子匆匆地回鹿冈了。这事本来应该是谁也不知道。供饭时出了这么丢脸跌股的事情，四喜家是绝对不会往外说的。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公社的妇女主任专程来到里陂上村，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卫生工作。村民一问究竟，妇女主任实在忍不住，笑着道出了原委。原来是肖部长昨天吃到了一只蟑螂。

想来是肖部长回到鹿冈以后，越想越生气，才叫妇女主任来里陂上，让我们大家知道了张四喜家供饭时的这个大笑话。

直到如今，我在美国的家里烧菜，仍有几样菜肴是按照里陂上的烧法来做的。

生炒鸡块

把鸡剁成一寸见方的块，和葱姜一起放入锅中炒。如果

炒得干了，加一点点水以后继续炒，大约十到十二分钟，炒到鸡块刚刚断生，加入盐、糖和酱油，炒匀起锅。如果有必要，最后可以勾一点芡。

香煎茄子

把茄子切成二分厚的片，放在锅里两面煎软以后，加入葱花和盐，最后加入一点点水，起锅。

酥香芋艿

芋艿连皮放在水里煮熟，去皮，再放到锅里烧，烧的时候加入葱花、辣椒、盐和酱油，最后加一些水，到汤汁有了糊状的时候就烧好了。

类咸菜

买来大芥菜，在开水里煮一分钟捞出（也可以直接用买来的潮州酸菜），挤干水分后切细，下锅快速爆炒，加入盐、辣椒或者辣酱。这道菜香辣可口，十分开胃。

我在烧蕹菜、菠菜和豌豆苗等绿叶菜的时候，最后加小指甲那么大的一点猪油，烧出来的菜马上就有了里陂上村的味道。

四、水果和果树

我下乡之前在上海，家里经常吃水果，却不知道结水果的果树究竟是什么模样。待得到了里陂上村，发现村民会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几棵果树，但是他们却没有“水果”这个词汇。

村民见到自家树上的果子成熟了，照例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地享用，并且时常会非常慷慨地送一些给我们知青，或者招呼我们一起吃。只是这些果树的品种不甚优良，结出果子的味道无法和那时上海市场上的水果相比。

里陂上村最常见的是桃树、梨树、李子树，以及橘子树、橙子树和柚子树。

桃树、梨树和李子树同属蔷薇科植物。

桃子

春天里，里陂上村里粉红色的桃花犹如女孩子的面靥，十分好看。可是桃树上结出的桃子只有鸡蛋般大小。摘一个熟透了的尝尝，只有极淡的甜味，吃在嘴里有一点发沙，和我们熟悉的硕大甜蜜又多汁的江苏无锡水蜜桃相去甚远。我们学着村民的样子，把没熟的桃子摘下来，咬在嘴里嘎嘣嘎嘣的，像是吃脆萝卜，倒有那么一股清香。后来才知道，这根本就是“硬肉桃”的一种，硬熟时的桃肉脆硬致密。

梨

里陂上梨树的品种是“麻梨”，梨子的皮色和安徽省的“砀山梨”相似，个头比砀山梨小得太多，只有鸭蛋那么大，肉粗渣多，还有点涩。别说与天津的鸭梨、山东的莱阳梨和安徽的砀山梨这些“名梨”相比，即使和上海本地出产的白梨和香雪梨来比较，也还差了一大截。

李子

据书上介绍，李子在7~8月间成熟，饱满圆润，玲珑剔透，形态美艳，口味甘甜……可是里陂上的李子吃到嘴里，常常酸得令人呲牙皱眉。

橘子树、橙子树和柚子树同属柑橘类植物。

橘子

村民俗称“柑子”，号称是附近新干县有名的“三湖红橘”。就我的感觉而言，三湖红橘还是比以前吃过的浙江的黄岩蜜橘、福州蜜橘和江西南部的南丰蜜橘要差，甜度不够一点，酸度过头一点。

橙子

橘子的形状有点扁，村民称作柑子，而橙子是圆的，所以村民把它叫作“球柑”。在里陂上村，“球”和“臭”同音。我第一次拿到村民送来的“臭柑”，惊讶得睁大了眼睛，这黄澄澄的橙子怎么可能是臭的呢？切开来品尝一番，它的质量自然不及广东的新会脐橙。

柚子

村民骂某人的面皮厚，常常比作“香圆皮”，这“香圆”就是柚子。柚子的皮很厚，有村民尝试着用来做了菜让我试吃，又涩又辣，味道很怪。柚子的果肉看上去不错，但吃起来比不上广西的沙田柚子。

在美国，有一次晚饭以后，美国出生的儿子提醒我：“爸爸，该吃水果了。”

我对儿子说：“我知道冰箱里有水果，但水果不是每天必须要吃的。每天必须要吃的是主食和副食，主食是米饭和馒头面条，副食是各种菜肴。我们今天就不吃水果了。”

我禁不住又想起了里陂上村里的那些果树。

五、野生的果子

里陂上村的山岭上有几种野生的果子，主要的两种是杨梅和“娘娘饭”。

杨梅

距离里陂上村不远的水东坑里就有一片杨梅树林，我和村民朋友张寿仁一起去摘杨梅。野生的杨梅树有四米多高，多枝杈，我带着装杨梅的竹篱和用来勾树枝的长钩，脚一蹬，手一搭，三下两下就上了树，两眼透过树叶，搜寻着杨梅。野生杨梅很小，直径多在半寸以下。一看到成熟的杨梅，我马上摘下来，塞进嘴里，立刻溢满了口水。里陂上的野生杨梅太酸了，完全不像我之前吃过的浙江省的余姚杨梅。

我只摘了两棵树上的杨梅，装杨梅的竹篱就满了。下得树来，遇到寿仁，他从自己的竹篱中挑了几颗杨梅递给我，笑着说：“老夏，这是少有的白杨梅，很甜。”我一尝，只是不酸而已。

回到村里，我们把摘到的杨梅倒在一个盆里，用井水洗过，放在桌上，邀人围在一起，大啖起来。我刚吃了两三颗，便察觉到寿仁他们吃得飞快，已经有十来颗杨梅下肚了。再仔细观察，他们把杨梅扔到嘴里咬两下就吞下去了，并没有

像我那样吐出核来。原来村民吃杨梅是不吐核的！我马上像他们一样，不停地抓起杨梅往嘴里扔，一大盆杨梅很快就见底了。吃完杨梅，我心里不禁有些担心和疑惑：今天吃进去这么多杨梅核，肠胃吃得消么？明天拉出来又是什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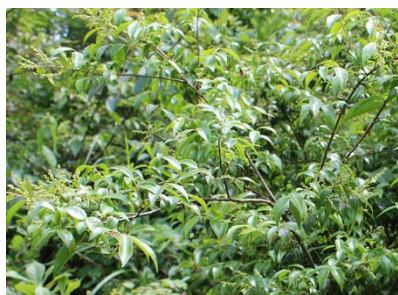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发觉整个牙床完全酸软了，根本不能咀嚼任何食物，所有的饭菜都是囫囵吞下去的。直到第二天的午饭才恢复了咀嚼功能，但还是觉得牙齿有些酸软。

以前读“望梅止渴”故事时，都说故事里的“梅”是一种青梅。现在我知道，不光是青梅，里陂上村的野生杨梅同样有“思梅止渴”功效。我敲键盘写这一段杨梅的文字时，脑中一想起那野生杨梅，口里的津液便涌动不止，已经嚥了无数次口水，似乎连仅存的几颗牙齿也开始酸软了。

吃杨梅的当晚，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的出工期间，我特意溜到山上的树丛里“出恭”。完事以后，我顺手折了一根树枝，在自己的排泄物中简单地拨弄了几下，没有找到前一天吃下去的杨梅核。

“娘娘饭”

“娘娘饭”是一种灌木丛的名字，同时也指它的浆果。每逢春末夏初的六月里，里陂上村的山岭上，随处可见一串串的“娘娘饭”浆果。浆果的颗粒红中带紫，样子庶近极小版的红葡萄，吃起来酸中带一点甜，果皮略有一点涩。



里陂上村的山岭上，五月初的“娘娘饭”，再过一个月就熟了。

“娘娘饭”成熟的时候，繁忙的春耕已经结束，田里的

农活松闲了。有一次出工时，寿仁邀我和他一起溜到山上，采摘了一堆“娘娘饭”浆果，坐在山顶的空地上，小憩一会儿，边吃边聊天。

我问寿仁，这种浆果为什么叫“娘娘饭”呢？

寿仁说，过去每年的春夏之交，往往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年的老谷吃完了，今年的新谷还没成熟。每到这种青黄不接时候，山岭上的“娘娘饭”就可以充饥当饱，它是观音娘娘的赏赐，是观音娘娘送来的饭呢。

蓝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变化着，一阵轻柔的暖风袭来。身边的灌木丛好像是在睡梦中，它懒懒地抖动一下身子，舒服地发出轻微的沙声。

空中响起了鸟儿清亮的叫唤，结伴飞来几只小鸟，站在了较高的树梢上。它们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唧唧喳喳地说话。一只小鸟突然拍动翅膀，像箭一样射向一串“娘娘饭”，叼起一颗浆果，迅即向上飞走了。这领头的兴许是父亲，或者是母亲。其他的小鸟“接踵而至”，叼起浆果，也扑愣愣地飞走了。

我们下山回到田里，继续干活。几个女孩子朝我俩看了一眼，偷偷地发笑。一个老者严肃地对着寿仁说：“你这后生又偷奸买懒了，躲到岭上去吃娘娘饭，吃得嘴上乌嘟嘟的。”

因为我是知识青年，老者不好意思批评我。

我和寿仁对望了一眼，同时笑起来。因为吃多了“娘娘饭”，我俩的嘴唇变成了黑紫色。

山上有一种叫作“灶捞饭”的灌木丛，数量比较少，其浆果的形状和味道跟“娘娘饭”差不多。

还有一种绿色的野果子是“毛栗子”，只有我们小时候在上海玩的玻璃弹子那么大，直径约有半寸。设法拨开果子的硬皮，里面那细小的果仁既带着一股清香，又有一丝苦涩。



野生毛栗子

9. 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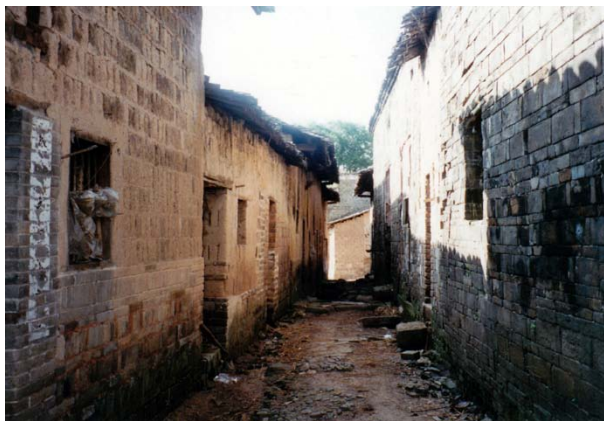
过去常说，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现在的说法是，普通老百姓负担不起昂贵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费用，那是新的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就是住房。

古今中外，住房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唐朝的大诗人杜甫，他在四川成都的时候，遇到居住的茅屋漏雨了，便大发感慨。他当时的理想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不由得想起了在里陂上的时候，住房的点点滴滴。

一、住祠堂

下乡以前，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南京，我家住的是铁路局的职工宿舍，每个月在父亲的工资里，要扣除几元钱的住房租金。



1998年，里陂上村最主要的巷道。

到了里陂上村，我新奇地发现，几乎每家村民都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有的人家好一些，有的人家差一些。因为是自有的住房，当然无需付租金。我们在仓库里暂时住了几天，就搬进祠堂里去住了。没人问我们要钱，是免费居住的。

据说这祠堂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每逢下雨，祠堂里就像在小学的课本里读过的简易棚屋那样：“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在滴滴答答地下个不停。”我们得用锅碗瓢盆等各种容器，放在漏雨的地方盛积雨水。雨水滴落的声音各有不同，初听上去有点像音乐，听久了就觉得很单调，像是催人入眠的催眠曲。

有一次，半夜下起了大雨，我们在酣睡中，没有听见下雨。等到我们早晨醒来，发现地上的积水有一寸多深，我们的鞋子像纸折的小船一样，漂在水面上。

祠堂后面紧挨着屋背岭，岭上有一片松树林。入夜以后，阵风吹过，树林轰轰作响，这就是书上说的松涛声啊。

一天傍晚收工以后，薛志民拿了一只竹篾做的大畚箕，那是平时撮稻谷用的“撮箕”，他打开祠堂后门，想去屋背岭旁边的晒谷场上撮一些瘪谷回来，准备晚上在房间里点燃了充作蚊香，把讨厌的蚊子薰出去。



撮箕

志民用撮箕装着瘪谷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原来他刚出门，一迈腿，赤脚踩到了松软凉滑的什么东西。他吃惊之余仔细一看，夜色朦胧中，一条蟒蛇悄然无声地滑动着离去了。

我们养的鸡每天会从祠堂里溜到晒谷场上去偷吃稻谷，每只鸡都养得身肥体壮，但是那一阵少了好几只。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猜测，我们的鸡怕是给屋背岭上的狐狸叼走了。后来我们觉得，那几只鸡更有可能是被这条蟒蛇吞吃了。

二、村民造新屋

不久以后我知道了，里陂上村民一生中要做的最大的事情，是造房子，叫作“做屋”。房屋房屋，北方人是一座房子里有几间屋子，房大屋小。里陂上的村民认为，是一个屋

里有几间房，屋大房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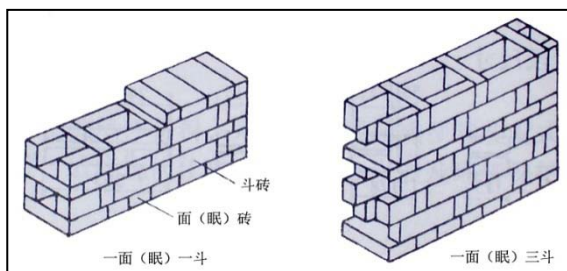
里陂上没有造新屋必需要用的杉树。村民造新屋，最大的开销是买杉树。传统计量杉树用的是“斤两法”，并不是按照公制的“立方米”来计量。要造一个最简单的三开间的新屋，差不多要买“一斤”杉树。

在“斤两法”里，砍下一棵杉树，剥去树皮，在离根部六尺的地方测量周长，如果有一尺八寸，按照口诀“尺八一钱八”，就是一钱八分，不到二钱。早先一斤有十六两，合一百六十钱，要八十多棵这样“尺八”的杉树，才合到“一斤”。按六十元一两来计算，“一斤”杉树要花九百六十元钱，平均每棵树十二元左右。

我曾抄写过一份计量杉树的口诀表，以前记得很熟，后来把口诀表弄丢了，现在只记得有“尺木三分……尺八一钱八，尺九二钱一，两尺二钱六……”。

造新屋需要用砖。砌墙的青砖可以自己烧砖窑，但是十分辛苦，会累到人都“脱了一层皮”。如果去买砖，是六元钱“一墩”，有二百块砖，每块六斤重。

青砖砌墙，里陂上村民把平放着砌的砖叫做“面砖”（应为中国传统建筑业中“眠砖”之谐音转用），侧放着砌的砖叫做“斗砖”。最高级的墙是实砌墙，用里外两层“面砖”砌成，谁家盖了一式“面砖”的新屋，会引来村民的啧啧赞叹。更为常见的是一层“面砖”、一层“斗砖”，俗称“一面一斗”的空斗墙。这种平、侧交替砌筑成的空心墙体，可以节省一些砖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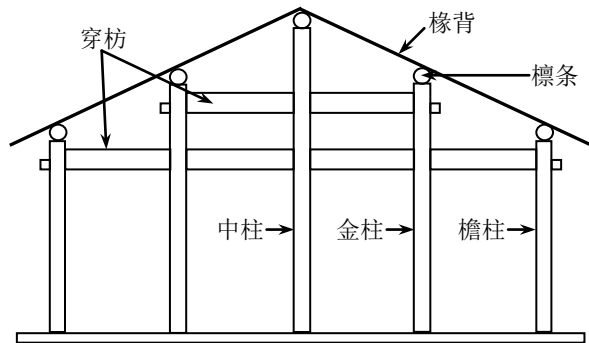


经济实惠的空斗墙

很多村民因为财力不够，便会自制土坯砖。他们选用没有杂质的黄泥，加水踩烂拌匀，然后用一个木制的模架，一块一块地做出砖坯，晒干以后就是土坯砖。每块土坯砖的尺寸，大约是长七寸半、宽五寸、厚二寸，重量在二十五斤左右。我一次只能挑六块土坯砖，别人能挑八块。

打好了地基，开始砌墙。靠近地面的是“一面一斗”的青砖墙。财力雄厚的人家，是一色的青砖，叫作“青砖到顶”。财力不够的人家，起了三四尺高的砖墙以后，上面再接一段土坯砖。

屋架是杉木做成的，屋柱之间用枋子连接起来，叫作“穿斗式”屋架。“穿斗式”屋架又分成了软山屋架和硬山屋架两种。里陂上村民最喜欢的是传统的软山屋架，整个屋子的重量全部由木制的屋架来承接，墙体并不承重，所以有“墙倒屋不倒”的说法。硬山屋架是一种混合的类型，中间是木屋架，四周的楼枋和檩条，有一头搭建在山墙上，墙体承受了屋子的一部分重量。应该说硬山屋的整体刚度比较好，相对地结实一些，但是在村民的眼里，“硬山屋”始终没有“软山屋”的档次高。



穿斗式构架

会做屋架的木匠师傅来了，他不用图纸，全凭记忆和经验。屋架全部是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铁钉。等到屋柱一根一根竖起来了，用枋子一一地穿接好，就要上屋顶的房梁了。

上房梁的那天有个仪式。放了一挂爆竹以后，主持人先

用尖刀，当场宰杀一只准备好的公鸡，然后手持那只鸡，把鸡脖子里流出来的鸡血，洒滴在地上。接下来，他从酒壶里倒了一碗水酒，高高举起算是祭天，嘴里念念有词，都是吉祥的话语，我当时觉得很有趣，可惜现在不记得了。他接着把水酒洒在地上，算是祭地。最后再放一挂爆竹，上梁仪式就结束了。接下来，由木匠师傅指挥着众人，用绳子把绑着红布条或者贴着红纸的梁木拉上去，安装好。

屋顶的檩条上铺好了椽背以后，就要覆盖青瓦。村里造新屋没有什么安全措施，也没有脚手架，要把瓦片送上屋顶，全靠“打瓦”。地上的人捧住一摞瓦片，屏住气，平直地往上一抛。屋顶上的人站在屋檐边，看准了瓦片的来势，伸手接住，放在屋顶上。一抛一接，上下配合默契。一摞摞的瓦片飞上去，没有片瓦散落在地上，十分神奇。如果是建造二层楼的新屋，屋顶比较高，要用工具来打瓦。打瓦的工具是有把手的方木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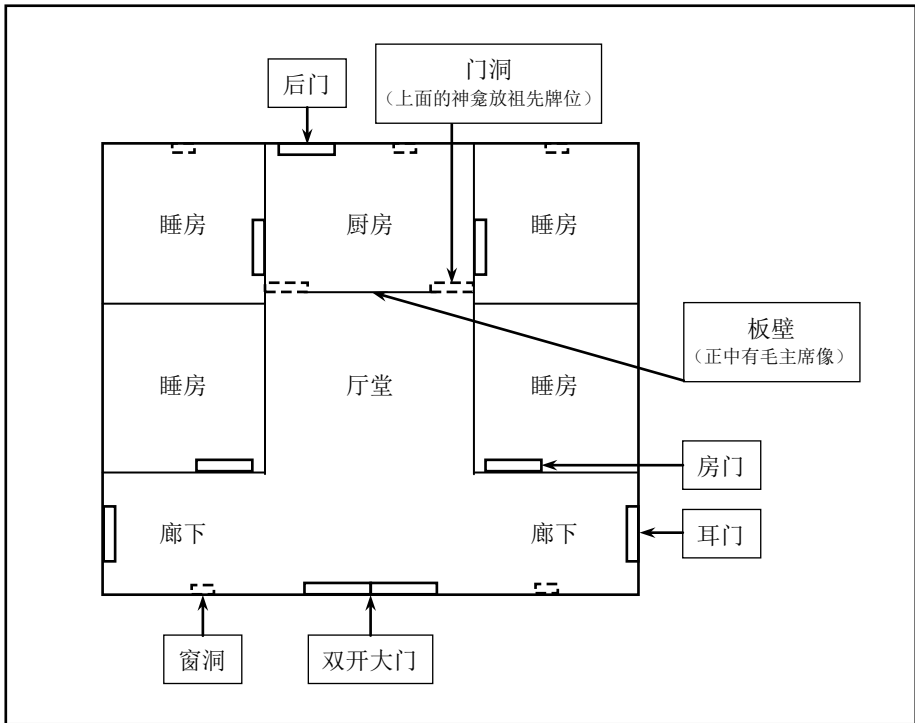
村民造新屋的时候，除了请泥水匠来砌墙盖瓦、请会造屋的“大木匠”来做屋架以外，还经常要在村里请很多人，来帮忙干活。我虽然体力不强，但是我会帮造屋的村民出些主意，帮着张罗和协调，也会带头领着其他人干活（有点像现在建筑工地上的小“包工头”），因此造新屋的人家都很乐意请我去帮忙。

三开间的新屋造好了，是坡顶的平房。刚进了对开的大门，是空空的廊下，廊下的两头各有一扇可以走到屋外的耳门。屋中央是宽敞的厅堂，厅堂正中的板壁上张贴着毛主席的画像。靠近板壁放着一张方桌，是全家人一日三餐吃饭的地方。厅堂后面是厨房，通向厨房的门洞上是神龛，供着祖先牌位。厅堂的两边是睡房，前面的睡房略大于后面的睡房。

传统新屋的采光比较差。大门上方的墙上，有一块透光的地方，大约二尺高，三尺宽，叫作“天门”。大门和耳门关闭以后，整个屋子里，全靠天门里进来的那一点光了。

睡房门的上面，是一个中间竖着几根条木的长方形空框，

睡房的采光主要就靠它，所以睡房里显得非常幽暗。整个屋子只有前、后两面墙上有小小的窗洞。



里陂上村传统三开间民居平面图中柱金柱金柱



厅堂中间至今仍有毛主席像。右上方的神龛放祖先牌位。

现在鹿冈乡的农民，时兴建造三到四层的楼房，配上了钢制的门和铝合金的窗。

遗憾的是，有些楼房建成了平屋顶，会造成屋顶流水不畅。水泥屋顶经过阳光的强烈照射，时间一长，会慢慢风化，可以造成屋顶渗漏，或许会像我当年在上海住的房子“中国花园”那样，房间里的天花板上，有很多黄褐色和黑灰色的水渍，十分难看。上海的年均降水量不到一千二百毫米尚且会渗漏，鹿冈的年均降水量可有一千五百多毫米呢。

考究一点的楼房仍然是传统的坡顶，安上了彩色的琉璃瓦，美观、大方、高贵。只是琉璃瓦的釉面经过日晒雨淋，十多年就会斑驳脱落，变得难看了，倒不如在我们居住的美国加州这一带，很多人家用的是漂亮厚实的不上釉的红瓦或蓝瓦，可以保持几十年不变。

这些年来，里陂上村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挣了钱回到村里，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建造新屋。村民从1990年代开始建造二层楼的住屋，2000年代有三层楼的新屋出现，到了2010年代，村民的新屋有不少已经是四层楼，高度已经超过了村子后面那矮小的屋背岭。



2014年的里陂上村，有一层到四层的住屋，有的已高过了矮小的屋背岭。

按照规定，里陂上的村民在原来的宅基地上拆除旧屋以后建造新屋，并不需要缴纳费用。

村民如若私自占用良田造新屋，则按建筑面积征收罚款，每平方米180元人民币。

（而邻近的袁家村和李家村属于墟镇，村民建造新屋时，还得缴纳相应的规划费和设计费每平方米 18 元。）

村民手里有钱了，不必再像几十年前那样，自己动手开建砖窑，砍来大量木柴，极其辛苦地烧造传统的青砖。他们改为购买全国统一标准的机制红砖，十分方便。

看着乡亲们兴致勃勃地建造新屋，看着他们造新屋时用上了吊车，我由衷地为他们的发展感到高兴。



2014 年，村民建屋用上了吊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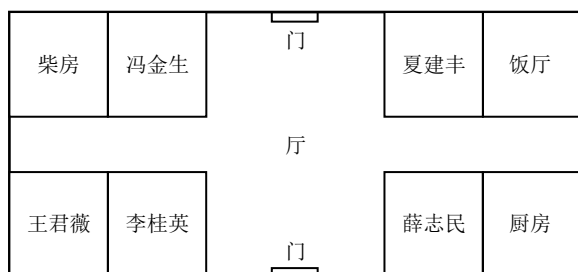
三、住新屋

1969 年初全国知青大批下乡后，开始时各地政府的管理是所谓的“劳民伤财”，即与劳动局，民政局、商业局、财政局都搭界。在永丰，我们被算作移民，归永丰县民政局管。1970 年代初期，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乡办”或者“知青办”，统一管理全国一千多万下乡的知青。各级政府也相应成立了乡办。

乡办成立以后，国家拨了一部分款，要求各村专门为知识青年建造新屋。里陂上村得到了国家给的 1500 元钱，开始动工为我们盖新屋了。

不到半年，我们的新屋造好了，和村民造的传统新屋有些不一样。

新屋是坡顶平房，居住面积大约一百平方米。新屋内用松木板隔出了八间房和一个厅，每间房约九平方米。



里陂上村知青新屋平面图

按照要求，应该是一间房住两个知青，但此时我们九个知青中只有五人常在村里。于是我们用一间房作厨房，一间房吃饭，一间房堆干柴，其余五间房正好一人一间。厅里空着，供村里开会和每天晚上记工分使用。外来的干部在村民家里吃完了饭，也喜欢到我们的厅里来休息。

鞭炮响过，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阴暗潮湿的祠堂，搬进了新屋。原来我们四个男生挤住在一个房间里，现在一人一间房，太好了。

我们的新屋建在村头，离田不远，虽然和大自然比较亲近，但有时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

一天晚上村里开会，多数人坐在厅里，我的房间里也照例坐了几个人。突然，村民张寿仁叫了起来：“老夏，有蛇！”原来是一条巨毒的银环蛇（竹节蛇）正从我的床底下伸出头来。大家手忙脚乱地把蛇打死，扔了出去。

还有一天晚上，鸡窝里的鸡突然骚动不安，咯咯咯地乱叫。拿手电筒一照，一条毒性不强的蝮蛇（麻鸡婆蛇）盘在了鸡窝里。我只好壮着胆子，用火钳把那条蛇钳出来“消灭”了。

一开始，新屋里的老鼠比原来住的祠堂里要少很多，后来也渐渐多起来了。

我在床头横放一条长凳，当作床头柜，油灯放在长凳的一头，紧挨着床。床上一年四季挂着方帐。帐子不光要防蚊子，还要防老鼠跑到床上来。帐子顶上是老鼠的“跑马场”，

有很多老鼠屎。

一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睡觉前躺在被窝里，隔着帐子，凑着床头的油灯看书，那是一大享受。一阵睡意袭来，我正想吹灯就寝，一只半大的老鼠，顺着帐门的折缝，突然钻了进来，“误入白虎床”。我顿时睡意全无，翻身坐起，身上的汗毛也竖了起来。我顾不上多想，用被子作武器，对着老鼠猛扑。惊慌失措的老鼠沿着帐子，转着圈地跑，它想逃出去。我扑来扑去，抓不住它。

“哎呀我傻了，它只是想出去，帐子一开就行了。”我一掀开帐子，那只受惊的老鼠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记得有一次我去南昌开会，一周以后才回到了里陂上的新居。厨房的水缸里还有大半缸水，我照常舀水喝，照样淘米洗菜煮饭。

到了晚上，我和村民正在厅里开会，村民张富魁突然大叫起来。他是到我的厨房里找水喝，透过手电的亮光，富魁看见我的水缸底部有一只死老鼠，身体已经腐烂了。我赶忙把水舀出来，重新挑水来洗干净水缸。

我知道自己不小心喝过了这特殊的“老鼠汤”，很可能会生病。但是我不知道会生什么病，只能耐心等待着疾病来访问我。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我居然安然无恙。

这新屋留给我太多的回忆了。

我在这里用糯米酿造水酒、用稻谷做烧酒。遇到好朋友陆禹平或者夏元麟来了，我更是要炒几样好菜，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每逢我杀猪的日子，我起早做豆腐，上午杀猪、晚上在厅里摆上四桌杀猪宴，场面十分热闹。

文化革命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四旧必须要批判，要禁止。我在文化革命初期，响应了破四旧的号召，把家里的一本《唐诗三百首》烧毁了。

在里陂上村住进新屋以后，我偶然借到了一本不知什么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不由得想起了以前破四旧的事，心

里很后悔，便赶快抄录下来。

我从第一首张九龄的五言古诗《感遇》开始，一直抄到最后一首杜秋娘的《金缕衣》结束，一共 310 首。晚饭后，我在饭桌上点着油灯抄录唐诗，抄了将近二十个夜晚才完工。

我曾经在这新屋里，参照流传已久的格式，给村民写了一份买卖房屋的“绝契”。“绝契”的意思，是指卖方卖断，买方买断，双方均不得反悔。旧时文书的细密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它和如今律师的文本有些相似，我把基本格式抄录在此。其中括号里的文字是“与时俱进”，为了因应新社会的需要而添加的。

绝契样式

立永远卖契字人_____，（____公社____大队）____村人，今有祖父手置到本境住屋一栋____间，（见土地证____号。）今因要钱应用，自愿将所业出卖。上卖青天桁条椽瓦，中卖楼椽楼板搭攀独脚门扇宝壁，下卖础石地坎。东以____为界，南以____为界，西以____为界，北以____为界，四至界限所载明白。凡及屋内寸木寸板片瓦片砖概行扫卖，出路随门出入。今除遍问过亲房叔伯兄弟人等，具说无钱，不能成交外，今凭仵说合，召到____村____人名下，向前承买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价（人民币）____元正。其币于立契之时，一并亲手同仵，三面交足讫，并不短少分文，又非准折公私债务之类，尽是一色现金过手，交付明白，得授清楚。其屋未卖之先，并不曾重行典当别处，又不与他人互相钩绞。如有此业来历不明，出售人自然拘管明白，不干承买人何事。所买所卖，俱系二比情愿，非相抑逼而成。一定后，二比各不许反悔，悔者抽罚契上价币一半，与不悔人用，仍不破此交易。买者永远管业，卖者不得异说。恐口无凭，立卖契字一纸存照。

同年月日交到契上价（人民币）一应如数，完讫。

_____年____月____日

立卖契字人_____ 说合_____ 在见_____ 代笔_____

后来，我又借到了一本讲诗词格律的书，依然是在新屋

的饭桌上，把其中的五十种词谱抄录了两份，其中一份给了朋友夏元麟。在抄录诗韵（共 106 韵）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国家推广的普通话里已经消失的十七个入声韵，比如“屋”韵是：屋木竹目福禄……，陆禹平的“陆”是入声字，就在“屋”韵中。

过去农村的财主家里有人去世，会请和尚来做法事。和尚啾啾地敲着木鱼，口中悠扬地反复颂念“光明经”。到了 1960 年代，虽然做法事成了“迷信”，被禁止了，但是传统的影响还在，村民如果听别人唠叨觉得烦了，就会讥讽地说：“你念什么‘光明经’啊？”很巧，我得到了八十一个字的《光明解无经》，原来光明经是它的俗称，是用来超度亡灵的。

我知道农历十二月是腊月，但是其他的月份如何称呼呢？后来我看见一本“杂记”，才知道正月是端月、七月是瓜月、八月是桂月、九月是菊月，等等。如果用地支来称呼十二个月，正月对应寅月，十二月对应丑月。这本杂记上还有三十六种亲友称呼的上款和落款，以及送匾的格式，送各种信封（红包）的格式，等等。

以上的“光明经”和“杂记”，我均在新屋里恭恭敬敬地抄录如仪。

有点奇怪的是，我居然还在这新屋里抄录了毛主席去世以后，新政府颁发的短命的《第二次简化字方案》。

到了每年的农历十二月，新屋厅堂的板壁上要张榜公布各户村民年终分配的决算明细。我从鹿冈商店买来一种不起眼的米黄色纸张，约摸有四尺来长。纸的短边有二尺来宽，是没有裁切过的毛边，所以村民俗称为“毛边纸”。

我用普通的毛笔蘸着墨汁，在毛边纸上抄写决算的明细榜。毛边纸十分细密光滑，富有韧性，比当年我在学校里抄写“大字报”时所用的白色大纸还要好。毛笔走在毛边纸上那不涩不阻的感受，点顿撇捺的得心应手，墨汁在纸上不涸不化，真是奇了。

村民张四喜告诉我，毛边纸是永丰县本地出产的。县里盛产毛竹的上永丰地方，每年春天的毛竹笋子长到一人多高时，便砍伐下来，捶扁以后放入石灰塘里沤烂，再经过蒸煮、制浆等多道手工，才能做成毛边纸。

哎呀，这似乎是纸中之王“宣纸”的制作方法了。从毛边纸不涸不化的特点来看，它有点像宣纸中的“熟宣”呢。

我后来看过一篇文章，说是民国以前，逢到安徽宣州的“宣纸”供不应求的时候，往往要从江西各地采购调运一些纸张来应急，可以冒充真正的宣纸销售出去。

不过，如果宣州人真的要把永丰的毛边纸当作宣纸去卖，可能得改头换面，把它的毛边裁切成光边才行。

多年以后我在永丰县，曾几次特意问起：“还有毛边纸卖么？”得到的不屑一顾的回答都是：“早就有人做了。”

但愿永丰县传统的“毛边纸”，至今没有真正绝迹。

每逢过年，村里的家家户户要在自己家的大门、后门和边门上张贴春联，我会在新屋里忙上一天，给大家用楷书写春联。有一年，我得了一本隶书字帖，就开始试着用隶书来写春联。

我在新屋里鏊过墓碑。先根据墓碑的格式，用毛笔在碑石上写好内容。在里陂上村，最上面的抬头不外乎是“鲤溪张氏”、“清河佳城”之类。然后用小铁锤和小鏊凿，按照墨迹细细鏊刻成阴文。写字的时候，写一竖是从上到下。鏊刻一竖的时候，是从下到上，正好倒过来；与此同理，在鏊刻一捺时，要从捺脚最后的笔锋处开始。

我小时候学写毛笔字，临的字帖和很多人一样，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那应该是从碑上拓下来的。因为鏊刻过墓碑，我可以想像出来，柳公权所在的是唐朝，当时石工们鏊刻石碑的时候大概是怎样工作的。

里陂上村民去世后所使用的灰黑色墓碑，碑石是永丰县本地出产的，在鹿冈商店就能买到。质量不好的灰黑色碑石上，时常会有白色的矿物结晶，俗称“石屎”，石屎十分坚

硬，很难篆刻，用篆刻一凿就会脱落，是碑石里质量较差的一种。

没想到多年以后，永丰这种带有“石屎”的黑色石材经过打磨和加工，成了中国小有名气的供人赏玩的菊花石。“石屎”变成了白色的菊花，菊花石的价格当然很高。

同一种石材，用作墓碑时最好没有石屎，供人赏玩时追求的就是石屎的数量和形状。

村民至今没有赏石的雅好，他们购买墓碑时，依然尽量选用没有“菊花”的石材。



碑石做成的墓碑



漂亮的永丰菊花石

我还在新屋里接待过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马立平。

我和马立平的通信并不频繁，大约每个月鱼雁往返一次。说实在的，我们各自的工作都很忙。我只到村前大队的小学去看过她一次，她正在上课。只能在她下课以后，回到和陈亚平老师共住的卧房兼书房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上一会儿话。

1976年的一天，马立平有事到鹿冈，午饭后悄然弯到里陂上村来看我。我忙不迭请她到我的房间里，让她坐在小木椅上，我则坐在对面的床沿上。

马立平看见我抄写的贴在墙上的语录，有点惊讶。那并不是到处可见的毛主席语录，而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有积极的意义，便抄写了贴在墙上。

鲁迅先生在前面还有一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句话在很多人看来，是比较消极的。我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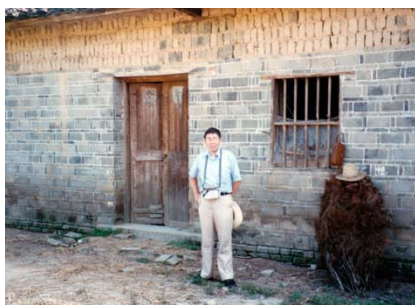
然心里同意鲁迅的这个说法，却不敢贸然抄写在墙上。

马立平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村前去了。

1979年2月，我带着返乡的行李和里陂上村民送我的锦旗，离开了这知青的新屋，回上海了。

后来，永丰和鹿冈的“乡办”在撤销以前，乡办的干部来到里陂上，要求村民购买这批当年专门为知识青年建造的新屋。毕竟政府当时曾经拨了一部分款，他们想收回这些钱。里陂上村民张贤宗和张四喜各出了几百元钱，买下了我们的新屋。

1998年我回到里陂上村，那屋尚算完好，大门上那残缺的对联还是我二十年前的墨迹，大门下方的狗洞被堵死了，里面是村民的柴房。



1998年，当年知青的住屋尚算完好，大门上那残缺的对联还是作者当年的墨迹，大门下方的狗洞被堵死了，里面是村民的柴房。

直到2002年，我和马立平带着孩子，全家从美国回到里陂上村，那屋里的板壁上，还能看到我在二十多年以前写的一些字。

10.行（交通）

我以前住在上海的武进路四川北路口，出门走上二十分钟，就到了繁华的南京东路。如果不愿意走路，可以跳上 1 路或者 3 路有轨电车，当当当，轰隆隆，就到南京东路的永安公司了。此外，弄堂口的 14 路电车可以到南京东路福建路口，18 路电车可以到南京路西藏路口，附近的 65 路汽车可以到南京东路外滩。总而言之，交通十分方便。

一、走路

我到了里陂上村，从交通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幸运。

里陂上村距离鹿冈公社只有一公里多，就在从永丰到乐安的公路边上。从村里到鹿冈，只要走二十分钟。从村里到永丰县城是二十二公里，走路只需要半天就到了。

我的好友中，陆禹平的罗家大队和夏元麟的洋坳大队在鹿冈南面，他们从村里到鹿冈，需要走两个小时。而马立平从她所在的高坑村走到鹿冈，需要走一个小时。

自行车也很少，根本买不到。只有公社的主要领导才有资格配发一辆自行车，方便他们下乡工作。

公交班车就更少了。在鹿冈的桥头边，有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车站，是招呼站，当车上车下有人打招呼的时候，班车才会停下来。



当年的班车

每天会有两次班车经过鹿冈。一班是永丰到乐安的短途班车，上午十点半左右经过鹿冈去乐安，中午十二点钟不到，又从乐安回来经过鹿冈，再去永丰县城。如果坐这班车去永丰县城办事，当天没有车回来，得在永丰的饭店里住一夜。可是饭店要凭大队盖了公章的证明才能住，很麻烦。

还有一班是抚州到吉安长途班车，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经过鹿冈，也可以搭乘这班车去永丰，但当天也是回不来。这班长途车更不靠谱，到了鹿冈经常不停。任你在鹿冈招呼站拼命地挥手跳跃打招呼，司机就是只当看不见，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绝尘而去。低头看一看身上，班车卷起的砂石公路上的红土尘，已经把你的一身衣裤都“染”红了。

要到永丰县城去办事，自行车和班车都靠不住，还是迈开两条腿走路比较可靠。有一次，我清早出发，到县城里办完事，在县城最好最大的永丰饭店花了不到一元钱，美美地吃了午餐。临走的时候我又买了十个一两个的馒头放在包里，准备回到里陂上村让薛志民他们尝尝。

我出了县城，走上了永乐公路。路上和来的时候一样，空寂无人。我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感觉有点渴了。我打开随身带的水壶，喝了几口水，又感觉有点饿了。我从包里摸出一个馒头，谁知道还没怎么吃，馒头就钻进了肚子里，活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尝到味道。

心里有些后悔吃得太快了，我不甘心，又拿出一个馒头，慢慢地塞到嘴里。那馒头实在比上海的馒头好吃多了。上海是大城市，国家要优先保证供应粮食。配给居民的粮食虽以上海居民习惯吃的大米为主，但也要搭配一定比例的面粉，叫作“标准粉”。标准粉要凭粮票购买，每斤0.17元。这“标准粉”有时发红，有时发绿，可能是小麦粉里面掺进了不同种类的杂粮粉。而永丰是传统的水稻产区，县里的面粉是从小麦产区直接调拨过来的，应该还没有掺过杂粮，纯小麦粉做的馒头真的很好吃。

我还没有走到鹿冈的地界，那一斤十个馒头已经吃完了。

二、过桥

在里陂上村，赶集叫当墟。有一次，我到沿陂镇去当墟，遇到了巷口村一个姓刘的老者，他热情地招呼道：“老夏，跟我一起去山下村么？”

山下村？就是前年趁着月黑风高，悄悄地摸到里陂上村，把我们放在晒谷场上的杉树全部偷走的山下村？我当然要去看看。但是，听说去山下村的路上，有一座桥很难走。老刘说：“现在江水很浅，不用过桥。”

我和老刘从沿陂出发，一路聊着山下村前年组织村民到里陂上偷杉树的往事。我们涉过浅浅的江水，顺利地到了山下村。在村民家里吃过午饭，我和他起身出发回鹿冈。

我们一出村口，就看见一座高高的木桥，我连忙问老刘：“难道我们要过这桥？不是说不用过桥吗？”

老刘说：“从沿陂到山下不用过，从山下到鹿冈要过。”说话间，已经到了桥头。

一站上桥头，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这座桥以“难行”远近闻名，其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因，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高、窄、长、险。首先是高，当时江里水不多，桥面离地足有八九米高，桥下是一大片裸露着的河床沙滩。桥面很窄，是三根并排着的直径五到六寸的杉树，桥的两旁既没把手、更无栏杆。桥长有一百米左右，两尺不到的桥面凌空直直地伸向前方，简直望不到头。最最要命的是“险”：支撑这座桥的一个个桥墩，是由两根大杉树搭成的“八”字形架子，八字的顶部是一根横木，上面搁着作为桥板的那三根杉树。杉树的表面用木工斧头略略削平了，以利行走。可是这三根杉树是各自独立的，相互之间并没有连接，只在两端用大码钉固定在横木上。

我想，上桥后一踩到“桥板”上，脚下的杉树定会上下抖动，不免心惊胆战。又害怕如果不幸跌下桥去，虽然下面的沙滩比较松软，恐怕也是非死即伤。倒不如桥下的水深一

点，掉下去了还可以试着游泳逃生。

我正在神情紧张地胡思乱想，老刘看我站在桥头不肯上桥，便催促说：“没关系，你跟着我走就可以了。”

我硬着头皮，一狠心踏上了桥面。

老刘在前面走，踩得脚下的杉树一下一下地颤动，他小腿上的肌肉也在一下一下地抽动。我收回目光，死盯着自己脚下，咬紧牙关深呼吸，努力想跟上老刘，但是心里发慌头发晕，感觉就要不行了。

我一抬头，看见老刘停住了脚步。他转身对我说：“老夏不要怕，你看着我的后背走。”我便抬眼紧盯着他背上的背囊，我知道那背囊里面装的是他上午在墟集上买的苕麻。

这样一来，我感觉好了一些，勉强能跟上他的步伐。只是这桥实在太长了，老也走不完。老刘在前面突然说：“唉，不知是谁跌下去了，还呕了一堆。”

我用眼角瞟了一眼桥下，沙滩上果然有一堆人的呕吐物。我不敢细看，继续咬着牙，努力跟上老刘。终于过完了这木桥，这时候，我才感觉自己像虚脱了一样。

我缓过劲来以后问老刘：“要是碰到涨大水，这种桥是不是很容易冲走？”

老刘说：“是的。这座桥，山下村的人过几年就要修一次。”

我俩正在马路上边走边说那令我生畏的木桥，一个脚步快速的老者赶上了我们。老刘认识那个老者，他俩打过招呼，老刘转过头来对我说，这老者是上袍村的。

我便和那老者招呼道：“我是里陂上的。你们上袍村都姓高，你也是排行‘发’字那一辈的么？”

那老者有些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我真不知道里陂上还有你这个戴眼镜的后生，但我一定认识你的爹。告诉我，你是谁的儿子。”

我支支吾吾地不肯说，老刘在旁边笑着说：“他是里陂上的上海佬，知识青年。”

那老者不相信，他摇了摇头，说：“我们大队也有上海佬，哪会给日头晒得这么乌黑？说话哪有这样‘平当’？”

说话‘平当’，那是称赞我没有外乡人的口音。居然连外村的老农民也一口咬定我是土生土长的里陂上某某人的儿子，我心里不免有些得意。那老者再三询问，我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上海人。我也眼瞅一下老刘，他在旁边偷着发笑。

没走多远就是上袍村，那老者在进村回家的路口和老刘道别。他歪着脑壳，把我从头到脚仔细看了一遍，脸上满是困惑的神色。他可能还在猜想，我在里陂上村的父亲是谁呢。

过了上袍村就是鹿冈的地界，我和老刘一面赶路，一面继续谈论山下村那座令我胆战心惊的木桥。

后来马立平告诉我，她也曾经走过一次这座桥，同样有那种终身难忘的恐惧。

听说现在山下村已经通了公路，那令我和马立平终生不能忘怀的木桥已经变成了水泥桥。

三、拖拉机

1970年代的初期，鹿冈公社有几个大队陆续购置了江西拖拉机厂生产的“丰收-27”中型拖拉机。拖拉机属于农业机械，按理是用来在田里耕作的。可是它们无一例外地挂上了拖斗，永远在公路上跑运输，好像从来不下田。拖拉机把木材和柴火运到永丰去，把化肥和水泥运回鹿冈来，跑运输比下田耕作更赚钱。

不过，有拖拉机跑运输，使得鹿冈的交通情况大大改善了。

吃过早饭以后，装满了柴的拖拉机从里陂上的墩上驶过。高高的柴堆上坐满了搭车去县城的农民。拖斗的载重量是三吨，货物加上人，把拖斗下面轮子上方的弹簧钢板压得平平的，很明显是超载了。拖拉机的驾驶员虽然很怕出事，却没有办法把上面的人硬拉下来，毕竟都是认识的乡亲。

于是，拖拉机要想办法不让农民轻易爬上来搭车，就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比如天刚亮，拖拉机就拉着货溜走了。又比如看见拖拉机上爬满了人，驾驶员就宣布今天不去永丰了。他钻进农民家里喝酒乘凉，让拖拉机上的人在毒辣辣的阳光暴晒，比比看到底是谁的耐心更好。

拖拉机的设计不是用来跑运输的，它跑不快，一般时速只有二十公里左右。那时我们还年轻，只要快跑几步，双手吊在拖斗上，再一撒腿，就能翻身爬上去了，颇有几分电影里铁道游击队员的样子。

我们还能在拖拉机行进的时候下车：双手吊在拖斗的最后面，脸一定要朝着拖拉机前进的方向。然后双手一松，一脚先点地，顺着惯性向前跑十来步，就停住了。李家村的一个村民不懂得这个道理，拖拉机没有停稳的时候，他就从拖斗的后面下去，背部朝着拖拉机前进的方向。结果他朝后一仰，后脑着地，丧了命。

有了拖拉机，我们去永丰办事方便多了，哥哥建新在昆明工作，有一次他在去昆明的途中，特意弯到永丰来看我。我搭着先锋大队的拖拉机到县城，又和他一起站在拖拉机的拖斗里，回到了里陂上。

哥哥这一生中，很可能唯有在永丰，才乘过拖拉机吧。

四、汽车

正规的运输单位里多数是解放牌卡车。据我父亲说，它的设计先是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卖给了苏联人，1950年代苏联人又把它给了我们中国，帮助我们建起了造汽车的大工厂。

解放牌卡车开得飞快，时速在四十公里以上，我们没本事爬上去。但是有些知青很聪明，女同学负责在马路中间拦车，男同学埋伏在路边。开车的司机看见了年轻的女学生，知道她们是知青，多数会停下来。这时候路边的男同学一拥

而上，爬进卡车的车厢里。

有些男知青很勇敢，直接站在马路中间拦车。汽车不愿意停，减慢了速度，朝着知青抵撞过来。几个知青按着车头连连后退，突然往旁边一闪，趁着汽车还来不及加速，便飞快地爬上车去。知青到了目的地，在车厢里敲着司机的驾驶室顶棚，喊着要下车。可是司机心里有气，故意加大油门，根本不理睬知青。

车上的知青急了。有人急中生智，脱下衣服，抓住衣领伸出去，用衣服遮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司机看不见路，也急了，把头从左边伸出驾驶室来，看着前方的路面，顽强地继续开车。知青们看见司机的头伸出来了，一阵乱拍。司机寡不敌众，只能把车停下，乖乖地让这些知青下车。



解放牌卡车

五、火车

我过年回上海探亲，正是“春运”期间，火车特别拥挤。那一年，我到了樟树火车站，这是一个不重要的三等车站。我顺利地买到了没有座位号的票。

等了很久，广州到上海的绿色列车缓缓地驶进了樟树站。站台上等待上车的黑压压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列车停下来了，里面挤满了人。没有旅客下车的车厢，车门一律不开。有旅客下来的车门，也是一开就关了。

铁路上常常是这样。车站方面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来

多少人卖多少票，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争吵。至于旅客能否上车，那就凭旅客的本事了。列车方面则抱怨车站，明明知道列车已经超载，车站还卖出那么多票，于是就不开车门了。

我仗着年轻，挤在车门边，车门却不开。我只能挤向车窗，希望能从车窗里爬进去。可车窗也是关着。正在这时候，发生了奇迹。我面前的车窗慢慢地上升，有人在开窗。我马上对身边一个不认识的旅客说：“我先进去，你把我们的行李传进来，你再进来。”说完，我就双手勾住窗沿，往车窗里爬。

车厢里面的人看见我往里爬，赶紧推着我的头，要把我推出去。我双手扒住窗沿，死死顶住，一边把膝盖也伸进去。里面有人急忙关窗，把我夹住了。好在车窗的下沿有橡皮条，并不疼。我猛一发力，车窗又往上升起来了。里面的人见拦不住我，只能让我爬进了车厢。



如今已然淘汰的蒸汽机车。

我返身接住传进来的行李，再把那个传行李的旅客也拉了进来。车站上的发车铃声已经响了好几遍，列车终于慢慢地动了。

我站在车厢中间的过道上，听见坐在窗口边的那人说：“车上太挤了，本想开窗透透气。嘿，没想到又挤进来两个人。”

他看我戴着眼镜，又说：“你是知青吧，现在的知青可是够猛的。”

他不知道，知青还有更猛的呢。我可听别的知青说过，他们是怎么上火车的。

一伙知青挑着行李要上火车，火车进站了，门窗全都紧闭着。这时候，知青用扁担头插进车窗下沿的橡皮条，用力一撬，车窗就往上升。两根扁担轮番撬动，车窗越开越大。如果车厢里的人要有所动作，第三个知青的扁担伸进去晃一下，里面就没脾气了。



当年统一的绿皮客车，后来很少见了。

一般来说，大年夜和年初一这两天的火车比较空。后来我回上海过年，一定是错开高峰，乘坐这两天的火车。我在上海的弟弟至今还记得，年初一或者年初二，他听见楼梯咚咚地响，探头一看，楼梯上先出现一个旅行袋，然后看见了扁担，接着出现了我的头。

从樟树站上火车太难了。有一年我回上海，决定从里陂上村走到乐安县的江边村站上火车。江边村虽然是小站，但它是起点站，上车很容易。但是里陂上村距离江边村约有五十公里，其中还有一段是山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明明可以先坐班车到抚州再转火车的，为什么要走这么多路呢？大概我当时是想试着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或者是怕班车经过鹿冈的时

候不肯停车吧。

我清早起来吃了饭，不到七点钟就出发了。我挑着七八十斤的行李，随着扁担闪动的节奏走路，要比平时快一些。我穿过小路，到戴坊镇歇了一下脚，继续走到龚坊镇，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我觉得肩膀有点疼，腿也有点酸。我心想不碍事，再有两个多小时就到江边村了。

挑着担子走路，一小时约莫能走六公里。到江边村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四点半钟。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八角钱住一夜的小旅馆，安置好行李，早早吃了晚饭，看见天还亮着，就想去火车站转转。我空着身子一走路，不对了，两条腿酸疼得迈不开了，肩膀上火辣辣地疼。我先前挑着行李走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啊。

我咬着牙，摇摇晃晃地到了火车站。车站的门锁着，上面有一张字迹模糊的小告示，说是每天早上开车以前一小时开始卖票。

我透过车站的栅栏，看见站台的第二股道上停着一列黑色的货物列车，上面没有盖篷布，各节车上装满褐黄色的石头，夹杂着些许泥沙。我猜想，这就是传说中的铀矿石了。

听说有一条铁路专用线从江边村车站延伸出去，一直通到大山深处的铀矿。好像赣州那边有提炼铀的工厂，去年还到我们这边招了一些工人过去。

第二天早上，在江边村车站买票上车的不到十个人。我上了车，靠窗坐好，看见好几辆解放牌卡车在车站停住了，下来了一大群人，他们也是来坐火车的。

这群人坐满了我们这节车厢，有人还带着手风琴。我一问，他们是单位里的文艺宣传队，要到北京的部里去参加文艺汇演。这么多人去北京演出，这个大单位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铀矿了，那么所谓的“部里”，就应该是北京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也就是核工业部了。我的表姐从大学的数学系毕业以后，就分配在二机部工作。

火车刚开动，有一个人站起来，开始指挥他们那伙人唱歌。好听的手风琴的声音响起来了。那个指挥看上去好像很专业，还让他们先练声，然后才开始唱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那好像是分声部的合唱，很好听，和我们平时齐声的吼唱完全不一样。

六、走路去卖牛

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 1976 年的深秋，我走路去戴坊镇卖牛。

里陂上村民张春茂家负责饲养的耕牛出了一点问题，需要到沿陂镇或者戴坊镇的牛市上去卖掉。沿陂镇太近了，卖这样的牛说不定会生出麻烦来，队里决定到路程很远的乐安县戴坊镇去卖牛。卖生产队的牛必须有两个人在场，除了春茂以外，还得有人一起去。

这时候已经是农闲时节，队里的工分挣得很轻松。而光是来回走一趟戴坊，就要花八九个小时，所以没人愿意去。我说，我愿意去。这事就定下来了。其实我愿意去的重要原因，是去戴坊必须路过村前大队，我有机会顺路去看马立平。

戴坊的牛市在上午九点开始。牛走长路的时候没有人走得快，因此我们清早四点多钟就出发了。春茂牵着牛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走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越来越冷，心里不禁有点奇怪。按理说，我吃了饭，身体里有了燃料，我又穿了不少衣服，应该越走越热才对啊。我摸摸身上，衣服有点湿润。我心想，大概是拂晓以前，结露水了。我又摸一下头上戴的山寨版的军便帽，感觉不对，摘下来凑近一看，帽子上是一层白霜。我再一摸，我的肩上也有霜。怪不得这么冷，原来是打霜了。

我们赶到戴坊，牛市刚刚开始。因为不是牛市的旺季，总共才有十来头牛。有人前来看我们的牛，他先挑了一大堆牛的缺点，旁边还有人帮他帮腔说话。然后这人问，这牛要

卖几多钱。

买卖耕牛的双方要谈价钱的时候，不能出声，只能在袖管里打手语，神秘兮兮的。我看见他的手缩进了袖管，我的手连忙跟进去出价，把他的手指数成八的样子，表示我们要卖八百元。这时候从外面看。我们俩的袖管连在一起，看不见我们的手在里面做什么。

那人摇摇头，在袖管里把我的手指扳成二的样子，表示他只肯出二百元。

我说：“那还不如把牛杀了卖肉呢。”把他的手指数先扳成六的样子，再扳成八的样子，表示我们的牛六百八十元就会卖了，这是我们可以出的最低价，队里定死了的。

那人摇摇头，说：“我最多出这个价。”他把我的手指数扳成了三的样子，又扳成了六的样子。

这差距太大了，我从他的袖管里抽回了手，说：“没关系，你可以先看看其他的牛。”

这天戴坊的牛市很清淡，只成交了一头牛，也不知道是什么价钱成交的。俗语说“卖牛不卖绳”，我们看着那卖牛的人解下牛绳，收了起来。买牛的人给牛结上了自己带来的牛绳，把牛牵走了。据说牛绳代表着财运，农民绝大多数是迫不得已才卖牛的，留下牛绳就是留下了财运。



买牛卖牛的牛市，正逢淡季。

我和春茂一直在牛市上呆到下午一点钟，还是没有卖掉牛。我们再不打道回府的话，回到里陂上就要天黑了。

我们早上经过村前大队的时候，天还没有亮。等我们从戴坊牵着牛回来，快到村前大队小学的时候，我对春茂说，我去看一个朋友，你先走吧。

我到了村前小学，看见小学里的王老师正倚在门框上，借着落日的余辉看报纸。他见我来了，说：“哦，依来寻马立平，伊到鹿冈去了。”我随即返身，发现春茂牵着牛在远处等着我。

我们从村前的小马路上拐出来，刚到先锋大队的榨油坊边上，迎面一辆自行车过来了，骑车的人戴着大口罩。虽然已经是夜色朦胧，我凭直觉知道这是马立平，便喊了一声，停下了脚步。马立平在我身后十几步的地方停下车来，认出了我。我走上前去，说：“我今天去戴坊卖牛。路过你们学校，王老师说你去鹿冈了。”

她脱下口罩，说道：“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给你写信。我这两天就要到吉安师范去读书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有时间，我会到里陂上来一次，否则就只能等我到了吉安再写信了。”说罢，我们匆匆告别了。春茂还牵着牛，在不远的暗处等着我呢。

我回到里陂上，心里很郁闷。今天是什么倒霉的日子啊，那头牛没有卖出去，倒是跑走了一匹马。村前大队推荐去读书的知青不是已经到上海读大学了吗？学校招生早就结束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永丰县文教局的人很欣赏马立平，可是村前大队没有推荐她。文教局就另外弄了一个名额，让马立平到吉安去读书。县文教局的干部罗亨凤还专门骑着自行车赶到鹿冈，把入学通知书送到马立平手里。

如今中国的交通网发达了。我 2013 年跟着陆禹平去江西，他开车花了九个小时，就从上海到了永丰。我住在旅馆里，第二天清晨起来，看见县城边上的肖家村里，村民把农

用车开到田边，再下到田里去抛栽糯谷的秧苗。一个农妇开着三轮电动车去给蔬菜泼尿，半路上塑料的尿勺从车上滑下来了。马路上走路的人很少了。

到了鹿冈以后，马立平住在高坑村里。她发现很多村民家里都有电动车，走路的人也少多了。原来到上海带过我女儿的高福英嫁到了袁家村。听说我们来了，他们两公婆骑着摩托车赶到了高坑村。

交通工具名目繁多，人们的出行方便多了，不用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耗时费力地走来走去了。

但是我想，这样要耗费多少不可再生的能源呢？又会对环境产生多大的污染呢？别人若是知道我这种杞人忧天的想法，大概有很多人会发笑的。



2013年夏天，马立平住在高坑村里。

11. 1975年——谓我何求

1975年是我在里陂上村非常特别的一年，也是我的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的年初，我像变戏法一样，突然成了共青团员。到了年尾，我是正式党员了。

这一年的正月里，我阴差阳错地当选了里陂上村的生产队长。到了秋天，我放弃了报名去学校读书的机会，里陂上生产队推荐了知青冯金生。经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程序，他成功地去读书了。

然而我最刻骨铭心而又终生难忘的是在1975年的初夏，我在鹿冈公社举办的农机学习班上，认识了从村前大队来的乡村教师，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的马立平同学。（对不起，当然还有后来成为好友的罗家大队的林场负责人，上海虹口中学的陆禹平同学。）

一、入团

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有什么理想，不知道要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也不懂得要不断争取进步，好好表现自己，积极靠拢党团组织。

记得在中学里，班级团支部要听取群众意见，请大家提名自己心目中的入团候选人。有一位同学提了我的名字，马上有人表示反对，理由就是我没有积极靠拢团组织。

我到里陂上村务农的时候，父亲正在上海铁路局的隔离室里接受审查。当时传说纷纭，说父亲除了是反动学术权威以外，他还是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和军事院校的反动军官。

我怎么可能入团呢？即便是我想申请加入，人家会要吗？更何况我没有这个意愿。

常年在里陂上劳动的知青中，薛志民和冯金生入团了，王君薇和李桂英入团了。李桂英还是团县委的委员，在公社

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主持过会议，作过报告。崔应辉更是早早地直接入了党。只有我属于另类，没有入团。几年过去了，剩下我和冯金生还在里陂上种田，其他的几位都有了更好的出路，离开了农村。

1975年的春节刚过，就像变戏法一样，奇迹发生了。

先锋大队的大队部的墙上，贴着一张永丰县团委印的漂漂亮亮的表彰全县优秀青年团员的名单。鹿冈公社这一栏里，居然有我这个非共青团员的名字。



2014年，当年先锋大队的大队部。

大队的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来向我表示祝贺，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几个月前，公社打电话来，要大队上报一个优秀青年的名字，大队就报了你。

优秀青年？他们可能是把团员青年和知识青年搞混了。很多优秀的知识青年已经离开农村，到更有出息的地方去了。剩下来的人里面，我成了优秀青年。

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奇迹应该是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1974年，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了，毛主席称赞他是“人才难得”，准备进一步重用他，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因此有了很大的松动。

就在1974年的下半年，我父亲的工作单位给鹿冈公社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父亲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已经结束了为期六年的审查，恢复工作也已经两年了。如果不是这封来信，即使先锋大队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到了公社

也应该拦下来，不会再报到县里去，我不可能突然成为优秀青年团员。

1975年我认识了马立平以后，有一次向她提起，全县优秀青年团员的名单上也有她的名字。

马立平说：“别提了，这些年每次回上海探亲，都要为我父母亲平反的事奔忙，一点用都没有。我和你一样，去年下半年，上海给鹿冈公社来了信，说我父母亲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也是没写入团申请，就成了优秀青年团员。”

如此看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戏法，还不是孤例。

二、当选生产队长

在农村，生产队长出工在前，收工在后，不能多拿一分工分，没有任何补贴，上下受气，是最没有人愿意做的工作。

里陂上村绝大部分是张姓，族谱上一查，他们居然还是唐朝宰相、大诗人张九龄的后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起先祖“九龄公”，村里张姓的长者都要挺一挺胸，抬一抬头，显露出极大的尊敬和骄傲。

村里一直是姓张的人做队长，可是张姓村民分成了两房四家，互相之间谁也不服谁，争斗得比较厉害，基本上是由两房里面推出人来轮流当队长。先锋大队的人都知道，里陂上的队长特别难当。

1974年，先锋大队有两位知青去读书了，一位是在上头生产队做队长的知青。另一位是我们里陂上的知青，县团委委员李桂英。同村的冯金生和李桂英都出生于工人家庭，但是冯金生的其他条件和李桂英相比，要稍逊一筹。

李桂英走了以后，很快传来消息，部队就要到鹿冈公社来征兵了。冯金生很想通过当兵来离开农村，他拉着我一起去找公社武装部的姜部长。姜部长在洋坳大队蹲点工作，我们一路找到洋坳的山里。他听我们说完了来意，对冯金生说，青年去参军是好事，只要体检合格，应该没什么问题。

过了不久，果然有两个解放军来鹿冈征兵了。冯金生身材高大，相貌也很憨厚，那两个解放军很中意他。最后，我陪着冯金生到鹿冈卫生院做体检。没想到冯金生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了。

体检的最后大关是测量血压。冯金生紧张得双手发抖，头上直冒冷汗，结果是血压太高。旁边坐着的解放军摇了摇头，对冯金生说：“你别紧张，先休息一下。过二十分钟再来量一次。”

我陪着冯金生在卫生院外面溜达，心里却很想进卫生院去找熟悉的医生，要几片降血压的药。可是今天小小的卫生院里挤满了人，解放军也在那里，实在是不敢去。冯金生第二次测量血压，还是太紧张，没有通过。解放军走了以后，我和冯金生再去卫生院，给他量血压，他的血压正常了。

冯金生想当兵的希望破灭了。他闷闷不乐了好几天，突然对我说，他想当里陂上生产队的队长。冯金生又拉上我，一起到大队书记的家里，说了他的想法。书记说，知道了，明年里陂上的队长人选，大队会考虑的。

1975年的正月里，有消息传来，说是大队决定，里陂上可以选知识青年当队长。为此，我和村民张寿仁、周恩绍、张发茂等一千朋友提前打了招呼，希望他们选冯金生。里陂上村开会选队长的前一天，恰巧我们知青的老班长崔应辉从南昌回到里陂上来玩。他第二天上午也参加了村里的会议。

会议一开始，我就提出选冯金生当队长。没想到，我没有打过招呼的一个村民马上发言，他不同意。他说了冯金生的一些缺点，觉得还不如选我。他刚说完，许多人附和着说“同意”，张寿仁举着双手，大声喊着：“我选老夏！”

就这样，我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阴差阳错地当选了里陂上的队长。开会时一直坐在我旁边的崔应辉感叹地说，这可以说是一次很民主的选举了。可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大队的暗中授意，很难说村民会选我们知青来当队长。

散会以后，冯金生坐在那里不作声。我觉得事情没有做

好，他当队长的愿望没有实现，我很对不起他。或许他会觉得，是我耍弄了他。我想了想，坦率地对他说：“我知道你参军不成功，就想当队长，目的就是为了去读书，可以离开农村。这样吧，今年学校招生的时候。里陂上就推选你去读书。”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脸上渐渐舒展开来。

到了夏天，学校开始招生了，我没有报名，而是推荐了冯金生。这使得大队书记十分惊讶。

1975 年的秋天，冯金生成功地去读书了，我也成功地兑现了自己对他的承诺。

三、农机学习班

为了让剩下的知识青年比较安心地留在农村，各级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是让知青学一点手艺和技术，让他们在农村发挥一点作用，提高一点生活水平。1975 年 6 月，鹿冈公社为知青开办了木工、电工和农机等各种学习班，名曰“函授班”，为期一周，可以记工分。我有开柴油机碾米和抽水的经历，还参加过永丰县的手动插秧机培训班，于是报名参加了农机学习班，听公社的干部说，会有上海的师傅来教我们。



1998 年，鹿冈公社的办公楼，一楼最左边的两个窗户是会议室。农机学习班当年在会议室里开班。

开班的第一天上午，上海来的老师要我们作自我介绍。过去的六年，我专心在里陂上种田，和我们大队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交往并不多。至于其他大队的知青，认识的没几个。

我很认真地看着学习班上的陌生面孔，听他们自我介绍。大眼睛笑咪咪的同学是青山大队来的张延敏。高大白净的女同学是前村大队的，叫许刃解，这个名字很特别。眼睛很小的同学是陆禹平，从罗家大队来的。



1998 年，鹿冈公社机关食堂用的水井。

有个女同学迟到了，她叫马立平。不用说了，虽然以前没有见过，她一定是村前大队的马立平，做民办老师很有名气的马立平，有很多传说的马立平。她已经在教书，又是女的，怎么也来学农机修理了？



1998 年，原来村前大队的知青林场，现在是小学，此为教室内景。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走上前去和马立平打招呼：“你好，我是先锋大队的。”

“知道，你是里陂上的队长，听说过，没见过。”

“你已经在村前做老师，怎么还会来参加这个学习班呢？”我明明知道她在会上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觉得她的理由很特别，故意再问她。

马立平说：“我的学生问我，拖拉机是怎么会走的，我回答不上来，所以就来了。”她的脸上一派纯真，大眼睛里清澈见底。

我想，此人倒是挺认真、挺执着的，很不错。但是拖拉机是怎么会走的，只要找本书看看就行了呀。于是我笑着打趣说：“如果你的学生问你，飞机是怎么会飞的，那你也要去学开飞机了？”

马立平语塞了，大眼睛眨了两下，原本俊俏的脸一下子羞得绯红，漂亮极了。

今天，马立平这个名字和形象对上了。

当天晚上回到里陂上，我一直睡不安稳，再也无法在脑海中抹去马立平的形象，不禁回忆起有关马立平这三个字的点点滴滴。

1969年底，村前大队的高坑生产队有个女孩子嫁到里陂上村以后，说起高坑村的上海佬栽禾快极了，我第一次听到了马立平这个名字。

有一次，鹿冈中学的老师来支援里陂上双抢时，议论到村前大队的民办老师中有“两只瓶”：马立平和陈亚平。说是上次县文教局来人，听了马立平的课，评价很高。

听说马立平在中学里的成绩非常好，是学校的宠儿。

不久前，洋坳大队的夏元麟到永丰的“乡办”写材料，回来时在里陂上歇脚，说起村前大队的马立平也去了，他拿出马立平写的稿件给我看。稿件的字迹非常端正，起首的一句是：“笔直的曾坊河静静地流着……”写的是一位上海知

青在开挖曾坊河的过程中十分努力，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的故事。从文章来看，马立平可以算得上是才女。

传说马立平的父亲是干部，曾经是上海一个区的副区长，文化革命初期自杀了。

据说马立平有一个比较正式的男朋友，是在高坑村一起务农的男知青。据说还有别人在追求她。

据说……

第二天，马立平没有在农机学习班上出现。一打听，她因学校里有课，不能来。

如今回想起来，真是像歌词中说的：

只因为在人群中（农机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未能忘掉你的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地思念。

……

我再三告诉自己，我和她的成长环境不同。再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但我还是忍不住：

想你时你在天边，
想你时你在眼前（村前），
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

……

过去也曾有别的女知青对我表示过好感，可是我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感觉。

农机学习班结束，过了一个多月，我实在忍受不了煎熬，决定要给马立平写信。我俩所在的先锋大队和村前大队的邮路，是公社的邮递员老徐负责，我请老徐做信使，帮我把信送到马立平手里。

信的开头是：

亲爱的马立平同志

在那个年代，这很大胆了。后来，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

熟悉这个称呼。

信的最后一句话表述了我的心迹：

我决心参加到追求你的队伍中来。

熟悉我的人会说，我是一个没有归宿的人，没有什么追求。“知我者谓我何求”，仔细想来，我一不求入团入党，二不求当队长，三不求离开农村，只是老老实实在地认真做好眼前的事，确实别无所求。

但是我平生唯一有过的追求，就是这一次。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马立平的回信，她同意通信。我眼前顿时一片澄明，感觉自己进入了全新的世界，好像生命重新开始了。

可是，我犯了一个技术错误。老徐帮我送信，坚决不肯让我贴邮票。最后我说，在上海，市内通信是半价，就贴四分邮票吧。老徐同意了。贴四分邮票的信太特别了，很快在我们这一片的知青中间，传开了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管他呢，我就是那只快乐的癞蛤蟆。

农机班结束以后，我想方设法，为里陂上村争取到了一台免费的手扶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和装货用的拖斗，村民俗称“狗牯车”。

同时，我作为“夏师傅”，也开始接受其他地方的邀请，帮助修理柴油机和手扶拖拉机。其中当然也包括到马立平那里，帮助修理她执教的村前小学用来搞勤工俭学的那台柴油机。

我永远不会忘记 1975 年的 6 月，不会忘记鹿冈公社的农机学习班。

四、入党

1975年暮春的一天中午，鹿冈公社的书记来里陂上找到我，拿出一份表格“啪”地放在桌上，说：“小夏，填表。”我拿起表格一看，吓了一跳，这是一份入党志愿书。我马上放下表格，恭恭敬敬地说：“对不起，我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再说，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

书记打断我的话，一拍桌子，生气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你吗？你不入党谁入党？在我们眼里，你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别罗嗦，快填表。”我被书记的威势一下子镇住了，乖乖地收起了那份表格。

我交了入党志愿书以后，一直没有消息。时间一长，我也就淡忘了。

有一天，鹿冈公社管知青的乡办主任跑来告诉我，昨天晚上公社党委开会，一共批准了两个人入党，其中一个就是我。我心里很平静，只是好奇地问：“还有一个是谁？”

“是村前大队的马立平。”

啊，是她，是她！我心中一阵狂喜。昨天……昨天是什么日子？是1975年的12月13日。

说起来，父亲本来可以是我家里第一个入党的人。在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以前，父亲在工作中有比较重要的发明创造，所以党组织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加入共产党。

可是，父亲是单位里有名的书呆子。在共产党如日中天，很多人都在积极争取入党的时候，父亲居然拒绝入党，理由仅仅是他在旧中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在新中国也愿意保持无党无派的身份。

父亲单位的领导比较讲礼貌，没有拍着桌子要父亲入党。（父亲也很胆小，要是单位领导拍桌子，估计他就入党了。）

因此，父亲到上海市的“政协”去开会，后来又换当闸北区人民代表，都是作为“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去参加会议。

我入党的时候没有预备期，一入党就是正式党员。当时的理由是，批准你入党，就是承认你符合了党员的标准。有

预备期的话，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难道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标准不一样吗？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才恢复了预备期的制度。

我入党以后，找到大队书记，要求交党费。书记说，党费？过一阵子再通知你。

我问里陂上村里的党员张贤通，他交不交党费。贤通惊讶地说：“党费？党员不就是吃苦受累走在前面，拿好处排在后面吗？什么是党费？”

过了两个月，大队书记通知我，大队研究过了，党费标准是一个季度交五分钱，从1976年1月开始。

我这才知道，先锋大队的党员交党费，是从我1975年底入党以后开始的。

三十八年后，我和马立平坐着陆禹平开的车回到鹿冈。马立平住在高坑村里，摆了五个大圆桌，请乡亲们吃饭。陆禹平趁着酒兴，站起来起哄说：“马老师和夏队长是同一天入党，同一天结婚，太难得了。他们俩今天回高坑，是请大家补吃结婚酒啊。”



2013年夏，马立平在高坑村请客。村民造新屋不用青砖，改用红砖了。

现在，我和马立平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可是我们永远记得1975年的12月13日，那是属于我们俩的特殊纪念日。

12. 过年过节

下乡前在上海时，我们所过的重要节日有：春节、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中秋节、端午节，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节日如三八妇女节、八一建军节，等等。

对里陂上村的村民来说，重要节日只有三个：初夏的过节（端午）、秋天的中秋、以及冬天的过年。

一、端午裹粽

里陂上村民的“过节”，专指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过节最重要的是裹粽子。

节前数日，家家户户的女孩子挎着扁篱，结伴上到贯前大队那边的山里，在溪水边找到矮小的宽叶青箬竹，采摘裹粽用的青箬叶。



扁篱和青箬竹

和我母亲用来包粽子的芦苇叶相比，这青箬叶短而宽，一张叶子就可以裹一只粽子。糯米的处理也不同，雪白的糯米放在碱水里浸涨了，变成了嫩黄色。最具特色的是用来扎粽子的“绳线”：从门前的棕树上砍下一柄大大的绿色的棕树叶，沿叶脉撕成细细的长条，放在火上一燎，撕开后的长条叶片微微卷缩起来，便成了一大把“绳线”，垂在叶柄下面。搬来一块石磨的上扇，放在桌上压住那棕叶的叶柄，再拉过一条长凳坐在对面，就可以开始裹粽子了。

村民裹粽的样式只有一样——四角粽，内容也只有碱水粽

一种。四角粽的裹法比较简单，只见妇女们拿起一张箬叶，弯折成一个圆锥，添上米，再折两折，拉过一根粽叶“绳”饶几下，就成了。箬叶虽比芦苇叶宽，但也只有两寸多点，所以裹好的粽子最多只有鸭蛋那么大。

待粽叶上的每一根“绳”都绑上了粽子，移开石磨，拎起粽叶的叶柄，下面挂着的二三十个小巧玲珑的四角粽轻轻地晃动着，真像是一件漂亮的艺术品。

过节以前，村民还会腌制一些鸡蛋和鸭蛋。他们把积存的蛋煮熟了，放在盐水里浸几天，就成了腌蛋，或者叫“腌子”。有一次，村民张梅发拿了几个腌子来，笑着说：“过节了，来，请你们吃‘原子弹’。”在村里，“腌”和“原”同音。

因为这是煮熟了再腌几天的蛋，只有表层有一点咸味，中间的蛋黄也不会出油。后来，我请村民吃我自己用生鸡蛋腌成的咸蛋，他们尝了以后大为惊讶，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好吃的腌蛋。

端午节那天，里陂上村各户人家的大门两旁挂上了采摘来的菖蒲和艾叶，大家喝着平日里的水酒，吃着一年才做一次的碱水粽和腌蛋，过节的气氛使得人人心情舒畅。过节的时候田里的活不多，而天气已经很热了。在糯米里放进碱，裹成的粽子不但吃起来更筋道，而且也不容易馊腐，可以吃上三四天。但是我嫌这粽子的碱味太大，远不如我母亲裹的粽子。

在上海，我母亲每年端午时节裹粽子的时候，除了四角粽，还有枕头粽和小脚粽。按着内容来分，有白米粽、赤豆粽、明油细沙粽（豆沙粽）和我最喜欢吃的肉粽。母亲用的芦苇叶虽然窄，但是比青竹箬叶长得多，几张芦苇叶拼起来裹成一个粽子，粽子的个头也比里陂上的大多了。感觉上芦苇叶裹的粽子比竹叶裹的粽子更加清香。

母亲还会在煮粽子的大锅里放上一批鸡蛋，煮出来的“粽子蛋”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剥去蛋壳，再薄薄地洒上一点细

盐，要比平时吃的茶叶蛋和酱蛋更为鲜美。如果说里陂上的村民给我们吃了‘原子弹’，母亲做的当然是更厉害的“中子弹”了。

马立平在她插队务农的高坑村里，跟着村民家的女孩子学会了裹粽。如今我们在美国，她还是每年端午会包一堆粽子。在煮粽子的时候，我还是会像母亲那样，放进一批鸡蛋，做出好吃的粽子蛋——“中子弹”。

端午节的传统，都说是来源于纪念古代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江西省可算是古代楚国的腹地，可是里陂上居然没有村民知道“端午节”来源的传说，也没有村民知道屈原是谁。

也许，他们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过节的时候裹粽子，是二千多年来代代相传的古风，是他们趁着夏收大忙前的空隙，打一次牙祭而已，没有必要去追寻它的源头。

也许，因为里陂上的村民不识字，所以不知道屈原投江的故事。可是，即使不识字，也应该听别人说过故事，村里口口相传的故事还少吗？

也许，“端午节”的来源只是历朝历代儒家的文人编写出来的一个忠君爱国的传说吧。

村里有位老者告诉我，端午和中秋之间，还有农历七月十五。到了这天，阴间的鬼会来到人间，享受人们的祭祀。若是鬼魂对某户人家不满意，就会利用当空的烈日，让这家的老人中暑而死。祭祀鬼魂是被批判的“迷信活动”，所以村民仅是念叨一下七月十五，他们不敢有任何实际的活动。

而在上海，这一天是母亲从箱子里翻出衣服来“晒霉”的日子。

二、中秋杀牛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中秋就是中秋，如果说“中秋节”，里陂上的村民会搞糊涂的。

中秋的字面意思是在秋天的中期，夏收已经过去，秋初

那炎热的“秋老虎”也不再来了。

春华秋实，到了中秋时分，菜地里的芋艿已经熟了，可以开挖吃个饱；庭院里的鸡鸭刚刚长成，可以宰杀尝个鲜；酒缸里刚用新糯米酿出的美酒，可以开怀饮个够。

村民在中秋也会吃上海人所说的月饼，只是他们叫作“中秋饼”。鹿冈商店有自制的中秋饼，一斤有四个（和上海一样），卖六角四分钱，里面的馅心主要是猪油拌冰糖，咬起来嘎嘣嘎嘣响。我每年会买一点中秋饼来补充营养。

有一年中秋，适逢朋友夏元麟从吉安回鹿冈，经过里陂上。他带来了吉安的中秋饼，一斤才两个，显得特别大，特别新奇，感觉特别像月亮。夏元麟说，吉安还有一斤一个的中秋饼和二斤一个的中秋饼卖呢。

过端午的时候，村里有时会杀一头猪，每户人家可以分到几斤猪肉来过节。然而到了中秋，要比过节隆重一些，村里最大的事情是杀牛，几乎每年都要杀一头耕牛来庆贺中秋。

双抢大忙过后，所有的耕牛都疲惫不堪了，尤其是年迈的老牛，常常连路也走不动了。村里共有二十多头耕牛，它们的平均寿命不到二十年，差不多一年可以杀一头。

可是上级有明文规定，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不准随便宰杀。所以我们先要写报告，说明要宰杀的是一头丧失了耕耘能力的废牛，经过大队和公社盖章批准以后才能宰杀。

村民杀猪都是在屋内，可是要杀牛那样的大牲畜，必须在露天操作，所以得选一个晴朗的日子才行。好在中秋之前已经是秋高气爽，很少下雨。

杀牛的那天早上，把牛牵到空地上的木桩边栓好。有年长的村民会说，你看，它已经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在流眼泪呢。围在四周看热闹的人趋前一看，那牛的眼窝下面果然湿漉漉的。

里陂上的村民可能是受了佛教的影响，认为那些今世造了大孽的人，来世会变成耕牛。耕牛终身辛劳不说，死的时候也不痛快。死后的牛皮做成鼓面，还要遭人捶打。

村民又说，牛眼看人大，鹅眼看人小。意思是说，牛虽然身躯很大，牛眼也不小，但是从牛眼睛里看出去，人是无比高大，所以牛只能俯首帖耳地听人使唤。而在鹅的眼睛里，人只有鸡那么小，所以鹅会勇敢地扑楞着翅膀，伸长了脖子，嗷嗷地叫着，冲上来啄人。

吃过早饭，杀牛开始了。先用两根很长的粗麻绳，在牛的两个前蹄和后蹄上方二寸的地方，分别做好活扣。每根麻绳有两个精干的后生掌握着，他们随时准备用力，把牛掀翻。

主刀的人是村里极有威望的角色。他走上前去，解开了木桩上的牛绳，左手紧紧牵住牛鼻子，右手提着劈柴的斧头。他看准了牛脑壳上，两只牛角根部连线的正中间的部位。据说那里有一块脆骨，一砸就碎。主刀人的右手猛地举起斧头，大喝一声，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方形的斧头脑奋力朝那脆骨的部位砸下去。

不管这一下是不是砸准了，那边四个后生同时用力，把麻绳一拉，牛的前蹄和后蹄分别收紧了。那牛站立不住，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腾起一阵灰雾，在上午的阳光里慢慢散开去。

四个后生飞快地把四个牛蹄攥在一起捆紧了，让牛蹄朝天。然后用两根直径三寸左右，八尺来长的杉木，分别从两边穿过了牛蹄和牛肚之间的空档。杉木的一头点地，另一头由后生用肩膀使劲掬住，这时的牛是背部着地，不能动弹，也不能叫唤了。

主刀人搬来了一只木盆，里面有一只碗和一把尖刀。他用刀从牛的下颏正中切开，沿着脖子划开牛皮，一直划到牛的锁骨处，再轻轻地把皮和肉分开，就像外科医生在施行手术。那尖刀沿着锁骨往里一捅，直中牛的心脏，牛血汨汨地涌流到了分开的牛皮和牛肉之间。主刀人放下刀，拿起木盆里的碗，不断地把血舀进木盆里，这就是“牛血旺”，村民俗称牛旺，有红火、兴旺的意思。

最后是“庖丁解牛”。书上说，庖丁解牛的刀几十年不

用磨，是有可能的。牛的骨头缝大概有一到二毫米宽，筋膜很松，主刀人用刀轻轻一插就解开了，真是“游刃有余”。牛身上的肌肉群之间的筋膜更是松薄，好像用手指一勾就能挑开。后生们忙着把解开的牛腿和其他大段的牛肉掬到仓库里过秤，然后用铁钩挂起来。

生牛肉按人分配，每斤作价八角钱，在年终分配的时候从收入中扣除。可是年迈的耕牛不是专供食用的菜牛，这种牛肉无论煎炒炸煮，都不容易烧烂，牙口差的人根本咬不动。

我试过几次，找出了一种把老牛肉切片以后炒嫩的办法。关键是用木柴把铁锅烧到暗红色，倒入牛肉片，爆炒五六秒钟，立即起锅。

村民分得的生牛肉是不带骨头的纯肉。村里派人把剩下的牛骨和内脏放在大锅里煮，煮上十来个小时以后，除去了骨头的牛杂碎，就是“牛熟”。牛熟往往是按户分配，每斤还是作价八角钱。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牛杂碎和生的纯牛肉是一样价钱。再一想就懂了，一斤生牛肉煮熟以后，只有六两了。一斤牛熟，差不多等于一斤七两的生杂碎呢。

杀牛的第二天，把牛皮卖给沿陂镇的供销社，可以卖到二十多元钱。最后剩下的牛骨，用碓臼打成了骨粉，作为肥料撒到田里去了。



用脚踩的传统碓臼

有一次，村里在中秋杀牛，由我操起斧头，击打牛脑壳上的那块脆骨。在煮牛熟的时候，我特意翻出那牛的头骨来查验，发现我砸歪了。

中秋的那天中午，村民全家围坐在一起，桌上的菜肴十分丰盛。刚分得的牛肉切成薄片，加上切碎的红辣椒，炒成了一大碗，闻上去香辣刺激；早晨刚杀的洋鸭切成块状，加上青葱烧熟了，在大碗里堆得冒尖，吃起来鲜嫩可口……

端起了桌上的酒碗，碗里斟满了鲜香凛爽的美酒，招呼一声：“吃酒！”琼浆玉液顺着喉咙，缓缓流进了肚里，这里的“吃”字应该读成“恰”。随着一阵“恰，恰！”声，互相之间先谦让一下，接下来就是大快朵颐的时候了。

里陂上村民没有中秋赏月的习惯。倒是记得我们住在祠堂里的时候，我和薛志民在某一个中秋节的晚上，突然起兴要到室外去赏月。也许是生活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月亮，当我俩拿着月饼来到祠堂外面时，觉得天上的明月和平时满月的时候一样，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能是那年的中秋有点热，在外面没过几分钟，嗡嗡作响的蚊子就赶过来了，它们一点也不照顾知识青年的“小资情调”，直往我们身上扑。我和志民只好拿着没有吃完的月饼，匆匆忙忙地逃回房间，躲进了帐子。

三、过年打麻糍

在里陂上村的节日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过年。

中国政府把过年改叫“春节”的历史，只有一百来年。里陂上村民不知道春节，他们会问：“春节是啥个？该不是立春吧？”

不错，把过年改称春节，大约是从1911年开始的。之前的数千年里，每一年有二十四节气，其中有十二节，十二气。“立春”是节，俗称春节，“雨水”是气。直到现在，民间请人算命，还是以“立春”的日子，作为一年的开始。

一到农历十月底，村民家里就开始准备过年了。第一件事是要杀几只“洋鸭”，用它们来做过年用的腊鸭。

洋鸭是一种我们在上海从未见过的黑鸭子，体型比江浙

一带著名的湖州麻鸭要大一倍，肉质很厚，味道鲜嫩。每年春天，鸭贩子挑着几百只小洋鸭来村里叫卖，要五角钱一只，不便宜。据鸭贩子说，这洋鸭是母麻鸭和公火鸭交配以后，用母麻鸭的蛋孵出来的小洋鸭。洋鸭不会生蛋，没有繁殖能力，小洋鸭当然比较贵了。



洋鸭

春天买来的毛茸茸的十来只小洋鸭，除去被狐狸叼走的、被路人踩死的或不幸病死的，剩下的五、六只终于长大了。中秋的时候已经杀吃了一、两只，余下的现在用鸭笼关着它们，放在黑乎乎的睡房里，每天给它们填喂精饲料，正在填食催肥呢。

村民觉得，鸡鸭在填食的时候不见天日，它们会长得更快。这和现代工业化的饲养正好相反。在大型封闭的养鸡场里，有二十四小时的强光照射，再加上激素和其他条件，一只鸡从出生到宰杀只要四十天，快极了。

催肥了的洋鸭中，先杀掉两只做腊鸭，那新鲜的鸭子内脏是当天下酒的好菜。剩下的洋鸭继续养着，留到过年的正月里再杀，可以请那些来家里拜年的亲戚朋友吃个新鲜。

农历十一月，准备杀过年猪的人家忙碌起来了，他们要备好杀猪的用具，洗干净各种器皿，联系最亲近的族人来帮忙。杀猪的当天晚上，还要摆杀猪宴，邀请自己的族人吃一餐。几乎每户人家杀猪，都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杀猪宴。在杀猪宴上大吃大喝的时候，村民们会询问我，我的杀猪宴上的那些佳肴都是怎么做出来的。

进入农历十二月，也就是腊月，过年的气氛更浓了。许多人家开始炒落花生、炒红薯片。自己种的落花生和薯片，是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干果。我在上海过年的时候也要炒花生，但是没有炒过红薯片。

红薯适应性很强，对气候、土壤和肥料的要求很低，几乎到处可以种植。种红薯只要用扦插，把一段一尺长的红薯

苗的一半埋在土里，它就能成活。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早年西方人把南美洲的红薯带到菲律宾以后，就作为“高科技”产品，不准出口了。直到明朝的后期，有福建省“下南洋”到菲律宾谋生的华侨，在回国探亲的时候，把红薯的藤苗藏在船舱里带回了福建老家，这才慢慢传播开来了。

村民收了红薯以后，先放在楼板上阴干一段时间。等到红薯里的糖份增加了，便用一个特制的刨子把红薯刨成片，晒干以后收藏好。到了炒薯片的时候，把晒干的薯片和沙子一起放入锅中，不断翻炒。一直炒到薯片成了金黄色，上面出现了一些膨胀起来的不规则圆点的时候，又香又脆又甜的薯片就炒好了。

还没到过年，村里面那些调皮的孩子，多数会找到自己家里放有炒薯片的陶盎，偷偷取出一点来，在出工的时候和小伙伴分享。看着他们嘎嘣嘎嘣地嚼着薯片，我仿佛听见了那越来越近的过年的脚步声。

过年以前，气氛最热烈的是打麻糍。把蒸熟的糯米打烂以后，揉成的一个个糯米饭团，就叫麻糍。好像有的地方叫打糕，有的地方叫糍粑，也有的地方叫麻糬。我参加过很多次打麻糍。

过了腊月二十三才开始打麻糍。厅堂的中央放着一个石臼，一尺五寸见方，重约二百斤，石臼内擦得干干净净。靠着板壁，有两根打麻糍专用的五尺来长的麻糍棍，供两个人同时使用。说是“棍”，其实麻糍棍的直径有三寸左右，只是中间有一段削细了，可以盈手一握。



石臼

厅里吃饭用的方桌上，准备好了放麻糍的竹箕，里面有二只碗，分别装着已经磨细了的盐和熟黄豆粉。

厅后面的灶上，大锅里的糯米快要蒸熟了，饭甑的汽盖上腾腾地冒着热气。

一切都准备好了，参加和观看打麻糍的人也陆陆续续地进来了。

热腾腾的大甑端出来了，半甑蒸熟的糯米倒进了石臼里。我精神抖擞地跳起来，脱下外套，只穿单衫，卷起衣袖，率先拿起麻糍棍，开始在石臼里杵捣。另外一个小伙子跟上来，拿起麻糍棍，和我一起打麻糍。

麻糍棍是用密度很大的柏树做成的，本身就很重，再加上刚出甑的糯米还没有打烂，并不是很粘，所以在开头的一二分钟里不需要花很多力气。

可是随着糯米越来越烂，越来越粘，往往要花一百斤以上的力气，才能把麻糍棍从石臼里拔出来，连带着拉起一溜二尺来长的麻糍条。得用手蘸了旁边准备好的井水，来除去粘在棍上的麻糍，然后用双手再一次把麻糍棍高高举过头，用足全身力气，“嗨”地大喝一声，向下砸去。麻糍棍每打一下，会听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脚下会感受到地面在微微地震动。我很快就浑身湿透了。

只有这样连续击打二十多分钟，才能把糯米粒完全打烂，成为麻糍。

和在油坊里榨油一样，打麻糍绝对是精壮男人的工作。打麻糍的厅堂是展现男人力量的舞台，在周围观看的，主要是青年男女和孩子们。麻糍棍拔不出来了，会引起围观的男青年一阵哄笑。打麻糍的小伙子那尴尬的脸涨得更红了，因为他知道，村里有好几个年轻姑娘的眼睛此刻正盯着自己呢。

里陂上的村民经常用打麻糍来隐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拔不出麻糍棍，代表这个男人真是没用。

我擦干了满头的汗水，仔细地品尝那蘸了盐和豆粉的麻糍团，麻糍团香软可口极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麻糍这淡淡的咸味，或许是我打麻糍时滴到石臼里的汗水的味道吧？

吃过了麻糍，觉得身上有一丝冷意，赶快穿上了外套。我这才想起来，屋外还是寒冷的冬天呢。

如果天气不太冷，打麻糍有时也会在屋外进行。



有时候，打麻糍也会在屋外进行。2014年，作者摆出了打麻糍的架势。

把吃不完的麻糍晾干后，浸在水里，十天之内一般不会馊坏，可以留到新年里招待客人。

我女儿在美国，每周六要去练习打日本式的“太鼓”。有一次，女儿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太鼓班的“Mochi”亲善活动。我去一看，原来就是打麻糍。“Mochi”就是麻糍么，只不过他们打“Mochi”的时候，有人穿了和服，在一边打着鼓点而已。打“Mochi”时，每次打的糯米饭的量远远没有我们打麻糍时那么多，他们还有人专门蘸着水负责翻动糯米饭。巧合的是，太鼓班做出来的“Mochi”团，他们也会蘸着黄豆粉吃。

临近除夕了，里陂上村里的妇女们开始大扫除，她们掸除尘灰，清洗灶具，擦拭家具。村里的男人们去鹿冈商店买了爆竹和香烟，准备过年使用。有能力的人家已经为全家做好了过年穿的新衣裳，那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体面。我则忙着为家家户户写春联，顺便练习毛笔字。

除夕那天，里陂上和附近的一些村子是在中午吃“团年

饭”，据村民传说，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地方在古代属于“十一都”的缘故。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属于“九都”，九都的各村却是和上海一样，年夜饭才是一年一度的“团年饭”。

除夕的晚上照例要守岁。里陂上的村民不吃饺子，更没有春节晚会，全家人只是围着火塘，一边聊天一边守岁，家里至少要有一个人能坚持到鸡啼时分。守岁的火塘里烧的整段木头要够大，象征着来年家里养的猪会长得很大。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火塘里一直有火，不能熄灭，这样才能期盼着新的一年能够红红火火。

新年第一天的早晨，打开大门做的第一件事，是放一挂鞭炮，过一会儿吃早饭的时候再放一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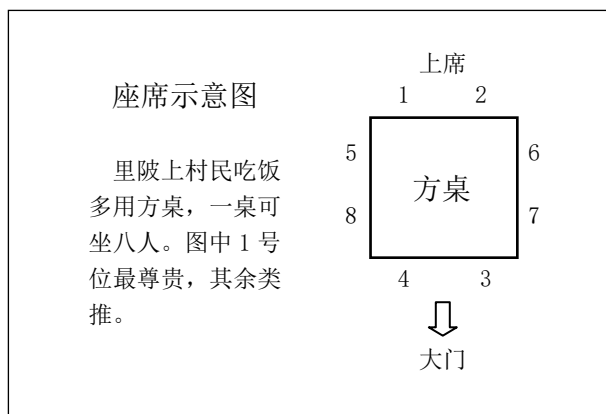
书上有“爆竹声中除旧岁”的说法，人们经常把鞭炮叫作爆竹。有一年的正月初一的早饭时分，里陂上村的一个老者发现，自己家里的鞭炮用完了。老者别出心裁，带了柴刀到山谷里，砍了一把细青竹回家，在自家的大门外点着了。一时间，爆燃的竹子噼啪作响，和鞭炮声十分相似。想来古人和如今的穷人，的确可以用爆竹来辞旧迎新。

早饭以后，村民之间开始互相拜年了。即便是平时打过架，见面不说话的冤家对头，拜年的时候也是频频抱拳作揖，朗声说道：“请拜年！”对方也笑着高声回应：“发财！”互相说着吉利话。（即便是现在，想升官和想发财，好像也是我们汉族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如果家里的孩子在大年初一犯了过失，做错了事情，家长一反常态，既不动口批评，也不动手教训，显得十分宽容大度。人人都希望新的一年有一个好的开始，家里家外都是一派喜庆祥和的景象。

从年初二开始，村民开始互相请客，请的多数是自己的族人和外村的亲戚。男人的地位比女人高一些，最先请的全部是男客。农村里是传统的大家庭，族人和亲戚人数众多，一次肯定请不完，酒席得一轮一轮地请，俗称为“车子席”。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可以类比上面派下来的干部，

身份稍微高一点，村民请客的时候，也常常叫上我们。又因为我们是远方来客，按照村里的习俗，我们还总是坐在对着大门的上席。



坐上席的人是酒席的指挥员。我坐在上席，只要我不动筷子，谁也不能动。我一动筷子，说：“吃这个碗。”一桌人的筷子一齐伸过来，夹一筷子菜。你不能夹两筷子，更不能夹别的碗里的菜，这是规矩，也是一个人的修养和礼貌。如果主人的家境不大好，我得帮主人省着点，尽量带着大家多吃点家常的蔬菜。主人台面上的肉食还要请很多次客呢，可不能把珍贵的肉食全给吃了。

酒碗里的水酒刚喝浅了一点儿，稍稍不留神，女主人就从背后提着滚烫的酒壶，悄悄上来，一下子把酒碗斟满了，一定要我深喝一口。于是，我很快学会了在酒席开始的时候少喝酒，到最后，我得一口气干了碗里满满的酒，然后立马撤退下席。否则真的会被灌醉的。

我在农村十年，基本是两年回一次上海，一年在上海过春节，一年在里陂上村过年。村里有二十多户人家，每户人家在过年请男客的时候，会邀请我去吃一餐。为了避免争抢，他们会自行协商安排好，我在里陂上过年的这十来天里，每天的三餐是在谁的家里用餐。

记得好像是 1977 年的新年里，到村民家里吃饭，我刚

坐下，鹿冈饭店的厨师老胡也来了。胡师傅是一位传奇人物，不久前在永丰县举行的厨师烹饪比赛上一鸣惊人，据说他从杀鸡开始到炒鸡块上桌，一共只用了五分钟，因此得了第一名。

主人邀请胡师傅坐在我旁边，我立即问他烹饪比赛的事情。胡师傅摇摇头，谦虚地说：“都已经过去了，就不谈了。”等到酒过三巡，胡师傅的谈兴来了，不等我们催促，他用浓重的上永丰藤田人的口音，主动说起了那次比赛。

烹饪比赛的赛场上有二三十位选手，他们是永丰县各个单位推选上来的，比赛的内容是用鸡来做出各自的拿手菜肴。胡师傅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选了一只不大的黑毛阉鸡。

胡师傅一听到开始比赛的哨音，他手起刀落，斩下鸡头，提起鸡脚，把鸡浸在旁边的开水盆里涮几下，迅即出水，用手一撸，褪去鸡身体上的毛，剁掉鸡脚，斩去依旧有着鸡毛的鸡脖子和鸡翅膀（俗称翼夹），开膛取出内脏，把鸡身体“当当”地斩成鸡块。他做完这一切，花了不到两分钟。

炒锅里的茶油冒起了青烟，胡师傅把鸡块放入锅中翻炒，加入各种佐料。不到五分钟，油亮的“生炒鸡”出锅装盘，端到了评委们的面前。

我说：“胡师傅，听说你一共只花了五分钟，可是你现在这么一说，好像超过五分钟了。”

胡师傅嘿嘿地笑了：“一共用了七分十二秒，我得了速度的第一名。不过，从鸡块下锅到出锅装盘，还真是五分钟左右，绝对不假。我事先就知道，有的厨师水平比我高，我只有在速度上超过他们才行。这一招叫作出奇制胜。”说完，他高兴地夹了一片肉，送到嘴里。

“听起来，除了你是速度的第一名，还有其他的第一名了？”我好奇地问道。

胡师傅端起酒碗，深深地喝了一大口，说：“那当然，县城里的一个厨师得了口味的第一名，还有一个人得了美观的第一名。”

就这样，在里陂上村过年的日子里，我可以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吃到晚上九点钟，每天接连着在三家不同的村民家里喝酒，抽烟，吃菜，聊天。我和村民谈论村里的大小事务，向外村来的客人了解各方情况，顺便对上下左右、国内国外的各种看不顺眼的事情发一些牢骚，骂几句娘。

一般在正月初十以后，里陂上的村民家里开始请女客。请女客意味着过年快要过完了，“车子席”也进入了尾声，再不用为主人省菜了。这时候的肉食一旦上桌，客人可以尽情地吧肉食一扫而空。如果有多余的肉食，主人常常会包好了，让客人带回家去。

过年的正式结束是在正月十五，这天晚上要守灯。每户人家的油灯一直要亮到第二天的鸡啼时分，中途不能熄灭。村里的俗语说：“三十夜里的火，十五夜里的灯。”守灯这种古老的习俗慢慢地发展，可能就成了后来的上元灯会，也就是现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我女儿幼时在上海，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她还曾拉着有四个轮子的兔子灯，高高兴兴地满街走呢。

2014年我回到里陂上村，正值五一劳动节，政府和学校放假。在鹿冈和永丰县城读书的学生回到村里，他们没有种田的经验，不会跟着长辈下田，而是衣着光鲜地呆在家里。

我和村民正在院子里聊天，旁边的一辆摩托车发动了，两个后生坐在车上。“去哪里漂啊？”我问道。漂就是玩。

车上一个后生应声答道：“放了假，在屋里冇事做。过节么，到河里电一点鱼来吃。”说完，给我看他带着的用来电鱼的蓄电池，那是汽车上用的。

“突突突”，摩托车绝尘而去。我却恍若隔世。想起四十年前的五一劳动节，正是每年春天的农忙时节，公社的干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要下田插秧。时代不同了，如今里陂上村的后生居然会过五一节了。不知道村里的年轻人会参与新出现的“七夕情人节”和“11.11光棍节”么？

13. 赤脚和穿鞋

听说在中国的北方，农民种的是旱地，可以穿着鞋在地里耕作，不用赤脚。

可是我务农的里陂上村是在南方，村民种的是水田，田里有水，必须赤脚才能下田干活。

一、赤脚

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带了一双常见的半高雨靴（中筒套鞋）到里陂上，曾经在春天清晨摘秧的时候试着穿过一次。一下秧田，雨靴的边沿离开水面还有一寸左右，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摘秧，生怕清洗秧苗根部的泥土时，激荡的水波会溅进雨靴里面。村里年轻的男女后生看见了我的雨靴，就像任何时代的青年看见新潮的东西一样，啧啧地赞叹不已。这个说：“啊，这样脚就不会冷了吧。”那个说：“哪，收工时不用洗脚就可以回家了，真好。”

其实，雨靴的胶皮保暖功能很差，根本抵御不住寒冷的入侵，我的双脚还是和平常一样冷。

身边的秧摘完了，需要移动脚步。我从原来半蹲着弯腰摘秧的姿势，往左侧一下身子，想把右脚从秧田的泥里拔出来，可是怎么也拔不动，原来是雨靴被泥吸住了。我再一用劲，右脚拔出来了，雨靴却仍然陷在泥里。我摇摇晃晃地站不住，右脚一踩，正好把雨靴踩倒了，里面立刻灌满了泥水。于是我不得不仍然赤脚摘秧。而雨靴则乖乖地在田埂上羞愧地躺着，不敢看那刚刚升起的太阳。

有了这个教训，我从此老老实实赤脚下水田了。十年以后我离开里陂上的时候，那双雨靴依然完好无损，因为我实在没有怎么穿过。

每年从早春二月底三月初的春耕开始，一直到十月份收割二季晚稻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凡是耙田耙田、做秧田播种

谷、摘秧栽禾、耘田施肥、打农药拔稗草等等，我们都必须赤脚下田，连中午回家吃饭也往往是赤脚来去。于是，我从清早起床，直到夜晚洗脚睡觉，一般都打着赤脚。

中间的七八两个月割稻的时候，在放干水以后晒了十几天的稻田里，我们可以穿鞋割稻了。但是有些稻田里有冷泉，是终年不会干的“陷泥田”，还有一些田是因为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田里一直有水，叫作“春泥田”。在这两种田里割稻，我们还是得赤脚下田。总算起来，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要赤脚，这倒给我们省了不少鞋。

怪不得好像有一本书上说过，中国的北方人是“穿鞋民族”，中国的南方人是“赤脚民族”。

村民们长时间在水田里劳作，双脚在水里浸久了，脚趾之间会红肿发炎，很不舒服。这时候村民会在回家吃饭的间隙里，去村边的树丛中摘些黄荆的叶子，稍微捣烂一下，夹在脚趾之间，起消炎的作用。



黄荆叶子有消毒消炎的作用

奇怪的是，我们男人比较少发生这样的事，脚趾之间红肿发炎的绝大多数是女子。可能是女子的皮肤本来就比男人细嫩，或者因为世代代是“男耕女织”，女子下田比较少的缘故吧。

解放以前，像里陂上村这种传统的农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就像戏词中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女子基本上不下田劳动。如果因为家境贫寒，家里的妇女不得不下田，那是要被村里的左右邻居看不起的。

共产党来了以后，提倡男女平等，导致女子和男人一样下田劳动，确实可以是像报纸上说的那样，“解放了妇女的

生产力，发挥了妇女的聪明才智”。但是另一方面，妇女从田里劳动回来，还得拖儿带女、烧茶煮饭、缝补浆洗，传统女子应该做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减少。应该说，她们的负担比起传统女子来，是更加沉重了。

到了每年的端午节前，天气越来越热，村里从十来岁到五六十岁的女子，因为长期下水田的缘故，多数人的脚趾间发炎了。她们光着脚丫子在村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很多人的脚趾间都夹着翠绿色的黄荆叶。这情景若放在今日，远远望去，颇像夏天里摩登女子的脚趾上，涂上了绿色的趾甲油。

长期赤脚走路和下田的结果，是我的整个脚底长了一层黄黄的老茧，很像是黄色的皮鞋底，上面还夹杂了一些黑褐色的斑点。即使是负重走在满是碎石的山路上，也不会觉得脚底咯得疼。

有一天中午，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长来里陂上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去青山大队的源头村。源头村距离里陂上有十几里路，绝大部分是山路。我应声对连长说，那就走吧。他看我赤着脚，迟疑地问：“你不穿鞋？”

我看了他脚上的布鞋一眼，说：“我好久没有穿鞋了，应该没问题。走吧。”说罢，我们一起出门了。

从源头村回来的路上，他感慨地说：“老夏，不瞒你说，这几年我当了大队干部，每年拿着固定的三千六百个工分，穿鞋的时间多，赤脚的时候少了。我种了几十年田，居然不如你这么能赤脚走山路了。不过你也太能吃苦了。”

我笑着说：“农民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日子，我是在接受你们的‘再教育’呢。”

“嗨，老夏，我怎么好像是在接受你的教育呢？”他笑了。

后来我知道，中国古代有不少文人雅士，他们不但欣赏姣好的面庞和纤巧的双手，还会点评双足的等级，是名副其实的“评头论足”。我从小到大，知道自己越长越丑，但是低头看看双脚，似乎不太难看，只是平时躲在鞋子里，别人

不知道罢了。只有在里陂上村的时期，我的脚丫子才小小地露了一下“脸”。

二、穿鞋

每年十月的秋收结束以后，一直到第二年春耕以前，我和村民一样，都穿鞋了。

里陂上村民穿的鞋主要是自己做的布鞋和草鞋，他们也会花钱去买的少量的套鞋（胶皮雨鞋）、胶底解放鞋和塑料凉鞋。

布鞋是传统的鲶鱼头式样，黑面圆口，布底，令人感到新奇的是这种鞋不分左右脚，我在上海从来没有见过。村民要纳鞋底，先得自己种苧麻，把麻杆的皮剥下来浸在水里，然后除去外皮，再洗净晒干以后，搓成了长长的苧麻鞋底线，才能开始工作。相比之下，上海可以买到纳鞋底专用的棉纱鞋底线，要方便多了。

每逢过新年，村民要尽量穿着崭新的布鞋，喜气洋洋地出门去拜年和做客。



布鞋陆禹平提供

可是布底鞋遇水容易烂，不能在下雨天穿。套鞋和胶底的解放鞋呢，许多村民又往往买不起。于是村里人常常会议论：某某人家买了一双套鞋，某某人家又买了一双解放鞋。村里无论男女老少，穿上了买来的新鞋，都会翘起脚来展示给大家看，让大家欣赏和羡慕。

那时候买鞋是一件大事。现在买鞋不是大事，买高档鞋才是大事。

到了秋冬季节，和布鞋配套穿的，是一种特别的长筒的棉纱袜子。村民从鹿冈商店买来浅棕色的棉纱袜，把袜底剪开，翻起，另外配上密密麻麻行过针线的白色布袜底和绣花的“袜掌”。村民说，这样改造过的袜子特别结实。



村民把改造过的袜子称作“洋袜子”，当是指机织的棉纱袜而言。没有棉纱袜之前，白色布袜底和绣花袜掌也许是缝在传统的布袜子上面。

村里有一种传统的女鞋，那是曾经裹了小脚⁵的妇女专为自己做的布鞋。那小小的黑面布鞋，尖尖的头，讲究的人还常常用彩色的丝线，在鞋面上绣出花样。

村民的布鞋有一种特别的用途，就是在生气和发火的时候，把鞋脱下来当作武器。（父亲或者母亲会用鞋来打孩子，好像全中国都一样，我看过的电影和电视剧里就有不少，里陂上村也不例外。就算是外国人，生气的时候也会脱下皮鞋当作手榴弹，向美国总统扔过去。）但是里陂上的村民用鞋子打人，还比别处的人多有一种功夫。

⁵书上说，自从1911年清王朝结束，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人就废除了女人裹脚这千年的陋习。我母亲1917年出生，她理所当然没有裹脚，和书上说的一样。但是在里陂上村，实际情况和书上说的有所不同。有的村妇1923年出生，1928年开始裹脚（以后又放开），这时距离中华民国总统颁布的废止裹脚的法令，已经十几年了。我下乡的1970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村里只要能劳动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赤脚下水田劳动。那些四十五岁以上的妇女，裹了的小脚虽然已经放开，那尖尖的已然畸形的脚，还是比正常的脚要小很多。我清楚记得她们一摇一晃，在田里艰难行走的样子。

有时候两个村妇争吵不休，要动手打架了，可是有一方比较机灵，她想到平时骂人泄愤时说的：“拿屎鞋打的”，会早早地准备好一只布鞋，在鞋底上抹上一点小孩的大便。只要一亮出这超级武器，对方一定落荒而逃。我开始很困惑，为什么对方那么害怕，一定要逃呢？村民解释说，一旦被“屎鞋”打到了，就要倒霉一辈子，永远不得翻身。所以遇到“屎鞋”，哪有不逃之理？但那只是妇女的招数，我没有见过男人亮出“屎鞋”来打人。

许多村民会自己编草鞋。我曾经到鹿冈商店花九分钱买了一双草鞋穿，感觉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特别。草鞋特别不经穿，我那双草鞋五天就穿烂了。村民周恩绍说，即使是他做的最好的草鞋，最多也就能穿五六天。

最新潮的鞋是有搭攀的塑料凉鞋，晴雨两用，只是不能下水田。上海的塑料凉鞋款式多，质量好，价钱也便宜，只要二三元钱就可以买一双。我回上海探亲时，会帮村民买几双塑料凉鞋带回里陂上村。

渐渐地，没有后跟和搭攀、穿脱方便、价钱便宜的塑料拖鞋开始流行起来。拖鞋不怕太阳晒，不怕大雨淋，踢踏着拖鞋到田头，两脚一甩就下了水田。上来的时候，带着泥污的双脚往拖鞋里一插，再伸到水田里涮几下，拖鞋和脚都干净了。但是穿拖鞋不能走在泥泞的路上。踢踏踢踏，拖鞋会把泥泞道路上的泥浆翻起来，溅到身上，甚至翻到脑顶上。

在平时，我上山砍柴一定要穿鞋。如果赤脚的话，踩到山上的尖锐的竹桩或者柴根，很可能会扎伤甚至戳穿脚底板。而一年一度的去几十里外的白珠水库捐竹，是我望而生畏，而又不得不去做的事。每逢捐竹，我一定是穿上最结实最防滑的胶底解放鞋。

里陂上村民从来没有见过皮鞋，他们的传说中，鹿冈的财主家里有一种“牛皮钉鞋”，专门在下雨天穿的。我请村民张春茂描述这种鞋的样子。他自称见多识广，却也只是听说，没有真正见过。他东拉西扯说了半天，我始终没有弄明

白，想像不出这种鞋是什么模样。

有一次，突然看见村前大队的曾书记穿了一双崭新的黑皮鞋在鹿冈走路，我很吃惊，这毕竟太少见了。可能是鞋子太大的缘故，他每走一步，鞋跟往下脱，脚跟往上露，“托落托落”地响，十分引人注目。我问老曾：“是托上海知青买的吧？花了七块六角五？”

“你怎么知道？”老曾很惊讶。

我说：“这是近来上海最多人买的皮鞋，简称‘七六五’。你应该把鞋带再绑紧一点。”

“我那里的知识青年也这么说，可是绑紧了鞋带，脚不舒服。”

“那你不是把皮鞋当作拖鞋来穿了？”

我和老曾都笑了。

后来又一次在鹿冈见到他，黑皮鞋显得旧了，鞋带也绑紧了。曾书记学会穿皮鞋了。

记得我第一次穿皮鞋是在五岁的时候，母亲让我试穿一双棕色的皮鞋，那是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穿上不到十分钟，皮鞋把脚夹得很难受，母亲同意我脱下来，再也不穿了。

第二次穿皮鞋，是在我三十岁那年，回到上海工作以后，买了一双和当年曾书记穿的同样款式的黑皮鞋。虽然上海人对这种皮鞋的简称还是“七六五”，实际上却花了我九块六角五分钱。



草鞋



皮鞋

14. 捐竹

里陂上村的生活和生产中离不开竹子。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吃饭用的筷子、捞饭用的灶捞、盖在饭甑上的汽盖、放剩饭的饭篮、晾晒衣服的竹篙、晒东西的晒箕和肚箕、筛米的米筛，还是头上戴的大小不一的斗笠，捉鱼时庠水的庠斗和放鱼的篱子、捉黄鳝的笕子，放松光的扁篙、作客时提的腰子篮、床上铺的篾席、姑娘们出嫁时带的针奩，都是竹子做的。

而生产上用到大量的篮攀、箩、撮箕、晒簞、谷筛、打禾桶的折子等等，更是需要很多毛竹。

可是里陂上村没有竹山，缺少制作各种竹器的原材料。

还好我们先锋大队的巷口村有一户地主，曾经在永丰、峡江和新干三个县的交界处有一片竹山，坐落在沿陂镇白珠村的白珠水库后面。里陂上村就用这个名义，去那里砍伐毛竹捐回来（捐竹），以满足村里的用竹需求。

去白珠水库捐竹很辛苦，光是来回的路途就要六个多小时。更不用说回来路上的那三个小时，肩上还压着沉甸甸的毛竹呢。虽然每个村民都知道自己的生活离不开竹子，可是谁也不愿意去捐竹。

于是每年会有这么一天，村里规定，凡是拿六分工分以上的劳动力，不分男女，一律要去白珠水库捐竹。有人很会钻空子，他们到了竹山上，专门挑轻细的竹子砍了捐回来，也可以记一天的工分。为了防止这一点，村里进一步规定，要按照捐回来的毛竹的重量来记工分：七十斤毛竹记十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去捐竹的前一天，我磨快了砍竹子的毛镰，从箱子里取出了我平时不穿的那双最新最结实的胶底解放鞋。

村里为了鼓励大家去捐竹，经常是一大早就免费提供热腾腾香喷喷的白米饭，让那些去白珠水库捐竹的人吃饱了再

出发。我们哗哗地吃饱了早饭，我赶紧换上了特地准备好的解放鞋，肩上搭一条擦汗用的毛巾，斜挎一个仿制的军用水壶，取出我的那根齐肩高的“丫”字形撑棍，戴上斗笠，手提毛镰，跟着大伙出发了。

我们从里陂上村出发，走山路到水东村，然后横插，一路经过吉江、司背、枫田、麻江、李山，最后从白珠村的边上进山，到达白珠水库脚下。接下来，我们要沿着水库的溢洪道，一路往上爬到坝顶。

白珠水库的溢洪道是一段平整的水泥斜坡，坡度45度左右，长度大约有五十米。躬着腰奋力往上爬的时候不觉得怎么累，我和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抢先到了坝顶。我松了一口气，转身往来路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其他人正在陆陆续续往上爬，还在溢洪道最下面的人看起来是那么小，相比之下我们好像是在天上。一想到待会儿我必须掬着毛竹从这溢洪道走下去，背脊开始发凉，浑身的汗毛不禁竖了起来，头也开始发晕。

穿过白珠水库大坝，绕到永丰、新干、峡江三县交界处的附近，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竹山，满山都是碗口粗细的毛竹。



茂密的竹林。正中间的这棵竹子好像不是老竹，而是新竹。

没有人知道真正属于先锋队的那片竹山在哪里。大伙进了竹山便分散开了，各自寻找着自己中意的毛竹。

做各种竹器必须用陈年的老竹。当年的新竹的颜色比较偏绿，竹节处有一点发白，这样的竹子不能要。陈年的老竹的颜色是绿中带一点黄，比较亮。

尽量选大的竹子，既是为了出篾率高，可以多打一点竹器，也是为了要多拿点工分。

我远远看中了一根又大又亮的老竹，满心欢喜。待得来到近前，左手搭住竹子，仰起头来顺着竹子往上看去，顿时失望了。这竹子的竹梢断了，可能是被上一年的积雪压断的。这种竹子连篾匠也破不开，已经属于废竹了。

竹林里到处响起了清脆的“当当当”的伐竹声和毛竹“嘎啦啦”的倒地声。

我又选中了一根竹子，可惜有点弯，不能要。前一年我就是砍了一根有点弯的竹子，上了个当。那次竹子刚上肩的时候，我捆在中间，因为竹子的两头往下，在平地上走的时候感觉特别平稳。可是到了一段“凹”字形的山路上，我还没有走到“凹”字的最低洼处，竹子的两头就都碰到地面，我的肩膀捆不到竹子，竹子搁浅了。我只好用双手托起竹子的一头，让它离开地面，用力往前推送，好不容易才拖着竹子脱离了窘境。

最后，我匆匆忙忙选了一根中等大小的笔直的竹子，砍倒以后顺着竹梢的方向削去竹枝，截断竹梢。

我把竹子捆在右肩上，又用左肩上的“丫”字形撑棍的上部带住竹子，左手压住“丫”字下面的那一“竖”，利用杠杆原理，让左肩也承担一部分竹子的重量。竹子虽然不重，但是很长，我必须小心地慢慢下山。

我还没有走出竹林，就遇见村民周恩绍在训斥她的女儿：“你怎么能随便砍了一根竹子不要，又另外砍一根？”

“我是得见旁边的一根竹子更好，所以才……”恩绍的女儿辩解说。

“你这样是浪费了一根竹子。以后要选准了竹子才能下刀，砍了就不能反悔。记住了！”

恩绍说完，把女儿丢弃的那根竹子绑在自己砍的竹子上，两根竹子一起揸。周恩绍是里陂上村数一数二的好角色，年轻的时候经常在清晨挑上 120 斤重的一担米，到四十多里外的永丰县城去卖米，做“米窠(读音‘跳’)", 当天来回。

我们揸竹到了白珠水库的坝顶，要下溢洪道了，我特意穿的解放鞋要发挥作用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压住砰砰的心跳，开始往斜坡上迈步。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前面两三步的地方，千万不能再往下面看，那样我会头晕心慌的。我的身体尽量往后倒，同时保持肩上竹子的平衡，一步一步往下走。解放鞋很新，胶底的摩擦力很大，所以一点也不会打滑。

我平安地下了白珠水库的溢洪道，心里很得意，也很满意。

白珠村前面的一段简易公路是我们的集合地点。我取下左肩上的撑棍，竖在身子前面，用手扶着，那“丫”字的三杈点正好到胸前。把右肩上的竹子搁在撑棍的杈上，让身后竹子的一头着地。这样一来，我的双肩和双腿全部解放了，浑身一阵舒服。用毛巾抹一把汗，喝一口水壶里的水，摘下斗笠猛扇几下，再小心地点上一根香烟，狠吸一口，感觉就像到了神仙的境界。



撑棍

我们开始聊天。村民张春茂说，他今天刚进竹林，不小心一脚踩在一个枯朽的毛竹桩上，连鞋带脚陷了进去。他拔出脚来，没想到那竹桩里出来了四条小小的毒蛇“青竹标(竹叶青)", 吓得他立即蹦开了。

“还好那四条是没长大的小蛇，要不然我今天就……”张春茂一边抽烟一边说。

旁边的村民张寿仁马上打断他：“你去年就说过这事。你这究竟是哪一年？”

“好……好像是去年。”春茂眨眨眼睛，磕了一下他的竹烟斗。

大伙都笑了起来。

等人全部到齐，我们捎起竹子，一个接着一个，“浩浩荡荡”地出发回家。知青薛志民走在我后面。

山路时常会弯弯曲曲，我到了一个山势往里凹的转弯处，肩上竹子的前后两端都紧贴着左边的山壁了。我知道，如果这个弯再紧逼一点，我的竹子再长一点，就无法通过这个弯道，就会连人带竹子掉下右边的山坡。我紧张地迈开脚步，小心翼翼地控制肩上的竹子。好了，终于通过了这个弯道，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候，我身后有人大叫起来：“老薛，薛志民！”原来是薛志民的竹子砍得太长，他没能转过这个弯道，连人带竹跌下坡去，急得跟在他后面的村民叫喊起来。

我赶紧停下脚步，放下竹子。还好那山坡不是很陡，薛志民一骨碌爬起来，先找到跌落了的眼睛，再抱起竹子伸给我，让我接住。他爬回到山路上，居然毫发无损。

等我们捎竹的人马在下午回到村里的时候，距离早饭已经有六七个小时，大伙早已是饥肠辘辘了。好在村里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吃的饭。

我捎的竹子一过秤，只有五十四斤，还不到八个工分。薛志民的竹子有五十六斤，他拿了八分。要是薛志民在山上把竹子截得再短一些，他就会像我那样，既不会拿到八分，也不会跌下坡去了。

第二天，我把捎竹时穿的那双解放鞋刷洗干净，晒干收好，准备在有像捎竹这样重大事情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几年以后，巷口村单独成立了巷口大队，不再属于我们先锋大队了。可是里陂上村有时依然会鱼目混珠，去白珠水库后面的山上砍伐（偷伐）毛竹。

有一年我们被白珠大队的人抓住，被迫留下了竹子，全村人马空手而归，但是回村以后照样记了工分。我们是记了工分，村里破损的农具却还在等着竹子来修补，怎么办呢？我们要顾及脸面，也是做贼心虚，再不敢去白珠水库那边了。

村里不得不换个地方，到鹿冈公社有竹山的寨下村去捐竹，由生产队负责出资购买。这一来，捐竹的路程近了许多。

不料我们刚到寨下村，他们的队长就迎了出来，笑嘻嘻地说：“白珠不让你们捐竹，是不是？”

唉，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这传得也太快了点。

我捐着用钱买来的毛竹回村时，总觉得肩上毛竹的质量没有以前从深山中偷来的竹子那么好，有点“买不如偷”的意思。不过，我们生产队从此再没有偷伐过别人的毛竹。

倒是马立平说，她们也曾跟着高坑村的村民去远处的竹山里偷伐过毛竹，却没有被抓住过。

几十年过去了，鹿冈乡各个村里的毛竹林越来越大，竹材越来越多，可是村民日常使用的绝大部分竹制品，却已经被价钱便宜而又经久耐用的塑料器具所取代。过去编织各种竹器的篾匠，是受人尊敬的手艺人，现在他们却因为塑料制品的冲击而很难依靠“制篾”来谋生。年老的篾匠纷纷改行，年轻人不愿意学做篾匠，“制篾”这门传统手艺，说不定要在鹿冈乡灭绝了。

塑料是石油化工的副产品，难道我们鹿冈人一定要等到石油资源枯竭，等到做塑料的原材料断绝以后，才想到要恢复使用各种竹子做成的器具吗？



2014年，作者在捐竹的路上，用撑棍来歇肩。

15. 铲田塍和筑田塍

初来乍到里陂上村，耖田、耙田、整秧田、播种谷这类复杂的技术含量高的农活，村民根本不让我们上手。我们只能和村里长大的孩子一样，从最简单的农活学起。我们最先学会的农活是铲田塍（读作“成”）、铲田塍（读作“看”）和筑田塍。

一、田塍和田塍

里陂上村山坑里的水田，都是顺沿着山势拾级而上的梯田。近年来，广西省龙脊梯田和云南省哈尼梯田随着摄影家的镜头，博得了无数世人的眼球。里陂上村的梯田是在山坳里，而不是在山坡上，所以没有那些摄影名作里的梯田那样壮观，但毕竟还是水稻梯田。水稻梯田最关键的，是要有蓄水、控水的功能。而蓄水、控水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梯田旁的田埂得以实现。

把上下两坵梯田分开的田埂，村民称作田塍。田塍大约一尺来宽，每条田塍中央有一个五六寸宽的缺口，叫作田阙（读作“缺”），村民简称为“阙”。“阙”就像是调节田里水面高低的阀门。平时根据需要，用松树枝和田里的泥土把阙封到一定的高度，就能把水拦蓄在田里，保持一定的水位。如果水稻已经成熟，需要放水晒田，就用镢头把阙完全打开，上坵田里的水便汨汨地流到下坵田里去，直到流光为止。

普通的水田，由于挨着的田块处在差不多相同的平面上，田塍两旁的高度是相似的。而梯田的田塍，它所隔开的是有落差的上坵田和下坵田，所以靠着下坵田的那一面，要明显地高出靠着上坵田的那一面。村民把田塍靠着下坵田的那一面叫作田塍。田塍的高低，由山坑里山势的坡度而决定，山势越陡，两坵梯田之间落差越大，田塍就越高；山势越缓，两坵梯田之间落差越小，田塍就越矮。暴雨之后路过山坑，

举目望去，只见层层梯田的田塍上，一道道瀑布奔流而下。那美景，那美声，是在上海时绝对想象不到的。

要是雨下得太大，田里的水就会冲破田阙，冲垮田塍。



雨下得太大了，大水冲破了田阙。

二、铲田塍和铲田塍

田塍上和田塍上，会长出杂草来，每年春耕之前都需要用镢头铲一遍，除去这些杂草，这就是铲田塍和铲田塍。

铲田塍的工作包括铲去田埂上面和挨着上坵梯田那面的杂草，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强度不大，铲田埂表面时，甚至不用赤脚下到水田里去。由于铲过的田塍还要重新加筑，即使铲得有些高低不平也不碍事。

相比之下，铲田塍更有意思些。田塍有高度，表面积大，铲的时候人下到田里，分开两腿，斜抡镢头，一下又一下，把前一年里长出的杂草铲除干净。没有杂草的地方，也要浅浅地带过一遍。走进一个山坑，坑里一层层的红壤土那微带红色的田塍光不光，平不平，那可是整坑梯田的面子所在，也是村民自己劳动态度的直接印证。

遇到田塍上常见的坚硬粗壮的芭茅草，必须要双手握紧镢头的木把，甩开胳膊，快速发力，镢头才能铲断草根。奋力挥动着胳膊，铲田塍的动作幅度很大，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个流行的口号：“甩开膀子大干”。铲田塍就是要甩开膀子来干。虽说铲田塍只要用镢头把杂草连根铲去就可以了，看

起来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新手和手法粗糙的人，往往铲得高低不平，像狗啃过似的。手法老到的人铲过的田塍，非常平整光滑。所以，只要劳动力够用，村民常常让妇女和小孩铲田塍，而铲田塍的任务则由精壮的男劳力承担。

有些时候，个别偷懒的村民会采用数千年来刀耕火种的老办法，铲塍之前先点着火来把田塍上的芭茅草烧掉，这叫烧塍。这是政府严格禁止的。烧塍很危险，一不小心火随风势蔓延开来烧到山上，就会形成山火，造成山林的损失。



烧塍不慎，引起了山火。

有一年，我们看到距离里陂上村很远的天上冒起了层层烟雾，慢慢扩散开来，遮住了半边天空。那是永丰县和峡江县交界处的最高的大山烧起来了，整整烧了半个多月，烟雾才渐渐散去。后来听说，这场烧毁了大片森林的火灾，就是因为烧塍引起的，政府为此抓走了一个烧塍的农民。

三、筑田塍

铲田塍和铲田塍以后，田塍变低变窄了，于是要在田塍的上面和靠着上坵田的那一面，加糊上一层田泥，这就是筑田塍。筑田塍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田塍有一定的高度，否则年年铲塍，田塍越铲越低，田里就蓄不住水了。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田塍越铲越薄以后，上面的一坵田会漏水。

筑田塍的时候，人下到水田里，一般先用“四齿耙”或

者镢头，勾起田塍边的田泥，一块一块地铺在田塍的上面，让田塍恢复到原来的高度；接下来再勾起田泥，搭在田塍的一旁，用来增加田塍的宽度。然后，用镢头把田塍上面和旁边新加上去的田泥摊匀、抹平，最后还要蘸水上光，新的田塍就筑好了。筑田塍是有一定难度的技术活，有点像造房子时候的泥水匠，只是用镢头代替了泥水匠手里用的泥刀。

村民家里多有一种“四齿耙”，有点像上海郊区农民用的“铁搭”。筑田塍时用四齿耙来勾田泥，比较方便。



四齿耙

可是每户村民家里至多只有一把四齿耙（平时主要用来扒出牛栏里的“牛栏粪”），多数人还是用镢头来勾田泥。

把田泥铺在田塍上面比较容易，而把田泥搭在田塍边上就有讲究了。泥太干了搭不上去，泥太稀了会滑下来；沙田里的泥，含沙量高一些，水一多就塌下来；精泥田里的泥很粘，即使加了水，也不容易用镢头推开。我经过细心琢磨，很快就掌握了筑田塍的要领。

看着亲手筑好的新田塍，又平整又光滑，在阳光的照耀下，还有一点亮闪闪的反光，两面交界处形成的鲜明顺畅的线条，勾勒着镜子似的水田。我撑着镢头站在田里，自我欣赏一番，不免有些陶醉其中，心里美滋滋的，觉得很满足。

铲田塍是在田塍的一边削去了一层土，筑田塍是在田塍的另一边加上了一层泥。村民有一句俗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现象：“一年一层皮，十年一下犁”，说的是两坵梯田之间的田塍，每年都会因为铲塍而向山的上方移动半寸多一点。过了十年，田塍移动了约莫六到七寸，就像用牛拉着犁来犁一下的宽度。以此来推算，每过一百年，田塍就会移动六到七尺。这何尝不是一定意义上的“沧海桑田”呢？

四、“石圳、石陂、石田塿”

有一次筑田塿，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村民周恩绍忽然问我：“老夏，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出生的时候，屁股上会有一块乌青吗？”

我从书本上看到过一些这方面的传说，可是不知道里陂上村的版本。我更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不等我回答，恩绍接着往下说：“传说有一次，阴间的阎罗王要让一个人出世（出生），可是那个人怎么也不肯。阎罗王忍住怒气，问他为什么不肯出世。

‘要我出世有条件，因为我上辈子做农民太苦了。’他说。

‘可是你这次出世还是做农民啊，你有什么条件？’阎罗王问。

‘要我做农民，必须出生在这种的人家，家里要有石圳、石陂、石田塿，使我不需要辛苦种田；我每年的收入要有千把两银子、万把担谷，使我能够用不完吃不完。’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阎罗王听了以后发了很大的火，把手里的生死簿往地上一扔，说道：‘如果是这样，我就自己出世去当农民了，还轮得到你？’

阎罗王怒气冲冲地说完了，便在那个人的屁股上用力踢了一脚，那人疼得哇哇直哭，来到了人世间。

从那以后，新出生的孩子的屁股上，多数会有一块乌青。”

恩绍说完了这个故事，我突然想起和阎罗王有关的一件事，便插嘴问他：“听说阎罗王是‘先注死，后注生’，对吗？”

恩绍说：“是的，阎罗王在我们出生以前，必须先注定好每一个人死亡的日子，然后才决定这个人在哪一天出生。”

我想，按照这种传统的说法，既然阎罗王早已定好了我们的生死，死亡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恩绍聊天结束，便搓搓双手，拿起锄头，挥动双臂，继续筑田塍。是啊，世世代代的农民只有辛勤劳作，才能有所收获，维持生活。农民若想好吃懒做，梦想着能有一种不用铲田耨和筑田塍的“石田耨”，那是连传说中的阎罗王都不同意的。

不过，很多种田的人还是希望能有免去劳作的“石圳、石陂、石田耨，”。这几十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特别是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农民的这个长久以来的梦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现今里陂上村主要的灌溉渠道是用水泥和麻石修筑而成，可说是真正的石圳；有芮源水库来代替“作陂”，可以算是有了石陂；机耕道两旁的水田，已经有了水泥做的石田耨。

在一般的田塍上，村民每年只要喷洒一到二次除草剂，就可以除去上面的杂草，而不用铲田耨和筑田塍了。虽然要花钱买除草剂，但毕竟是既省时又省力，的确比过去轻松多了。可是用了除草剂以后，杂草的根还留在田塍的土里面，虬结成一层，不时会长出草来，使得田塍和田耨看上去永远是毛茸茸的，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平整光滑，那么漂亮了。



如今，用水泥做的石田耨和石田阡。



村民在田塍上喷洒除草剂

除草剂是有毒的，不但会对大田里的农作物产生毒害，还会长年残留在土壤中，很不容易降解。国内有的地方声称，他们的农业基地十多年来从未使用过化肥、农药和除草剂，所以他们生产的水果和蔬菜，是百分之百纯天然的绿色产品，

因此把价格定得很高。等到有关部门来检测的时候，发现在农业基地的土壤中，还是存在着十几年以前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残留，因此这些水果和蔬菜不能卖高价，否则就算作是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环境一旦被污染了，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贫铀弹”，不但损害了当地人民和参战士兵的身体健康，还造成了环境的放射性污染和重金属污染。这种污染比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对环境的污染更厉害，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不能清除的。

我不禁联想到，云南省的哈尼梯田已经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不知道作为“世界遗产”的哈尼梯田，是否允许农民在田里使用那些既有好处也带来坏处的工业产品。比如说，是否允许使用除草剂来“铲田壟”和“筑田塍”呢？

下面是哈尼梯田春天插秧时的画面，近处青嫩的秧苗刚刚返青，稍远处有大片的田块在等待栽种。如果是用传统的方法筑田塍，此时距离的日子并不久，田塍上面应该尚未长出当年的毛茸茸的嫩草，一定也是比较光滑。

我睁大了眼睛，努力想从画面上寻找答案。



云南省的哈尼梯田

16. 碾米

我们刚到里陂上村，就发现村里有一台南昌柴油机厂制造的十匹马力单缸 1105 型柴油机。村民说，这是村里在 1966 年，花了一千多元人民币买来的，另外村里还配备了水泵，主要是在春夏之交用于抽水抗旱。

柴油机平时可以用来碾米，因此村里还新买了碾米机。

但是，除了抽水抗旱的时期以外，平时的柴油供应很紧张，经常买不到柴油，无法开动村里的柴油机。里陂上村民如果要用机器碾米，只能等到先锋大队的碾米房工作的日子，挑着稻谷去排队等候。碾一百斤稻谷要交付六角钱。

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村民还是沿用老祖宗传下来的，上千年的传统方法来碾米。



古老的木砬

他们用自己家厅堂里的土砬或者木砬，用人力脱去稻谷外面的一层壳，这层脱下来的稻壳黄灿灿的，薄而完整，就是我小时候听大人提起过的“砬糠”。“砬糠”可以用来垫在鸡窝里，也可以在夏天用来熏蚊子。用砬来脱去稻壳是重体力活，我累得满头大汗，一小时才脱壳一百斤稻谷，得到七十多斤“糙米”，也就是现在最时兴、营养最好的养生保健米。

可惜糙米吃起来有点拉喉咙，口感比较差，里陂上的村民只有在家里有人“老去了”（去世了）的时候，才会煮糙米饭吃。他们吃糙米饭，有点和披麻戴孝相类似，表示出慎终追远的意思，用来缅怀先人的艰辛。我或许是受了村民的影响，如今坚决不吃时兴的用糙米和五谷杂粮做的饭。要是看见别人吃了，我还常常忍不住，会说些怪话。

要用传统的办法吃白米饭，得把糙米挑到村里的碾房里去碾白。碾房的地上有一个直径三米多的圆形石槽，叫作碾槽。碾槽上面是用木头做的碾架，碾架的下部装着三个直径在一尺三寸左右的石头碾轮。每两个碾轮之间的距离相等（圆心角 120 度）。



碾轮

我把糙米均匀地倒进碾槽，牵过牛来，给牛套上了碾架上备好的牛扼以后，人就坐在碾架上，一拍牛屁股，或者是小竹鞭一抽，牛就晃晃悠悠地走起来，在碾房里转着圈，带动碾架下面的碾轮，开始碾米。

记得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天色阴暗，北风吹进了碾房。我缩着脖子坐在碾架上，听着碾轮在碾槽里咕噜咕噜地转动，单调而枯燥。我抬起眼皮，朝碾房外望去。移动着的田里尚有不曾融化的白雪，路上是一个戴着已经洗成淡红色的虎头帽的孩子，两只小手团在衣袖里。我猜想他可能会像许多孩子一样，冬天里的鼻子下面挂着鼻涕。近处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树干上，还有点点的残雪。树顶上的一只老鸱（乌鸦）噗噗地飞起来，呱呱地叫了两声，不见了。

碾房里的老牛还在不紧不慢地走着。“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我的心情也恍恍惚惚地伤感起来，和碾房内外的景色溶在了一起。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糙米碾白了许多，碾槽里则多出了些黄色粉状的细糠。我把白米和细糠倒进风车，摇动手把，

用风车一吹，白米和细糠分开了。一百斤稻谷可以得到六十六斤左右的白米。人吃白米，猪和鸡鸭吃细糠。

过了两年，柴油的供应逐渐宽松了，里陂上村的柴油机主要是用来为村民碾米。有一段时间，我和村民张梅发一起负责碾米，后来发现一个人就够了，我俩便轮流工作，独自一人掌控柴油机和碾米机。

柴油机在工作的时候需要有循环的冷却水，村里为此做了一个可以放四担水的大木桶。木桶的底部有一根橡皮管通到柴油机的进水口，机器里的小水泵把冷水抽进去，再从柴油机的出水口流出来，就是滚烫的热水。热水从另一根橡皮管流回到大木桶。若是木桶里的水太烫了，就要把热水管拿开，让热水流到地上，木桶里的水就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碾米机还在不停地工作，我得抓紧时间挑几担冷水，倒进大木桶里，再把热水管放回去，使冷却水保持循环。

碾米机的上部，是一个可以放六十斤左右稻谷的上大下小的铁皮斗。碾米机的中部有一个滚筒，是碾米机的核心部件。在铁皮斗和滚筒之间，是一块钢片，用来调节流进滚筒的稻谷流量，村民称作“刀片”。我要用“刀片”仔细地调节稻谷流量的大小，在尽量提高出米率的同时，又不能在碾出的白米中混有金黄色的稻谷。调节好了之后，用蝴蝶螺栓把刀片固定住。



碾米机

滚筒下方的一边是出米口，要用箩筐接住哗哗地流出来的白米；另一边是出糠口，出来的全部是细糠，也用箩筐接住。村民挑来稻谷，我会用大钩秤称过，留下记录。稻谷碾好以后，细心的村民会要求我，复称一下白米和细糠的重量，看看是否和他挑来的稻谷重量相符。

奇怪的是，每一百斤稻谷碾成了白米和细糠，就只有九十九斤了。村民问我为什么，我实在不知道。碾一百斤稻谷

的过程只有几分钟，弥散在空气中的粉尘估计会有一二两，不可能有一斤重。碾米机中间的滚筒里的米谷确实出不干净，会留下一点米谷在机器里，但是最多也只是一二两的重量。同样的一担箩，同样的一杆秤，怎么会少了一斤呢？我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有博士说，有可能是碾米的时候，稻谷在机器里摩擦生热，稻谷里的一些水分在碾米的过程中蒸发了。）

这种老式的柴油机的消音设施极差，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吵得我耳朵发胀。村民来碾米的时候，只有附在我耳朵边大声说话，我才能听得见。

我至今不知道当年那嘈杂的机器声究竟对我的听力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1975年，我参加了鹿冈公社开办的农机学习班。学习班的老师告诉我一个消息，上海市政府最近调拨给江西省一批手扶拖拉机，永丰县分到了十几台。

农机学习班结束以后，我立刻到鹿冈公社的乡办主任那里，请他想办法为我们里陂上村申请一台手扶拖拉机，他答应为我去打听。过了几天到公社，乡办主任告诉我，这批手扶拖拉机是“扶贫物资”，专门援助那些贫困村的，我们里陂上不是贫困村，根本没有资格申请。

但是里陂上村的土地非常集中，人少地多，非常符合“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如果有了手扶拖拉机，每年的农忙时节，就不用劳烦公社调动大批人马来里陂上支援“抢收抢种”了。我找到公社的书记，向他说明了情况。

我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给里陂上村争取到了一台上海生产的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外加一个二轮的拖斗，价值合计三千多元人民币。我把手扶拖拉机从永丰县的农业机械局开回了里陂上村，“突突突”的机器声吸引了很多村民来看热闹。我兴奋地对大伙说：“不用村里出一分钱的。”

话音刚落，我就觉得这话有些不对。村里每年上交的农业税约有一千元，国家把农业税的收入用来建设军队、用来发展工业、也用来回馈农业。眼前的这台手扶拖拉机，其实含有一点点我们缴付的农业税在内。

有个老者走近来，用手一摸那滚烫的水箱，立刻把手缩回去。他有点怀疑机器的效果，说道：“机器，机气，用得好才是机，用坏了就是气，还不晓得要花几多钱去修理呢。”

有了手扶拖拉机以后，村里就把原来的柴油机以六百元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个村庄。手扶拖拉机的用途很多，农忙的时候可以用来炒田和耙田；冬天可以直接开到水库里或者水塘边，用来抽水捉鱼；平时还能挂上拖斗，跑一点短途的运输；在日常生活中，则用它来带动碾米机，为村民碾米。

手扶拖拉机自身带有水箱，水箱虽然不大，装满一箱水却可以连续工作两个小时不用加水，比起用柴油机碾米不断地换水，要方便很多。它还带有一个简单的消音器，机器的噪音也比原来的柴油机小了。

但是村里很快就觉得，一台手扶拖拉机不够用。特别是在夏天双抢大忙的两个月里，当村民需要碾米的时候，手扶拖拉机却在大田里耕作，不能回来碾米。

1976年，还是我担任生产队长。村里由我做主，花费了二千五百元钱，又买了一台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它和去年免费得到的手扶拖拉机一模一样。村里还另外添置了一些容易损耗的零配件。这样一来，无论哪一台机器出现了故障，一般都有现成的备用零配件，立刻就能换上。

有一次，在大田里炒田的手扶拖拉机坏了，却一时没有合适的零配件可以替换，我便从碾米的手扶拖拉机上拆下相应的部件，及时解决了问题。村里同时再另外派人赶到永丰县城去，紧急采购这个部件。

1980年代的初期，里陂上村和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开始分田到户，手扶拖拉机和碾米机便宜地卖给了一户村民，由他承包了村里的碾米业务。

2010年我回到里陂上村，发现村口的桥边上有一座米厂。一打听，原来是村民张贤宗和人合办的。他们不仅承接了原来先锋大队的碾米业务，还到各村去收购很多稻谷，碾成白米以后，再销售到各地去。

现在的米厂里，碾米的工序很复杂，要经过多台机器。首先用两台筛选机，分别筛去稻谷里的禾秆和石块。接着是舂稻谷的机器，生产出糙米。再经过依次筛选，然后依次进入两台碾米机，白米便哗哗地流出来了。最后经过水磨机抛光，又用色选机来剔除杂色的米和烂米以后，才能打包外运。



筛去禾秆和小石块等杂质



用方形的机器来舂稻谷



白米哗哗地流出来



用电子秤称重和打包

经过这些工序，一百斤稻谷只能产出五十多斤米，比几十年前我们碾米的时候少了十来斤（余下的猪饲料就多了）。米厂里碾出来的洁白晶莹的大米很是好看，人见人爱。遗憾的是，那少了的十来斤是米粒的外层，其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米厂里碾去米粒的外层，实在可惜了。

如今人们为了弥补这些被人为丢失的营养物质，时兴的做法是花费较高的价钱，去购买那些吃口很差、营养物质没有被碾掉的“糙米”来食用。

从我们当年十匹马力的柴油机到如今初具规模的米厂，看着米厂里正在运转的各种机器，回想起当年由我操作的碾米机，相形之下是那么的简陋，真可谓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17. 抽水和捉鱼

因为给里陂上供水的芮源水库没有修好，所以我们刚到里陂上的头两年，每年的五月份就要抽水抗旱。

春华秋实，转眼就到了每年的冬季，那时田里的稻谷和山上的茶籽都已经进了仓库，该轮到用机器来抽干池塘或者水库里的水，抽水捉鱼了。

一、抽水抗旱

春末夏初的五月份，正是田里的水稻生长最迅速的时节，需要大量的水分。村民说，每菟禾每天要喝一大碗水呢。

可偏偏是这时候，蓝湛湛的天空中常常是万里无云，没有一点要下雨的迹象。于是村里不得不组织人力，在流经村边的小河里作陂、然后用机器来抽水、用水车来车水，千方百计地让每菟禾都能喝到水。

我们砍来大量的脚柴（灌木），在小河中的一个地方投放下去，让靠近上游那边的水位抬高，这叫“作陂”（我的一副眼镜就是在作陂的时候不慎跌落河里，被水冲走了，幸亏我还有一副备用的眼镜）。

作陂以后，开渠引水，把河水引到一个高坎下。我们在高坎的边上，装好了柴油机和水泵，接好了八寸粗的铁管，开动机器把水抽到高坎上，顺着地势，就可以灌溉一大片水稻田了。

我朝周围一瞥，突然发现在柴油机旁的草丛中，卧着一台废了的机器，巨大的飞轮的直径有一米左右。这也是柴油机吗？

村民周恩绍告诉我，这是“木炭机”，要烧木炭才会转，是十年以前县里免费送给里陂上村的。大概是在1965年，旱情比较严重，木炭机连续抽水五天五夜，机器上的一个弹簧烧断了。买不到弹簧，机器就死了。第二年要抽水的时候，

村里就买了现在的这台柴油机。

我想起了自己小学的课本里提到过的锅驼机抽水灌溉农田的事。既然烧木炭，那应该是一种蒸汽机。这草丛中烧木炭的机器看来就是“锅驼机”了，用木炭把锅炉里的水烧开，以水蒸汽作为动力，带动水泵，抽水抗旱。我又想，柴油机烧的是柴油，木炭机烧的是木炭，村民把书上说的“锅驼机”叫成“木炭机”，好像更合理一些。

里陂上村有一片田的地势更高一些，而村里只有一台柴油机。要把水送到更高的田里，还得用龙骨水车接力送水。龙骨水车的样子和书上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半坐在一根木杠上，两个前臂趴靠住另一根高一些的木杠，双脚轮流踩踏水车的踏板。里陂上的水车最多可以有四个人同时踩。

上：普通的龙骨水车

下：明朝《天工开物》中所绘的龙骨水车

我第一次踩水车，非常兴奋，刚刚跟上了其他人的节奏，腿脚就用上了全力。



我突然发现，在我右边踩水车的村民张寿仁歪着脸，在对我笑。可是他笑的模样有些诡异。我正在纳闷，左边踩水

车的村民张贤通叫了起来：“好你个寿仁，你偷懒！”原来，他已经看出寿仁的双脚虽然跟着水车的踏板在动，却根本没有用力。寿仁听了这一声喝，他哈哈大笑，双脚索性松开了，在空气中胡乱蹬了几下。

芮源水库落成启用以后，里陂上村再也不用每年在小河里作陂引水，更不用踩水车来车水抗旱了。村里就此彻底告别了龙骨水车的时代。

那一架退休的水车靠放在生产队仓库的墙边，很快就消失不见了。那是怎么回事？村民悄悄地告诉我，水车是木头做的，某人把它偷偷地弄回家里，当作木柴烧掉了。

二、抽水捉鱼

除了抗旱，村里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抽水。那就是冬天干鱼塘或者干水库，捉鱼过年。

过去没有水库，村里的鱼都放养在鱼塘里，捉鱼时要车干鱼塘里的水，主要是用水车。现在当然使用机器来抽水干塘。

里陂上村的大堰上有一口最大的塘，名字就叫大塘。



里陂上村，堰上的大塘。

有一年冬天，我一个人负责抽水干大塘，开动机器，整整抽了一天一夜。

那天晚上，我给手扶拖拉机加满了柴油，就钻到了一大

堆稻草里面打盹。稻草堆里很冷，再加上吵闹的机器声，我根本不能好好休息。

半夜以后，我钻出了草堆，草堆上面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夜晚的景象和白天很不一样，天空是深极了的蓝色，没有一片云彩。一轮清月斜挂着，它的右上方是浑圆的，左下方缺少了一点，没有那么圆。我抬头看着月亮，心想这是新月，今天应该是初十了吧。四周的田野上，近处是一片惨白，不远处那些还没有翻耕过的田里，稻茬上也罩上了霜。越往远处越黑，里陂上村就隐藏在远处的黑暗里。

那边应该是从永丰到乐安的永乐公路，居然会有一辆汽车在半夜里开过。汽车的头灯远远看去像是黑暗里移动的萤火虫，一抖一抖地晃动着，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地飞过来。除了大塘里抽水机的响声以外，已经听见隐隐约约的汽车马达声了。马达声越来越响，汽车头灯的光柱照亮了江边的石壁，绰约可见石壁顶上的那些松树。凭着经验，那好像是一辆载重四吨的解放牌卡车。汽车很快朝潺陂村的方向开过去，隐没在了树林里，一晃一晃的头灯的光亮也看不见了。

我觉得身上冷，围着大塘跑了好几圈，还是觉得冷。我有些后悔没有从家里带些柴来烤火。我想起手扶拖拉机的水箱是热的，赶忙跑过去，捂住水箱取暖。

第二天下午，大塘里的水抽干了，全村人赶来捉鱼，却只捉到一百多斤鱼。村民说，可能是因为当年夏天的大雨造成涨水，放养在大塘里的很多鱼，都趁着涨水的机会逃走了。

芮源水库里的鱼是先锋大队放养的，每隔几年会抽干水库捉鱼。

又有一年冬天，芮源水库里的涵管盖子早已全部拔开了放水，水库里已经没有什么水了。大队决定派我用里陂上的手扶拖拉机开到水库里，带上水泵，由大队出资提供柴油，准备抽干水库以后捉鱼，给全大队的农民过年。

我在芮源水库抽水的第三天下午，大队领导来到水库，看见水库已经见底，只剩薄薄的一层水了。领导嘱咐说：“明

天就要捉鱼，现在先把机器停了，晚上再继续抽水。”



手扶拖拉机和水泵

我吃过晚饭，到了芮源水库，又用手柄摇动飞轮，发动了手扶拖拉机，开始抽水。不一会儿，三个大队干部带着手电筒和水桶也来到了水库。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随着水库里的水越来越少，鱼儿因为受不了缺少氧气，开始扑啦啦地蹦出水面。有些鱼没有回落到水里，而是落在了水边的地上。手电筒的光柱罩住了地上的鱼，它们正甩动着尾巴，想回到水里去。

大队干部扔掉手里的半截香烟，疾步冲过去，按住了在地上挣扎的鱼。他们把小一些的鱼扔回水里，挑了几条约四五斤重的大鱼放进水桶里，然后命令我停了抽水的机器，和他们一起回里陂上村，在我的住处和他们一起烧鱼吃。

我以前只是听说，每逢大队的水库要抽干捉鱼了，大队干部都会在前一天晚上弄几条鱼，美美地大吃一餐。现在这个传说变成事实了。

一回到我的住处，我们就一起动手杀鱼。总共是两条鲢鱼，一条胖头鱼（村民俗称“大脑”鱼），我们不一会儿就宰杀完毕，冲洗干净了。大队干部到处搜罗我的糯米水酒和谷烧酒，找到我的碗筷，在我吃饭的方桌上摆好。然后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我在灶边忙着烧鱼，还时不时的给我做帮手。

我把两条鲢鱼的尾部做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红烧划水，鲢鱼的其余部分则分别做成了炒鱼片和类似上海的熏鱼（辣

味加得很重)。胖头鱼的鱼头自然是烧鱼头汤，汤里放了本地出产的红薯粉丝。我把剩下的胖头鱼身加了很多辣椒，做成了鹿冈人平时爱吃的菜式。

过了晚上十二点，丰盛的全鱼宴开始了。我们一共才四个人，一顿胡吃海喝以后，还是剩下不少。这和现在用公款吃喝的情况差不多，只是当年我们把剩菜都收起来了，没有倒掉。大队干部到凌晨二点来钟才走，剩下的鱼我又吃了两三天。

第二天早上我一出门，住得很近的村民朋友张寿仁就迎上来说：“昨天晚上，你厨房里的砧板响了一夜，你们吃了多少鱼啊？”他的表情十分夸张。

我把他拉进厨房，让他看我们吃剩的鱼。他把各种剩菜尝了一口，啧啧地说：“我要是做了大队的书记，也一样会请你来烧鱼给我吃，我还没有吃过你烧的鱼呢。”

的确也是，我杀猪的时候请村民来吃杀猪宴，从来没有遇到过村里分鱼，所以他们没有吃过我烧的鱼。

这天下午，全大队的民兵集中到芮源水库捉鱼，我依然是在一旁负责抽水，这时候抽出来的已经是连水带泥了。我担心泥沙一多，时间长了怕会磨坏水泵。

虽说捉鱼只是民兵的任务，可是全大队能够走动的人似乎都来了。他们有的带着准备装鱼的竹篱子，有的带了更大的能放更多鱼的竹扁篱，还有的甚至带来了捉鱼的斩针。他们乌压压地围在四周，等到民兵捉完大队放养的那几种家鱼以后，他们就可以一冲而下，尽其所能，去水库里捉各种野生的杂鱼，捉到了就归自己。

大队干部把民兵分成两拨，一拨人下去捉鱼，另一拨人负责在岸上维持秩序，驱赶那些越逼越近的各村来的想捉鱼的村民。

周围照例烧起了几堆火，供捉鱼的民兵取暖。

大队干部一声哨响，捉鱼开始了。民兵们啾啾地抽着冷气，走进冰冷的泥水中，双手探摸着。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

许多十来岁的男女孩子从大人之间的缝隙中钻到前面来，他们着急地试探着想浑水摸鱼，被维持秩序的民兵一阵吆喝，推搡回去了。

泥水中的民兵每逢捉到了大鱼，就会尽量抓紧了拿给大家看，周围的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有时候民兵一不小心，让大鱼猛地挣脱了，四周就响起了一片哄笑声。那情景活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大戏。

大队干部看到放养的鲢鱼、胖头鱼和鳊鱼这三种家鱼已经捉得差不多了。而四周的村民中，有人的脚已经踩到了泥水里，维持秩序的民兵眼看就要拦不住了。

这时候，又一声响亮的哨声划破天空。哨声未停，四周等待已久的村民一涌而下，瞬间就布满在泥水之中。大戏的第二场开始了。刚才看戏的“观众”迫不及待地冲到了“舞台”上。

大队干部要我把抽水的手扶拖拉机停了下来。耳边没有了嘈杂的机器声，水库里显得很安静。我再仔细听了一下，的确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紧张地摸鱼。我看见有人摸到一条比较大的，应该是鲢鱼。他直起腰来像是要炫耀一下。但是他一看到周遭紧张的捉鱼气氛，就赶紧把鱼放进后腰上系着的竹篱子里面，弯下腰去接着摸鱼了。

这样的场面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一个人直起腰来，又一个人直起腰来，大家很快都直起腰来，迈着两条冻得通红且沾着泥水的腿上岸了。

这说明，芮源水库里连小手指那么大小的鱼也没有了。转眼之间，几百个人一下子散开，不见了。只剩下手扶拖拉机和水泵孤零零地留在芮源水库里，过几天我们会把它们弄回去。

我和里陂上的村民一起走在回村的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兴奋极了，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我刚刚下去，手就冻僵了。我正担心捉不到鱼呢，有想到鱼也冻僵了，不会动，很好捉。”

“我这点鱼大概会有四斤。”

“我的可能会有六斤。”

“就是那么一下子，太快了，真的像做梦一样，”村民张寿仁感叹地说。

“真的像做梦一样。”几个女孩齐声应道。

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面敲打键盘，想起这些事情，也真的像做梦一样。



2014年，作者坐在电脑前面敲打键盘，想起这些事情，真的像做梦一样。

18. 砍柴

在里陂上村生活，砍柴是大事。

我到鹿冈不久，就听村民说，共进大队有个村里的上海知识青年，因为连绵的阴雨，没柴烧了，就劈了吃饭的桌子来烧饭吃。没有柴，就不能烧饭，这是硬道理。可是我刚到里陂上的时候不会砍柴。

一、脚柴

刚到里陂上村，一天收工以后，我跟着村民张寿仁上山学习砍柴。那天学砍的是灌木丛，村民称之为“脚柴”或者“毛柴”，用的工具是勾勾的毛镰。

我跟在张寿仁后面进山，一脚深一脚浅，总也跟不上他。山路越来越窄，从一尺宽变成五寸宽，最后到了没有路的山坡或者沟底，那就是砍柴的地方。

我学着寿仁的样子，左手抓住一根手指粗细的灌木枝，右手握住毛镰的把，奋力朝灌木枝的根部离地面二三寸的地方砍下去。没想到那灌木枝噔地一个反弹，打得我左边的脸颊麻辣辣地疼。灌木枝没有断，镰刀砍到之处只是破了一点皮。我再奋力砍了好几刀，终于砍断了那根灌木枝。

我开始仔细观察寿仁砍柴的动作。原来，毛镰的刀口和要砍的灌木之间，应该有一个45度左右的夹角，以利于毛镰切入灌木。所以，当右手挥动毛镰往下砍的时候，左手要抓住那灌木往左下方按，和毛镰形成合适的夹角。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又试着砍了一会儿，虽然还是很慢，效果的确好多了。

张寿仁很快砍了两大堆脚柴。他又砍了两根细长柔软的灌木枝，两头就这么一绕一结，就成了“绳子”，放在了稍微平坦一点的地方。



一捆脚柴

他把脚柴一束一束整齐地堆上去，然后用刚才做的“绳子”一绕一抽再一扭，就绑成了一大捆柴，真是有点神奇。寿仁看我不会绑柴，就麻利地帮我绑好。但是他的动作太快了，我只觉得眼花缭乱，没有看明白。

寿仁又砍了一棵胳膊粗细的小树，截成六尺多长，两头削尖，就成了挑脚柴的柴担。他把绑好的两捆柴组成一担，足有一百多斤重。而我砍的那一点柴充其量才二十来斤。

寿仁担着脚柴在前面蹬蹬地走，山路两旁的灌木丛被脚柴刷得沙沙直响。我肩上扛着一小捆柴，努力紧跟在后面，好不容易才回到住处。

我试着把刚砍回来的柴塞进灶膛去烧，却只会冒烟，并不着明火。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过来一看，便哈哈大笑说：“刚砍回来的是湿柴，里面有水份，起码要一个月以后才能烧。从我这里拿点干柴先烧着吧。”

学会砍脚柴以后，我一有空就上山砍柴，把附近山上的灌木成片地放倒，摊在山坡上晒干以后，再一担一担挑回家。

有一年的冬天，我正在村民周恩绍家里的火塘边烤火，左手突然被恩绍抓住了，他发现我手上有十几处细小的疤痕。那是我秋天砍脚柴时不小心，左手在握紧脚柴的时候，被尖锐的细枝和蒺藜刺破了皮肤。恩绍感慨地说：“老夏，你受苦了。”

二、棍子柴

棍子柴的直径在一寸以上，介乎于脚柴和松树劈柴之间。一开始，我还是跟着村民张寿仁学习砍棍子柴，用的工具还是毛镰。



尚未安装木把的毛镰

不论是乔木还是灌木，也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只要长到胳膊粗细的树木，就是我们要砍的目标。我们把这些树木砍倒，削去枝桠和树梢以后，断成一尺五寸长的棍子柴。棍子柴一般都在很远的山坑里。为了抓紧时间，我们吃完午饭立刻出发，往往是一路小跑，才能在下午出工以前赶回来挣队里的工分。

我和薛志民、冯金生负责砍柴。我们的屋檐下堆满了柴，多数是棍子柴。或许是当年砍柴太多的缘故，现在我看见树木，脑海里首先闪过的，往往是估量一下，把这树砍了以后，大概能够变成多少柴。

记得有一年，鹿冈公社组织基干民兵训练，最后一天是实弹射击，每人打五发子弹。按照惯例，里陂上村的民兵应该是第一个打靶。

村民张寿仁和我以及张清魁等几个人早就约定，我们早上打靶一结束，趁着别的民兵还在打靶，我们赶紧上山，每人砍一担棍子柴，在中午以前卖给鹿冈银行，赚一点外快。下午我们再继续参加民兵训练。民兵训练是队里给记工分的。

“实弹射击从先锋大队开始！”公社的武装部长发出命令。

先锋大队的民兵连长大声叫道：“里陂上！”

“来了。”

“在这里。”

我们一边漫声应着，一边卧倒，拨弄着手里那老掉牙的步枪。我依照所学的射击要领，打了五发子弹，一发未中，全都打在了靶纸旁边的岩石上，激起了一缕缕白烟。这些步枪的准星一定没有校准，我们里陂上的民兵没有一个人打中靶子。

接下来我们几个人溜走了，到远处的山坑里去砍棍子柴。我们很快每人砍满了一担。

山坑底下没有路，山坡又很陡，要爬到山顶上才有正常的山路可走。我的力气不大，只能咬紧牙关挑着柴，一步一

步往山坡上爬。遇到坡陡的地方，我双腿乱颤，猛吸一口气，眼睛一闭，挣扎着往上蹬一步，同时必须掌握好肩上的平衡。

终于到了山顶上，我立即放下担子，摸出香烟发给大家。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一口，周身说不出的舒坦。我平躺在山顶上，四肢尽量伸展开来。上面是蔚蓝色的天空，空中浮动着几朵胖乎乎的白云。四周很安静，我浑身暖洋洋的，有点想睡觉。

“该去了！”随着张清魁的一声吆喝，我一骨碌爬起来，挑起担子，走上了山路。

挑棍子柴走路得有技巧。山路的空间比我们挑的柴担要窄，会有各种枝桠横着长在山路上，拦住我们。我必须双手一前一后，紧紧抓住装棍子柴的络架，依靠身体前面的棍子柴冲开拦路的枝桠，依着惯性一直往前走，千万不要停顿。否则的话，棍子柴被路边的枝桠一挡以后会摇晃转动，造成人的重心不稳，掌握不住平衡，一不小心会连人带柴滚下山去。



2014年，作者去砍柴的模样。 作者用络架担起一百多斤柴

我挑着一担棍子柴，走了几里路到鹿冈银行。银行新来的徐会计给棍子柴过秤，我的一担是一百四十斤，赚到八角四分钱。徐会计一边给我钱，一边上下打量我，嘴里说：“哎呀，里陂上的老夏真是名不虚传。”

三、松树枝桠和松树劈柴

先锋大队规定不能砍倒大松树，有的聪明人就会钻空子。他们在离村子很近的地方，爬到松树上去，把松树的枝桠砍一部分下来当柴烧。这样做并没有违反规定，我也很快学会了这种取巧的办法。直到大队进一步禁止砍松树枝桠以后，在一段时间里，我有时还会悄悄地到远处的山中，爬上松树去砍枝桠。

等我们有保护树木的环境保护意识，那已经是我当生产队长以后的事了。

大松树的枝桠，粗的有大腿那么粗，细的也有胳膊粗细。我们用的工具当然还是毛镰。

大松树的枝桠离开地面最少有三到四米，要爬上底部直径在二尺以上的松树，抱着松树有点像抱着墙，根本使不上劲，很难爬上去。我借用村民的梯子来上树，必要时把两架梯子接在一起，就可以上到离开地面最近的枝桠，然后顺着一根一根的枝桠往上爬，爬到上面一个合适的位置，从背后抽出毛镰，开始砍枝桠。

砍断的枝桠不会直接落到地面，而是掉在下一层较大的枝桠上。下一层的枝桠虽然比较粗一些，但是因为上层断枝压在上面，往往只要猛砍几下就断了。我在树上一点一点往下移动，等到砍断最下层的离地面最近的大枝桠时，嘎拉轰隆隆的响声表明，我们又有柴可以用来烧饭了。

很多大松树上有无数黄色的蚂蚁。人一爬上树，黄蚁便蜂拥而至，翘起尾部，狠狠地咬进我的皮肤，有如无数的针同时在刺，又麻又痛。许多人在惶急之下，连滚带爬地逃下树来。但是我很快发现，当黄蚁咬来时，只要我忍住疼痛，纹丝不动，坚持半分钟到一分钟，黄蚁就会认为我不是敌人，不战自退了。

那些被黄蚁咬过的村民，自然知道哪些是有黄蚁的松树。当他们看见我能把黄蚁树的枝桠砍下来，都很诧异，那些黄

蚁怎么不咬老夏呢？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

不过随着上级越来越严格的禁令，和越来越少的松树枝桠，这种砍柴的方法很快就废弃不用了。

刚下乡两个来月的时候，村民周恩绍拿了一大抱松树劈柴给我们，那是用大松树劈成的一块一块的劈柴，又干又轻，真是非常好烧。我们再三问恩绍，哪里才能砍到这种柴，可他就是笑而不答。最后他才告诉我们，里陂上村附近，自己村里的山上的松树不让砍，他是到很远的巷口村的山上偷偷砍伐的松树。

我们四个男生决定也去砍松树。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们借了两把斧头，薛志民带了一把口琴，我带了一本书，出发了。我们不知道哪些山属于里陂上村，只是从山沟爬上了山脊，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我们东张西望，最后决定砍一棵半山腰的松树，那棵树望过去直径有一尺左右，估计很快能砍断。

从山脊往下没有路。我们互相搀扶着下到山腰，来到这棵松树跟前，才发现这是一棵直径二尺多的大松树。我们已经来了，就砍这棵吧。



砍柴的斧头

我们有两把斧头，决定分成两班，轮流上阵。崔应辉带头，我们高一斧低一斧地开始砍树。可是斧头实在不听话，角度也不对，所以进度很慢。虽然我们是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每个人的手上还是很快都起了水泡。

开始薛志民在轮班休息的时候还有闲情吹吹口琴，我也会翻翻书，但是很快我们就用完了力气，没有了兴致。

很快就到了下午出工的时候。崔应辉说，看来今天下午

我们要耽误出工了，我们眼下的任务，就是砍倒这棵大松树。

日头渐渐西沉了，这棵松树虽然被我们开了二尺来宽的口子，有点像削铅笔一样，最细的地方的直径只有五寸左右了，它却仍然屹立不倒。崔应辉抡起斧头，又狠狠地砍了几下，还是没有动静。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算了，回去吧。”

我站了起来，接过斧头说：“再坚持一下。我来再砍十下，如果不行就算了。”

说来也真奇怪，我才砍了五六下，就听到了细小的嘎嘎声。我们正怀疑是否听错了，嘎嘎的崩裂声越来越大，松树慢慢地沿着和山脊平行的方向倒下去。我们迅速地跳到了安全的位置。松树越倒越快，轰隆隆的倒地声中，夹杂着枝桠断裂的嘎嘎声，场面十分壮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天色近晚，我们感觉累极了，回村的路又很远，谁也不愿意扛柴回去。这棵倒下的松树放在这里，会不会有人来偷呢？我们听说过，有的村民会到山上去偷别人砍的柴。我用斧头削去一块树皮，拔出随身带的英雄牌金笔，认真写下了一行字：先锋四队知识青年砍，1969年5月。意思是告诉别人，别打这棵松树的主意。

回到村里吃过晚饭，村民张发茂来看我们砍了多少柴。我们告诉他，我们在大约什么地方，砍倒了一棵很大的松树，并没有带柴回来。当发茂知道我们在松树上留了字，顿时大惊失色地说：“那是李家人的山岭。李家是大村，他们正愁没有证据来证明我们乱砍滥伐呢。”

第二天一早，发茂急忙上山，找到那棵树，铲掉了我写的那一行字。

与此同时，我们上海佬一边砍树一边吹口琴，还在树上写字，便成了里陂上村里妇孺皆知的笑话。很多年以后，这还是村民们常常取笑我们的事情之一。

我们四个人花费半天时间砍倒的大松树倒在斜坡上，位置很不好，我们没有能力进一步处理，后来给了张发茂。发

茂花力气劈了十几担松木柴回家，还送了一担给我们。

劈松树柴是技术难度很高的工作。如果树干的直径大于一尺，先把树干按照一尺五寸的长度，用斧头在树干上砍出半圈二寸宽、二寸多深的口子。接下来是抡起斧头斜劈，一块一块地把劈柴剥下来。然后再砍出半圈的口子，循环往复地把劈柴剥下来，直到把整段树干劈成松树劈柴，再开始劈下一段树干。

劈柴纯粹是男人的工作，村里没有女子会用斧头劈柴。可惜我的力气不大，所以需要双手紧握斧头柄，用足全身力气，才能把斧头稍稍砍进树干，却又震得双手发痛。待到劈柴告一段落，我松开斧头时，那用力较多的右手的手指已然不听使唤，不会自行伸直了。我只能用左手来逐个扳直右手的手指。每扳直一个手指，心里抽痛一次，身上会出一点汗。

（后来我得知这是一种“腱鞘炎”。如今我右手的指关节虽然活动如常，却几乎每日都有酸胀的感觉。）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上山，而且带着大锯的话，劈松树柴就容易多了。把松树锯成一段一段，每段长一尺五寸左右，然后把松树段竖起来放在地上，用斧头劈成一块一块的松树劈柴。可是里陂上村没有两个人操作的锯树的大锯。我一个人上山劈松树柴，能独立操作的只有斧头。

如果树干的直径在一尺以下，可以先把树干用斧头断开，每一段大约一尺五寸左右。然后把这段树干枕靠在另一段很大的木材上（这段木材称作“枕脑柴”）。我高高抡起斧头，瞄准了一段树干的直径，从正中间劈下。如果树的木纹很直，有时只要一斧头，就能把一段树干一劈为二。

如果一斧头下去，树干没有开，反而把斧头紧紧夹住了，就可以双手紧握斧头柄，把斧头连同树干举到胸前。然后猛一发力，高举过头，就势翻转，把斧头脑砸到枕脑柴上，利用树干本身的重量和加速度，咚的一声响，这段树干就劈开了。

只是有一次，我刚把斧头连同树干举到胸前，不料五六

十斤重的树干突然脱落，斧头脑带着惯性猛然砸在我额头的正中。我眼前一黑，躺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我爬起来，当时觉得没事了，便继续劈柴。

从那以后，每到冬天，我都会早早戴上帽子遮住额头，否则额头就会痛。如果当年我不是偶尔违反规定，悄悄地偷砍一点松树劈柴的话，我的额头应该不会受伤的。

有一次从永丰县城来了一辆拖拉机，到里陂上村买柴，看见我们的干柴很好，他们一定要买，一百斤柴的价钱从六角破例提高到了六角五分。砍柴很不容易，干柴很珍贵，需要量又很大。正如村民经常念叨的：“灶门大似山”，意思是说，整座大山上的树木都可以塞进小小的灶门里烧掉。别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干柴，两天要烧掉一百斤呢。我坚决不愿意卖柴，但是冯金生力主要卖，结果卖掉五千多斤干柴，装满了那辆拖拉机，才得了不到四十元钱。



“一壁”的棍子柴堆放得很整齐。

附近的农民很快传开了，说是里陂上的上海佬很勤劳，还卖给永丰人一拖拉机的干柴呢，不像某村的上海佬，懒得上山砍柴，用爹娘寄来的票子（钞票），从老俵那里买柴烧。

没想到我们卖柴，居然成了里陂上村上海知青的无形资

产，为我们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在劈松树柴的时候，居然发现在松树里嵌着一颗步枪的子弹头。这里以前打过仗！是的，这里曾经是当年红军和白军作战的战场。

永丰县当时是游击区。有一阵子红军杀过来，成立了苏维埃，强行把地主的田地分给了穷苦的农民。过一阵子白军杀了回去，反攻倒算，把红军分给农民的田又夺回去，还给了地主，并且一度把永丰县更名为平赤县。

红军曾经在永丰的龙冈大胜，毛主席高兴地写下了：“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粉碎了白军的第一次围剿。又有传说白军曾经在永丰的江口大胜，把俘获的红军绑在江口大桥的栏杆上，大开杀戒。

在有些村子的房墙上，我们依然可以看见用石灰水写的“欢迎白军弟兄过来当红军”，“红军必胜！白军必败！”之类的标语。

而里陂上的村民周恩绍，1924年生，他曾经亲眼看着白兵在里陂上的屋背岭和其他的山头上修筑炮楼，用来封锁红兵。他们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打仗游戏，是里陂上村的孩子分成两拨，一拨是红兵，一拨是白兵……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这棵松树和我手里的这颗嵌在松树里的子弹头，应该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了。我现在记下的这段文字，或许可以算是一个间接的见证吧。

那颗子弹头我当时放在箱子里，后来不知所终。可能是在离开里陂上的时候整理箱子，无意中丢失了。也可能它正静静地躺在我家的某个角落里，等着有人去发现它呢。

19. 种菜

1969年到里陂上不久，村里给我们知青班（集体户）分了“自留地”。我们和村民一样，每人可以有一分自留地（约六十七平方米）。当时我们在祠堂里居住，分到的两块自留地不算远，走路二分钟就到了。两块地连在一起，一块是七分，另一块是二分九厘，一共是九分九厘（约有一个半篮球场那么大）。比照规定，村里多给了我们九厘自留地。

自留地的收入归己，主要是用来种菜。

一、惨淡经营

我们的自留地是原来一直种水稻的薄瘠沙田，而且一边是高坎，会漏水。田边有一排几百年“高寿”的大树，大树的树冠挡住了不少阳光，树根则一直伸到了田中间。犁田的时候，树根有时还会劈断犁嘴。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对于种菜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分到自留地的时候，正好赶上春种。按照村民的习惯，每人要种一百菂（棵）辣椒，一百菂芋仔（芋艿）才够吃。我们集体户有九个知青，于是我们种了九百菂辣椒，九百菂芋仔，还种了一些茄子和黄瓜。

村民把自己家里的自留地称为“土”或者“园”，他们精心耕作了很多年，这些土十分肥沃。分给我们的自留地是“田”，而且是薄田。“种田”和“园艺”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种菜的肥料仅仅是自己的尿。有时候，我们在晚上去鹿冈公社看露天电影。如果尿急了，总要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一直坚持到看完电影回到住处，才在尿桶里小便，为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让我们的自留地能够多有一些肥料。可是光靠尿肥来种菜根本不够，因此我们第一年种的菜别提有多狼狈了。

村民的辣椒长到二尺多高，他们吃的青辣椒都有手指那

么长了。而我们种的辣椒只有一尺来高，叶色发黄，才刚刚开出小白花。那些小白花好不容易变成了嫩绿色的不到一寸长的小辣椒。我们实在等不及了，摘了一堆嫩辣椒，炒了两大碗，一眨眼的功夫就吃光了。

村民看见了，好心地提醒我们说，你们上海佬居然吃这样有料的嫩辣椒，应该每人种二百莧才会够吃。

其实，我们是因为在前一段蔬菜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用盐水或者固体酱油冲汤来下饭的日子过得太久了。

到了中秋节，应该可以挖芋仔吃了。村民种的芋仔，芋叶起码有齐腰高，最好的甚至有人那么高，他们挖一莧芋仔，全家可以吃一餐。可我们自留地里的芋叶只比膝盖高一点点。冯金生在轮到他做饭的时候，去自留地挖了十几莧芋仔来做菜，才够我们吃一顿。

总之，我们第一年在自留地里种菜，真可谓是惨淡经营。

二、改造自留地

1970年，我们知青班的班长崔应辉提议说，我们要真正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每人选了一户村民作为师傅，一日三餐在村民家里搭伙，认真地向村民学习。师傅手把手地教我们干各种农活，其中也包括种菜。

但是我们自作主张到村民家里搭伙的做法，不符合有关的规定，受到了上级的多次批评。我们坚持了将近二年，在巨大的压力下，最终又恢复了集体起伙。

我们集体户重新开张的那天早上，村里很当一回事，还专门燃放鞭炮。那天我负责煮饭，村民张梅发还特地来灶边指导，告诉我什么时候应该捞饭，什么时候应该上甑。

那时我们也知道了，要种好菜，首先要改造我们的自留地。

自留地边上那些大树的树根会来和我们种的蔬菜抢夺养份，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镢铗在地边上开了一条五寸宽

一尺多深的沟，用斧头砍断那些表浅的树根。更深的树根对于我们种菜来说，妨碍就不大了。

没有肥料怎么办？里陂上村的祠堂前面有一口不大的水塘，是全村最低洼的地方。每逢下大雨，村里的鸡、鸭、鹅、猫、狗、猪、牛的排泄物都流到这水塘里。天晴以后太阳一晒，这水塘里墨绿色的水面上会冒出许多水泡，那应该是沼气在冒泡。

每年有二到三次，我会只穿一条短裤，拿了挑土用的篮攀到水塘里捞塘泥。塘泥可以有二尺厚。我仰起头，整个身体蹲到水里，只觉得后脑的头发碰到了水面。我双手用篮攀把稀稀的塘泥挖起来，小心地提出水面，以避免塘泥再滑入水中。我奋力把一篮攀一篮攀的塘泥运上岸，最后还必须用许多竹枝盖在塘泥上，以免这些塘泥成为猪们清凉的浴场。等到毒辣的太阳晒干了塘泥，我就把这些珍贵的有机肥料挑到自留地里。记忆里，好像女生中的李桂英也做过这事。

数年以后，我们的自留地从薄瘠的“田”变成了肥沃的“园”，苕菜、芋仔、辣椒、茄子、黄瓜、蕹菜、苋菜、豇豆、红薯、南瓜、菠菜、芹菜，样样蔬菜都长得漂漂亮亮，像模像样，印象比较深的是下面几种。

苕菜

下乡那年我们是初春到达里陂上，当时正是苕菜的收获季节。苕菜的个子比我们上海常吃的青菜大得多，能长到二尺多高，吃起来有一点苦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菜，待到一个读过小学的村民告诉我苕菜的“苕”字是怎么写的，我一下子惊讶起来：“记得好像《西游记》里说到过，有这种菜的，这应该是一种很古老的蔬菜吧。”

后来我从别的书上看到，苕菜好像是芥菜的一种，栽种的历史很久了。



苕菜

菘菜很容易种，产量也很高。每年秋天种，来年的春天收。

菘菜平时摘叶子吃，四五片菘菜叶子就有一斤，放在滚水里氽一下，挤干水就能脱去苦味。切细爆炒以后有点像江南的雪里蕻的味道。如果再加上红辣椒，非常开胃。

到了春天，菘菜刚刚开始往上抽苔，这时候，村妇开始忙着把菘菜一棵棵砍倒，从地里收上来。

菘菜的菜苔，俗称“菜脑”，有莴苣那么粗。菜脑去皮以后切片清炒，味道鲜嫩清香。如果你吃到“菜脑炒肉片”这道农家名菜，你一定会赞不绝口。



菜脑

一棵菘菜可以有五斤重，一户人家种二百棵菘菜，收获一千斤是很平常的事。菘菜最重要的用途是做“篓菜”。先把菘菜叶子洗干净，晒到大约六七成干，切碎以后放进瓮里，拄实压紧，封上瓮口。过一段时间开瓮，再晒再拄，叫作“倒瓮”。最后做成的篓菜酸香可口，不容易腐坏，可以一直吃到夏天。篓菜看上去很像浙江的霉干菜，但是没有加过盐。篓菜烧肉的味道，很像江苏和浙江一带人家做的霉干菜烧肉。

菘菜也是猪食的主要材料。菘菜剁碎了，加上米糠，煮上满满的一大锅，猪闻到了香喷喷的味道，就会哼哼嗷嗷地蹭在灶台边，小眼睛老是瞅着锅里的美食，不停地甩动着细小的尾巴，赖在灶边不肯走开。

芋仔（芋艿）

芋仔是里陂上村民的主要蔬菜之一。按一家五口来算，要种五百菹，平均每人一百菹，春天种，当年秋天收，一直可以吃到来年的春天。

每年春天，从楼板上摊晾的芋仔里，挑出个头均匀的芋仔，切去下半部，就成了芋仔种。

村民常说，芋仔是“生要牛粪，死要豆豉”。把芋仔种栽到自留地里，盖上薄薄的一层土，再盖上厚厚的一层牛粪。等芋仔长到最后两个月，又上一道厚厚的牛粪，最后用芦荻草盖住根部，不让杂草生长。这就是“生要牛粪”。

烧芋仔的时候，除了加辣椒和香葱以外，还一定要加一点豆豉，芋仔的味道才会更加鲜美。这就是“死要豆豉”。

有一次，公社的邮递员老徐来里陂上送信，我在自留地里远远地和他打招呼。我那齐人高的芋仔叶挡住了老徐的视线，他起先没有看见我。老徐下了自行车，来到我种的芋仔边，搓着双手，啧啧地说：“这么好的芋仔，原来是你种的。一甬芋仔挖起来，怕有七八斤吧。”

芋仔吃多了会堵气，滞纳不下，胃里不舒服。据村民传说，以前有一个中医，在夏天路过永丰，看见到处种了芋仔，他跌脚叹道：“哎呀，这里的人吃这么多芋仔，秋冬时节会得胃病，这可怎么是好？冬天我得来这里治病。”到了冬天，这个中医又来了，看见到处种了萝卜，他说：“好了，好了，如果有了胃病，一吃通气的萝卜就好了，我带来的药也就是些莱菔子（萝卜籽）而已。”

我们收了芋仔，摊晾在楼板上，大部分很久都不坏，有一小部分会先后发烂变硬。烂芋茛有一种特别的香味，仍旧可以吃。所以村民说：“红薯烂了连猪都不吃，芋仔烂了那得起劲吃。”

烂芋茛不能留种，要先吃掉。后来我每到吃剩菜的时候就会说：“这是烂芋茛，先吃这个。”

到了现在，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上海的家里，“烂芋茛”不但是名词，还成了动词。我要吃剩菜了，家里的人往往会叫起来：“你这个烂芋茛，不要再烂芋茛了好不好？”

我常常回答：“节约不是小气，节约是美德。何况真正的烂芋茛确实很好吃。”

我每年上山砍几担“芦荻草”，用来盖住芋仔的根部，那是太平常不过了。可是我在1974年左右，到“山水甲天下”

的广西省桂林市旅游，在游览当时新开发的溶洞“芦笛岩”的时候，溶洞入口旁边的墙上，就画着大大的芦茛草，说是“芦笛草”。里陂上小小的芦茛草到了桂林，居然能够换个名字，登上大雅之堂。但愿它们真的是同一种草。

1990年代，我在国内的电视上看到中药“铁皮枫斗”的广告。哈，电视广告里的那种植物，不就是一种芦茛草吗？没想到在里陂上为芋仔服务的芦茛草摇身一变，居然有这么大的名堂。如果早知道，我当年应该吃上几口芦茛草试试。

不过我再上网一查，铁皮枫斗的图片和芦茛草不一样了。那个电视广告应该没有错，肯定是我记错了。

辣椒和茄子

辣椒和茄子应该都是属于茄科的植物，都是春天开始栽种。它们植株的大小和高度，以及开花和结果期也都相差不多，夏天是盛果期。辣椒和茄子秋天还会第二次开花结果，数量比夏天少很多，俗称秋辣椒和秋茄子。



辣椒

1941年6月的那个夏天，应该是日本人的飞机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狂轰滥炸的高潮时期，我的大姐出生了。夏天的重庆是著名的火炉，我的母亲正在坐月子。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她就带着大姐从“火炉”逃到湿冷的防空洞里。一来二去，母亲得了比较严重的胃病，不能吃哪怕一点点带酸带辣的食物。因此，我受家庭影响，从小没有吃过辣。

到了里陂上村，我像开始学习抽烟一样，开始学习吃辣椒。我很快感觉到，吃了辣椒出汗以后，身上的汗毛孔张开了，很爽快，很解乏。而在辣椒生长的不同时期，它的味道也是不同的。

一开始是摘青辣椒吃，比较鲜香，不是很辣。等到青辣椒有一点转成黄红色，是辣椒最辣的时候，口感也比较老，不好吃。最后是辣椒变成鲜红色了，摘下来烧菜，那时是厚

中带糯，辣中有甜，特别美味。

炒辣椒是最常见的吃法，最理想的是辣椒炒肉片和辣椒烧小鱼。

村民还有一种特别的吃辣椒法，叫作“礅辣子”。把青辣椒或者红辣椒放在饭甑里蒸熟，取出后放入齿钵中，用杵把辣椒礅烂，洒上一点盐就行了。我对这道菜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好吃。

辣椒还是去除腥膻味的好材料。里陂上的村民在烹制荤腥和野味的时候，如果想要去除异味，一定是用辣椒，他们民没有用料酒和生姜来去除腥膻的习惯。多年后我到了美国，在广东人开的中餐馆里打工，发现这些从广东台山来的人十分讲究新鲜的食材，很少使用料酒。最近我整理自己烹饪过的二百来种家常菜时，为了简单便捷，也绝少提及料酒。

不过吃辣椒也有副作用，吃的时候嘴里辣，大便的时候肛门辣，同村的知青冯金生老是说自己“屁股感冒了”。村民的说法则比较含蓄，叫作“辣子冇补，两头受苦。”

里陂上的茄子和上海的茄子不一样，是椭圆形的（有点像电脑上用的鼠标器），分成紫色和白色两种。

村民把茄子切成二分厚的片，放在锅里两面煎软以后，加入葱花和盐，你想试试这种吃法吗？我至今在美国烧茄子的首选烧法，还是我从里陂上村民那里学来的法子。

蕹菜和芹菜

春天栽种蕹菜以后，不久就可以采摘食用了，可以清炒，也可以做汤。如果把蕹菜的茎和叶分开做菜，特别是用蕹菜的茎梗和辣椒作为食料，入锅快炒以后上桌，那香脆鲜辣的味道十分可口。

我们种的蕹菜分两种：子蕹和藤蕹。

子蕹是直立生长，会分蘖，叶子的绿色浅一些，茎梗的颜色有点发白，吃起来更嫩一些。

藤蕹爬在地上，长得比较快，产量高，叶子的绿色深一些，茎梗的颜色有点发紫，吃口稍微差一点。

我们的自留地改造好以后，肥力很足，只要及时浇水，蔬菜就能长得很好。吃不完的蔬菜就成了猪的饲料。

即便是寒冬腊月的天气，里陂上的村民每隔一两天，还是会提着尿桶，去给自留地里种的芹菜上一点稀释了的尿肥。他们说：“芹菜，勤菜，芹菜就是勤菜，就是要勤劳才能种出芹菜。”古书上，芹菜是俗名，蕲菜是其正名。

等到春天的南风一吹，芹菜嗖嗖地往上抽。如果有一碗香气扑鼻的芹菜炒肉片放在你面前，你若不是连连咽口水，那才奇怪呢。

菠菜和猪婆菜

菠菜籽躲在一层厚厚的壳里面，很不容易发芽。不光是我们知青种不好菠菜，里陂上的村民也种不好这种据说是从波斯那边传过来的绿色蔬菜。后来我从一本书上看到，菠菜籽先要放在水里浸几天，播种以后要把土压平压实。我照着做了，果然菠菜的发芽率提高了不少，许多村民来问我讨要菠菜的秧回去栽种。

我栽种的菠菜长大了，只要摘两棵回来，就能炒出一碗鲜嫩的菠菜。

大约是1976年左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种蔬菜，叶子很像菠菜，颜色浅一些，却比菠菜高大许多。里陂上的村民说，这是“猪婆菜”，是用来喂猪的，不过人也可以吃，味道比较淡，有一点点发涩。

有一天，我在里陂上炒“猪婆菜”的时候，手里一边炒菜，嘴里一边念叨：“猪婆，猪婆……巨菠……”我脑中突然闪过两个字：巨菠。好像哪本书里写到过这种菜。再者，里陂上村民的“猪”字，就是发“巨”的音么，“猪婆”菜应该是“巨菠”菜才合理一些。

到美国以后，有一次，我们中文学校的老师送给我一袋蔬菜，她说：“这是我自己种的老母猪菜，吃不完，给你尝尝。”我打开口袋一看，原来就是猪婆菜，或者是我自行定义的巨菠菜。

不管怎么说，这都不应该是中国原生的蔬菜啊。如果它是从欧洲，从西方传过来的，那么西方人是用它来喂猪吗？特别是用它来喂老母猪吗？我实在弄不明白。

瓠瓜和苦瓜

村民把瓠瓜叫作“瓠仔”，属于葫芦的一种，我们上海知青看到“瓠仔”的第一眼，几乎每个人都会说：“这不是上海的‘夜开花’么？夏天常吃的。”我不知道上海的‘夜开花’是不是真的是在夜里开花，但里陂上村的瓠瓜一定是在白天开花。我看见蚂蚁在它白色的花瓣和黄色的花蕊上爬来爬去，野生的蜜蜂时不时地飞过来吸食花蜜，它们是顺带着给瓠瓜传授花粉。



瓠瓜

“苦瓜”顾名思义，在我有限的知识范畴里，应该是可食的瓜类中间，苦味最浓的。苦瓜虽然苦，但当它与其他菜放在一起炒时，不会影响其他菜自身的味道。苦瓜“只苦自己，不苦别人”，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君子菜”。我在村民张寿仁家里，生平第一次吃苦瓜时，摇着头，勉强咽了下去，后来就是寿仁略带夸张的说法：“老夏第一回吃苦瓜，摇头不想吃，第二回吃苦瓜，点头拼命吃。”

书上说，我们中国人常吃的扁豆、茄子、丝瓜、瓠瓜和苦瓜，都是很久以前从印度传过来的。我们真应该感谢印度人，让我们有了这几样家常蔬菜，就像应该感谢他们发明了制造白糖的技术一样，让全世界的人能够吃到白糖。

黄芽白（黄芽菜）和包心白（卷心菜）

上海人在秋冬季节经常食用的黄芽菜和卷心菜，到了里陂上村，村民却叫作“黄芽白”和“包心白”。这两种菜，我们知青和里陂上的村民都试着种过，但是只会长出绿油油的菜叶，菜心却不会包起来，最后只能用来喂猪。

然而沿陂镇附近的菜农有特殊的栽培技术，能够种好这两种菜，他们在过年前后挑到墟集上来卖，价格十分昂贵。

距离沿陂镇墟集不远的路旁有个水塘，卖菜的人事先把放着各种蔬菜的箩筐一律浸泡在水里。墟集快开始了，他们从水里拉出箩筐。蔬菜喝饱了水，可以多卖一些钱。

里陂上村民在过年的时候，会到沿陂镇的墟集上去购买黄芽白和包心白，奇怪的是他们明明知道菜里面有很多水，却最多是私下里埋怨几句，并不会当面揭穿菜农搞的名堂，和他们发生争吵。我想，村民或许觉得，过年请客的时候有这两种珍稀的菜肴，可以增色不少，况且一年才买一次，所以不值得去计较了。再者村民和卖菜的人或多或少有些相识，乡亲么，过年期间应该图个吉利，吵嘴就没意思了。

番瓜（南瓜）

南瓜的原产地是南美洲，里陂上村民称作番瓜。番瓜不难种，经常有很好的收成。但是据说吃多了番瓜以后会“烂脚”，小腿容易发生溃疡，所以村民种的番瓜常常用来喂猪。

马立平说，她当年以民工的身份去修建铁路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以南瓜当菜，吃得腻透了。更可恨的是那些南瓜放在拖拉机上经过长途运输，不知道为什么，时常会被柴油污染。这种南瓜吃在嘴里有一股柴油的苦味，实在难以下咽。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不喜欢吃南瓜。到了里陂上村，我除了种些南瓜来喂猪，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江西的省委书记程世清来鹿冈公社时，吃青番瓜（青嫩小南瓜）的轶事。

那是 1970 年初夏的一天，江西省的最高领导、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将军坐着吉普车，突然来到了鹿冈公社。

据说程世清很愿意深入基层，为了能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他下决心要跑遍全省所有的公社。江西省有 80 个县，以每个县有 20 个公社来计算，有 1600 个公社。如果程将军“走马观花”，平均每天走两个公社，也得花费 800 天时间呢。

当程世清突然来到鹿冈公社的时候，多数公社干部还在各自“蹲点”工作的生产队里，公社只能通过电话找到他们，说是程世清“程政委”来了，把他们紧急召回到公社来。

那时有个年轻干部刚来鹿冈不久，他很聪明。程世清看

着他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赤脚上还沾着泥巴，便询问情况。他汇报说，自己正在田里栽晚稻，听说程政委来了，脚也来不及洗就跑来了。

然而有鹿冈村民后来告诉我，程世清来的那天上午，他看见这干部从前村大队的方向，一路小跑赶到鹿冈，在距离公社办公楼不远的地方，脱下布鞋放在一边，卷起裤脚，下到水田里踩了几下，然后离开水田，急匆匆地到公社去了。

程世清十分赞赏这个干部的工作。不久以后，他从一个鹿冈的“股级”干部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了“副处级”干部，调去吉安工作了。党中央一贯要求各级干部到群众中去，提倡艰苦奋斗。而基层的干部却会投其所好，如此取巧。

程世清要在鹿冈公社吃午饭了，他的要求很简单，炒一盆他喜好的没有成熟的青番瓜（青嫩小南瓜）就行。



熟番瓜（大南瓜）



青番瓜（小南瓜）

鹿冈人从来没有食用青番瓜的习俗，公社食堂里那唯一的炊事员犯愁了。到哪里去找青嫩的小南瓜？又该怎么烧呢？炊事员向几个鹿冈的村民买青番瓜，村民都说：“那东西怎么能吃？不卖。”他急了，径直跑到村民的菜地里，摘了几个青番瓜，花较高的价钱买了回来。

后来有一段时间里，只要说起程世清，鹿冈的村民就会说：“哦，是那个要吃青番瓜的人么。”

我在里陂上村的十年里，程世清是唯一在鹿冈吃过一餐饭的江西省最高领导。我再未听说有别的省级领导人在鹿冈

停留过。

第二年春天，鹿冈公社武装部的肖部长到南昌开会，硬是想办法找到了程世清，向他汇报鹿冈的工作。据说程世清有点忘记鹿冈了。不知道肖部长是否提到他在鹿冈食用青西瓜的事，最终程世清还是答应了肖部长的请求，鹿冈公社得以购买到了一台十分紧俏的“丰收-27”型拖拉机。

程世清后来因为“林彪事件”而突然下台。我很想知道他下台以前，最终是否跑遍了江西省的每一个公社。到了各个公社里，他又是否经常要求食用他十分喜爱的青西瓜。

三、锄草靠手腕

里陂上的村民说：“读书就怕考，种田就怕草。”读书的时候最怕考试，种田的时候最怕田里长杂草，杂草老也除不尽。

种菜的过程中，也一定会要锄草。从某种程度来说，种菜的过程就是和杂草作斗争的过程。

刚开始学习用镢头锄草的时候，我们完全不得要领，光是简单地用双手握住镢头把，用手臂和腰部的力量去推拉拍打，结果往往是杂草没有除掉，倒把菜苗弄死了。亲眼看着我们辛辛苦苦种大的菜苗被自己锄倒在地上，在烈日的暴晒下渐渐变色，渐渐缩小，心里真是痛极了。

俗话说熟能生巧。时间长了我们就知道，用镢头来锄草松土，靠的主要是手腕上的功夫。到后来，我几乎不用思索，手中的镢头到了菜苗的边上就会自动停住，自动转弯，差距仅在分厘之间。这完全要靠自己手腕上的细微动作来掌握。

我的镢头在土下一过，杂草倒了，土也松了。土会往身边移动一点，我用镢头的镢板在土上轻轻一推，土回到了原处。锄草的功夫到不到家，就看这一点。

太阳一晒，杂草死了，它们再也不能和蔬菜争夺阳光和养料了。

太阳一晒，蓬松的土释放出更多的养份。蔬菜的根部透

气以后，可以更快地吸收营养了。

有时候我真是觉得，我的肉眼能看得出来，那些蔬菜正在摇头晃脑，滋滋地往上生长。



2014年，作者在锄草。

四、自留地里的水稻

里陂上村的上海知青一个一个离开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可是村里并没有把分给我们知青的自留地收回去，这使得我一个人和我养的一头猪就有将近一亩的自留地。

村里不是不想收回我们的自留地，而是不太好意思收。毕竟他们这些年来，亲眼见证了我们投入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把两块薄田改造成了肥沃的园土。

我在多余的自留地里能种些什么呢？如果要最省精力最省时间的话，只有栽种水稻。

村里没有人在自留地里种水稻，却也没有明文规定不许种。水稻是粮食作物，国家不是提倡多种粮食么？

于是我把多余的自留地灌上水，又耙又耖，摘了村里剩余的秧苗，一共花了两天的时间，在自留地里种上了水稻。

自留地的肥力很足，水稻的长势比紧挨着的大田好很多。没过多久，水稻开始扬花、吐穗、灌浆，就要开镰收割了。

收割是件喜事，我叫鹿冈知青综合场的陆禹平来帮我收割水稻。请陆禹平来割稻只是一个名义，要不然他不会放下

手上的工作，请假来帮我。我更在意的是有个朋友一起来聚一下。我买了牡丹牌香烟，烧好了红烧肉，温好了水酒。

陆禹平来了，我们先是喝酒吃肉抽烟，然后下地割稻，不到三个小时就割完了。我们再回来，继续吃喝聊天。他当天晚上回鹿冈了。第二天，我到自留地里脱粒，收获了好几担稻谷。

自留地收获的稻谷晒干以后，我卖了几百斤议价粮给国家的鹿冈粮站，十一元七角一百斤。粮站的站长表扬我，说我觉悟高，能把余粮卖给国家，而不是去黑市上卖高价。我心里想，里陂上村民看见我多赚了这些钱，想法可是不一样呢，他们只是嘴上不说罢了。

第二年，我主动把一块大的自留地交还给了村里，只留下了一块小的自留地。

村里在我交还的自留地里种水稻，头两年的收成很好。后来土地的肥力耗尽，自留地又回复成了一般的水田。



当年种水稻的自留地，如今依然种水稻。

几十年过去了，我回国和陆禹平相聚的时候，他有时会笑嘻嘻地提到当年来里陂上帮我割稻的事：“你当年可是一个地主，雇用我来帮你割稻，你剥削了我的劳动。”

我也笑着说：“啊，那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只想着和你一起喝酒吃肉，没想到几十年后有人会秋后算帐。你说个数吧，我努力赔偿你。”

禹平啊，我们是“往年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0. 养猪、杀猪和杀猪宴

1972年春天，我们里陂上村的知青在公社和大队不断的压力之下，从各户村民家里撤出来，恢复了集体户，各人的自留地也重新归拢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在农村已经三年，学会了砍柴、烧饭和种菜，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再也不用盐水和酱油汤来下饭了。我们如果还想要吃肉和鸡蛋，唯一的办法是和村民一样，自己养猪养鸡。在里陂上村，养猪称作供猪。供养供养，供和养差不多吧。

十分辛苦地把猪养大了，我们要想办法杀猪吃肉。杀猪是大事，也是喜事，村民杀猪的那天，照例要举办杀猪宴，我们知青杀猪时当然如法炮制。以下先说养猪。

一、养猪

1972年我们知青重新集中开伙以后，很快就到沿陂镇的墟集上，花三十多元钱买了一只二十多斤的小黑猪。按照正式的说法，小猪应该说“一头”而不是“一只”。可是在里陂上村的语法里，量词比较简单，不光是猪和牛，连人也可以是一只一只的。

我们买了小黑猪的第二天，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告诉我们说，他昨天晚上一直听见我们的小黑猪呼哧呼哧的，这是一只气喘猪，一定养不大，恐怕很快就会死掉，应该赶快退给卖主，卖主一定是欺负你们上海佬不懂如何买猪，才把这毛干肉瘦的病猪卖给你们。



小猪，村民俗称“奶猪”。

沿陂镇的墟集五天一次，我们根本不知道猪的卖主姓甚名谁，看来这个亏我们是吃定了，且将就着供养这小猪吧。虽然我们自留地里的菜还没有长起来，可是好在我们人多，小黑猪只要吃米糠和我们蒸饭时多余的米汤就足够了。

不到一个月，周恩绍看着小黑猪，笑眯眯地说，奇怪，这猪居然不喘了，还长得油光光的。兴许是你们这一户知青人家的九个人有八个姓，八个不同的火焰加起来，你们的火焰实在太高，连这黑猪的灾病也压下去了。

我连忙问火焰是怎么回事。原来，每个人的头顶上方都有一定数量的看不见的火焰，同时每个人身上都有煞气。（我心里想，好像什么书上说过，每个人都有气场啊。）如果一个人的火焰高，煞气大，别人就不敢惹他，连灾病都不会轻易上身。

在老周看来，是我们的火焰保住了小黑猪，治好了它的气喘病，而不是我们的小黑猪每天吃精饲料，因而提高了抵抗力的缘故。

到了秋天，我们的小黑猪身体滚圆，再也不长了。两个月之内我们称了它好几回，都是 120 斤。后来看了养猪的书，才知道小猪在长身体发育的时期，有一个名词叫作“架子期”，主要是让猪长身架，不能让猪多长膘，因此不能给猪多喂精饲料。

按照永丰县的规定，全县各村的每户人家在一年之中，养大出栏的第一只猪，必须以每斤毛重 0.54 元的价格，卖给国家，由各地的供销社负责收购。

一个农民去卖猪了，他把一只吃了 30 斤猪食，撑得极饱的猪送到供销社的收购站过磅，有 222 斤。收购员高声说：“除去猪食 20 斤，按毛重 202 斤结帐……”若是正在此时，这只不争气的猪拉屎了，收购员马上就改口了：“除去猪屎 2 斤，按 200 斤结帐，票子 108 块，外加 30 斤肉票。”几秒钟之内少了 1.08 元，卖猪的农民一脸的沮丧，皱着眉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它晚一点屎也好么，唉……”，

卖猪以后，卖猪的农民可以在收购站杀猪的日子，凭着 30 斤肉票，按照国家 0.80 元一斤的价格去买肉。

可是单凭一户人家的力量，绝大多数人家每年只能养大一只猪，按照规定卖给国家以后，自己却不能按照传统的习

俗杀猪过年了。于是有人想出办法来，在一年的年初卖掉一只猪，达到了国家的规定。待到这年的年底，家里又有一只猪长大了，就去大队申请杀猪过年。至于第二年养大的猪，则拖到第三年的年初再卖。

因为农民这么调皮，钻了政策的空子，使得公社没有完成国家的生猪收购计划。受了上级批评以后，公社就要求各个大队加强管理，加大生猪收购工作的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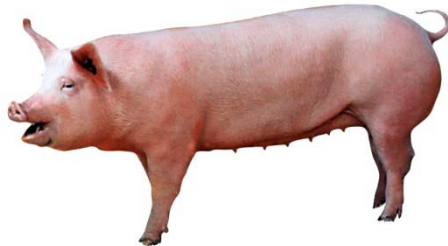
每逢这种时候，我们先锋大队的领导经常是装聋作哑，含糊其辞，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大队领导心里很清楚，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如果真正按照上面的规定，向农民每家每年收购一只猪，那么农民的传统习俗“杀猪过年”，一般来说就不可能了。

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农民提供的猪肉不仅供应给城里人吃，还大量出口，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的一部分，换回了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器材，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很惭愧，我们里陂上的知青没有卖猪给国家。从供养第一只黑猪开始，我们差不多一年左右，就会养大一只猪，然后请大队批准我们杀猪吃肉，搞了一点特权。

几年过去了，里陂上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少，养猪比以前困难多了。可是为了吃肉，我们还是要养猪。

我在里陂上村的最后一年，只剩我一个知青了。可我独自一人，依然养着一只洋白猪。



洋猪长得快，但肉的品质比土猪差一点，没那么香。

我现在还能想起来，那只洋白猪饿得在猪栏里哼哼着到处乱拱，乱啃猪食槽的样子。管它呢，现在是猪的“架子期”，

只要饿不死，就会长身架。直到出栏宰杀前二个月的催肥期，我那可怜的洋白猪才享受了大量的南瓜、红薯、薯苗和各种蔬菜，加上米糠，甚至还有米饭。洋白猪最后空腹一称，有178斤。

村里的俗话说：“养女算不得饭钱，供猪算不得糠钱。”买一只小猪要花去二三十元人民币，等猪长大还要八到十个月甚至更久，期间花费的糠钱和其他猪食的费用远远超出卖猪所得到的钱，更不用说花去的时间和精力了。

为什么要养猪？对我来说，为的是能吃肉。有肉吃是口福，口福是人生的大幸福之一。幸福常常用钱买不到，也常常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换来。

对村民来说，养猪除了可以吃肉以外，他们卖了猪，手里多少能有一点活钱可以使用。再者，家里的米糠饭汤、薯藤菜叶、厨房的下脚料（包括泅锅水），都有了去处，成了猪食。要是有个猪栏，猪粪还可以肥田。

二、杀猪

那只小黑猪长大了，我们知青虽然没有卖过猪给国家，可是眼看着长得滚圆的黑猪，又实在想吃肉，怎么办呢？还好先锋大队的领导照顾我们，同意我们杀猪。我们请村里的张发茂来帮忙杀猪，杀猪人的所得是二斤最好的猪肉。

滚圆的黑猪刚刚杀好，我们分别割了几斤肉，送给经常帮助我们的村民周恩绍、张发茂和张寿仁，以表示感谢，可是他们坚辞不受。几番推让以后，最后我们只好说，就算是向我们借肉吃，等他们以后杀猪的时候还肉给我们就行。他们这才答应收下了。

村民要杀猪，多数是在秋收以后到春节以前，一方面是因为农闲，另一方面是在天冷时杀猪，猪肉不容易腐坏。若是经过晾晒烟熏，把新鲜猪肉做成腊肉，甚至可以坚持到第二年春夏之交还能有肉吃。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后把猪供养大了，能在夏天杀猪

的话，把肉借给各家村民，到了秋冬时分，村民杀猪的时候，我们再把赊出去的肉账要回来，那我们就差不多全年都有肉吃了，岂不是很好？

于是我们第二次杀猪的日子，特意选在了7月初的开镰收割早稻以前，那是夏天双抢大忙以前最后一刻的闲暇。我们早早通知了里陂上村的各户人家，请到我们杀猪的现场来借肉。果然，村里凡是计划在当年秋冬时节要杀猪的人家，都高高兴兴地来借了肉。可是到最后，仍然剩下了好几十斤肉，这些肉过两天就要腐坏了，得赶快腌成咸肉才行。

我这才想起来在上海的时候，母亲也总是要等到秋凉以后才开始腌咸肉，“夏天杀猪”还是没有考虑周全。现在天气这么热，该怎么办才好呢？

最后，我买了一个类似江浙一带的酒坛，把肉腌在里面。一般是按照一斤肉一两盐的比例来腌肉，我考虑到现在是夏天，增加到一斤肉放一两半盐。我又在厨房里最阴凉的角落挖了一个二尺来深的坑，把腌了咸肉的坛子放进去埋好，以求模仿秋凉时节的气温，降低腌肉的温度。整个坛子只有坛口露出地面，我在坛口上用塑料膜扎紧封住，意在防止苍蝇进去下蛆。此法居然很成功。

村民听说了，感到不可思议，纷纷到我的厨房里来查看。这一坛又鲜又香的咸肉，我们一直吃到冬天。

到后来，每年的秋冬时分，村民杀猪了，我们照例兴致勃勃地前去赊得肉来，享用一番，等到我们夏天杀猪时，再用自己的猪肉去还肉账。如此一来，我在喂猪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想到，可怜的猪啊，你还活着，可是你的一条腿，已经抵作肉账，被我们提前吃掉了。

凡是我们的杀猪，都是请村民张发茂来主刀，经常是我做助手。

但是我在里陂上最后一次杀洋白猪，是我主刀。

村谚说：“牵牛要用绳，杀猪要用凳。”杀猪时，一定要用那种能坐两个人的长条凳。

杀猪开始了。我的助手奋力提起猪的尾巴，使猪的后腿离地，让它用不出力。我一手抓按住猪耳朵的根部，另一手抄住一只猪前脚，用力提起，将猪身与准备好的条凳垂直，搁在条凳上，再用麻绳把猪嘴捆住。

我操起磨快的杀猪尖刀，从猪锁骨处一刀捅进去，直中心脏。猪抽搐几下，几秒钟就不动了。用这种“直击心脏法”杀猪，来对比最现代化屠宰厂的电击法杀猪，可以说是不相上下，我的猪并不更痛苦。

拔出刀来，猪血汨汨地流到放了适量水的木盆里。轻轻地搅拌以后，约十分钟，猪血凝固了，放入滚水一氽，可以做出美味的猪血，村民称作猪旺。猪旺炖豆腐是里陂上村的美味之一。

即便是现在，猪血也是四川名菜“毛血旺”的主料。我多次品尝过毛血旺，里面的猪旺绝对没有我做的猪旺那么又滑嫩又有弹性，那么香鲜可口。

放血以后的猪放入大木盆，用水桶盛了滚水倒入大盆，烫刮干净猪毛。接着把猪吊起，破肚以后，先取出猪的内脏，准备在晚上的杀猪宴上使用。再从猪的脊椎中间劈开，把猪劈成两半，放在案桌上，进行猪肉分类。

里陂上村民把猪肉分成比较简单的猪头、猪腰肪、猪腿和内脏四类。其中猪腰部分带了肋骨的“硬腰肪”（上海的肋条肉）是村民公认的最好吃的部分，其次是猪前腿上的“前夹精”肉（上海的前腿夹心肉）。至于后腿臀部上的精肉，是村民煎煮某些中药时，必须要用的药引子。

上海的猪肉分类要细一些。猪头再分出来猪耳朵和猪舌头单独做菜。猪腰部分更是把肋条肉、大排骨、小排骨、里脊肉分开来卖。猪腿部分有腿肉、蹄膀、脚圈、猪脚（上海人称猪脚为脚爪，里陂上村民称脚趾甲为脚爪。他们开始时大惑不解，为什么上海佬要吃猪的脚趾甲。）上海人对猪的内脏分得更细。猪心、猪肝、猪腰子、猪肚、大肠和小肠都可以分别购买，做出各种不同口味的美味佳肴。

三、杀猪宴

每逢我们知青杀猪的当天晚上，会邀请里陂上村的每户人家派一个人作为代表，来参加我们的杀猪宴。

我在杀猪那天清晨 4 点多钟起床，用石磨来磨碎浸了一夜的黄豆，开始做豆腐。到早上 8 点来钟，一板热腾腾的豆腐做好了。

上午九点左右动手杀猪，一直要忙到中午十二点以后才算弄完。

下午从自留地摘来各种蔬菜，把菜洗干净，切好备用。接着马上开始烹调那些需要煮得久的肉料，同时赶紧按照拟定的晚宴菜单来备料。

当然，不能忘了烫好自己酿造的米酒，准备给客人享用。

香烟也是必须的。平时农民抽纸烟时，一般是买 0.17 元一包的香叶牌纸烟。我会设法买到 0.37 元一包的前门牌香烟来请客。

还得去各家借桌子和凳子、碗盏和油灯。四张方桌摆放在厅堂里，有那么一点点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百鸡宴”的味道，很气派。

天黑以后，各家的代表陆续来到，他们兴高采烈，脸上满是由衷的笑容，伸出双手接过我递上去的烟。

邀请的客人一到齐，我一声招呼，大家没有一句废话，马上开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开始是猪旺炖豆腐，接着上的是炖烂的猪头肉和猪肠，都是村民家里杀猪宴上的常见菜。

村民半饱以后，他们平时吃不到的、期待已久的“里陂上老夏的上海菜”开始上桌了。

油煎的猪大排，又嫩又香。

“哇……这是用猪腰肪上的‘斧头脑’割出来单独做的吧？叫什么？”村民问。

“香煎大排”，我说。村民摇摇头，没听懂“大排”是

什么意思。

接着上桌的是各种炒菜，有蕹菜梗炒腰花、黄瓜炒猪肝、辣椒炒猪心猪舌、四季葱炒里脊肉，等等。

记得有一年杀猪的前一天，洋坳大队的知青夏元麟正好到里陂上来。他知道我们要杀猪，连忙去公社的干部那里借了自行车。他第二天一早骑车去永丰县城，买了各种蔬菜，下午赶回里陂上村，让我做各种炒菜。

如果炒菜的颜色过深，我会加进白色的豆腐片。

有一次，我在炒的菜里加上了黄色的蒸鸡蛋的切片。但是在昏暗摇曳的橙黄色油灯下，蒸鸡蛋的切片呈现出来的是白色，理所当然成了豆腐片，村民们根本不相信那是鸡蛋做的。这个错误我只犯过一次，以后再也不做蒸鸡蛋了。

客人有四桌，而我只有一只猪的内脏，于是我特别说明，只能加上各种蔬菜搭配着炒，才够大家吃，因此对村民表示歉意。

里陂上的村民从未见过真的肉圆。他们在娶亲嫁女或者在重大节日的宴会上，有时会上一道名菜“肉圆”，其实只是用红薯粉做成“肉圆”，再放在肉汤里煮一下，是徒有其名的“名”菜。有一位老者在国民党时代做过里陂上村的“甲长（村长）”，算是见多识广一些，他也只是听说某一个大财主的酒席上有真的肉圆。



红薯粉做的“肉圆”

待到我做的肉圆上桌，大家见到了传说中的真肉圆，顿时骚动起来：“哪……是真的肉圆！”这时候他们大都已经吃饱了，我还是怕他们争抢，大声喊着提醒大家：“肉圆每人两个到三个，后面还有熬肉。”

到村民家里吃酒席，最高级的肉菜是“熬肉”。桌上那一大碗二寸见方的肉块并没有煮烂，并不十分可口。没有煮烂的肉的体积比较大，显得十分“有料”，八九块就能装成堆尖的一大碗。主人端出熬肉，既表示出自家的体面，又表

示出对客人的尊敬。客人也都十分默契，在发出惊喜和赞叹之后，一般不会随便动筷子去吃，这使得熬肉经常成为一大碗只看不吃的菜。即使有人不懂潜规则，开始吃熬肉（就像我们刚下乡时那样），一桌八个人，一大碗熬肉每人一块，也够吃，只是主人心里常常会有一点点心痛。

我的压轴大菜是红烧肉，用里陂上村民一般的说法，是“老夏的熬肉”。

做红烧肉必须要用到白糖和酱油。

杀猪之前，我先到鹿冈商店设法“走后门”买到了白糖。鹿冈商店自行酿制的酱油味道很差，我必须用上海带来的固体酱油，这样才能请村民吃比较地道的红烧肉。

“大家放开肚来，尽管吃。”我一边端上红烧肉，一边笑着大声说。其实我知道大家已经吃得很饱了。

“好吃，真好吃。”

“我已经撑足了，不过还可以再吃一块。”

“老夏，你开头就应该让我们吃熬肉，等我们吃足了才端出来，老夏你真是奸猾。”桌上一片嚷嚷声。

我说：“要是开头就给你们吃熬肉，我这只猪身上的肉全部烧成熬肉都不够你们吃的。我明天还吃什么？我只能吃猪头了。所以这道菜只能在最后上桌！”

整个厅堂里一片笑声。

参加杀猪宴的村民代表回家以后，在几天里，里陂上全村都会议论纷纷，特别是那真的肉圆和“老夏的熬肉”。这些消息口口相传，渐渐散开到外村去。

杀猪宴过后的第二天，照例会有几个村民在队里出工的时候告诉我，他们吃多了肉，回到家里不久，就开始拉肚子，“像射箭一样泻出来”。他们说话时脸上的表情既带有几分满足，又含着些许遗憾和可惜。

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们很久没有如此痛快淋漓地大口啖肉了，肠胃一时间有些不适应，就急急忙忙地排泄出来，真是可惜了。

杀猪宴上，我只邀请里陂上的村民，别人一概不请。可是常常有人不请自到，往往是杀猪宴刚开始，就闯了进来。他们是闻风而来的公社和大队的领导。

有一次适逢下雨，公社领导带头，领着几个人兴致勃勃地撑着伞来了。

他们一进门，村民们立刻恭敬地让座，让上座，马上拿碗斟酒。座位不够了，村民们自觉地移动自己的碗盏，三个人挤着坐一条长凳。看来，尊卑有序是里陂上村民的传统。

我从厨房出来，领导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也点一下头，微笑着说：“来了，来了。”表示出应有的尊敬。我那时有点心高气傲，心想着我没有请你们，你们却来了。因此，虽然我脸上对领导循着一个“敬”字，嘴里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欢迎欢迎”这类的话来。

公社武装部的姜部长曾经在里陂上村蹲点工作过，和我比较熟悉。有一次我办杀猪宴，那天他不在鹿冈，没有到里陂上来。过了几天的一个中午，我收工回来，我的床上居然躺着一个人，却是姜部长。他跳起来说：“小夏，我在等你回来。快，喝酒吃肉。”

原来，这天上午姜部长到了里陂上我的住处，在厨房里四处搜索，居然找到了我前几天刚腌好的肉。他摸出一大块，到我们的自留地里摘了辣椒，做成了白切肉。他又找到了我的酒。现在，白切肉和酒正在铁锅里温着呢。

这是我第一次吃白切肉。酒足肉饱之后，姜部长拎着我另外送给他的一块肉，高兴地走了。

至此，杀猪宴算是正式结束了。

21. 酿酒

在里陂上村，最流行的饮料是稀释的糯米酒，村民一般称作水酒。

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带着一身臭汗和疲乏酸软的身子从田里回来，用井水绞一把毛巾洗洗脸，擦擦身，从酒钵里舀一碗清凉的水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又解渴又提神，是多么的惬意。

到了寒冷的冬天，我们缩头缩脑地从自留地里种菜回来，先到灶口边或者火塘边烤一会儿火，然后从滚烫的酒壶里斟一碗热酒，细细地流进喉咙，暖到胃里，热气散发到全身，混身舒坦。

毛主席好像说过，酒就是粮食。中国的绝大多数酒都是用粮食酿造出来的。

一、糯米酒

里陂上村每年有三十亩左右的水田用来种糯谷，一百斤糯谷可以碾出七十斤糙糯米。这种糙糯米主要的用途就是酿酒。

酿酒要有酒饼（酒药），卖酒饼的人串街走巷，经常会背着一包酒饼来村里兜售。花五毛钱买一包酒饼，可以做两到三次酒。



酒药

酿糯米酒并不难。

一般是在晚饭后，量出五斗糙糯米（各户人家的斗略有不同，一斗米约在五到六斤），浸泡在水里。第二天，糙糯米放入饭甑里蒸熟后，把饭甑搬到露天处，用木勺把一水桶的井水淋到蒸熟的糙糯米饭上。把酒饼揉碎了放在碗里备用。

糙糯米饭的温度降低以后，撒一些揉碎的酒饼在酒缸（村

民称作酒甕)底部，然后把糙糯米饭一层一层舀入酒缸，每一层上撒些酒饼。最后轻轻拍紧抹平，中间用手指挖一个两指宽的洞，撒上剩余的酒饼，把酒缸搬到厨房，盖上锅盖，成了，只等着三到五天以后出酒，美美地享受吧。



酒缸（酒甕）



锡酒壶

当然，三到五天以后酿出的这缸酒究竟是甜还是酸，是香浓还是水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酒饼的好坏、糯米饭的温度、井水的质量、甚至酿酒那几天的气温高低，都会影响到酒的质量。从某种程度来说，酒的好坏就全凭天意了。

感谢上天的眷顾，我在里陂上村酿了那么多次糯米酒，没有一次是发酸的。

稀释前的糯米酒的原液叫作“酒浮”，浓厚的琼液上漂浮着一些瘪瘪的棕黄色的糙糯米饭粒，就像棕黄色的蚂蚁一样。“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我的确有一只红泥小炉，那是冬日农闲时用来炖猪脚用的。可为什么是绿蚁呢？后来大约是在1977年，我看到了一本介绍格律诗的书，便猜想“绿蚁”可能是为了配“红泥”，也就是“仄仄”对“平平”，如果用“黄蚁”或者“棕蚁”就不工整了。不过这只是个人的猜想。若是在不同的地方，用了不同的原料，放了不同的酒药，说不定真能在酒的原液上面浮现出“绿蚁”的。

2002年的夏天，我的弟弟建原喝过我和薛志民从鹿冈带回上海的糯米酒原液，他至今谈起来还是啧啧称奇。

糯米酒原液的数量不多，大多数村民舍不得喝。他们把糯米酒的原液舀出一部分，放在酒钵中，兑上数倍的井水，

让它再发酵一天左右，过滤掉那些“黄蚁”似的酒糟，就成了可以吃的米酒。不过，这是生酒。生酒吃了可以泻火，但比较容易拉肚子。如果把生酒灌入大的锡酒壶，隔水放进滚水中煮上一个多小时，杀死了酒里面的所有细菌，便成了熟酒。村民请客时绝对不用生水酒，一定要用熟水酒。也许熟酒比较安全，客人吃了不容易拉肚子吧。对了，村民不说喝酒，也不说饮酒，而是和吃饭一样，直白地说“吃酒”。

糯米水酒的酒精含量虽然不高，吃多了也会醉人。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鹿冈的村民家里喝完酒回里陂上村，一路上两脚发软，走路就像是踩在厚厚的棉花上。一阵清爽的夜风吹过，我的身体轻飘飘的，就像天上的神仙。脚下仿佛不再是棉花，而是白云，头上的月亮又大又白，分外清亮。

记得是 1977 年春天的插秧季节，我正在田里一点一点往后退，一行又一行，唰唰地栽禾。突然听见有人在叫我，是永丰县乡办的张主任来了。“小夏，快要收工了，中午在你这里喝酒。”他说罢，便蹲在田塍上抽烟，看着我栽禾。

老张是山东人，南下的解放军转业干部，他知道我这里有酒。会喝酒的人不用什么下酒的菜，老张喝了两碗酒，说道：“小夏，你爱看书，又会鼓捣柴油机，应该搞一些发明出来。”

我摇摇头，说道：“我连初中都没有读完。”

老张鼓励我说：“军队里著名的马克沁重机枪和后来的阿卡-47 步枪，它们都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的自学成才的人发明的。”

老张说的也许是真的，但是我知道，发明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父亲在文化革命以前主持设计的自动化工业软水设备，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发明了，他星期天在家里还要加班，拉着从美国带回来的“计算尺”，进行繁复的计算。

我对老张说，设计没有那么容易。比如 1961 年上海重型机器厂自行设计的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报纸上说这台设备是一个电焊老师傅设计出来的。

可是据我父亲说，那个老师傅的电焊技术在上海可算是一绝，那庞大的机体就是他用多块厚钢板焊接起来的。他虽然参加了一些设计工作，但是总体设计师是一位资深的工程师。

那天我俩喝了很多糯米酒。老张借着酒兴，感慨地说起了有点敏感的政治话题：“小夏，我觉得毛主席在晚年犯了两个大错误，一个是错用了自己的老婆江青，还有一个是反周（恩来）。从历史来看，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人，好像最后都会失败。周总理既是绵里藏针，又能委曲求全，在党内、政府内、特别是军内的根基很深，在人民中的威望很高。”

队里出工的哨子响了，老张知道我要下田栽禾，他放下酒碗，匆匆告辞了。

二、谷烧酒

过了几年，开始有流动的酿酒师傅来村里，他们用一般的籼稻谷来酿制烧酒，每酿一百斤稻谷，收二十元钱人工费，能出四十斤烧酒。这并不便宜，村里没有几户人家愿意酿烧酒。村民心里有数，到鹿冈商店买红薯做的烧酒，才六角钱一斤。而自己请人酿谷烧酒，工钱加上稻谷成本和柴的成本，要合到七角五分一斤。

我很想知道酿烧酒是怎么回事，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钱不是问题。我决定酿五十斤稻谷试试。

来了一个酿酒师傅，他把五十斤没有脱壳的稻谷放进锅里煮熟，取出晾开，降低温度后用酒药拌匀，装进了他带来的特制箩筐里。酿酒师傅把箩筐封好，然后对我说：“不要动这两个箩筐，十五天以后我再来。”

十五天以后的一个早上，两个酿酒师傅带来了蒸馏烧酒的用具：一口又大又深的甑和一个特殊的铁皮汽盖。师傅把甑往我那放好了水的大铁锅上一放，把箩筐里发酵好的稻谷舀进甑里，盖上汽盖，就开始烧火蒸酒。

铁皮做的汽盖和甑一般大，盖在甑上很密封。汽盖上伸出一根倒 L 形的铁皮管，管子的下口正对着我的酒坛，蒸馏

出来的烧酒会流进酒坛里。

锅里的水还没有烧热，管子里已经有酒出来，酿酒师傅说：

“这是冷汽酒，浓度最高，你可以尝一点。”

我拿碗装了一点酒，尝了一小口，顿时觉得一股强大的暖流在我身上四处扩散，几秒钟之内，我的手指尖就开始发热。“怎么样？”酿酒师傅问。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厉害的酒，起码有 85 度。”我一边兴奋地回答，一边用土瓷碗装酒。

那天早饭没有什么下酒菜，我喝了这一碗烈酒。

村民的俗语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之刀。”可我这碗酒下肚以后，并没有穿肠而过，而是十多分钟以后，就返回到喉咙口喷薄而出，吐了一地，而身体也随之一阵轻松。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酒后呕吐。

这时候，以村民张贤通家的狗为首，几只狗推推搡搡，呜呜地争抢着我吐出的秽物。转瞬之间，厅堂里泥土的地面上已经是干干净净，这些狗真可以称作高级清洁师。

可是到了第二天，张贤通的母亲找到我，说：“老夏，我家的狗昨天吃了你吐的酒，到现在还有醒。”

我楞住了，最后只能说：“如果它真的死了，我加倍赔你，买一只狗四块，我赔你八块钱，就算是我买了你的狗。”今天看来，那多余的四块钱是赔偿给狗主人的精神损失费了。

以往，我们知青有时会买村民养的狗，杀了以后吃狗肉。现在这只狗如果真的死了，我想，醉死的狗，它身上的肉应该还是能吃的。

到第四天早上，张贤通的母亲告诉我，她家的狗今天早



蒸酒

上醒了。

稻谷酿的烧酒，味道虽然比红薯烧酒要好一些，没那么割喉咙，但是喝多了以后，还是和红薯烧酒一样会上头，使人头疼脑胀，很不舒服。我还是更喜欢喝用糯米酿的酒。

请酿酒师傅酿的那二十来斤谷烧酒，我喝了好久才喝完。

在中国，以酒的酿造方法来分类，糯米酒属于“过滤酒”，喝酒时要把酒糟过滤掉。直到今天，到超市里去购买黄酒的时候，某些瓶装的黄酒（糯米酒）放久了，在酒瓶的底部，还是会有沉淀物。各种烧酒（白酒）是“蒸馏酒”，由酒蒸汽上升以后冷凝而成，所以酒瓶底部不会有沉淀物。

三、鹿冈酒

到了美国以后，分外想念里陂上村的糯米酒，便在回国的时候，顺便从上海买些酒药捎带到美国来。这种酒药做出来的甜酒酿，太甜了，根本称不上是酒。过了几年，旧金山湾区中国人开办的超市渐渐多了，我们在超市里找到一种酒药，酿出来的糯米酒有点像了，但还是甜了一些，不是里陂上糯米酒的味道。

直到 2013 年的夏天，我们搭乘陆禹平开的轿车再次回到鹿冈。马立平到她插队的高坑村，在原来住过的老俵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她特地托人买了鹿冈的酒药，从高坑这个边远的小山村一路带到美国。

马立平在家里用两个同样大小的陶瓷闷烧锅，同时酿了两锅糯米酒，一锅用美国买到的酒药，另一锅用鹿冈买来的酒药。用鹿冈酒药酿酒，出酒量比较多。我们把用鹿冈酒药酿出来的生酒煮熟定型，成为熟酒，名字呢？姑且称作“鹿冈酒”好了。味道呢？当然是鹿冈和里陂上的糯米酒的味道，久违了。

凡家中有客人来小聚，郑重捧出鹿冈酒来，请客人品尝。他们从未饮过这种酒，无不惊呼同样的一个字“好！”

22. 做豆腐

豆腐是中国人的美味食品，全国各地豆腐制品的种类之多，堪比西方人琳琅满目的奶酪制品。

上海本地生产很多豆制品。菜场里有卖老豆腐、嫩豆腐、油豆腐、臭豆腐、厚百叶、薄百叶和素鸡，这些是用黄豆做的。粉丝是用绿豆做的。素面筋、油面筋和烤麸虽然归在菜场豆制品的行列里，它们其实是用面粉做的。

过去在上海买早点的时候，早点铺子里的豆制品通常有淡豆浆、甜豆浆和咸豆浆，现在多数店铺又增加了豆腐花。

此外，在上海还可以买到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包括各种豆腐制品。

但是里陂上村民做的豆腐制品只有三种：豆腐、泡豆腐、霉豆腐。泡豆腐和霉豆腐都是用豆腐做的，是豆腐的衍生产品。我们知青要吃豆腐么？当然要自己动手来做，每年在农闲的时候做上那么一二次。

一、做豆腐

做豆腐最费时间的是磨黄豆。先量一斗（约五到六斤）黄豆，浸泡一夜。

磨黄豆时，左手用小勺每次舀六到七粒黄豆，连水一起倒入石磨上面加料的眼中。右手均匀转动石磨，每两圈加一次黄豆。这个过程大约要三小时，做成一大木桶带渣的生豆浆。

接下来是过滤豆浆。大铁锅的上方吊好十字形的木制“摇架”，把一大块江西特产夏布做成的方形“摇巾”的四个角，分别扎在摇



2014年，作者当年用过的石磨。

22. 做豆腐

架的四个头上，然后用大木勺把大木桶里的生豆浆舀到摇巾里。一边舀，一边依次上下摇动摇架的四个头，雪白的豆浆便透过摇巾的不同部位流进锅里。留在摇巾里的豆渣是喂猪的上等饲料。



做豆腐用的木桶、箱架和盖板、摇架。

摇巾里的豆渣有数十斤重。有一次，摇巾没有扎牢在摇架上。摇巾里的豆渣越来越重，摇巾的一个角突然从摇架上崩落，豆渣瞬间掉进锅中。

我本能地想逃开，尽力一蹦，滚热的豆浆还是溅了我一身。豆浆过滤失败了，我只能在打扫擦拭干净以后，从头再来。



用摇巾来过滤豆浆

滤掉了渣的豆浆在锅里烧开后，舀进洗净的大木桶里。

我们另外舀一些滚烫的豆浆出来喝，马上发现比上海的豆浆味道更香醇。上海的豆浆喝到最后，碗底不时会有一层细细的豆粉似的渣，可能是过滤的不够细吧，口感没有那么好。

现在我们在美国，经常用豆浆机在家里做豆浆和豆腐花，口感总是不如在里陂上村做的那么好。我琢磨了一段时间，觉得是豆浆机提供的不锈钢滤网太粗，豆渣混进了豆浆里。于是我找来细一些的滤网。可是光靠豆浆机用的那么一点点的带渣豆浆的自重来过滤，压强太小，豆浆下不去。如果有母亲使用的绞馅袋，说不定能起作用，可是手头没有。我突然想到在里陂上做豆腐时过滤用的摇巾，何不拿块一般的棉布来试一试？马立平用这个办法一试，果然成功，从此我们可以享受极品的咸豆浆和豆腐花了。

当年在里陂上，有个别的村民学着我们，在做豆腐的时候试着喝一点豆浆，然后告诉我们，豆浆不好喝，比豆腐差远了。

我们给豆浆“点卤”用的是石膏。把石膏水缓慢倒入大木桶，一边倒一边用锅铲搅拌豆浆，看着豆浆一点点凝结起来了，我们也赶紧轻轻地舀一些出来，做成鲜美的豆腐花。

最后，在木制的豆腐箱架里铺上已经洗干净的摇巾，把豆腐花舀进箱架，然后拉起摇巾的四角覆盖好，加上豆腐箱架的盖板，再用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上扇压住。



豆腐箱架



用石磨压住豆腐箱架的盖板

豆腐箱架是个二尺见方，高约四寸的木盒子。在木盒里面的底部的横竖两个方向上，各自均匀地刻着七条凹槽，把底部分成了六十四个方格。每条凹槽的两端和木盒外面相通，

有穿过盒壁的流水通道，豆腐花里的水分在重物的压榨下，会沿着凹槽流出去。豆腐箱架的盖板比木盒的内尺寸略小一些，可以在木盒里上下自由移动。随着箱架里的豆腐越压越紧，盖板往下慢慢移动，最后做成的豆腐约有一寸半厚。

一个小时以后，豆腐做好了。移走石磨，拿出盖板，打开摇巾，露出了雪白的豆腐。再把盖板盖在豆腐上，用力把豆腐箱架和盖板一起翻转过来，然后小心地提起箱架，取走摇巾，原来的凹槽就凸显在豆腐上，成了凸棱。用刀沿着凸棱把豆腐割成六十四块，这一板热乎乎的豆腐就可以享用了。

比起上海用机器做的豆腐，我用传统手工做出来的这些豆腐，质地更细滑、更有弹性、黄豆的香味更浓，因而更加美味。

我每次回到永丰和鹿冈，只要是在饭店用餐，不管大店小馆，无论简陋与否，点菜时我一定会要一道豆腐。几十年过去了，那豆腐一点没变，还是当年的味道，鲜、香、细、滑，在别处绝对品尝不到。

在里陂上村，我做一次豆腐就有六十四块，不可能一下吃完，过几天就会发酸、发馊、腐坏，必须要做成泡豆腐和霉豆腐。泡豆腐大约一个星期才会坏，霉豆腐可以半年不坏。

二、泡豆腐

泡豆腐其实是上海的油豆腐。

把做好的一块豆腐再切成三十二个小方块，放进烧滚的油里余，豆腐块迅速膨胀，上浮到油面上。再翻动几下，等到豆腐块的表面色泽金黄，就捞出来。满满一竹篮胖鼓鼓的泡豆腐，在上海哪有这种光景？上海的豆制品是凭票供应，每人每十天可以购买六分钱的豆制品。嫩豆腐八分钱一块，你买六分钱，营业员就切四分之三块豆腐给你。

我们满心喜悦地抢着吃刚出锅的泡豆腐，烫得我们咧着嘴，一边拼命往下咽，一边滋滋地直吸气。

可是我们第一次做的泡豆腐很奇怪，它一边自然冷却，一边自然缩小，等到完全冷了，泡豆腐又回复到没有油余以前的大小，赶紧再尝一个，可惜已经没有刚泡出来那么香软可口了。

村民周恩绍过来看见了，告诉我们，这是石膏卤水放得太多的缘故。

卤水放得太少，就怕豆浆凝结不成豆腐。现在放多了，做泡豆腐又不成功。不过，再成功的泡豆腐放久了也会坏，我们这几天就赶紧吃这些不成功的泡豆腐吧，总比以前用盐水拌饭要好多了。

三、霉豆腐

霉豆腐非常像上海的白乳腐。

把一块豆腐也切成三十二个小方块，一排一排地码在竹篮里或者饭桌平时放菜的抽屉里，千万别让狗吃到。几天以后，豆腐长出了白毛和红色绿色灰色的霉斑，这时可以加工成霉豆腐了。

先把晒干的红辣椒炒脆了，碾成末，放在一只大碗里，加入较细的盐，拌匀。（从鹿冈商店买来的盐，据说是从福建省来的海盐，大的如蚕豆，小的如黄豆，最小的也有绿豆那么大。俗语说：“米不尽谷，盐不尽沙”，如果把盐放在碗里用水化开，碗底会有一层黑褐色的沙土。）

轻轻地拿一块发霉的豆腐在大碗里边蘸边翻，让豆腐的六面均匀地沾上盐和辣椒末以后，小心地放进一个小陶盎里面。豆腐块在陶盎里一层一层排放整齐，最后封住陶盎的口。



陶盎，直径约有八寸。

半个月后，陶瓮启封，香辣鲜美的霉豆腐做好了。

我有一次去鹿冈知青综合场的农业组去看望知青朋友陆禹平，手里一晃一晃地拎着的礼物，就是一小盎的霉豆腐。

我刚进屋，陆禹平就说：“你手里这圆圆的东西是什么？难道是电影《地雷战》里面，民兵挂在树上和门后用来炸日本鬼子的‘晃荡雷’？”

于是我和陆禹平之间，在一段时间里，见面的时候说到“晃荡雷”，那就是“霉豆腐”的代名词。

2010年我回永丰鹿冈和里陂上，在带回上海的礼物中，就有两盒共十瓶当地的特产——霉豆腐。这些霉豆腐统统冠以永丰县的历史名人欧阳修（永叔）的字号：《永叔公》牌的腐乳（霉豆腐）。

永丰县沙溪乡欧阳家族故居的西阳宫里，高大的石碑上，镌刻着欧阳修感念他母亲恩德的著名祭文《泃冈阡表》。欧阳文忠公生于四川绵阳，歿于安徽阜阳，他生前回老家时，吃过永丰的霉豆腐吗？不知道如今尚在永丰生活的欧阳家的后人，对《永叔公》牌的霉豆腐有何感想。



永叔公牌霉豆腐

23. 狗的回亿

我们住在斯坦福大学边上的小城里。家的旁边有一个不算小的公园，里面有一大片草地，我们经常会去公园里散步。公园里竖着醒目的牌子，提醒人们遛狗的时候，一定不能松开拴狗的绳带。可惜总有一些人不遵守规矩，放开了狗，任凭它们在草地上追逐、嬉戏。



美国加州小城的公园

有一次，我们正在散步，两只放开的狗突然大声吠着朝我们扑来。马立平惊得叫起来，我也觉得后脊梁发冷。狗的主人是一位白人妇女，她走过来说，这狗从来不咬人。是的，狗的确不会咬自己的主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它不咬别人。前些年在旧金山，有一只从不咬人的狗跟着主人出门，一张嘴就咬死了人。

我们和那狗的主人理论几句，没想到那人一点也不客气，丝毫不觉得理亏。

据说狗的祖先是狼，至少我们家的人本能上是怕狗的。我儿子达中，字子庸，他在年幼时，只要远远见到狗，就吓得直往我身上爬。子庸现在长大了，也还是和我一样，遇见了狗，内心总是有一丝紧张。而美国的狗不像里陂上村里的那些草狗，只要人一弯腰或者一下蹲，草狗就夹着尾巴慌忙走开，生怕我们在地上捡东西来砸它。美国的狗没有这种躲

避人的习惯，不知道害怕。这似乎有点像美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什么都不怕。

有一次，亲戚从纽约来，带了一只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宠物狗。我试着对它一弯腰一下蹲，它居然像里陂上村的草狗那样退缩了一下，我顿时感到十分亲切，非常惊喜。只是那宠物狗仅仅是混血，不是纯粹的草狗，所以后退的幅度没有草狗那么大，尾巴也不像草狗那样会夹起来。

看着亲戚的那只混血狗，我不由得想起了里陂上村的那些草狗，有关它们的种种情事，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脑海里。

一、打狗

刚到里陂上村，我们不知道要防范狗。我们在锅里或者桌上的食物一旦忘了藏好，就一定会到狗的肚子里去。有一次从田里回来，刚跨进门槛，一只狗就急匆匆地从我们身边溜出去，它还不忘斜着头也视我们一眼。

待到我们放下锄头一看，糟了，聪明的狗居然把我们食橱的搭扣打开了，橱门敞开，里面碗也翻了，瓶也倒了。再抬头一看，高高吊着的饭篮歪斜了，饭篮盖掉在灶台上，篮里的饭被狗吃光了。

我们又累又饿，心里十分沮丧。我们初来乍到，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还要被狗欺负。

我们商量好对策，决定要给狗一点教训，也好出一口胸中的闷气。

一天中午，我发现那只偷吃的狗在我们的灶台边转悠，急忙招呼了薛志民。他按照事先商定的计策，立刻拿起了扁担。我悄悄来到大门口，站在大门后面，把大门半掩上，还留着五六寸的门缝。



村里无名的草狗

薛志民出了房门，举着扁担一声

吆喝，那狗急忙夺路而逃，来到大门口，从门缝往外蹿。待得狗头刚出门，我把门使劲一推，狗的后半身卡在门里面，出不去了。志民赶上来，抡起扁担，对着狗屁股一阵乱打，打得那狗在门外嗷嗷地叫唤。不幸的是它吃不住痛，大小便失禁了，狗屎狗尿拉在了大门里面，味道很难闻。我赶紧松了手，那狗挣扎着出去，悻悻地哼着逃走了。

奇怪的是那狗记吃不记打，还老是来我们这里转悠。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进一步坚壁清野，把栅门关得更牢，饭篮吊得更高，让馋嘴的狗可望而不可即。

马立平说，她也参加过打狗。曾经有狗在晚上来偷吃知青的东西，知青生气了，便关起门来打狗。他们的方法是男女合作，立平和其他女知青站在饭桌上，用手电筒的光束照住了狗，男知青在移动的光束指引下，于黑暗中用扁担奋力追打，打得那狗“狼奔豕突”，自有另外一番打狗景象。

二、吃狗肉

住在我们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家里养了一只黑狗，却不怎么来我们这里偷吃东西。1969年的一天，恩绍突然问我们：“老崔，老夏，你们吃狗肉吗？我的狗卖给你们，两块五角钱。”村里几乎家家都养狗，却不怎么吃狗肉。

我们后来知道，恩绍家的狗去一户姓张的村民家里，偷吃了一点米。那村民特别排斥异姓的人家，骂了许多恶毒的话。性情正直刚烈的恩绍怎么受得了，他决定放弃自己家的狗，却又不忍心亲手打杀，才想到卖给我们。从那以后，恩绍家再也不养狗了。

我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沾肉食了。热心的村民教我们把狗肉切成块，加上大量红辣椒一起煮。煮了不久，狗肉的香味飘出来了。我们守在锅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停地咽口水。冯金生终于忍不住，揭开锅盖，夹了一块狗肉塞进嘴里。我们看他呲牙咧嘴咀嚼的样子，就知道肉还没有煮烂。这是我们第一次吃狗肉。

往后的日子里，我好几次向村民买狗吃。一只狗一下子吃不完，就把狗腿腌了，和腊肉一起熏。我哥哥建新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吃狗肉，就是我从江西带回上海去的“烟熏狗腿”。

到了冬天，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偶尔也会凑份子“打平伙”，每人出一份钱，买狗杀来吃。村民传说狗肉是热性的，冬天吃了狗肉以后，晚上就不用盖被子了。我试了几次，却还是一样要盖被子，可能是我的身体比较性寒吧。

也许是我比村民多吃了一点狗肉，村里的狗看见我，吠得比较多一些，一些老婆婆就说：“以后少打狗吃哟。”

三、被狗咬

有一次，我到村民张五喜家关照村里的工作，他家的狗就吠个不停。离开他家的时候，那母狗悄悄追到我身后，跳起来咬了我一口。五喜抱歉地说，实在对不住，这狗婆刚生了一窝小狗。



村里的狗婆。四只小狗正争着吃奶，另一只却在好奇地张望，探索新的世界。

这种时候的母狗为了保护小狗，警惕性很高，特别容易咬人。

我回去处理流血的伤口，从伤口的齿痕可以发现那狗很聪明，它是跳起来歪着脖子咬的，上下齿从水平方向横转了

90度，刚好和我的腿垂直，这样咬起来方便。

我被狗咬了，很担心会得狂犬病。我知道永丰没有狂犬病的疫苗，南昌好像也没有，要到上海才有。我值得赶到上海去打狂犬病疫苗吗？那也太过分了吧。

狂犬病的潜伏期有半个月到半年，甚至一年以后，得病的狗或人才突然发病死亡。还好，只要那咬我的狗在半个月内不发病就行。我几乎每天去问五喜，他家的母狗是否有异常的表现。如果那狗发病了，我得立刻逃回上海去打狂犬病疫苗。我至今还记得五喜那诧异的表情，他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突然对他家的母狗那么关心。

记得好像是1971年，说是洋坳那边发现了疯狗咬人，有人发病了。这消息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有好几个村子的民兵接到通知，开始捕杀各户人家养的狗，甚至不惜开枪杀狗，闹腾了一阵子。

人好像就是这样，只要各种动物包括虫子没有侵犯到人的利益，就能和人和平共处。人甚至会说，某某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等等。

可是一旦动物和人有了利益冲突，特别是威胁到了人的生命，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大开杀戒，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只。比如说，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禽流感，就要扑杀几十万只鸡，还恨不得把天空都罩起来，不让任何鸟类飞过。

四、养狗

我们在农村养的第一只小狗，一个月就夭折了。我们把它埋在住处的旁边，还做了一个记号。知青是年轻的城里学生，感情还是细腻一些。

过了几年，我从村民朋友张寿仁家里抱了一只小黄狗来养着。为了方便狗的进出，我还专门在大门上开了狗洞。



可爱的小狗

村里的狗照例都没有名字，别人称呼我的狗，自然是“老夏的狗”。而城里的人养狗，喜欢像外国人一样，给狗起名字。陆禹平家里现在养的狗，听说是叫“东东”。

小黄狗渐渐长大了，一身毛发酷似美国的金毛犬，平顺光滑。我收工回来，它一见到我，就迈着小快步颠颠地跑过来，围着我转，快乐地摇着尾巴。我吃饭了，它站在旁边像孩子那样望着我，渴望着能有东西吃。我看书了，它趴在我身边，让我时不时抚摸它。有时候我突然烦了，低喝一声“走开”，它瞧瞧我，疑惑地起身，走开几步，又趴下来。

有一次，它跟着我走到村口的马路上，突然来了一辆大卡车，把它卷到了车肚下面。糟糕，它要完了。

黄狗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它拼命跑着想冲出来，碰到了飞速旋转的车轮边上，又弹了回去。它再奋力冲刺，又被车轮弹回到车肚下面。它一犹豫，大卡车呼啸而过，把它从车肚下吐出来，留在了马路上。

我连忙过去，不停地拍它。它一脸惊恐地望着我，始终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村里的草狗不是城里的宠物狗，没有人给狗洗澡，所以我最多只是拍拍它，抚摸它，却从来没有抱过它。

有一天，村民张文臣提着一只小野物来见我，说他亲眼看见，是我的黄狗在村边咬死的。嘿，这狗还真厉害，会打猎。文臣把野物烧好以后，端了一碗给我。我尝了一口，余下的全部赏给狗吃了。只是它咬死的那只野物究竟是什么动物，我至今弄不清楚。

有一次我到吉安开会，五天以后回来，在村口的马路上刚下了拖拉机，就看见远处的田塍上有一个黄点，像子弹一样向我射来。我的黄狗拼命地甩动着尾巴，高兴地扑到我身上，站起来，伸着嫩红的舌头，呜呜地哼着，想要舔我的脸。

它是一只母狗，长大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去玩，不久就怀孕了。它生下了三只小狗崽，都是黑白相间的小花狗。我把其中的一只送给了在鹿冈知青综合场工作的陆禹平。

剩下的两只，一只夭折了，另一只小公狗顺利长大以后，突然不见了。也许小公狗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被人偷偷宰了。

真希望我的黄狗能够再生一窝小狗，奇怪的是，它后来再也没有怀孕。

再后来，它像以前恩绍家的狗一样，去那户姓张的人家偷吃了一点米。那户人家不敢公开骂我，而是狠心地用毒药把我的黄狗毒死了。

每次回到上海，马路上遛狗的人不少，他们牵着各种各样的狗，有的狗还戴着帽子，穿着衣服。我很想在这些狗之中，找到一只像里陂上村民养的那种草狗，但始终没有找到。

我的眼前升起了它的影子，一只没有名字的狗，我的黄狗，老夏的狗，我深深地怀念它。

2014年我回到里陂上村，拍摄到了一些草狗的照片。其中有一只黄狗，我看着它，它看着我，眼神是那么熟识。这分明是当年老夏的黄狗转世了。



这只很像作者当年养的黄狗

24. 遇险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几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对于我来说，迄今为止遇到的最为危险而且自己认为有可能危及性命的事情，都发生在我做农民的时期，发生在里陂上村。

一、红毛豺狗（豺）

在里陂上的时候，白天要出工，理论上的工作时间是一天十小时：早上二小时，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十小时以外的其他一切琐事中，砍柴和种菜是最重要且费时费力的两件事之一，没有柴不能做饭。没有菜的后果当然是只能吃白饭。

一个五月天的下午，天气晴朗，我早早计划好，等下午一收工，趁天没黑赶紧去砍柴。为此我连耘禾的竹杖都没拿，而是带了一把砍柴的柴刀（毛镰）放在田头。这样做，免不了给人一种干活不认真的感觉。但那时认真干活的人不多，大家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天下午我耘禾还是很认真的。

好不容易等到队长一声吆喝：“收工！去归！”我就像兔子一样窜出去（子庸看见过我在上海着急过马路，等绿灯一亮时就这样窜过），一路疾走到了北坑。在里陂上村，跑叫走，走叫行，古今不变。

刚进北坑口，我正沿着旁边谷底的小路疾走，听见右面的山梁上的灌木丛里一阵哗哗的响动。奇怪，莫不成有人收工以后，上山砍柴比我走得还快？不大可能啊。难道是哪个不出工的老人下午在山上砍柴还没有回去？我边走边想。

在山里走小路，必须看着前面十步左右，高抬腿，迈小步，不容人随便左右张望，否则很容易一脚踩空，滚下坡去。可是右面树丛里的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眼珠不由向右侧瞟去。

真真的是说时迟那时快，眼角闪过一道橙红色的闪光。我立马停住，瞪大了眼睛。前方十米不到，约莫在齐人高的

空中，有一只橙红色的比狗大一点的动物，身体水平伸长，前腿和后腿与身体成一直线，头部颈部和前腿平行。我身后的夕阳照过去，那橙红色的动物和远一点的浅绿、深绿、黄褐色的树丛一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红毛豺狗（豺）！”我的喉咙口一下子收紧了，双手缩在胸前，紧紧握住柴刀的木把。

那只红毛豺狗缓慢地从空中落下来，前腿在谷底的路边轻轻一点，像闪电一样，又是漂亮的一纵，足有六七米远，落在左前方的山坡上，回头看着我。



红毛豺狗（豺）

不容我多想，哗的一声，树丛开处，右前方七八米处又窜出一只红毛豺狗，也是那么一跃一纵，瞬间就到了第一只红毛豺狗身边，哗哗地钻进树丛。

天哪，动物的速度哪是人类可以比拟！如果它们刚才是跳起来咬我，那么我的柴刀还没举起，喉管肯定已经被咬断了，肚子也扒开了。我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柴刀，还好，刀口是向外的，如果豺狗扑上来，兴许还能抵挡一下。我本能地想举起柴刀，不料两臂却是僵硬的，柴刀怎么也举不起来。不过我的脑子还在转。哦，刚才那第一只红毛豺狗回头看起来，其实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我右前方的它的同伴。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突然听到了野兽的叫声，有点像狗叫，声音比大狗的叫声要细一点尖一点，比小狗的叫声要响一点。

我循着叫声看过去，左前方的山腰上，那两只红毛豺狗露出上半身，正在对着我叫。它们在打我的主意，它们要来了！我想往后退几步，可是我一步也不会动，脚发软，身体要往下瘫，更要命的是想要小便。只是我僵住的双手依然紧紧握着柴刀。

身后右边的树丛哗哗作响，我不敢往后看，僵硬的脖子也无法转动。

从我身后五六米的地方窜出来另外两只红毛豺狗，它们一前一后，开始嗷嗷地叫着，向对面山腰上等待着它们的同伴跳跃而去，很快隐没在树丛中。我眼看着对面的树丛一边晃动着一路向上，一边哗哗作响。倏忽间，山野归于一片寂静。我知道，它们已经翻过山梁，远去了。

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要是我的腿刚才还能听话，真的后退几步，就和红毛豺狗狭路相逢了……

四周再没有什么可疑的声音，我就这样坐着。

不知过了多久，低头发现手里拿着柴刀，想起我是来砍柴的。挥动一下手臂，站起身来抬头一望，还有一抹落日的余晖。

砍还是不砍？这是一个问题。像平日那样到远处去砍柴是不可能了。空手回去？我岂不惹人笑话了。我四处张望一下，不远处有棵不大的松树，那按规定是不准砍的。可巧它的树干在二人高处分成了二股，一股大一股小，小的砍下来估摸着会有四五十斤重。树枝没有明令不准砍。算了，就是它了，凑个数吧。

我把柴刀插进背后腰上的皮带，三下两下上了树，开始砍那小腿般粗细的树枝。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有些恍神。就在砍到最后几下时候，我手一软，刀口滑到脚背上，出血了。几乎与此同时，树枝嘎嘎作响，掉在了地上。我连忙下

树，天色昏暗中我胡乱扯了一点松针，嘴里嚼烂后敷在脚背的伤口上，扛起树枝，一瘸一拐地摸黑下山。

回到住处，点起油灯一看，脚背的伤口虽然不大，却伤到了静脉。我赶快用井水清洗伤口，再咬着牙用酒精擦拭，涂上红药水，撒上消炎粉，最后用纱布包扎好。

第二天全队的工作仍然是耘禾。我的脚伤了，怎么下水田呢？

我想起以前在书上看到过，正规军的战士们如果要背着枪泅渡过河，往往会在枪管口内涂上一段凡士林膏，以防止枪管进水。

我马上从箱子里翻出从上海带来的凡士林膏，在我脚背的伤口上涂了厚厚的一层，再重新包扎好，就下田耘禾了。村民们见了，都问我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遇到了红毛豺狗，我怎么会脚上包着纱布下水田呢？

如果不是遇到了红毛豺狗，我怎么会亲身体会到“吓得屁滚尿流”，几乎要尿流呢？

如果不是遇到了红毛豺狗，我的右脚背怎么会至今还有一个疤痕，右脚的中趾又怎么会缩短了一点呢？

记得 1980 年代，一个中国作家遭遇车祸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说是汽车翻转的时候，他觉得比电影里的慢镜头还要慢。那第一只红毛豺狗在我面前的跳跃，也是那么缓慢，却又那么优雅。

据说，红毛豺狗最喜欢吃动物的内脏。它们围攻耕牛时，牛会低下头来左冲右突，和它们搏斗。而那只本领最大的红毛豺狗往往抓住机会，突然跳上牛背，低下头去，咬破牛尾巴下面柔软的后腹部。耕牛受不了，忍痛狂奔，红毛豺狗紧追其后，直至耕牛肚裂气绝，倒地而死。红毛豺狗们一拥而上，吃光了牛的内脏，然后扬长而去。

又据说，红毛豺狗和北方的狼一样，是成群活动，连王八老虎（华南虎）都打不赢红毛豺狗，就不用说豹虎仔（金

钱豹)和野猪了。我遇到了红毛豺狗，应该谢谢它们的不吃之恩。

我遭遇红毛豺狗之前，已经和它们有过间接的接触和了解，那是在一年前的一天。

那天我们正在鹿冈公社参加唯一的一次全体知青大会。老队长张发茂笑咪咪地到会场，找到了我们。他说，刚才他拿着一只野猪脚到公社，公社按照政策，奖励了他十六元。

什么？野猪脚？

原来那天中午，发茂砍柴回家，挑着柴经过里陂上村北面的小水库的坝顶，此时水库里的水基本放完，他突然发现水库内裸露的山坡上，有一群红毛豺狗正在围攻一头野猪。发茂便在坝顶，远远地大喝了几声，然后赶快回家，拿了打猎的铳，约了两个人带着禾担和麻绳一起返回水库。

此时红毛豺狗已然散去，只剩那头开膛破肚的野猪静静地躺着，内脏已被洗劫一空。发茂他们几个人把没有内脏的野猪抬回村里一称，有二百二十多斤。



树林中的野猪

发茂拿着野猪脚到公社报告并且领赏的时候，村里人正在分野猪肉。不用说，那天晚上我们生平第一次吃到了香喷喷的一点肥肉也没有的野猪肉。我们和红毛豺狗共享了那头野猪。

其实，公社的那十六元钱应该奖励给那群红毛豺狗，是

它们杀死了那头野猪。发茂沾了红毛豺狗的光，得了一个大便宜，连带着我们也沾光吃到了野猪肉。

二、倒栽葱

里陂上村的男人过了五十岁，许多人就会剃成光头。可是张茂仁不到五十岁，每次剃头师傅来村里，他就要求剃光头，头皮青亮青亮的。他说话有些结巴，我们叫他“结巴子”，他会爽快地应承。若是叫他“野猪咬的”，他便面有愠色。

茂仁走路有些摇晃，上身摆动较大。他之所以走路摇晃，乃野猪所为。他年轻时参加围猎野猪，持枪守伏在暗处。不意一头成年野猪受了惊，朝他直奔而来。茂仁屏气扣动扳机，那野猪已然中弹，却未击中要害，反而加速冲向茂仁。茂仁手上的枪还没来得及装上第二发打野猪的独子铁弹。他一看大事不妙，只能落荒而逃。野猪追上来，在他屁股上咬了一口，然后突出包围，消失无踪，只留下茂仁在那里撕心裂肺地喊叫。茂仁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从此以后走路摇晃。

茂仁夫妇和五个孩子挤住在破旧的老屋里，很想再造个新屋，可是按照规定，造新屋不许占用耕地。无奈之下，张茂仁想在紧挨着他老屋后面的屋背岭脚下，挖出一块屋基来。屋背岭是里陂上的来龙岭，事关里陂上村的运气，谁也不赞成茂仁的想法。

茂仁来找我。我虽然不相信屋背岭和里陂上村的运气有什么关联，但是这么棘手的事情我也很为难。我只有把矛盾上交，和茂仁一起去找大队书记，请大队来决定。结果大队批准了张茂仁造新屋，我自然也因此得罪了一批村民。

于是茂仁每天天不亮，赶在出早工之前，他带领儿女们在屋背岭劈山挖地基。茂仁的新地基离我的住处不远，那镢头挖土时发出沉闷的吭吭声，时常会扰乱我的梦境。这是那个时代的施工噪音。

半年以后，茂仁这位当代新愚公，终于率领着儿女们在红土的屋背岭开出一块三开间的新地基。

离新地基不远的屋背岭上，有一棵二人才能合抱的大樟树，它有一根直径将近二尺的枝桠，正好伸到茂仁的新地基上空。要是他的新屋造好了，万一有樟树的树枝掉下来砸在屋顶上，会出大事的。

茂仁又来找我，要我帮他砍掉这大枝桠：“老夏，你会上树，帮我砍了它，给、给你换工分。”

“找别人吧。为了你能造新屋，我已经得罪了一些人。”我说。

“我找了，冇人肯帮我。树桠下面造不了新屋，你、你好人做到底吧。”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就依你吧，不过砍下的樟树桠要归我。”

“制得（行/可以/同意）。”

要砍的大樟树的枝桠离地有五米左右。我在树下先把两架三米长的杉木楼梯用麻绳绑在一起加长，把砍树的斧头用二米长的麻绳吊在楼梯头上，然后慢慢竖起楼梯，靠在大樟树上。我爬上楼梯，拉起吊着的斧头用力一甩，斧头绕过了树桠。我再登上几格楼梯，左手指用力勾住大樟树皮上的缝隙，右手够住那树桠，贴身靠住樟树，手脚一用力，纵身上去了。



大樟树

我左手扶住樟树，站在树杈上，里陂上村那些黑黢黢的屋顶就在脚下。不远处有些人已经在田里开始干活，还有些人掬着镢头在田塍上慢吞吞地走。远处一直可以看到南满贯山脚下，鹿冈公社著名的里陂上的圆墩尽收眼底。

我就近估量着，这大树杈的直径约有二尺，用斧头开的口子至少要有八寸宽，才能最终砍断它。口子的左边离开树干应该有一尺，好容我左脚站立，右脚要站在口子的右面。我想，砍到最后时，依照经验，树杈应该会发出轻微的爆裂声。那时我必须迅速抽回右脚，站到左脚所在的那一尺地方，双手要紧紧抠住樟树，等待那树杈折断时几秒钟的嘎啦啦爆裂声和轰隆隆倒地声。最后再小心地沿着楼梯慢慢下树。

我弯腰拉起麻绳拴着的那把斧头，小心站稳，开始工作了。咚咚的砍树声可以传出很远。（有时看见一个人在远处砍树，斧头砍下去没声音，斧头举起来才听见咚的一声，很奇怪很好玩。斧头从砍到树再举起来大约一秒钟，所以此人应该距离我们三百多米。）

我双手执斧，砍一阵要歇一下。抬起头来，我可以看见田里干活的人。有人撑着镢头把，在朝我这边看，还有些人对着我这边指指点点。他们一定听到了咚咚的伐木声，都知道了我正在砍断来龙岭上樟树的枝杈。他们一定在议论纷纷，可惜隔得太远，我听不见。

过了约一个半小时，我终于听到树杈发出了轻微的爆裂声。我赶紧缩回右脚，紧紧贴住树干。没有动静。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奇怪。

我沿着树干慢慢蹲下，左手扶住树干，右手单手执斧，试着继续砍。

单手执斧的力量太小，还是没有动静。

我站起来，身体的重心尽量往左边靠，右脚轻轻点住口子的右侧，斜着身子，双手执斧砍了起来。

刚砍了四五下，我只觉得身体一晃，右脚本能地往左边一缩。

来不及了。

嘎啦啦啦，大树桡往下沉，我手中的斧头脱手飞了出去，双手胡乱在空中挥了三四下，想抓住点什么东西，当然什么也没抓住。

我的头朝下，眼睛看着大树桡，随着它的轰隆声，我和大树桡几乎是同时落到了地面。我的双手挥舞着，摔了一个倒栽葱。

我翻身坐起来，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大树桡。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周身上下没有异常反应，没事。

村民周恩绍从干活的田里一路冲上山来，着急地叫道：“老夏，老夏！”

我跟随着老周的目光，看见右面地上松软的腐殖质上，有一个大约二寸深的圆坑。我知道，那是我的头顶和地面亲密接触的结果。倒栽葱的结局还算圆满。

然而就在圆坑旁边1尺远，赫然有一个约4寸高的尖利竹桩，正在狰狞地看着我。我和老周都看到了。

老周大声叫起来：“哪……老夏，你好危险！……你命好大！”

“……屋背岭是里陂上的来龙岭，事关里陂上村的运气？！……”想到这里，我的腿脚有些发软了。

我曾经在张贡茂家里搭伙，就把樟树的大树桡给了他。他第二天就请来木匠，打了一张吃饭用的方桌，那樟木桌面就是大树桡的一部分。

没过几天，心里不高兴的里陂上村民到大队告状成功，大队派人到张贡茂家，把余下的樟木树桡统统没收了。这些树桡堆在大队部，成了大队干部冬天烤火的材料。这着实让我心疼了一下。真可惜了这些让我头朝地倒栽葱的樟木。

冬天快过去了，有一天我路过大队部，看见一截最大的樟木树桡还没有烧完，就打趣说：“整个冬天你们用我的这些桡来烤火取暖，省了大队很多钱吧。”不想大队干部笑嘻嘻地说：“我们真是背时，用你的樟树桡烤火，樟油一烤出

来，辣得我们连眼珠都睁不开，还直咳嗽，我们就像烟熏的蚊子一样。”

后来我到公社去，遇见了老是那么笑眯眯的公社管知青的乡办主任，他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夏建丰啊，听说你这次犯错误了。砍了樟树也不告诉我。你要是送给我该有多好，我可以做樟木箱啊，看谁还敢乱说话。”

贡茂在事后告诉我，当我在帮茂仁砍树时，在田里干活的姓张的村民群情汹汹，他就知道我闯祸了。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客居在里陂上村的外姓人周恩绍一个人冲上山来看望我的原因。有些姓张的村民真有可能希望我从樟树上掉下来呢。

贡茂说，他舍不得我送给他的樟木。他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已经知道村民们会联合起来，到大队去告我的状。他便抢在前面，迅速打了一张方桌。按理说大队来人应该没收那樟木的桌面。可是除了桌面，打桌子用的杉木都是贡茂很久以前自己花钱买来的。桌子已经打好了，大队来的人无法下手。

赢弱的驼背老人贡茂，他在村里老是受人欺负，却也能想出这一招，够聪明。

几十年以后，我在里陂上村张贡茂的儿子张绍生（水根仔）家里，发现那张樟木桌面的方桌还在使用，桌面上依然有两道宽宽的裂缝。那是贡茂当年没等樟木干透，就匆匆忙忙地赶工做方桌所留下的痕迹。



2014年，贡茂家的方桌。

25. 挨饿

自从看了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以后，我开始喜欢和关注他的创作。2012年，他的新片《1942》讲的是大饥荒，正好我们这里的AMC院线的大股东是中国企业家，《1942》得以和中国的电影院同步上映，我一共看了三遍。我女儿苏舒看了两遍，她觉得《1942》是冯小刚导演拍得最好的电影，比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还要好。

在里陂上务农的日子里，我曾经试过只吃菜不吃饭，坚持了五天，知道忍饥挨饿的滋味真不好受。

我刚到里陂上村，就常常会听见年长的村民教训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的后生说：“唉，你们真是冇饿过饭啊！”

里陂上村现在耕种的田地，在解放以前多数属于李家村、袁家村和上头村里的财主人家。在一定程度上，里陂上可以说是一个长工村，多数人家给财主打长工。长工的收入要根据田里的收成来决定，一般是按四六分成，长工拿四成，财主人家拿六成。上交的农业税不重，由财主人家负责缴付。

长工之间有很自然的信息交流，他们知道谁家的田里收成好，谁家的田里收成差。他们也知道哪个财主刁钻吝啬，哪个财主宽厚大度（插秧割稻时会请长工喝酒吃肉）。

1949年解放以后，土地改革划定成分，财主人家绝大多数定成了地主，他们的田地没收，分给了穷人。里陂上村的二十几户人家，没有一户地主富农，中农也只是一二户，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

在解放以前，贫下中农的家里毕竟底子薄一些，没有陈年的积蓄，生活相对比较清苦，遇到年成不好，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会饿饭。

等到土地改革以后，里陂上的村民家家都有了足够的土地，就极少有挨饿的事情发生。



里陂上村民耕种的土地，集中在鹿冈乡最平整的大墩上。

村里年轻的一代没有挨过饿。他们有时会出工不出力，偷一点懒，耍一点奸，一边混工分，一边还满不在乎。他们有时还会发一些牢骚，对上级领导的某些作风和态度表示不满。

每逢这种时候，从前饿过饭的年长的村民，就会发出“你们有饿过饭”的感叹。

我从小生活上海，家境稍微宽裕一点，至少是衣食无虞。每当我感到肚子有点饿了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吃饭的饭点，记忆中从来不知道饿一顿饭是什么感受，“少年不识饿滋味”。

在我种田当农民的最后数年，里陂上村只剩下了我一个知青。这时候的我，各种农活都已娴熟，我在自留地里种的各种蔬菜也是郁郁葱葱、硕果累累，一个人根本吃不完，有时候会送菜给在其他村里插队的知青。

有一天，我又听见村民在训斥自己的孩子，还是那几句饿饭的老话。

我突发奇想：这些老人以前都饿过饭，不吃饭究竟是什么滋味？我现在有这么多蔬菜吃不完，如果我几天只吃菜不吃饭，会是什么感觉？

我决定自己来试试看。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的早饭，我炒很多青辣椒，中午则是两大碗蔬菜。

晚饭除了辣椒和蔬菜，还会吃一些茄子和瓠瓜。



紫茄子



白茄子

我除了只吃菜不吃饭，其他的一切活动照常进行。我白天要下地干活，另外要挑水、砍柴、种自留地、烧饭和喂猪。晚上睡觉以前，我习惯看一点书。

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我的感觉正常，只是胃里面有一些泛酸，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到了第三天，我感觉有点不对了。挑一担水，装满水的水桶不容易控制，有点摇晃。在田里做事也比平时容易累，容易出汗。第四天收工以后去砍柴，发现手上力气变小了，柴就不那么听话。挑柴回家的路上，有点心慌、气喘。

到了第五天出工的时候，我挑了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来做。当我走在田塍上，只觉得心也慌，头也晕，脚下轻飘飘，身体摇摇晃晃。我突然打个趔趄，差点滑倒，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只想快点回家休息。

我平日的夜晚躺在床上，隔着蚊帐，就着蚊帐外面床边上的油灯看书，是一种享受。可是今天晚上不行，书上的字老是会滑走，老也抓不住。我已经五天只吃菜，没有吃米饭了。

第六天早上，我拿起圆镜照看自己的脸庞，发现脸色不

但发黄、发灰，更是隐隐发绿，有点像没有施肥长得不好的蔬菜的颜色。我恍然大悟，知道“面如菜色”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了。

我放下镜子，赶快洗米、生火、煮饭。饭的香味出来了，我不停地咽口水。

真到吃饭的时候，我倒不觉得饭有多么香甜，只是吃得特别快特别多。

我在里陂上村做农民能够吃饱，这真是天大的幸运。

而相隔二里路外的潺陂村就不行，他们的人口和我们村相仿佛，田地却只有我们的一半左右。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潺陂的村民会走一百几十里路，到上永丰的藤田一带，悄悄地到农民家里买薯仔渣来充饥。

藤田地区盛产红薯，当地有名的土产是红薯淀粉和红薯粉丝，下脚料就是薯仔渣，主要用来喂猪。

有一次，村民张发茂从潺陂村的亲戚家带了一点薯仔渣回来，路上遇见我。

“老夏，要不要尝一下？”

“啥东西？”我问。

“薯仔渣。”

“吃一点。”我早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吃过薯仔渣。

我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小口，一股馊臭味直冲后脑。我强忍住恶心，咽了几次，薯仔渣直刷喉咙，终于咽下去了。



作者用过的圆镜



发茂



红薯渣



红薯粉丝

看见发茂正瞪大了眼睛在看我，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我知道，自己的脸上一定很难看。

“好吃吗？”发茂坏笑着问。

“怎么拿这种东西回来？”我摇着头问。

“女儿⁶没吃过，听说有薯仔渣，想吃。”

“贵吗？”我问发茂。

“六块五一百斤。”

“一百斤稻谷才九块五。”我说。

“那是国家牌价的稻谷，私人要卖十九块，还不准卖，卖了要犯法。”

再问下去，我才知道，藤田的农民秋天收了红薯，冬天做了薯粉以后，剩下的薯渣就堆放在那里，任其变味发酵。这样的薯渣到了春天，还能是什么味。六块五一百斤的薯仔渣，能有钱买，能买到吃，就不错了。

1980年代我去北京出差，大清早出去溜达，在西直门外见到很多人在排队买豆汁。我也凑热闹，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一碗。坐下一喝，却是薯仔渣的味道。我勉强喝了几小口，就把碗放在桌上，溜走了。凡是碗里的食物，我一般都要吃完，这次是例外。

我后来听说，豆汁是北方人用绿豆做粉丝后的下脚料发酵了做成的，怪不得和薯仔渣的味道差不多。

我在里陂上只吃菜不吃饭才五天，如果连菜也没有吃，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逃荒的灾民，我会放下那碗豆汁走人吗？



豆汁

我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上小学了，我就告诉他：

⁶这名义上的女儿是发茂收养的，成年以后嫁给了他的小儿子，其实就是解放以前所谓的“童养媳”。里陂上有些村民觉得“童养媳”的制度不错，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村民张寿仁和张富魁的老婆都是童养媳，两对夫妇的感情都很好。富魁在1980年代，三十来岁就去世了，富魁的老婆袁招金居然矢志不嫁，一直守寡。

“你要开始负责自己的早饭了，冰箱里有牛奶、面包、果酱和黄油。你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想饿肚子，那是你自己的事。”

儿子长大以后，有一次我问他：“肚子饿了没饭吃，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他马上回答：“知道。很难受。”

儿子告诉我，他上小学的时候，真的试过不吃早饭就去上学，结果在课堂上饿得头昏眼花，难受死了。从那以后，他坚持每天早上在冰箱里找东西吃，吃完以后再去上学。

听他说完，我笑了：“很好。这是你小时候得到的人生第一笔财富。”

儿子和他的姐姐一样，除了很注意不要浪费粮食以外，现在还会自己动手，烧出可口的饭菜。

有人在将近一百年前说过，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现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大多数人能吃饱，还时不时很浪费，嚷着营养过剩，嚷着要减肥，嚷着要养生。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周遭还是有人在忍饥受饿。况且谁也不能保证，今后我们这个世界不会发生大饥荒。

26. 受冷和烤火

每到寒冷的冬天出工的时候，里陂上的村民常常会缩着脖子说：“老古话说的是：热是热众人，冷是冷个人。”

热是热众人。夏天的农村没有冰箱，没有空调，过去的财主人家和一般人家一样，你光着膀子，我也光着膀子，再没有衣服可以脱了，众人一起受热。

冷是冷个人。到了冬天就各不相同了。过去的财主人家比较富裕，他们冬天出门可以穿皮袄，穿棉裤，戴皮帽，他们不下田干活，他们不会冷。至于一般的村民，上身可以有夹袄，有棉袄，可是他们冬天经常要出门干活，下身只有穿单裤才行。他们家里往往只有单裤，出门只能受冷。冬天冷到结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穿上两条甚至三条单裤来御寒。当然，如果是冬天农闲在家里，可以围在火塘边上烤火取暖。这时候就是只穿一条单裤也不觉得冷。

一、受冷

每年到了十二月，天气已经很冷，等到过了“冬至”这个节气，就要“进九”，以九天为单位，用谚语来描述气候在八十一天里的变化。中国幅员辽阔，描述“进九”之后气候变化的谚语有很多版本，里陂上村关于“进九”的村谚，和我们在小学课本里读到的不一样，和我看到过的其他版本也不一样。村民说的版本是：

一九、二九，相团不出手。（双手插在袖管里取暖）

三九二十七，檐墙脑上倒挂笔。（屋檐上挂着冰棱）

四九三十六，黄泥岭上长白肉。（下雪了）

五九四十五，冷得黄狗鸣啊鸣。（黄狗冷得呜呜叫）

六九五十四，讲吃不讲制。（过年只讲吃喝，不做事）

七九六十三，拜年路上脱衣衫。（天气暖，脱去上衣）

八九七十二，黄狗停荫树。（黄狗躲到树荫下）

九九八十一，个个脑上戴麦笠。（人人戴上斗笠遮阳）

我到农村的时候，带了一条咖啡色的“卫生裤”，有点像运动员冬天穿的厚厚的运动裤，在冬天穿上它很暖和。可是我不久便发现，穿了卫生裤以后没法卷裤腿，在寒冷的早春，要下水田的时候很不方便。

村民们看见我穿这么厚的裤子，一开始他们很羡慕地说：“过去有财主人家穿毛裤（棉裤），现在你的裤子比毛裤还要好。”等到我卷不上裤腿了，他们转而嗤嗤地笑起来：“老夏，脱了吧，脱了吧，要不然你下不了田。”他们好像是想看我在冷天的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呢。结果这条卫生裤穿了没几次，我宁愿受一点冷，也不好意思再穿了。我改穿棉毛裤外加单裤，棉毛裤的罗口拉到膝盖上，不会往下掉。

有一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我和村民张寿仁在一起聊天。他说起自己前几年过世的父亲，生前很多年都是只靠一条单裤就过冬。我说：“在屋里可以烤火取暖，这有什么希奇？”

寿仁说：“可是他还要上山挖柴根，出门挑井水，正月就开犁下水田，都只穿一条裤。不过他也只有一条裤可穿。”

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只穿一条单裤过冬是什么感觉？我想试试。现在刚刚是腊月，这两天外面也没有结冰。”

“老夏，你真的要校验一下？”

“我真的想试一试。”

第二天早上，我只穿一条单裤（当然比村民多穿一条短内裤），开始了我的受冷之旅。首先是要把水缸装满水，因此我必须出门挑水。我挑着空水桶一出门，哎呀，少穿一条棉毛裤就是不一样，冷风直往裤子里灌，很快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穿裤子一样。我一路小跑冲到井边装满一担水，赶紧迈着小碎步跑回家，倒完水以后把扁担一扔，蹦跳着跑到火塘边烤火取暖了。

接着要去自留地摘菜了，我也是蹦跳着一溜烟到地里，以最快的速度摘菜，然后匆匆回家。我一跳进门，把装菜的篮攀放在一边，先去烤火，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

就这样，我穿着单裤过冬，坚持了十几天，算是尝到了过去里陂上村穷苦人家过冬的滋味，实验便结束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冷得勾头缩颈、跳进跳出的怪样子，在旁人看来一定十分可笑。

每年春天，村里会在不同的水塘里放入鲢鱼、鳊鱼和胖头鱼（鳙鱼）这三大家鱼的鱼苗。经过二到三年，鱼儿长大了，到了冬天过年时节，生产队就会选一口水塘，干塘捉鱼，把鱼分给大家过年。

当抽水机把水塘里的水差不多抽干了，在鱼儿到处往上乱蹦的时候，我们就把裤腿差不多卷到大腿根，冲下塘里去捉鱼。我在冰冷的水和塘泥里最多只能坚持两三分钟，就要赶快上岸，拖着冻得紫红的双腿，在水塘边的火堆旁烤火取暖，过几分钟再冲下塘去。

水塘边围着很多人，几乎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来了，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只有最强的男劳力才下塘捉鱼，捉到了鱼就往岸上扔，有人会把岸上的鱼集中起来。别人捉到三条鱼了，我才捉到一条。岸上看热闹的人会高兴地喊：“老夏捉到鱼了！”我冷得嘴里咝咝地在抽气，心里却油然生出了温暖和喜悦的感觉。

里陂上村属于田多人少，每逢农历的正月底二月初就要开始春耕。如果遇上倒春寒，水田里偶尔还会有薄薄的冰茬。



耖田

这时候去犁田（村民叫耖田），就不像捉鱼的时候那样可以上岸烤火，只能咬着牙坚持。耖田半天下来，小腿以下在水里的部分冻成了紫色，已经麻木了。

我一直记得，有一天我耖田收工的时候，我把牛脖子上的牛轭解开了，整理好，又在田头把犁具洗干净了，然后用镢头挑着牛轭和犁具，牵着牛回村。说是牵着牛，其实是牛走在我前面，我的右手控制着肩上的犁具，左手握着牛绳。

牛突然停了一下，在我的面前拉了一堆屎。我一脚踩进了牛屎，一阵温暖沿着脚底往上传，舒服极了。牛还要往前走，它也想早点回家呢。我把手里的牛绳紧紧拉住，让牛停下了脚步，为的是我的双脚可以在牛屎里多享受几秒钟的温暖。

与此同时，在我身后的小路上的其他村民也不得不停了下来。他们的活计要轻松很多，大部分人是在铲田壩和筑田塍。

集体的耕牛都分散地养在各户人家。村里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早春时节，凡是养牛的人家，都要派人去耖田。妇女不用去耖田，去的全部是男人，大多数是各户人家的顶梁柱。他们是关键时刻必须走在前面忍受寒冷的人，是要担当责任的人，也是全体村民尊敬的人。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耖田收工以后，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当然是烤火，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离火太近，以免烤坏了已经冻得冰凉而麻木了的腿脚。

二、烤火

一到冬天，里陂上村每户人家的厅堂里的一角，就作为烤火的火塘。火塘设在进大门后的左边或右边，周围是矮凳和矮椅。火塘里的火往往从清晨一直燃到深夜，不像煮饭蒸饭烧菜那样需要快火急烧，因此用的多数是没有劈开的一段

较大的木柴，燃烧起来比较慢（燃烧速度最慢的是栎子树柴）。有时候烤火的木柴用完了，村民会临时到附近的山上去挖柴根（柴菟）回来烤火取暖，柴根烧起来也很慢。

用木柴烤火多少会有些烟。袅袅青烟冉冉上升，穿过屋顶上面瓦片之间的缝隙，飘散而去。里陂上村的房屋，瓦片直接放在椽条上，好像和我们常州老家的房子不一样。



很多民居的炊烟是直接穿过瓦片之间的缝隙，缓缓升上天空，形成特殊的景象。如今的说法是污染了环境。

冬天到村民家里去串门，他们马上热情地让出火塘边的座位，招呼我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老夏，来烤火。”而不是“老夏，吃了么？”

坐下来，在火塘边烤火，大家开始聊天，东拉西扯，无所不谈。记得有一次，寿仁一边拨弄着火塘里的火，一边说：“老夏，鹿冈老俵说，三个鹿冈人，才抵得上一个永丰人；而三个永丰人，才抵得上一个南昌人；要三个南昌人，才抵得一个上海人呢，还是你们上海佬最厉害。”

“照你的说法，一个上海人抵得上二十七七个鹿冈人。等你哪天当了队长，我在田里做一天工，你能给我二十七天的工分吗？”我笑着说。

寿仁也笑了，他说：“嗨，会种田有什么用？我们是农民，就是脓包的意思，农民是这世上最有用的人。”

我心里想，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以农立国。书上说“士

农工商”，农民的地位仅次于知识分子（士），历来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据说每年春天的开耕时节，北京城里的皇帝，还要到一个叫做“先农坛”的地方，去扶犁耕地呢。就连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纲领十六个字里，好像也有“扶助农工”这四个字，农民排在了工人前面。

可是实际上，农民一直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自己也认为，只有最无用最无助的人，才会来当农民。看来村民的心底里，有着千年积淀下来的深深的自卑。连我们这些天天胼手胝足，和村民在一起种田的知识青年，只是因为地域的不同，村民对我们有些“仰望”呢。

大家说累了，便眯上眼睛，专心享受烤火的乐趣。

烤火真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我坐在火塘边的矮凳上，全身放松。双手向前伸出，手心向下，感受着橙黄色跳动的火苗射出的热力，身上和手上一阵一阵地暖和起来。这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静止了，只有那成段的木柴或者柴根不时发出噼噼的爆裂声，溅起了点点的火星。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全然是一片空白，真舒服。这样的状态，有时候可以持续一个多小时。

偶尔睁开眼睛，瞧一眼脚边我养的那只黄狗，它老是跟着我，正舒服地伏在地上，和我一样，在享受着火的温暖呢。它眯着的眼睛间或一动，紧紧贴在额边的两只耳朵有时会突然竖起一只来，慢慢地转一圈。如果这时候有人推门进来，我的狗会撑起前腿，挺起上身，睁开眼睛，歪过头去瞧瞧。待它发现进来的是熟人，就摇一下尾巴，表示说它知道了，然后又懒洋洋地趴下去，侧过脸，抬起眼，怯生生地瞄我一眼，往我的脚边挪动一点，继续享受着烤火带来的莫大舒适。

可是婴幼儿在火塘边烤火，会有很大的危险。他们在矮椅上睡着以后，一旦翻身滚落到火塘里，很容易造成终身的残疾，甚至会失去生命。



矮木椅

除了烤火，村里的妇女在闲暇时，往往会提着火笼取暖，火笼里放了一些从灶膛里铲出来的炭烬，村民俗称“火屎”，既能散发热量，又不会漂出烟雾来。以前没有火柴的时候，很多村民烧完晚饭，就小心地用灶膛里灰白色的柴灰盖住“火屎”，可以留住火种，在第二天使用。



火笼

后来我有机会买到上好的木炭，用木炭放在专门的火盆里烤火，这是农村最高级的烤火方法。不知道为什么，用木炭烤火会感到空气很干燥。我还常常觉得，用木炭烤火的氛围和效果不如用木柴来得好。少了木柴燃烧的明火和青烟，用木炭烤火显得比较冷清和斯文，相比之下缺少了一些热闹和原始的味道。



火盆

2000年我在美国，靠贷款买了一个很小的八十多年的老房子，房子里居然有一个可以烧木柴取暖的壁炉。

快到圣诞节了，四季如春的旧金山湾区终于冷下来了。我兴冲冲地买来了专门用来烧壁炉的木柴的替代品，放在壁炉里的铁架上，点着了“木柴”。我看着那橙黄色的火苗一闪一闪地窜动，仿佛我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里陂上村，回到了用木柴烤火的岁月。

没过几年，我居住的小城为了保护环境，有了新的规定。所有的壁炉一律不准烧木柴和木柴替代品，要使用壁炉的住户必须进行改造，只可以烧煤气。

夜深了，烤火的村民回去睡了，火堆渐渐地熄灭，我也起身回屋，已经感到有一丝一丝的寒气向我袭来。

对我来说，用木柴烤火的岁月永远过去了。

27. 剃头和修面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想来我们汉族的男子在清朝以前是不剃头的，把长长的头发盘成一个髻，用布包住扎好，顶在头上。我看见书上绘出来的古人帽冠，上面总要鼓起来一块，好像就是为了存放那头上的发髻。那时候也有“理发”一说，主要是指洗沐和梳理头发。

到了清朝，汉族的男子不得不接受新的规定，把头顶前面的一半头发用锋利的剃刀剃光，就有了“剃头”的说法。后面余下的长头发编成一条辫子，拖在身后。等到国家衰弱了，中国男人拖在身后的那条辫子变成了落后的象征，成了西方很多人眼中的“猪尾巴”，有人还用英文Pigs（猪）的谐音，造出了一个带有侮辱意义的新字“Chinks（中国猪）”，专门用来称呼我们中国人。



清朝的剃头师傅

从我记事开始，每个月要到“剃头店”去剃一次头。那时候上海的剃头师傅除了剃头以外，大多有一手推拿和接骨的本领。记得我哥哥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手臂脱白了，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剃头师傅。我跟在母亲后面，探出头去，只见那师傅一只手扶住哥哥的肩膀，另一只手握住哥哥

的手臂，往下轻轻一拉，再猛地往上一推，嘴里说声：“好了。”哥哥带着一脸的惊恐活动了一下手臂，笑了起来。哥哥的手臂复位以后，那剃头师傅只收取了母亲一元钱。

现代的理发，是修剪头发、洗头、吹干、修面、染发、烫发等各种服务的统称，可是很多上海男人还是习惯地把理发简称为剃头，主要是指修剪头发，有时还包括洗头、吹干和修面。

一、剃头（剃脑）

1969年我到里陂上村“插队落户”之前，母亲特意提醒说，农村里剃头可能不是很方便，应该带一把剃头的推剪去才好。我便花费二元五角钱，在上海买了一把崭新的双箭牌手动理发推剪。



双箭牌理发推剪

到了里陂上村不久，我的头发长了，可是我们里陂上村的男知青，谁都不会剃头这门手艺。我只能和薛志民约定，我俩互相给对方剃头。我率先贡献出自己的脑袋，给志民当作试验田，用我买的那把推剪，任他胡乱地在我头上推一通。

坐在凳上让薛志民给我剃头，我常常会猛地一惊，痛出一身热汗。志民的手艺是在太差，我忍不住说：“小心点，依不是在剃头，好像在拔毛了。”

轮到我给志民剃头了，有时推剪夹住了头发，我心一慌、手一拉，就拔掉了他几根甚至是一小绺头发，青色的头皮上

渐渐地出现红色的斑点，出血了。

终于完工了，我手里拿着推剪，看着薛志民刚剃好的后脑勺，色彩很不均匀，青色中夹杂着的那一块又一块的白色，是我剃得太短，露出了他的头皮。

到田里干活的时候，村民们看着我和志民的新剃头，一边挤眉弄眼地做着怪模样，一边嗤嗤地发笑。我俩对望着，看见了对方那奇怪的发型，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我很快发现，志民的新剃头上那些露出头皮的地方，头发长得特别快，过了一个星期到十天，就看不出我那不听话的理发推剪曾经在他头上施虐的痕迹了。

转眼到了1969年的11月，插队务农已经八个月，母亲要我回上海探亲，顺便先到杭州的姐姐家住两天。临行之前，为了使自己在路途中显得精神些，我请志民给我剃头，他有些犹豫地说：“这次跟平常不一样，我怕剃不好呢。”

我说：“依现在越剃越好了，前几天寿仁还想来试试我们的手艺呢。没事的，依放心剃。”

志民给我剃完了，抱歉地说：“对不起，这次剃得不好，依去上海的路上应该戴帽子。”我拿起圆镜照了一下，前面还可以，后面看不到。我心想，充其量是后面露出了几块白色的头皮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按照志民的建议，戴上帽子出发了，起初一路平安，没有什么异常。

待得上了火车，车厢里十分闷热，我忘了自己的新剃头，随手脱下帽子，当作扇子，搧了起来。“哄”的一声，周围的旅客都笑起来了。我不明就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笑，下意识地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头。

“哈……”他们笑得更欢了。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们是在笑我的新剃头呢，我戴上了帽子。

对面的一个中年妇女敛起了笑容，小心地轻声问我：“你的头是谁剃的？”

“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剃的。”

笑声停止了，他们看着我，周围很是安静了一阵。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那些旅客知道了我的知青身份以后，可能会联想到我们在乡下很可怜，连剃头都弄成了这个样子。

火车到了杭州，下车到了姐姐家里，我洗脸的时候一脱帽，姐姐便大惊失色地说：“你的头这么难看！是谁剃的！”她要我马上到附近的店里去剃头。

我到了店里一脱帽子，自然又引起了一阵哄笑。

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薛志民当时把我的后脑勺弄成了什么怪模样。

后来，里陂上的村民朋友张寿仁见我剃头的手艺慢慢地进步了，便试探着问我，能不能给他“剃脑”。我说：“那当然可以，而且不收票子（钱）。”

村里人不说“剃头”，而是说“剃脑”，我觉得很新奇。但仔细想来，人的头部的前面是脸面，有头发的部分才是“脑”。回想起我理发的那把推剪，从来只在人的脑壳上耕耘，并不会推到人的脸面上去。看来“剃脑”比“剃头”要准确一些。

渐渐地，村里有几个年轻的后生愿意来找我免费剃脑。他们可以节省一点钱，自然很高兴。我很愿意为他们服务。他们教我砍柴种菜，教我犁地耙田，我正无以为报呢，心里也很欣欣然。

可是有人不高兴，那就是一直给里陂上村民剃脑的陈师傅。

陈师傅不是本村人，他每过半个月到里陂上村来一次，给村里的男性成年人剃脑和修面。男孩子则只给剃脑，不给修面。（用锋利的剃刀把脸上的胡须和汗毛刮掉，那叫修面，和我们上海人的说法一样。）

陈师傅不论大人小孩，按人头收费，每人每年六元钱。他眼见着有村民到我们这里来剃脑，自己的收入减少了，心里当然不高兴。他笑嘻嘻地来找我好几次，愿意出七元钱的高价来买走我的理发推剪，我没有同意。

陈师傅很快改变了策略，他来村里剃脑的时候，热情地邀请我免费剃脑和修面。我很愿意体验一下农村的剃脑和修面是怎么回事，便答应了让陈师傅在我的脑壳上舞推剪、在我的面皮上动剃刀，但条件是我必须按照市价，付给他二角五分钱。

我坐在凳上，陈师傅兴致勃勃地给我围上剃脑专用的靛蓝色棉布围单，式样和上海理发店里的围单差不多，只是没有及时清洗，鼻子里会钻进一些相应的气味。剃脑的时候，也许因为我是陈师傅的特殊顾客吧，感到似乎他的手艺比我在上海的剃头师傅要好一些，反正我觉得很舒服。

剃脑完毕，再用热水洗脑，和我在上海的理发店里剃头的过程差不多。

二、修面

接下来要开始修面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修面。

陈师傅端来一条长凳，自己侧身在凳子的一头坐下，拿着剃刀的右手朝着外面，左手拍拍凳面，招呼我坐在长凳的另一头，背对着他顺势仰面倒，枕在他的大腿上。我睁开眼睛，陈师傅的脸很近，距离不到一尺。

用热毛巾敷面一二分钟以后，陈师傅不用剃须膏，开始给我剃胡须。他的手势熟练而轻快，唰唰唰一阵响，比我平时自己对着镜子用剃须刀来剃胡子，要舒适多了。



当年，作者用过类似的剃须刀和刀片。

锋利的剃刀刮完了双颊，开始爬上鼻梁和眉心，接着在

额头上游走。眉毛上、眉毛下、眼皮下，伴随着轻微的“嗤嗤”声，剃刀好像刮去了我脸上的每一根汗毛。我想，修面就是刮脸，现在脸上已经全部刮过，应该结束了。也许是陈师傅觉得我动了一下，知道了我的想法，他轻声说：“不要动，快好了。”

剃刀开始刮耳朵的背面、耳廓的里面，剃刀在耳朵的边缘上走过。那剃刀直到刮干净我的脖子之后，才离开了陈师傅的手。



农村剃头师傅用的老式剃刀

我想要起身，陈师傅拍拍我：“还有一下下就好。”他随手拿起一把很细的小刀伸进耳朵里去绞耳毛，那“嚓拉拉”的声音特别清亮。绞完了耳毛，又绞鼻毛，接着他换上了一个掏耳勺，开始仔细地给我掏耳朵。在记忆中，过去哪怕是母亲给我掏耳朵，也没有陈师傅现在的手法那么好。

我还想多呆一会儿，陈师傅说：“好了。”

我挺身坐起来，精神一振，感觉无比清爽，这第一次修面的体验真不错。转念一想，我得赶紧付钱了。

如此享受了几次修面以后，我不由得想到，自己不会修面，而寿仁他们来找我剃脑，虽然一年节省了六元钱，却因此失去了修面的乐趣，实在是可惜了。

又过了一年，陈师傅终于说服我，高价把我的那把理发推剪买走，达到了他的目的。他高兴地说：“我们村里上海佬带来的推剪，早就给我收走了，就里陂上村你老夏的这把最难收。”

寿仁他们几个人只得和我一样，成了陈师傅的顾客。

从那以后，我在享受陈师傅周到服务的同时，略微有些遗憾地发现，他对我的服务热情和工作质量，都稍稍下降了

一点。

每逢插秧或者割稻的农忙季节，为了抓紧时间，陈师傅会带着工具来到田头，为我们剃脑修面。这时候，在田里劳作的每个男人都很高兴，我们不但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喘一口气，伸展一下劳累多时的腰肢和手脚，更可以藉着修面，好好地享受一番。

“老夏，到你了！”陈师傅远远地喊道。

我坐在田头的木椅上，照例围上了熟悉的蓝色围单，那围单熟悉的味道里，一股稻田里特有的清香掺杂进来了。修面的时候，我仰望着蓝天上缓慢飘动的白云，听着剃刀在我的脸上“滋滋”地游走，有时还会传来一二声使役耕牛的吆喝声。那是多么的放松，又是何等的惬意。

只是这一切太过短暂了，陈师傅已经站起身来，大声地喊着下一个村民的名字。我不得不下田去工作了。

回上海探亲的时候，我到父亲常去的那家级别较高的店里剃头。一进这家店，感觉就是不一样，亮畅的店堂里干干净净，满墙的大镜子明晃晃的。剃头师傅用毛巾利索地掸两下专用的座椅，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给我围上了雪白的围单，然后问道：“照原样？修面伐？”

“照原样，剃头加修面，来全套。”我盼望着能够在上海享受修面时的适意。

剃头、洗头，师傅把座椅放平，我仰面躺着。热乎乎香喷喷的毛巾来了，比乡下好得多。接着是涂抹剃须膏，这也是农村没有的。理发师开始修面了。

我突然感到有一丝疼痛，头不由得动了一下。师傅说：“噢，依的胡子不多，倒是韧刁刁的，不好剃。”

到最后，我等着绞鼻毛和掏耳朵，可是没有等到。我开始暗暗地怀念乡下给我修面的陈师傅了。

回到家里仔细地照镜子，发现我的下巴上有一个小小的暗红色的破口，那是上海师傅的剃刀留下的痕迹。我又怀念起了农村的陈师傅，他的剃刀虽然式样老旧，却从来没有割

破过我脸上的皮肤。



1960年代，上海剃头师傅用的剃刀。

按理说，上海的剃头师傅和乡下的陈师傅一样，都是经过多年的学徒生活，才学到了修面这门手艺。可是我总觉得陈师傅的技术更好一些。我想到，共产党来了以后，上海的学徒不管好坏，只要学满三年就能出师。相比之下，乡下的学徒有时要学四到五年，直到师傅觉得不会损坏自己的名声了，才放心让徒弟自立门户，独立操作。（不排除有些乡下的师傅故意不让学徒出师，可以减少一个竞争对手，同时能够多占有有一些学徒的劳动。）

还有，上海的剃头店里，各种设备高档、大气、上档次，剃头工具先进、整洁、又多样。也许正因为设备和工具好了，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即使修面的手艺马虎一点，也能过得去。就这一点而言，我不禁联想到其他的行业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医院里有越来越多的医生，他们越来越依赖各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为病人作各种检查，然后根据检查结果给病人诊断和开药。这样一来，医生个人的医术高下，似乎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

1989年底，我和女儿揣着国家允许调换的总共六十多美元，来到了美国，和正在读书的马立平会合。有种通俗的说法，过去我们到农村是“土插队”，现在几乎是身无分文地出国，可以算作是“洋插队”。拖家带口“洋插队”的留学生经常会自嘲，说自己是“五大员”：买辆旧车，成了驾驶员；到中餐馆打工，成了服务员；回家带孩子，成了保育员；

拿起锅铲，成了炊事员；给家人剃头，成了理发员。

二十年以前我带到里陂上村的那只棕红色箱子，1989年仍旧跟着我开赴美国，那箱子里又躺着一把崭新的双箭牌理发推剪。从那以后，立平开始学着用推剪给我剃头，成了家里的理发员。

略微有些遗憾的是，立平不会修面这种高级的技术活，美国的理发店里又似乎没有这项服务，我很久没有享受修面的乐趣了。

等我过了几年再从美国回到上海时，大多数的剃头店里已经和国际接轨，取消了修面这项传统服务。

我想起了好像是某本书上一句幽幽的话语：“世人不闻《广陵散》，已经很久了。”



1960年代，修面是剃头师傅的传统服务项目。

28. 松光、火吊和救火

“松光”是几十年以前里陂上村民用来照明的主要材料。他们在春天的夜晚经常会点燃“火吊”去田里捉鱼，火吊里燃烧的就是松光。我在农村十年，参加过几次救火，松光往往是引起火灾的直接原因。所以，我把松光、火吊和救火这三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写在了一起。

现如今的里陂上村，松光这样东西，已经绝迹很久了。

一、劈松光照明

上海是中国的大城市，现代化的程度比较高，夜晚自然是用电来照明。在1960年代，上海马路上的路灯，是当时最先进的高压水银灯。我家里则换下了老式的白炽灯，改用既明亮又比较节能的日光灯。

到了里陂上村，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到了夜晚，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村民多数使用“松光”来照明。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经常要点燃“松光”，到昏暗的柴房里去拿取各种用具。

顾名思义，村民用来照明的“松光”，一定和松树有关。

里陂上村周围的山岭上，有许多一人不能合抱的大松树。奇怪的是，有些大松树的树干上，从齐人高的地方开始，往下有二尺左右的长度，或多或少被人挖掉了一块。有的树挖得浅而窄，好像树干上长了一个凹进去的疤；有的挖得深而宽，那松树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

村民张寿仁告诉我，那是因为村民劈“松光”来照明，才把松树弄成了这个样子。

割开松树皮，松树受了伤，就会流出“松油”，松油流得多了，时间一长，把原本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浸润成了橙红色，用斧头小心地劈剥下来，就是松光。

劈松光使得松树又受伤了，再次流出松油，过一年左右，

又可以劈一次松光。你也劈松光，我也劈松光，时光过去了十几年，劈松光使得大松树最细的地方只有碗口那么粗了。

劈松光会毁坏松树，大队干部多次说要保护松树，禁止劈松光。记得唯一查处过的，好像只有李家村的一个村民。不成想这事还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国历来有一句脍炙人口的描述社会不公平的话：“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老百姓连晚上点松光照明的权利都没有，还让不让他们活了？一时间，我们先锋大队群情汹汹，大队干部成了“千夫所指”。从那以后，大队干部再也不敢说要禁止劈松光。

记得是一个刮风下雨的晚上，我吃过晚饭不久，忽然听见屋背岭上“嘎啦啦”的一阵响，然后是“轰……”的一声。那好像不是打雷，而是一棵大树倒地的声音。一定是屋背岭上那棵劈了松光，平日里看上去摇摇欲坠的“松光树”倒了！按照村里不成文的规矩，那棵树属于最先赶到现场的那个人。想到这里，我立刻穿蓑衣、戴斗笠、左手持手电、右手提斧头，匆匆赶往倒树的现场。

离开那松光树只有三四十米的时候，传来了第一声清脆响亮的伐木声。唉，还是晚了一步。

我不甘心地上前去，在手电的光亮中，辨认出是村民周恩绍抢在了我的前头，这棵松树已然归他所有。恩绍以胜利者的姿态，潇洒地和我打招呼。

那棵松树是村民劈松光的牺牲品，却让恩绍独自占了一个大便宜。我只能悻悻然回到住处。

村民都知道鹿冈商店有煤油灯卖，连玻璃灯罩在内，每盏九角六分钱，他们咬咬牙，还能买得起。但是点灯的煤油每斤要六角五分钱，一年至少要用去十几斤，实在太贵了。更何况煤油灯的玻璃灯罩非常娇嫩，一不小心就会打碎，却又



煤油灯

无法单独购买。没有玻璃灯罩，煤油灯基本上成了废物。

村里哪怕是最时尚最赶潮流的村民，买了一盏煤油灯便直呼上当：“上绝哩个当”。他们宁可去山上劈松光，松光不用花钱买。

每根松光劈成了宽约一寸，长约六七寸，它最大的功能是用来照明。不管是吃晚饭，还是晚饭以后的纺纱织布，村民都是把点燃的一到二根松光，放在一块青砖上，任其吱吱地燃烧，噗噗地爆出火花，发出比煤油灯亮得多的光焰。光焰渐渐暗下去了，从盛放松光的扁篱中再摸出一根，添加到当作底座的青砖上，光焰又起来了。

光焰旁边坐着的人脸和身影，在光焰的晃动中忽隐忽现。周围的一切都和数百年前相仿佛，时光似乎没有流转。只有厅堂正中间，那忽明忽暗的毛主席的标准像在提醒着人们，这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村民要出门查看柴屋或者牛栏，又或者吃过晚饭要出门到记工员那里记工分，他们照例点燃一根松光，用三个手指捏住下端，擎在头上，照亮前方。因为电池是紧俏商品，不容易买到，所以用手电筒照明走夜路的人很少。

用松光来照明，除了光焰会时大时小，不太稳定之外，另一个缺点是黑烟太大。

我们知青挤住在祠堂里，一开始使用煤油灯照明。有一天，冯金生很想能够像村民那样，省下买煤油的费用，他便拿着斧头上山，劈了一扁篱松光回来，晚上就在房间里点起松光照明。又黑又亮的烟雾随着光焰往上升，没几天就把大家的帐子熏黑了。我表示抗议，连忙把自己的帐子拆下来洗干净。冯金生自己也说，松光烧起来黑烟太大，他的鼻孔里全是黑的。实验很快停止了，余下的松光成了我们烧火做饭时的“引火柴”，先划火柴点燃松光，再用它引燃其他的柴。

我们常说的文房四宝，是指笔、墨、纸、砚。记得书上说过，可以用松烟来做成传统的墨。如果松光的黑烟不是熏黑了我们的帐子和鼻孔，而是另外想办法收集起来，也许正

是做墨的原料呢。

随着里陂上村民的收入逐步提高和国家电网的逐渐普及，到了1990年代，村民家里全部用上了电灯，他们劈松光照明的时代，可以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二、松光和火吊

永丰县的年降雨量有一千六百多毫米，每年开春的桃红梨白时节，里陂上村的水田里已经盛满了春雨，远远望去就像是许多形状不规则的镜面在闪闪发亮，是名副其实的“水平如镜”。镜面底下，手指那么长的小鱼活泛起来了。池塘里放养的大鱼，也会趁着温暖的春水溜出池塘，到田里来找小鱼玩耍。

每逢这种时候，里陂上的村民白天带着斧头和扁篱，抽空去山上劈来松光。到了晚饭以后，村民肩上斜挎着的扁篱装满松光，腰上扎着准备装鱼的篱子，手持捉鱼的鱼叉和斩针，擎着照明的“火吊”，出门到田里去捉鱼了，俗称“打火吊照鱼”。

传统的火吊是铁匠用二分粗细的铁条打成的篓状倒圆锥体，直径和高度均在六寸左右。这“铁篓”的网格很大，圆口的边上有三根一尺来长的铁条做的攀，攀的另一头并拢在一起，连接到一根三尺来长的杆上。这杆靠近“铁篓”的那端，有一尺多长是铁制的，其余部分是木头的把。使用火吊的时候，铁篓里面放置点燃的松光。松光放得越多，火吊就越亮。

我曾经跟着村民张寿仁到里陂上村的大堰上，打着火吊去“照鱼”。

春夜的堰上，田里一片蛙鸣。放眼望去，夜色中有七八团橙色的火在移动，那就是火吊。远处的火团小，移动得慢。



鱼叉

近处的火团大，动得快，还可以看到隐隐绰绰的人影。一团火停住了，那多半是发现了田里的鱼，持着火吊的人正在用斩针捉鱼呢。运气好的话，一个晚上可以捉到二三斤鱼。

我跟在寿仁身后，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斩针。



尚未安装木把的斩针

和松光熊熊燃烧的火吊相比，手电筒那惨白的光束显得十分微弱。寿仁停住了脚步，用火吊照着水面，对我说：“老夏，有鱼，快斩。”我看见田里有两条鱼，正在悠闲地摇着尾巴。

我举起斩针，猛地劈下去，溅了我一脸的水。我定睛一看，那两条小鱼早就不见了。

火吊的光亮渐渐地暗了，寿仁从扁篱中取出几根松光加了进去，只听得松油吱吱作响，松光腾地一声燃着了，火吊一下子亮了起来。我和寿仁忙了两个多小时，才捉到一斤多鱼，我连一条鱼也没有捉到。

回家的路上寿仁告诉我，有一次他打火吊照鱼，看见田埂上有一条很大的眼镜蛇在游动，像是在从上坵田过到下坵田去。（眼镜蛇发怒时，头部下面有一段会变宽，好像是脖子膨胀了，村民的俗称是“涨颈疯”。）

眼睛蛇的攻击性特别强，它可能是觉得受到了威胁，伸起头涨着脖子向寿仁冲过来。



眼镜蛇

寿仁急忙用火吊挡住蛇的来路，那蛇愤怒地缠住了火吊，缠得火吊都开始变形了。寿仁赶紧往火吊里小心地添加松光，让火吊越烧越旺。那眼镜蛇终于受不了火攻，全身松软，掉到田塍上，奄奄一息了。寿仁继续用火吊烧烤，用斩针扎，把这条大毒蛇打死了。

我想，如果寿仁手里拿的是火把，火把是烧不死眼镜蛇的，那还不知道是谁胜谁负呢。火吊比火把要好得多。

打火吊照鱼很少能捉到大鱼，绝大多数是手指那么长的小杂鱼。村民回家以后，直接把小鱼放在大铁锅里炕干了，加上碾碎的红辣椒烧了吃。

后来化肥和农药用多了，春天水田里的鱼就少了，劈了松光来打火吊照鱼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三、救火

里陂上村民的传统房屋，不管是正规的住屋还是放杂物的柴屋，基本上没有窗。即使是最高级的青砖到顶的砖屋，也只会在前墙和后墙上各留两个一尺高五寸宽的墙洞，这就是村民口中正式的“窗”了。房间里非常暗，村民进房找东西，往往要点燃一根满是松脂的松光，借着松光来照明。这就为火灾留下了隐患。

我在里陂上村的十年里，记忆中一共发生了三次火灾，每次都是用松光来照明惹的祸。所幸发现得早，救火及时，损失很小。

1969年的一个晚上，住在我们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听见他家牛栏里的牛有动静，他点着松光去牛栏查看，不小心燃着了牛栏上面堆放的大量干稻草，那是耕牛过冬的饲料。我们上海知青听到恩绍的喊叫，立刻用洗脸盆到水缸里舀了水，冲过去扑救。幸亏刚刚起火不久，也因为知青人多，很快就把火扑灭了。

1971年，村民张发茂的老婆，在白天点着松光，去柴屋

里找猪食盆。柴屋的屋檐不高，松光一下子把屋檐上极为干燥的茅草点着了。发茂在柴屋里存放着他多年来积攒的准备盖新屋的木料。一着火，这批木料肯定全完了，吓得发茂的老婆哇哇大哭起来。我和冯金生听见了，急忙从我们搭伙的村民家的水缸里取了水，冲出去救火。薛志民也很快赶来了。大火把茅草的屋顶烧掉了一大半，盖新屋的木料安然无恙，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应该是 1975 年，夏天双抢大忙时节的一个中午，我和里陂上的村民一起，顶着烈日挑着稻谷，到鹿冈粮站交完公粮回来后，走进厨房准备午饭。正在这时，有人大叫：“着火了！”我刚放下手里的切菜刀，公社武装部的姜部长就冲进了厨房，说：“快，救火！”我急忙拿着脸盆到水缸里舀水，飞快地跑到屋外，发现是我们知青的新屋旁边，村民张顺喜的柴屋顶上的茅草烧起来了。如果不把火扑灭，很可能会延烧到我们的新屋。

我和姜部长拼命地来回奔跑，几分钟以后，我水缸里的水用完了，火也被我俩浇熄了。这时候，冯金生也从鹿冈粮站交完公粮回来了。等到我坐上饭桌，已经是下午二点多钟，终于可以填饱饿得前心贴后背的肚子了。

那天中午，姜部长到里陂上村，是来找我道别，他要调到永丰去工作了。姜部长见我在田里劳动还未回来，就在村民家里吃了午饭，到我们知青的新屋里休息。他在我的床上午睡，听见外面有人大叫，连忙从床上跳起来，到门口一看，只见一个村民慌慌张张地朝自己家里跑去，他是想叫人来救火，手里还拿着一根已经熄灭了的松光。后来我知道，是村民张顺喜，点着松光去柴屋里找东西，一不小心，手里的松光碰到了屋檐上的茅草，烈日下的茅草一点就燃。

我至今想不起来，那天为什么没有其他知青在屋里。好像李桂英正在仓库里称稻谷，而薛志民则已经“病退”回上海了。

我参与的另外一次救火是 1976 年，我在县城里的永丰

饭店参加全县知青代表会议期间。那次救火虽然和松光没有直接的关系，却也牵涉到了松油。

那是开会的第一天晚上，我被永丰饭店的广播吵醒了，喇叭里说永丰松香厂着火了，希望大家去救火。我睡的房间里有六张床，睡着六个知青代表。其他人好像都没有被广播吵醒，我不好意思叫他们，便独自到了永丰饭店的大门口，却空无一人。

我怀疑自己刚才是做梦了，正在犹豫不决，另一个上海知青来到了饭店门口，问我是不是听到了广播。

我俩核对了情况，决定去火灾现场。松香厂在聂家村附近，离永丰饭店有一段路。我俩在清冷的夜里一路小跑，大约十五分钟以后到了松香厂，发现是厂里专门存放松油的松油池着火了，火势并不大，有一队人正在用篮攀传递沙子，往松油池里倒。我们迅速地加入了传递沙子的行列。

这些传沙灭火的人，都是松香厂的职工，据他们说，是厂里有人为了发泄私愤，设法点燃了松油池，放火的人已经被抓住了。

过了半小时左右，火完全熄灭了，人们悄无声息地散开去，我俩也回到饭店继续睡觉。



永丰饭店

第二天上午知青代表继续开会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提到昨天半夜里饭店的广播，我也表示听到了，但是不好意思说自己跑去救火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到松香厂救火，很像是做了一个梦。

知青代表会议结束后，在回里陂上村的路上，经过松香厂的时候，我特别留意观察了火灾现场。松油池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只是池边的墙上有一块地方被火焰熏黑了，不注意观察的话，还真看不出来这里前两天失火了。

我参加的几次救火，都是火苗初起，感觉不到烈焰的威猛和可怕。马立平说，她在高坑村参加过扑灭山火，烈焰舔着火舌随着山风扑过来，高温和缺氧使她立刻感到窒息，马上就想到了死亡。

四、割松油

和松光有关的是松油。松油是一种化工原料，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当年鹿冈公社的各个生产队为了增加收入，经常会安排一两个村民到山岭上去割松油。

割松油的村民首先要到山岭上，挑选那些高大茁壮的松树，这些树的出油率会高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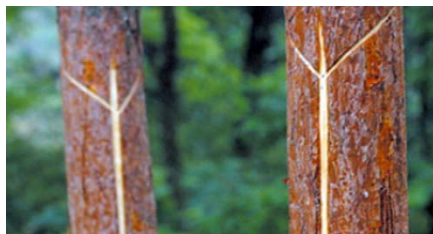
选好了五百到六百棵松树，需要规划好割松油的时候，割油人需要在各棵松树之间行走的路径，然后用柴刀砍出一条可供人行走的小路。

最后，准备好竹制的导管和盛放松油的竹罐，就可以在树上割透树皮，开出一个“V”字形的切口，村民俗称“眉毛叉”。

要让松树持续出油，割松油的村民必须每天上山，用锋利的专用刀具，在松树上割开的“眉毛叉”的下方，削去薄薄的一层树皮。过了几分钟，松树渗出一滴滴像清晨的露珠那样晶莹剔透的松油，顺着“眉毛叉”最下端的竹制导管，

缓慢地滴落到盛放松油的竹罐里。

如今鹿冈地区仍然盛行割松油，只是百年以上的大松树已经绝迹，所割的小松树的直径最多只有一尺，盛放松油不用竹罐，取而代之的是塑料袋。



在松树上割开“眉毛叉”



割松油的小松树和塑料袋

割松油对松树的伤害非常大。俗话说“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树木的根部从土壤里吸收的养料，全靠树皮往上输送。如果割掉一圈树皮，树就会枯死。

记得在中学里，有个同学不相信在生物课上学到的知识，决定要做一个实验，他把校园里最大的一棵大树割掉了一圈皮。学校知道以后非常着急，火速请上海的园林专业人员前来抢救，可是为时已晚。到了第二年，那棵大树果然枯死了。

按照里陂上村不成文的规定，在割松油的树上开的“眉毛叉”，不能超过树围的一半，必须保证有另一半完好的树皮来输送养料，让松树能够继续存活。

可是村民为了多出松油多赚钱，往往把“眉毛叉”开得很大，只剩下三分之一完整的树皮。那松树得不到足够的养料，没过几年，绿色的松针渐渐地变成橙红色，它枯死了。

村民说，即使“眉毛叉”开得不大，割过油的松树只是活着而已，再也长不大了。我有些怀疑这种说法。树只要活着，它木质部的年轮一年一年总是在增加，不会减少的吧。

29. 打铁、锯板和制篾

里陂上村没有木匠、没有裁缝、没有剃头师傅，还有三种工匠也是村里的稀缺资源，一旦需要的时候，村民只能到外村去聘请他们到村里来工作，那就是打铁的铁匠、专门锯木板的锯板匠和制作各种正规竹篾器的篾匠。没有这三种工匠的劳作，就不能维持村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的秩序。

马立平得知我想写这篇文章，她马上表示：“写打铁、锯板和制篾，真要举双手赞成，这三件事我都尝试过。左手上当年篾刀刻下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见，而‘破竹’的气势更是永生难忘。记得还在哪里打过几下铁，锻打需要用的力气，比看别人打铁的动作给我的感觉要来得更大。”

一、打铁

据说和永丰县相邻的吉水县，是出铁匠的地方（永丰县本身就是宋朝时候从吉水县分出来的）。在永丰县各处挑着担子到各村去打铁的师傅，多半是吉水人。他们各自有大致固定的活动范围，担负着一些村子里的铁器修造业务。每年挑着担子来里陂上村的那个打铁师傅，正是吉水人，黎师傅。

记得是刚下乡那年，一个阴湿的冬日。我在油灯下吃完晚饭，就听见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在外面和什么人说话。接着是“吱呀呀”的一声，祠堂的大门开了，恩绍手持一根燃烧着的松光在前面引路，后面跟着进来了两个人，好像挑着很重的担子。那是打铁的黎师傅和他的徒弟到了，我很好奇，连忙推开碗筷，过去凑热闹。

放在厅里的担子还没有打开，但是我看见一个有棱有角的长方形木头箱子上，有一个把手，那应该是鼓风用的风箱了，好像和上海街头爆“炒米花”时用的风箱差不多。



传统的木风箱



2014年，鹿冈的铁匠铺里有鼓风机。

恩绍从牛棚顶上抱来了一大堆稻草，他嘴里招呼着：“黎师傅还有吃饭？就到我屋里吃吧。这是给你们晚上打地铺用的草杆。”

黎师傅笑着答应了：“制得（可以）。这是一块六角钱，是我买草杆的票子（钱）。”

恩绍和黎师傅开始推推搡搡，互相谦让起来。最后是黎师傅收回了钱。

在他们推搡谦让的过程中，我听出来，恩绍的父亲当年就是从吉水到永丰来打铁的铁匠，最后定居在里陂上村的。恩绍还有一个姐姐，长大以后嫁回到吉水县去了。

第二天一早，黎师傅摆开了打铁的用具，主要是一个不大的炉子、一个风箱和一个不大的铁砧，其他的就是大锤、小锤和各种大小不一的铁钳了。

我问黎师傅：“这么小的炉子肯定不能烧劈柴，你们是烧煤么？”

黎师傅说：“烧木炭和火屎。我徒弟去村里买火屎了，这村里没有木炭。”

村民煮饭时，灶膛里的劈柴烧到最后，变成了很多枣子模样的红彤彤的小块，热力十足，那就是“火屎”，它的学名应该叫作炭烬。村民从灶膛里铲出炭烬，用水浇灭了，晾干以后收起来，专门等着铁匠来收购，可以增加几个零花钱。

那徒弟熟门熟路，知道哪些村民家里有炭烬，他很快回

来了，还捎带着买了些白米和蔬菜。师徒俩有打铁的炉子，可以自己做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平时用的铁制器具，在使用中都会磨损。火铲越用越薄，火钳越用越短，原来七八寸长的镢头板和镢銼板，不出几年，磨损到只剩下五寸来长。铁器需要修复，村民叫作“请铁匠来‘钢’一下”，这里的“钢”字念第四声。

早饭以后，村民大多知道铁匠进了村，三三两两地来了。“钢镢头，一块五角；钢镢銼，两块……有涨价。”黎师傅忙不迭地应承着村民的询问。

生产队长也来了，给黎师傅递上了一支烟。他要为来年的春耕未雨绸缪，队里耙田用的齿耙需要“钢”一下了。队长和黎师傅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给队里钢五张齿耙，每张从三十块钱降到了二十五块。

黎师傅开始工作了。他把一块需要接长的老镢头板放进炉子里那微弱的火苗上，上面用炭烬盖住三分之二，留出了镢头板的一端。徒弟使劲地拉动风箱，炉子里很快冒出了带有蓝色的火苗。

不一会儿，黎师傅的右手执握小锤，在铁砧上“嘚嘚”地轻敲了两下。徒弟听到了信号，立刻从风箱边跳起来，执住了大锤。

黎师傅的左手从炉子里钳出了镢头板。那埋在炭烬里已经变得红中带白的一头，放在了铁砧上；另一头用铁钳紧紧地夹住，掌握在黎师傅手里。

小锤是打铁的指挥员，“叮”的一声，打在了烧得通红的铁板上，分量并不重，铁板几乎没有什么变形。那是在告诉大锤：打这里。

大锤是战斗员，接到大锤的命令以后，便瞄准部位，狠狠地砸了下去。“当”的一声，不大的铁砧颤抖了一下，铁板的形状变化了。

“叮、当，叮、当，叮叮、当……”空气中悦耳的打铁

声可以传得很远，它是好听的音乐。但是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那响亮的节奏又像是“打铁请找黎师傅”的广告。

有时候，黎师傅一边挥锤锻打，一边简短地斥骂徒弟。那多半是他嫌徒弟太笨，大锤没有打在指定的位置上。或者是嫌徒弟太懒，大锤不够给力。

师徒俩把磨损了的旧镢头板打薄，两边向里弯曲，中间插上一块烧红的新铁板，捶打“咬紧”，再反复地烧红、锻打，最后成型。

村民三三两两地在周围，看着黎师傅打铁，嘴里经常会念叨：“老话说‘打铁冇样，边打边像’，你看你看，黎师傅的铁锤就是会打出各种花样来。”

可是我觉得，黎师傅是“打铁有样，边打边像”，要把铁块打成什么形状，那“样”都在他的心里呢。村民所谓的“打铁冇样”，应该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黎师傅钳住“钢”好的镢头，放入水桶里面。“嗤”的一下，水桶里冒出了丝丝白烟，三四秒钟后取出镢头。（书上说，那是淬火，可以增加镢头的表面硬度，使它比较耐磨。）取出的镢头扔在地上，让它自然冷却。（书上说，那是回火，能够去除淬火时产生的内应力。）

我们知青使用的不是镢头，而是队里用我们的“安家费”从鹿冈商店买来的“镢仔”。在村民看来，镢仔是妇女和小孩用的不正规的农具，所以有“做事用镢仔，吃饭用钵子”的说法，经常用来嘲讽一个人做得很差，吃得却很多。

后来，我的农活做得很棒了，逢到掂着镢仔去田里工作时，每每想起那句嘲讽人的话语，心里不免有些不舒服。

有一年，黎师傅又进村了，我决定不光要为自己打一把崭新的镢头，我还要有属于自己砍柴用的斧头和毛镰等铁器。村民家里都有这些用具，以往我都是向他们借来用的。

看着五十来岁的黎师傅微微地驼着背，正在熟练而轻松地为我打造新镢头。我突然手痒了，连忙给他师徒俩递上香烟，要求让我玩一下大锤，校验一下打铁究竟是什么味道。

黎师傅答应了。

我抡起大锤，按照他小锤的指点，猛力往下砸。“叮、当！叮、当！”地砸了那么十几下，感觉到烧红了的铁还是很硬，正像立平后来说的那样，需要用的力气比我要大很多。

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看人挑担不吃力”，意思是看别人做事好像很容易，要到自己亲力亲为的时候，才会知道其中的艰难。依我看，这句话也可以改成“看人打铁不吃力”。

那天晚上，我抚摸着崭新的镢头、斧头和毛镰，反复地欣赏、把玩，简直是爱不释手。想到自己从今以后再也不用镢仔，而是用镢头来干活，那就更像真正的农民了，心里觉得很满足。

冯金生的想法和我不一样，他直到 1975 年离开里陂上村去读书时，一直是使用他的那把镢仔。



2014 年，鹿冈铁匠铺，掌小锤的师傅。 改用机器来打大锤

二、锯板和樟木箱

1960 年代的上海人说到江西的特产时，第一就是樟木箱，其次才是南丰县的贡橘、上饶市的夏布、樟树市的中药材和四特酒。上海人用樟木箱来存放衣物，似乎可以永远不用担心箱内衣物的第一天敌——蠹虫。

到了里陂上以后，我很快就知道，里陂上村的屋背岭上和鹿冈老墟的大桥边，那几棵郁郁葱葱、数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就是乡规民约中明确规定的不准砍伐的樟树。摘下樟树叶嗅一嗅，确实有一股清香，透出了一丝类似于上海买的樟脑丸的味道。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真是樟树啊，是可以做樟木箱的樟树。”

从那以后，我就存下了一个念想：若是能找到一棵樟树，锯成板，做成樟木箱，用来存放衣物，那还真不错。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村民朋友张寿仁，他开始觉得很奇怪。里陂上村民多是用一种二开门的杉木“层子橱”来存放衣物。就算是村里用来存放贵重资料“族谱”的箱子，也只是杉木箱。没有村民用樟木来做箱子。

寿仁是村里比较追求新奇的青年，很想知道樟木箱子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和他约定，一旦有机会找到可以砍伐的樟树，我俩一起干。

一年以后，机会来了。寿仁告诉我，在一处绝壁下面，有棵樟树的全部枝桠被村民砍去当柴烧了，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

我问寿仁：“这树有多粗？”

寿仁双手一围，作出合抱的样子：“这么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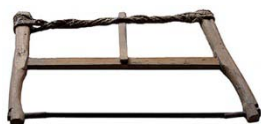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和寿仁合作，把这棵樟树砍倒，用斧头断成了四段，每段三尺长，抬了回来。

樟树要锯成木板才能做箱子，得请专门的锯板匠。寿仁说，锯板不难，只是比较累，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来锯板。我当然愿意有机会学习一门新的技术，“艺多不压身”么。

到了农闲时节，田里的劳作轻松了，我和寿仁不约而同地想到，该把那几段樟树锯成木板了。我们找来了两个“三脚马”，在厅里放稳当了，再加上三根杉木，做成“马架”，把一段樟树搁上去，用专门的刮刀来刮去树皮。我有墨斗和角尺，在树段上仔细地弹好墨线，把树段放正了，用马钉固

定在马架上，就可以开锯了。

锯板要用框锯，框锯和一般的木工框锯看上去不一样，结构却差不多，都是由工字形的木框架、绞绳、绞片、锯条等组成。用绞片绞紧了绞绳，锯条就绷紧了。我和寿仁分别站在马架的两边，各自双手握住框锯的一边。



作者的木工锯之一



作者当年曾用这把框锯来锯板

锯板先要“开锯路”，在木头的一端锯出一条缝来。这时，右手紧握锯把，左手按在起始处，轻轻推拉几下，用力不要过大。推拉框锯时不要左右歪扭，推锯时要重，拉锯时要轻，推拉的节奏要均匀。



三脚马



用框锯来锯板的样子

三段樟树都锯成了半寸厚的樟木板，我们把这些木板运送到寿仁家的楼上，木板之间用细木条隔开，可以让木板干得快一些。同时，把木板依旧叠成整段樟树的模样，两端用藤条捆紧，使得木板不容易变形和开裂。

两年以后，樟木板终于阴干了，我准备做两只樟木箱，一只自己用，另一只带回上海，孝敬父母亲。

我请木匠来做樟木箱的那天中午，邮递员老徐来村里送信，他看见了做箱子的场景，便问我：“你也在做樟木箱子带回上海去？”

我说了自己的打算，然后问他：“你说‘也’，难道有很多人这样做么？”

老徐说：“早就有知青这样做了。告诉你，我有一个好办法，可以帮你把箱子运到上海去。”

我立刻精神一振。自己正在为这个问题发愁呢，从里陂上村到上海，交通毕竟不太方便。

原来，老徐的办法是把樟木箱当作人们平时寄包裹时的包装木箱，寄到上海去。邮政包裹专用的白帆布口袋很大，一号袋可以装一只二尺四寸的樟木“包装箱”，二号袋能装二尺二寸的樟木箱。

我笑了：“老徐，你真有办法，既为我们解决了困难，又为你们邮局赚了邮寄费。”

老徐说：“我哪有你们上海人聪明，这是其他大队上海知青出的主意。”

在老徐的指导下，我把一只“樟木包装箱”从鹿冈寄到了上海。母亲收到了硕大的包裹，打开“包装箱”，里面除了一封信，什么东西也没有。等到母亲读完信，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从那以后，我在公路附近的田里干活时，每当从鹿冈那边由远而近地传来摩托车突突的马达声，我就会停下手里的工作，眺望着那飞驰而过的绿色邮电摩托车，辨识着后座的两边是否挂着两只很大的白色邮政包裹袋。那口袋里面多数是鹿冈知青寄回上海的樟木箱。

村民平日里不管是切菜还是剁猪食，用的都是樟木砧板。我也用一寸厚的樟木做成了砧板，但是开始用樟木砧板的一个月里，做出来的菜肴，总脱不了一股樟木的辛辣怪味。

到了198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工作时，有一次，突然发现四川北路的商店里有樟木箱出售。我征得售货员同意，

打开了箱盖，马上发现那箱子只用了很少量的樟木板。我问：“你们卖过全部用樟木做成的箱子么？”

售货员摇摇头，说：“没有。哪里有全樟木的箱子卖？我要去买。”

如今我从美国回到上海，那只里陂上的全樟木的箱子，静静地呆在上海的房间里。我看看它，它也看看我，似乎想起了它自己的前世今生，想起了我用框锯把它锯开的那一刻。瞧，它很默契地对着我笑呢。



作者的樟木砧板



作者的樟木箱

三、制篾

中国南方盛产的毛竹，据说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草本植物，这种草可以长到二十米高，而且长得很快，一般两年就能成材。又因为毛竹柔韧性好，纹路很直，不会变形，容易加工，是里陂上村民制作各类竹篾器具的主要材料。

我在村里吃饭时，手里持的是竹筷子。如果坐在饭桌上，环视一下厅堂，板壁上扣挂着晒箕和肚箕；地上放着一担空箩，一只箩上搁着米筛，另一只箩上插着撮箕；墙角里则靠着一对篮攀。这些器具的名称里，都有带竹字头的字，它们都是竹篾器。

想起村民平日的谜语里面，如果说“什么东西上圆下方？”谜底是箩。“什么东西上方下圆？”那就是我手里拿着的筷子。

再仔细想想，江西是从前楚国的腹地，如果把二千五百年前雄踞南方的楚国称作“竹子的国家”，应该不算过分。

我们每年从山上掬回村里来的竹子都是毛竹，必须趁着在毛竹新鲜湿润的时候，请篾匠来“制篾”。如果毛竹干燥发黄，柔韧性变差，就很难加工了。

篾匠用刀把竹子破开破细了，竹子就成为篾片。带有竹皮的是篾青，比较结实，没有竹皮的是篾黄，稍次一些。我想，做竹篾器的手艺人主要是玩弄篾片，所以才叫篾匠的，没有村民称呼他们为“竹匠”。

生产队请篾匠

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是集体劳作，需要的竹篾器具主要是晒簞、箩、撮箕和谷筛，以及篮攀。

篾匠师徒在约定的日子进村了。每逢这种时候，村里有几个老者就会唠叨起来：“唉，年年都要请篾匠，我们先前哪有这样？如今的后生败家呢。”

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珍惜和爱护，使得属于集体的各种器具大大缩短了使用的年限，这才不得不每年都要请篾匠来村里干活。

篾匠师傅使用的工具不多，通常是篾刀、篾针、手锯、圆刀等，只有四五样。



从左到右：篾刀（用来破竹和破篾）、篾针（用来编织）、圆刀（划出等宽的篾片）。

不管最终要编织成什么样的篾器，篾匠必须先用篾刀，把毛竹从中间破开。记得书上有个著名的成语叫作“势如破竹”，常常用来形容战斗节节胜利，毫无障碍。但是到了里陂上，见识到真正的“破竹”以后，我才意识到“势如破竹”的基本事实，还是破竹子，特别是破毛竹。

我们从山上掬回的大毛竹长的十来米，短的六、七米，

而截好的竹梢的直径有两寸多。只见篾匠师傅左手紧握篾刀，刀口向下，逢中抵住竹梢的横断面，右手挥拳，朝篾刀的刀背猛地一砸。“啪”的一声，竹梢裂开，刀口进去了。顺势拍几下，篾刀进去了近二尺，竹梢开裂得更大了。掰开竹梢，抽出篾刀，改为刀口向上，刀背向下，再插入竹梢的裂缝。然后握紧篾刀，突然向下发力，只听得“呱啦啦”的一阵声响，一根硕大的毛竹顺着竹节一路往下，迅速破成了两半。

也有时候，当竹缝裂到六、七尺时，篾匠干脆抽出篾刀，两手各执一边竹梢，吸口气，两臂同时向外一抖，那毛竹像从他手甩出的两根绿色长鞭，“哗”的一声，从上到下，一分为二，煞是好看。

我在旁边看着师傅破竹，那气势，那声响，心里的感受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

时间长了，我向篾匠师傅提出来，能不能让我试一下。师傅说，这些竹子没有前些日子那么湿润了，要难破一些。但是他经不住我的多次要求，不很情愿地把篾刀递给了我。

我学着师傅的样子，把竹梢破开，可是再往下就不行了。师傅笑了笑，上来帮着我，把那根毛竹破开了。不管怎么样，我看着躺在地上那分成了两半的毛竹，心里还是很高兴。

毛竹破开以后，篾匠师傅根据不同的需要，再把它破成宽窄不等、厚薄不同的各种篾片和篾条。用刀刃压住篾条，通过圆刀，把篾条拉成一定宽度的同时，篾条就刮得十分光滑了。而篾针则是编织竹篾器具时常常用到的趁手工具。



村民用毛镰破篾



篾匠用篾刀破篾



篾匠用圆刀拉篾

篾匠在工作的时候，和来里陂上村的其他工匠一样，没有什么劳动保护。因为不戴手套，再有经验的篾匠，双手还是很容易被锋利的篾片划伤。我想起马立平手上那明显的伤痕，当年她一定流了不少血。唉，女流之辈去玩什么篾刀呢，女人的手是不应该流血的。

自己请篾匠

村民自己家里也要用不少竹篾器。手头宽裕了，有些余钱的时候，就会请篾匠来家里，帮着修补和添置一些竹篾器，比如晾晒笋干、笋菜和南瓜饼的晒箕、肚箕，庠水用的庠斗，煮饭用的汽盖、甑篦，筛米用的米筛，睡觉用的篾席。有村民的女儿要出嫁了，为了给女儿置办嫁妆，会请篾匠来编织做女红的针奩，作客时提的腰子篮，取暖时用的火笼，等等。



取暖用的手笼和脚笼

煮饭用的汽盖和甑篦



晾晒东西的晒箕

筛去稻谷的米筛

竹篮和涮帚

村民自制的竹篾器

村里几乎每个男人都会到山上砍些拇指粗细的小山竹回来，破开以后做成各种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器具，如篱子、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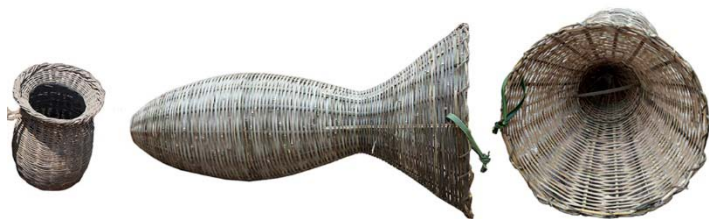
筍子和竹耙等。

篾子最常用，主要是用来盛放田里捉到的小鱼和山上扯到的竹笋。

簰是放在水流大的地方，主要用来捉小鱼。

筍子是安放在田阡处，用来捉田里的黄鳝和泥鳅的。

山岭上的松树属于四季常青的“常绿乔木”，树上新生的松针是嫩绿色的，老的墨绿色的松针渐渐泛黄，就会落下一些来，村民称作“松毛”。村民用自制的竹耙到松林中，耙起地上棕红色的松毛。松毛含有松脂，是引火的好材料。



篾子

簰，据说是甲骨文“再”字的原型。



篾子的底部要用力才能转开

耙松毛的竹耙

有一个时期，村里参加自制斗笠的人数很多。我从山上砍来细山竹，用毛镰破成很细的竹篾，跟着寿仁他们，一起编织斗笠。可是我横编竖织，弄出来的东西越看越觉得难看，实在不敢戴在头上。（倒不如请薛志民给我剃头，他剃得再难看，我自己也看不到。）

听陆禹平说，他曾经编过斗笠。如果他是戴着自己编的斗笠去出工，我从心底里佩服他。

2013年的夏天，我在永丰县城和朋友聊天，说起当下的演员在舞台上演出，有时候剧情需要他们戴斗笠，可是负责服装和道具的人买了斗笠，却没买“凉箍”。没有“凉箍”的斗笠怎么戴呢？

我感叹道：“可惜永丰的斗笠合作社已经解散多年，要不然真想买一只斗笠给我的孩子看看，让他们长些见识。”

朋友接嘴说：“夏老师，永丰街上还有私人在卖，就在下西坊的街口上。下西坊快要拆掉了。”

下西坊？据说那是清代状元刘绎的故里，还出过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将军金如柏和他的儿子金一南。

我们匆匆赶到下西坊，果然有白发苍苍的老者在卖斗笠，没有凉箍的斗笠每只12元，凉箍分开卖，每只2元。



作者2013年购，当年里陂上村民的斗笠里都加有竹子做的“凉箍”，既凉快，又戴得稳。



2013年，永丰县城里要拆毁之前的下西坊。

30. 水灾

种田是靠天吃饭。在里陂上村，旱灾不常见，水灾是常有的事。水灾能使粮食减产，能使交通中断，能造成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一、粮食减产

水灾能使里陂上村的粮食减产，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

我们到农村的第一年，割稻开始不久，就下起了大雨，不能出工了。老天爷给我们放假了，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年轻人高兴地聚在一起，打扑克牌消磨时光，等待天气放晴以后再下田。中老年村民则在家里打草鞋、编斗笠。在他们看来，打扑克是浪费时间。

过了几天，大雨依然没有停，开始涨水了。大水漫到了里陂上那些地势低洼的稻田里，村民紧张起来了。我看见村民周恩绍穿戴停当，正准备出门，便问他：“还在下雨，难道队里要出工了么？”

恩绍说：“没有出工。我要到田里看一下。”

我连忙说：“等我一下，我也去。”

我穿戴好蓑衣斗笠，扛着锄头，跟着恩绍，冒着风雨出门，查看水灾的情况。

稍微高一点的稻田里，只有稻穗露出了水面，在流水的冲击下痛苦地摇晃着，好像在叫我们去救援。远处低洼的稻田里，黄澄澄的水稻不见了，变成了一片白花花的水面，在风雨的吹袭下现出一道道的波纹。恩绍在风雨中大声地说：“这该死的楼板漏了这么久，也该停了吧。”他说的“楼板”即天花板，指的是天，“楼板漏”就是天下雨了。村民忌讳诅咒老天，总是用“楼板”来代替。过去在书上读到，中国人有“避讳”的传统，在里陂上村算是亲身体会到了。

我突然发现，风雨如晦中，水面上好像有一只小船在慢

慢移动。这怎么可能呢？整个鹿冈公社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似乎连一只船也没有的。恩绍大声叫起来：“哎呀，队里的禾桶飘走了！”原来那是一只空禾桶，在水中浮了起来，远远望去就像小船一样。村民按照老习惯，把脱粒用的空禾桶留在没有割完的稻田里，准备第二天继续割稻的时候使用。谁也没想到有这么大的雨，又下了这么多天，大水把禾桶冲走了。

好不容易等到雨停了，一点算，一共飘走了两只禾桶。队里派人到下游去找了两天，仅仅找回来一只。大水退去以后，很多水稻倒伏在淤泥里，乌黑的稻穗已经发芽，长出了半寸多长的禾苗。

不用说，大水浸过的田减产了。又因为大雨推迟了抢收抢种的进度，那年秋天的连作稻也减产了。

二、交通中断

水灾能使交通中断。

里陂上村口的公路桥边，是整个永丰到乐安的公路的最低洼处，那一年，大雨造成的交通中断已经十来天了。

一天早饭过后，我看见一辆从抚州到吉安的绿色班车停在了公路桥上，车前方桥下的公路上，是很深的积水。有两个乘客脱了衣服顶在头上，光着屁股往桥下的积水里走（这时村里两个在路边看热闹的女孩红着脸逃回村里去）。乘客发现积水还是太深，汽车过不了，便慢慢地退回来，爬上了班车。班车费劲地掉了头，呜呜地往来路开回去了。

后来公路改道了，从里陂上村对面的石壁岭下绕行，避开了这座桥，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

有一年，我从上海回里陂上村，坐火车辗转到了抚州北火车站。我挑着两个大号的旅行袋，一路小跑，想尽快走过抚河大桥，赶到大约四公里外的长途汽车站，排队购买第二天的汽车票。



2010年江西水灾，进入里陂上村的唯一通路上的桥梁，大水过后成了危桥（水泥板中甚至没有钢筋）。



2011年3月，有钢筋的水泥新桥落成。村里为建桥筹集12万元，把一些山岭70年的使用权卖给了鹿冈林站。

远远地看见抚河大桥，我觉得情况不对，桥上空荡荡的，连一辆过桥的汽车也没有。待得再走近一些，我傻眼了。大水淹没了抚河大桥的桥面，桥的中间还能看见有桥栏杆露出来，桥的一端有两三个人，大概是探摸着水里的桥栏杆，艰难地在齐腰深的水中往前移动。抚河变得十分宽阔，混浊的流水卷着大大小小的漩涡，慢慢地向下游流去。

我来到抚河边。河边停着几只小船，有人喊着：“五角钱一个人，一个人五角钱。”这是临时出现的摆渡船，可以把一些着急要过河的人送到对岸去。他们是趁这个机会，私人来赚外快的。有几个人站在船边，迟疑着不敢上船。这木船只有我们上海的公园里自己动手划的船那么大。船上可以

坐六个人，艄公只有一把桨。

一个老艄公喊着：“我这里还少一个，再来一个就走了！”我急着要过河去买车票、住旅店，匆忙环顾左右，旁边的两只船里没有客人，看来一时不会出发。老艄公看见我在犹豫，对我招招手，大声说：“五角钱，上来就走。”我没有细想，应声走上这只船的跳板，一个大步上了船。船身猛地往下一沉，其他几位客人的脸唰的一下白了，一个妇人嘟囔说：“还挑着担，有两个人重了。”我的旅行袋里多是给里陂上村民带的东西，是有八十来斤的行李呢。

老艄公一边收撤跳板，一边说：“没关系，很安全的。”小船出发了。

我们的船头朝着上游划去，船身和河岸的夹角只有三十度，几乎是逆流而上，这样才能保证小船不被湍急的流水冲到下游去。船帮最低处离开水面只有三寸左右，我想，如果船翻了，行李我是不要了，只要能保住我活着游到对岸，保住我缝在内裤上的那些钱就行。

艄公坐在船尾，用一把桨划船。小船慢慢到了河中间，流水愈加湍急，浪也大了，开始有浪花溅进船里。有个人动了动身子，船摇晃起来，更多的浪花溅进来了。老艄公和缓地说：“坐稳了，不要动，很安全的。”我们个个面色凝重，人人屏住了呼吸。我们的船好像一动也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离对岸近了，水流平缓了一些。一个人突然说：“看，那只船冲下去了。”我们顺着那人指的方向看过去，在我们的下游有一只和我们一样的摆渡船，显然是因为角度没有算好，已经失去了控制，正随着波浪往下飘去。看到这样的情景，大家在心里为自己感到庆幸，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大伙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感激地望着我们的老艄公。一个人大声说：“老者，还是你有本事！”我们异口同声，开始不住口地夸奖老艄公。

老艄公还是坐在那里，一桨一桨地划着船，脸上露出浅

浅的笑容，淡淡地说：“我说了么，很安全的。”

小船终于到岸了，大家开始付钱。我拿出一块钱给艄公，说：“我有行李，算两个人吧。”老艄公还是把五角钱塞回到了我的手里。



2010年江西水灾，河水泛滥。

三、重大损失

我下乡以前居住在上海时，几乎每年夏天都会遇到台风来袭，台风就是狂风暴雨的代名词。如果台风的风力达到了十级，我在逆风行走时，几乎走不动路。要是一转身，人立刻站不稳，好象要被狂风吹走了。若是遇上了强台风过境，上海的马路上总有高大的行道树倒伏在地，会造成短暂的交通中断和局部的停电事故，台风会造成各种经济损失。

水灾更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重大损失。

东海上的台风登陆以后，一般很少能够穿越福建省西面的武夷山脉，跑到相邻的江西省来。所以自从我到了江西，每年夏天上海的台风季节里，我都忙着在里陂上村的田里割稻插秧，从来没有遇到过台风。但是有一次例外。

那次例外发生在1975年的8月初，江西省气象台和永丰县气象站都发布了台风警报。但是当台风真正来临时，里陂上村只是刮了一阵七八级的大风，下了两个小时的大雨而已，和上海的台风根本无法相比。

可是到了8月中旬，我在交公粮的间隙里，弯到鹿冈邮电所去寄信，发现邮电所贴出了一张印好的紧急通知，说是8

月上旬，河南省驻马店地区降下漏天大雨，造成京广铁路上的漯河大桥被冲断，江西省各地邮局停止接收寄往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的物品。何时恢复收寄，另行通知。

“漏天大雨”这个词从来没有用过，连坚固的漯河铁路大桥都能冲垮，河南一定是遇到了天大的水灾。我问邮电所的老徐，他都听到些什么。

老徐说，火车不通，邮路断了，已经收寄的寄往西北的物品完全运不出去，其他寄往北方的邮件也要绕很多路，速度很慢。邮电系统的仓库里堆积如山，很多收寄的食品发霉发臭了。他又说，有传闻是河南下了极大的雨，像是天漏了，只要把空的脸盆伸出屋去，马上再拿进来，就是满满一盆水。听说是大雨造成了大水库决堤，很多村子冲走了，河南已经死了很多人。

听老徐说到这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起了以前背诵得很熟的词句：“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和“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太惨了。转眼一想，不对，把人民领袖的词句套用在这河南的大水灾上，是对领袖的大不敬，我犯错了。

记得是过了一个多月，老徐告诉我，他们邮电系统恢复正常了。



当年鹿冈邮电所外面的邮箱陆禹平提供

过了几年，我在江西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大意是河南驻马店地区的地委书记，把国家调拨的五亿元人民币的水灾救济款扣下了二亿，用来建造“楼堂馆所”，没有用在灾

民身上。这个书记抓进去了，判了很重的刑。仅仅从这条消息来看，从国家史无前例地给出五亿元救灾款，就可以想像那年河南的水灾有多大！

现在网络很发达，我这才通过网络了解到，1975年8月初的台风刮过里陂上村以后，一路向西进入湖南省，然后向北，最后停留在河南省。那次台风是酿成漏天大雨的源头。

这里是百度百科的一个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727123.htm>

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那次世纪大水灾。

考虑到网络的链接有时会撤销，有时内容会改变，我还是从中抄录几小段为好：

“1975年8月5日至7日，三天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的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目击者称：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同黑夜；雨水像从消防水龙中射出；从屋内端出脸盆，眨眼间水满；暴雨如矢，雨后山间遍地死雀。

“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了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到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相继垮坝溃决。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

运输 48 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这场暴雨超过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的特大暴雨，是水库设计者们未曾预料的。”

以上基本上是官方的资料，应该比较可靠。如果参照民间的说法，这场世纪大水灾的灾情更加严重，损失更为巨大。



1975 年河南大水灾，国家建造的板桥大型水库发生了溃坝。



1975 年河南大水灾，洪水冲毁京广铁路。

31. 虫害

我们人要吃粮食，虫子也要吃，人和虫子就起了冲突，这些虫子理所当然就成了我们要消灭的害虫。里陂上村的稻田里，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发生虫害，我们需要及时用喷雾器或者喷粉器来喷洒各种农药，尽力杀灭害虫，叫作“虫口夺粮”。



喷雾器

一、突击打药

有一年的春天，真是风调雨顺。我们播下种谷以后，不曾遇过倒春寒，所以不像往年那样，多少要烂掉一些秧苗。水稻在生长最需要水分的拔节、扬花和吐穗的日子里，老天爷也像是特别眷顾，几乎是每天晚上下一次雨，第二天的白天依旧是阳光灿烂。这就给水稻生长带来了充足的水分、光照和热量。村民说，种田的人就是要“靠天吃饭”，已经几十年没有遇到这么好的天气了。大家一致认为，今年的粮食一定会增产，丰收在望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开镰收割前的十几天，突然发生了大面积的虫害。数不清的稻穗枯黄发白了，禾叶鞘焦黄枯萎了，有些田里甚至连整棵整棵的水稻都枯死了。看情势，这应该是一种叫做“稻化螟”的害虫在作怪，必须尽快

杀虫，从虫的嘴巴里把粮食夺回来。

我跑到鹿冈，找到商店的王主任，他是那年在里陂上村“蹲点”工作的干部。老王觉得里陂上村的丰收已成定局，已经有一阵子没到村里来了。我心急火燎地向他报告了情况，老王二话不说，他和我一起，赶到里陂上村的大田里，实地查看灾情。

根据以往喷洒农药的经验，眼下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是喷撒农药“六六六”，里陂上村民的俗称是“六六粉”。老王是商店主任，他回到鹿冈，让手下的人一查，发现库存的“六六粉”只剩下两包了，不够用。老王马上摇动电话机，接通了县里的有关部门，要求紧急调运一批农药到鹿冈来。

可是村里买来了“六六粉”以后，却因为喷撒这种农药实在太呛人了，谁也不愿意干这种活。没人干，我来干。村民喷撒农药没有防护服，我比他们好一些，多有两样防护用具，一样是常见的白色棉纱口罩，另一样是我鼻梁上戴着的近视眼镜。直到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看见中国某地的农民在喷撒农药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喷撒“六六粉”的喷粉器，是一个圆柱形的铁桶，它的一端有个摇柄，可以带动喷粉器里面的风扇，把药粉从喷管里吹出去。喷管是“丫”字形，前端伸出两个喷口。喷粉器里面装满了“六六粉”，有三十来斤重。

我背起了喷粉器，戴上了斗笠和口罩，用力转动着摇柄，喷粉器便呜呜地哼着，把“六六粉”从喷口射出去，弥漫开来。我整个人立刻笼罩在了淡黄色的烟雾中，鼻子里嗅到一股辛辣的味道，很呛人。工作不到十分钟，我身上已然是薄薄一层淡黄色的毒粉。半个小时以后，我戴的口罩开始变成黄色。再过一会儿，手臂上渐渐渗出了细密的凉凉的水珠，这可能是像腌咸肉一样，“六六粉”把我肌肉里的水分给腌出来了。

用喷粉器来喷撒“六六粉”，努力工作一天，可以喷撒四十到五十亩田，比用喷雾器来喷洒液体农药的速度要快四

到五倍。我和村民中的党员张贤通，坚持喷撒了两天的“六六粉”，终于制止了虫灾的蔓延。

下乡以前，我在报纸上看到，“六六粉”是科学家反复试验了 666 次才获得成功的农药，太不容易了。十年以后回到上海，报纸又告诉我们说，科学家发明的“六六粉”是剧毒农药，会污染环境，对人和牲畜有害，已经禁止使用了。

（后来我知道，科学家发明了一样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又被科学家否定，那是很常见的事情。）



如今，新型的喷雾器，喷出了浓浓的农药烟雾。

几十年过去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顺便上网搜索，查找有关“六六粉”的资料，这才发现它的毒性非常大，令我目瞪口呆：

“人体中毒时，对神经系统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多汗、无力、震颤、上下肢呈癫痫状抽搐、站立不稳、运动失调、意识迟钝、甚至昏迷、并可因呼吸中枢抑制而呼吸衰竭。

“对消化系统会产生流涎、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疼痛及腹泻等症状。

“呼吸及循环系统可以造成咽、喉、鼻粘膜因吸入农药而充血，喉部有异物感，吐出泡沫痰、带血丝、呼吸困难、肺部有水肿，脸色苍白，血压下降，体温上升，心律不齐，心动过速甚至心室颤动。对皮肤、眼部的刺激症状，有皮肤潮红、产生丘疹、水疱、皮炎、甚至糜烂有渗出、发生过敏

性皮炎；眼部有流泪，眼睑痉挛和剧烈疼痛。

“六六六的一般毒性作用为神经及实质脏器毒物，大剂量可造成中枢神经及某些实质脏器，特别是肝脏与肾脏的严重损害。六六六可通过胃肠道、呼吸道和皮肤吸收而进入机体。

“六六六进入机体后主要蓄积于中枢神经和脂肪组织中，刺激大脑运动及小脑，还能通过皮层影响植物神经系统及周围神经，在脏器中影响细胞氧化磷酸化作用，使脏器营养失调，发生变性坏死。能诱导肝细胞微粒体氧化酶，影响内分泌活动，抑制 ATP 酶。

“致癌：80mg/kg 周，小鼠经口，致癌。六六六异构体的慢性毒性与在啮齿动物中观察到的致癌作用有关，影响最强烈的是 α -六六六，研究证明 α -六六六具有很高的致癌性。”

无知者无畏。“如果当年就知道‘六六粉’的毒性这么大，自己还会奋不顾身，自告奋勇地冲上去喷撒么？”我问自己。

静思良久，我觉得自己很可能是那个虽然心里害怕、犹豫踟蹰，但最后还是咬紧了牙关，硬着头皮往前冲的傻瓜。

我和贤通喷撒完了“六六粉”，没过几天，商店主任老王从县里开完会，搭乘拖拉机回鹿冈。拖拉机路过里陂上村时，老王直接下车，然后径直走到田里，再次查看灭虫的情况。他看见我和冯金生在田里干活，笑盈盈地走过来，说：

“这次多亏了你们知识青年及时报信，要不然虫灾弄得粮食减产了，叫我这个蹲点干部的面皮往哪里放！”

老王停住嘴，往四周张望了一下，有点疑惑地问道：“已经出工了么？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

我说：“队长的出工哨子已经吹了好久，他们应该快要出来了。”说话间，果然有些村民慢吞吞地朝这边走来。

现在不是农忙的时候，早出工和晚出工，都是记一样的

工分，那为什么要早出工呢？其实，我和冯金生也是在队长吹了出工哨子以后，估计大家开始出工了，我俩才出来的，没想到还是出来早了，无意中成了最早出工的人。

老王见村民来得不少了，他心里有气，不由得提高了嗓门，对着村民叱骂道：“你们是真正种田的农民，还要人家上海知识青年来带你们出工！这次田里生了虫子，你们自己不想办法，还是知识青年来找我，想办法解决了问题。你们还有没有面皮？”老王骂完以后，气乎乎地去鹿冈了。

二、次生灾害

因为有虫害，所以科学家发明了农药（村民俗称“虫药”，这个称呼似乎更贴切一些）。可是农药还会产生“次生灾害”，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里陂上村里买了一种叫“乐果”的农药，会给每户人家分一点，用来防治自留地里蔬菜的害虫。可是那时大家没有农药残留期的概念。我们在蔬菜上喷洒过农药才几天，就把蔬菜采摘回来，下锅炒一下，烧好吃掉了。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把农药吃到肚子里去了。



乐果是毒药

村民因为家庭矛盾或者邻里纠纷，互相之间经常会发生激烈的争吵。他们往往在一怒之下，或者是一气之下，控制

不住自己，冲动地拿起放在墙角的装有“乐果”的瓶子，打开瓶盖，仰起脖子，威胁说要自杀。不管是假自杀还是真自杀，反正时不时会听说，某个村子的某人因为什么事情，真的喝农药死了。

里陂上村民张绍生的母亲，生平第一次去永丰县城，是去看病。县里的权威医生宣布说，她的病没治了。结果这位待我极好的曾经裹过小脚的老婆婆回到村里，不愿意连累亲人，安排好了后事，一仰脖子喝了“乐果”，长眠在了里陂上村的屋背岭上。

有一年的端午节，村里为了让大家可以吃得好一点，派冯金生用一瓶叫作“毒杀酚”的农药，倒进了养鱼的池塘。二十分钟以后，不光是放养在池塘里的家鱼统统肚子朝上翻了白，漂浮在了水面上，就连塘底野生的乌鳢鱼和甲鱼也一起遭到毒杀，浮了上来。这些鱼分给全村每户人家吃掉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不是“吃得好一点”，而是“吃得毒一点”。幸亏农药的毒素主要是集中在人不吃的鱼内脏里面，鱼肉里的毒素相对要少一些。

有一阵子，村民周恩绍觉得家里养的猪不对劲，发现猪的肚子里生了虫。他就把“六六粉”作为打虫的药物，让猪吃了一点点，居然打虫成功了，他家的猪健康地成长。而张四喜就没有这么幸运，他给猪喂了太多的“六六粉”，把猪肚子里的虫连同猪一起毒死了。四喜舍不得丢弃死猪，煮好了猪肉请我去吃。猪肉一端上饭桌，有一股很熟悉的“六六粉”的味道飘过来。我只尝了一块肉，很呛人。

村民家里养的鸡，都是散养的“走地鸡”，整天在村里散步、觅食、打架。有的鸡比较调皮，会跳出村口的木坎，跑到种蔬菜的自留地里去糟蹋蔬菜。菜地的主人非常生气，就把稻谷用农药“乐果”浸过，撒在菜地的四周，把偷吃蔬菜的鸡毒死了。

为了这件事，村民分成了两派，争执起来。一派村民说，这些该死的鸡，非法越过木坎，还糟蹋人家的蔬菜，死得活

该。另一派村民说，这些鸡固然有错，但是错不至死，是拿农药来毒死鸡的那人太缺德、太恶毒。

这边两派村民还没有吵完，那边就有人来报告说，那几只毒死的鸡又活了。原来是张富魁的母亲，她用家里的剪刀，把鸡的胃（嗉子）剪开，取出有毒的稻谷，用井水把嗉子洗干净，再用缝衣服的针线封好。这几只鸡下地之后，几分钟就活了过来，能够站起来走路了。这真是奇迹。

后来也有村民用这个办法，来拯救被农药毒死的鸡，可是三次里面，大约只有一次能够成功。给鸡做外科手术的成功率并不高，死去的鸡还是经过烹调，进了村民的肚子。

我怀疑自己的身体里面，至今还可能积存有各种农药的残留，特别是“六六粉”的毒素。我在美国主要是吃猪肉，所以我的体内也可能存有美国瘦肉精的毒素。

我现在能够活到年过花甲，身体尚算健康，躲在暗处的大病暂时还没有向我发起进攻，真的是十分幸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上天给我的额外恩赐。



2014年，作者40年后重新掂起了锄头。

32. 交公粮和瞒产私分

里陂上村民俗称的公粮，其实包括公粮和购粮两个部分。

公粮是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当初人民政府核定里陂上村公粮定额的时候，兼顾到解放以前的情况，按平均亩产二百斤计算，每亩地交公粮二十斤。当时村里有五百多亩地，每年要交纳公粮一万多斤。直到政府废除农业税之前，里陂上村的公粮总数一直没有变过。

购粮是“征购粮”的简称，是按照国家在 1950 年代的统购统销政策，由国家向农村统一征购的粮食定额。里陂上村每年要交售征购粮（早稻谷）七万八千多斤，国家以每百斤九元五角的价格收购，二十多年未变。

一、交公粮

抢收早稻开始不久，生产队的仓库里已经装满了晒干的新谷。交公粮开始了。

每天中午时分，我们从田里挑回来刚收割的湿谷，倒在晒谷场上，然后扒满一担前两天晒干的稻谷，挑到鹿冈粮站去交公粮。一担稻谷有一百三十斤左右，我饿着肚子，顶着烈日，咬着牙齿，跟上村民的步伐，一步不歇地跳到粮站，差不多到了我体能的极限。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挑担送公粮。

里陂上村民素有“秤不加两，担不加斤”的说法。村

民用传统的杆秤来称东西，只要多加一两，原来平衡的秤杆就马上翘起来了，这就是“秤不加两”。一个人最多能挑一百斤重的担子，再多加一斤，他就不行了。这“担不加斤”说的好像就是我，如果一担公粮的重量再多几斤，我很可能会撑不住，跟不上的。我的力气比不上里陂上的村民。

我们一行四五十人挑着公粮进了鹿冈粮站。粮站的人先是随意指定一个村民进行抽查，把箩里的稻谷往一个大的肚箕里“哗”地一倒。检查完毕，他一挥手，我们便挑着稻谷鱼贯而上，过秤以后，把稻谷倒进国家的粮仓。



鹿冈粮站已废弃的粮仓，作者曾挑稻谷上楼梯交公粮。

有时粮站查到个别的村民故意掺进了瘪谷，许多村民就一起上去，围着粮站的职工吵吵嚷嚷。最后，作弊的村民还是不得不乖乖地用粮站的风车，把瘪谷再吹掉。吹瘪谷一般要花两到三分钟。可是等粮站的人一转身，村民立刻把风车上控制稻谷流量的开关调得很大，半分钟不到就算吹好了。

挑着空箩从鹿冈粮站回村的路上，村民周恩绍忽然感慨起来：“老夏，你说我们年年栽这么多禾，收这么多谷，除了交公粮，余下的米谷都吃掉了，‘喉咙深似海，灶门大似山’么，怎么也填不满的。人要吃饭才能活命，可是人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呢？”说到这里，老周不觉拖长声音，独自吟了起来：“老古话有啊：人在世上闷沉沉，不吃不穿不为

人，有朝一日阎王来勾簿，不要银子单要人。”

交完公粮回村，已经接近下午二时，我们匆匆吃完午饭，马上就下田割稻或者栽禾，一直忙到八点多钟天完全黑了才回家。

有一年，公社派了鹿冈粮站的干部来里陂上村“蹲点”工作。到了交公粮的时候，粮站的干部为了帮助里陂上村减轻挑公粮的负担，说是与其我们挑稻谷去鹿冈粮站，再用汽车从鹿冈把粮食运走，还不如直接用汽车到里陂上村运粮，这样汽车可以少走一点路，能够节省一些汽油，完全符合国家的规定。

粮站特意联系了永丰县汽车队的大卡车来到里陂上的村口。村民只要直接把稻谷装进大麻袋里，称好重量，缝好袋口，送到村口的卡车上，就完成了交公粮的任务。这样一来，村里交公粮轻松多了。但是我心里有一点疑惑：既然按照国家规定可以这样做，那为什么以往每年都要求我们里陂上村挑稻谷到鹿冈去交公粮呢？

装了稻谷的大麻袋有一百四十斤重。我半蹲着，另外两个人把麻袋放在我肩上。我深吸一口气，腰一挺，站了起来。可是麻袋扛在肩上，重心很高，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好。我东摇西晃、趑趄趑趄地扛着麻袋，走三百米左右，来到汽车边，队长笑着说：“老夏，你不行，到仓库里去帮忙吧。”

我到了仓库里，和妇女们一起，往麻袋里装稻谷，叫作“打包”。我很快发现，很多麻袋的底部装的是好稻谷，接着在中间放一点瘪谷，然后把好稻谷放在上面，称好重量以后再缝上麻袋口。这不是“以次充好”吗？

村民觉得自己很聪明。粮站派人来检查时，往往只拆开麻袋的缝口，麻袋的上层全部是黄灿灿颗粒饱满的上等稻谷。如果检查的人把麻袋里的稻谷全部倒出来，那些鱼目混珠的瘪谷还是在中间，很不容易看出来。鹿冈粮站没有发现我们村的舞弊行为。

谁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用麻袋交公粮的最后一

天，鹿冈粮站的副站长笑咪咪地陪着县粮食局的人，来到里陂上村口装粮的解放牌卡车旁边。副站长一边嘴里不断地说里陂上村交的公粮质量很高，一边招手让村民把扛来的麻袋放在地上。这是要抽查稻谷的质量了。

县粮食局的人板着脸不吱声，从上衣的口袋里摸出一个铮亮的钢制工具，有点像削尖了一头的小竹管。他用这一头尖的钢管往一个装满稻谷的麻袋中间一扎，往外一拉，就取出了一管麻袋里的稻谷。他把稻谷倒在手上，仔细看了看，点点头。一直在他身边的粮站副站长的脸上笑开了花。

县粮食局的人走到另一个麻袋边取样，他依旧板着脸不吱声，把钢管里的稻谷倒在手上，让大家看。

他这次取出来的是糶谷。粮站副站长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几秒钟以后，大声吼了起来：“你们居然敢欺瞒国家！是谁做的？！”我们的队长一看露馅了，也对着村民叫道：“你们居然敢瞒着我做这种冇良心的事！”他转过身来对县里的人陪着笑脸说：“这是我们错了，是我们不对。但是这一车已经快装满了，还是拉走吧。”

县粮食局的人气乎乎地爬上卡车检查，他涨红了脸，用力把几个装有糶谷的麻袋掀下车来。看来他一定是累了，跳下车来对粮站副站长气喘吁吁地说：“这个村子靠不住，今后不准这样收公粮了！”说完以后，他爬进卡车的驾驶室，坐在司机旁边，车子轰隆隆地开走了。副站长一边嘴上骂骂咧咧，一边悻悻地走回鹿冈粮站去了。

第二年，我们依旧要挑着担子到鹿冈粮站交公粮。粮站的副站长还记得上年的事，愤愤地对我说：“你们里陂上的老倭真是缺德，我好心帮你们，结果弄得我当面下不了台。”

旁边正好有一个袁家村的村民，他接嘴说：“他们里陂上老是这样。多年以前，里陂上村的公粮一直是在村里用麻袋装了就直接送出去，后来也是发现他们在麻袋里掺了糶谷，这才叫他们挑到鹿冈粮站来的。”

这是里陂上村的“家丑”，怪不得村里没人对我说过他

们从前交公粮的时候“以次充好”的事情。

我当队长的时候，村里有了手扶拖拉机，给它配了一个载重五百公斤的两轮小拖车。交公粮的时候，手扶拖拉机拉着小拖车，车上堆满了麻袋，每次都超载，一天能跑六七次鹿冈粮站，运出一万多斤稻谷。村里应交的八万多斤粮食，一个星期就运完了。

可是有一次，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天中午，村里的上海知青冯金生开着手扶拖拉机运送公粮去鹿冈粮站，回来的路上在鹿冈商店的门口遇到了两个里陂上村的妇女，她们搭乘在空载的拖车上，省得走路回村了。虽然大家知道这种小拖车的避震性能很差，颠簸得很厉害，但还是没想到车上的一个妇女是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孕妇，她下了拖车就说肚子痛，很快就流产了。

她的家人来找我，要讨个说法。我想，虽然是那个孕妇自己要坐车的，可是人家正在伤心，我只能连连说想不到，好言好语地安慰他们，表示极大的同情。过了几天，这事平息下来了。好在过了不久，那个流产的妇女又怀孕了。她生儿子的时候，她的家人还特地到我这里来报喜呢。

二、瞒产私分

有一年的春天，鹿冈公社的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老肖来里陂上村“蹲点”工作。到了那年的初冬，老肖听说里陂上村当年的收成和往年不相上下，他很不高兴。一年来，作为堂堂的公社副书记，他经常住在里陂上村，帮助和督促村民生产，很是辛苦，结果居然没有增加粮食产量，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怎么说得过去？

老肖觉得是里陂上的村民背地里隐瞒了稻谷的产量，偷偷地私下里分掉了，很可能是“瞒产私分”。他带了两个鹿冈粮站的人，来到里陂上村的仓库里，在放稻谷的木仓外面拉开卷尺一量，再用算盘咣咣一打，估算了一下，便认定里

陂上村的稻谷产量少算了三万斤。因为稻谷还在仓库里，只是村民隐瞒了产量，所以算是“瞒产”，不能定为“私分”。

这样一来，老肖在里陂上村“蹲点”工作的期间，使得村里的粮食增产了百分之十五，老肖高兴地走了。村里的会计按照老肖的要求来做年终决算，最后算出来，村民的收入在上年十个工分八角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角钱。老肖这样一弄，每户村民的收入都增加了，多数村民还真觉得是好事，他们高高兴兴地过了年。

过年以后，大家都希望仓库里真的有那多出来的三万斤稻谷。可是等到第二年的夏收以前，仓库里的稻谷全部出清了，那三万斤稻谷中，有二万六千多斤不见踪影，变成了亏空。老肖说里陂上村“瞒产”，其实是他在虚报粮食产量。



2014年，作者当年暂住过的生产队老仓库，已然破败。

生产队是独立核算的单位，上年因为虚报产量，村民的收入增加成了寅吃卯粮，第二年就要补回这笔亏空。可是村民不愿意收入突然下降很多，村里只好把这笔亏空分摊在两年的收成里，才把账目轧平了。至于老肖，他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已经调离了鹿冈公社。

几年以后，我到大队开会，大队的袁会计私下里问我，以前老肖说里陂上“瞒产私分”，最后怎么样了。

我把具体情况告诉了老袁，他说：“嘿，这算什么瞒产

私分？不瞒你说，你老夏还没来的时候，里陂上村那一次才是真正的瞒产私分呢。”

什么？我睁大了眼睛。

袁会计说，那是在1967年左右，里陂上村决定，有一批稻谷不计入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按照村民平时的口粮标准发给大家。这样做，既是“瞒产”，又是“私分”。但是一般来说，“民不举，官不究”，只要没有人揭发，大队干部不会主动去管这些事情。可是你们村里的村民张某人，听说有的村干部在瞒产私分的时候，私下里为自己多称了二百斤稻谷回家。

袁会计接着说，老夏，你一定听老俵讲过，世上什么最浅？都说从前家里点油灯的灯盏最浅，其实不对，是人的眼珠最浅，有一点点不公平就看出来了。



传统的灯盏确实很浅

那张某人觉得自己吃亏了，他一生气，就到大队来报告，逼得大队不得不处理，把“私分”的稻谷统统没收了，里陂上村谁也没有得到好处。

老袁虽然是会计，却怎么也想不通瞒产私分这件事。他说：“以你们里陂上为例，一年生产稻谷二十几万斤，除去公粮购粮和种子粮十万斤，剩下的十多万斤稻谷还不都是你们的？按照规定的口粮标准，你们只能发放八万斤口粮，可是剩下的几万斤稻谷，不是都给村民分吃了吗？不是年年如此分粮食吗？你们里陂上人真是蠢，冇脑筋，有什么必要搞瞒产私分？而且自己内部还摆不平，弄得偷鸡不成蚀把米。”

袁会计觉得，只要能够向国家交足公粮和购粮，余下的稻谷“瞒产私分”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不对，就说，一是“瞒产私分”以后，国家不知道一年究竟生产了多少粮食，统计不准确，就会造成国家决策错误。二是“瞒产”使得生产队账面上的收入减少，应该按比例上交给大队的“公积金”也就相应减少了。三是“瞒

产”会让各级干部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成绩，没有面子，要想升官就难了。

袁会计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他当大队会计，要填写很多表格，不晓得写了多少假的数据。比如每亩田用了多少肥料，他壮着胆子填了一个数字。

按照这个数字，就是全大队人畜的全部粪便和其他堆肥加起来，才是这个数字的几分之一，村里供养的猪起码长得有象那么大。



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漫画。农民也许真的希望村里养的猪能有象那么大。

可是上级还是批评说肥料太少了，先锋大队太落后、太不像先锋了。说到肥料，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要积肥料，县里要来检查了，你们里陂上村因为在公路边上，大队就组织很多人到山上砍了脚柴，堆在路边的田里，然后柴堆上面覆盖一层草皮，就成了肥料山。第二年栽禾时节，里陂上老俵哇哇直叫，说是田里的柴枝没有清理干净，下田栽禾会戳破脚。

袁会计继续说，老夏，你说的“公积金”，大队收得到吗？你里陂上交了多少？你们各个生产队不是赖掉，就是拖着不交，大队能收到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其他好几个大队都买了拖拉机，我们先锋大队号称很富裕，也想买，就是钱不够，老书记正在四处筹钱呢。

袁会计只同意我说的第三点，他回应道，当干部的谁不

想升官？你们瞒产，他的工作就没有成绩（现在改叫“政绩”），怎么升官？不火冒三丈才怪呢。

我和袁会计讨论以后，觉得有的地方比较贫穷，生产出来的粮食交了公粮和购粮以后就不够吃了，农民还不如先私下里分了粮食，填肚子要紧。这样一来，国家的公粮就收不上来了。国家采取的对策是坚决不准你们瞒产私分，一定要先交公粮。如果交完公粮和征购粮以后，你们吃的口粮真的不足了，可以申请国家的“返销粮”，国家可以退一点粮食给你们（有点像现在收上国税以后，国家再根据情况对各地拨款，进行“转移支付”）。可是“返销粮”的数量少，要粮食的地方多，“僧多粥少”，不如瞒产私分来得实际可行。

至于里陂上村这种相对富裕的地方，交完公粮和征购粮以后还能吃饱，真没有必要去瞒产私分。村民之所以要这么做，我想大概还是受传统的影响比较大。村民过去种自己的田，理论上只需要交纳“皇粮”，也就是公粮，属于农业税，税负不重。他们很容易把国家的“征购粮”和公粮混淆在一起，笼统地觉得村里生产的稻谷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要交出去，实在太吃亏了。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很多报纸上都有粮食亩产千斤甚至亩产万斤的报道。后来我在当年的《新华月报》上看到过国家领导人朱德和陈毅的文章，他们感叹说，自己青少年时期在乡下种田的时候，粮食亩产很低，所以一开始不相信报纸上的那些报道，直到他们下乡以后，看见了真的粮食堆成了山，肥料堆成了山，这才相信了。其实这二位国家领导人看见的粮食山，是从各处运来了粮食，临时堆起来，专门让他们看，欺骗他们的。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自古至今，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当年全国的“大跃进”带来了粮食的“大丰收”，各级干部已经把产量虚报上去了，上级就要求各地多交粮食，用来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没有生产这么多粮食，很多地方交不出来，干部着急了，

就一口咬定是农民“瞒产私分”了。他们采取了很过分的手段去征集粮食，有人甚至把农民下一年的种子粮也强行收来了。

这样做的结果，只要是正常人都会想到，农村里有的地方，种田的农民饿死了。

我在里陂上村十年，和村民在一起插科打诨，荤素热冷，几乎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比如我听说在“大跃进”期间，某某大队的某个书记，为了强迫村民集中到生产队开办的集体食堂里吃饭，就挨家挨户把村民家里的铁锅全砸了，弄得食堂解散以后，鹿冈商店的铁锅脱销，农民还得步行，走到永丰县城去买锅。

整个永丰县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在里陂上的那十年里，没有听说过我们里陂上村、我们先锋大队、我们鹿冈公社在“大跃进”时期有饿死人的事情。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讲述在“大跃进”时期，由于当年省政府的现实主义领导，使得江西的情况要比相邻的省区好很多。

我为这一方土地感到庆幸，我真诚地为这一方乡亲祈福。



2014年，作者在里陂上村。

33. “红管家”

我们里陂上的上海知青分散在村民家里搭伙，和他们共同生活了近两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光学到了各种生产和生活的技能，而且每个人都和自己搭伙的村民家庭有了深厚的感情和紧密的联系。比如薛志民搭伙在村民张梅发家里，梅发的父亲提起薛志民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家里的老薛。”他好像真是把薛志民当作了自己的家里人。

我们迫于压力，撤出了村民家里。但只要逢年过节，我们曾经搭伙的那些村民家庭，一定会盛情邀请我们一起吃饭，再叙旧情。

1972年我们知青重新集中开伙以后，有村民在开会的时候提出，在他家里搭伙的知青很好，可以担任生产队的出纳。别的村民马上就说，在他家的知青也很吃苦，可以做会计。

村民推荐我们当“干部”，这固然与我们自身的努力劳作和真诚待人分不开，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和村民之间在平日里的竞争、摩擦甚至恩怨有关。他们有一部分动机，是想把知青作为代理人，来平衡村里复杂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由于村民的信任，我们知青担任了村里的各种职务，后来被说成是生产队的“红管家”。

李桂英担任会计。

生产队每到年终，要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算出每天的工分究竟值多少钱，用的是现代通行的复式记账法。这种记账法太专业了，农村里极少有人懂得。所以只有生产队的会计才是真正的会计，大队的会计只要在报表上填写一些领导需要的数据，按时向上级汇报就行了。

为了简化会计的记账，1970年代的初期，江西省推出了“以表代账”。生产队会计只要填写长长的表格，就可以进行经济核算。这种办法只推行了二年就废止了，还把它说成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胡乱搞出来的东西。

王君薇担任出纳兼妇女队长。

出纳管钱，经常要去鹿冈买东西，村民大多认为，这是一个揩油的肥缺，村里历任的出纳多数会揩油，贪污一点钱，村民俗称“吃冤枉”。由知青王君薇担任出纳，的确没有揩油的事情发生。至于妇女队长，没人把它当一回事，只不过是上级规定要有这个职位而已。

薛志民任保管。

保管经常要在仓库里掌秤，给各户人家分发口粮，少了一些下田辛苦劳作的时间，也是不错的差事。更重要的是，知青在分发口粮的时候比较公平，不会像以前的保管那样，会因为村里的亲疏关系而在掌秤的秤头上厚此薄彼，生出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冯金生任民兵排长。

民兵排长也是规定要有的职位，好处是每年有一到两天可以到公社去“集训”，既轻松，又可以吃几餐肉。

我担任记工员。



算盘。做“管家”，不管是会计、出纳、保管还是记工员，自然少不了算盘。

记工员的任务是每天晚上为出工的村民记工分，其实是画圈。我们一天出工三次，早上、上午和下午各画一个圈，没出工就打叉。我的记忆力尚可，只要看一下出工的人数，就知道每次各有哪些人没有出工。

有一天，在田里劳作的时候，我用眼睛一扫，发现村民张发茂没有来出工，就问发茂的老婆：“你家发茂到哪里去了？”

“在家里打篾席呢。”发茂老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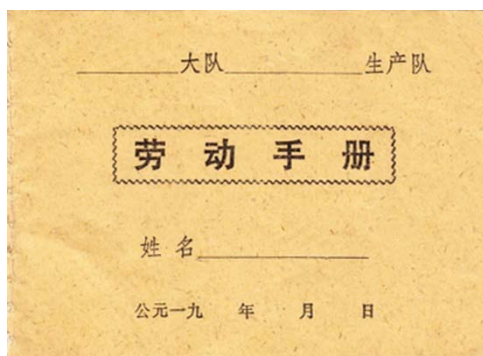
我听了，觉得很奇怪，便说：“发茂不是篾匠啊，难道他学过制篾？我没见过他打篾席，收工以后一定要去看看。”

“哄”的一声，大伙笑了起来，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

村民朋友张寿仁告诉我，篾匠在编织篾席的时候，先起序，然后坐在篾席上，一点一点往前编打。现在发茂在家里打篾席，就是说他生病了，正躺在床上铺着的篾席上呢。

收工以后，我急匆匆地去看发茂，他果然躺在篾席上，见我来了，挣扎着坐起身来打招呼。我一摸他的额头，很烫，赶紧去拿了几片复方阿司匹林药片，让发茂服下。第二天上午，发茂恢复出工了。

晚上记工分的时候，常常是村民拿了全家好几本的工分簿（劳动手册）来，我不用村民自报，唰唰地画好圈。村民拿起工分簿一看，居然没有记错。



劳动手册就是村民俗称的工分簿

全队七八十人的记工分画圈，我一会儿就干完了。

到了年终，记工员需要统计全年的工分。以往的记工员请上帮手，要耗费十几天时间，才能算出每人每年的总工分。即便是这样，还老是出错，总是有人拿着工分簿来要求改错。毕竟工分就是钱啊。

算工分很繁琐，也难怪会出错。如果某人一天的工分是

9.6分，那么早工的那个圈代表1.92分，上午和下午的圈各代表3.84分。要是那人下午没有出工，9.6分减去3.84分，这天得5.76分，记在出工日期的旁边。工分簿每页可记九天，把九天的工分相加，记在该页的最下面。然后再把每页的工分相加，才得出一个月的工分。

年 月 日	早 晨 农 事 项 目	上 午 农 事 项 目	下 午 农 事 项 目	全 日 工 分	盖 章
6 11	33		6	6	
12	1		1	6	
13	1		1	6	
14	1		1	6	
15	1		1	6	
16	1		1	6	
17	1		1	6	
20	1		1	6	
21	1		1	6	

劳动一天得六分，这是里陂上村女性全劳力的最高分。

我担任记工员的时候，改进了算工分的方法，算工分的方法改成了数圈圈。上午和下午的圈，我称作大圈，各占一天工的五分之二。早上的圈是小圈，占一天工的五分之一。一个大圈等于二个小圈。

先数大圈，如果某人一个月有大圈56个，等于小圈112个。再加上小圈有27个，等于小圈139个。按理来说，139个小圈除以5，就是他这个月的出工天数。但是我为了计算方便，把139乘以2，得278，再除以10，所以他这个月出了27.8工，记下（以上全部用心算，加上数圈，在15秒钟左右）。最后再乘以每天工分9.6分，我用算盘啪啪一打，他这个月有266.88分。

用这种办法来计算工分，速度快，出错少。我一个人只需要两天，就能把村里全年的工分张榜公布，村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大队干部知道了，想在全大队推广我的办法，特意跑来里陂上村找我了解情况。我解释了很久，作了演示，最后他

们好像是明白了，可是后来就没了下文。他们不了了之的原因之一，或许是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吧。

后来不在工分簿上画圈了，改为直接写上工分，更加直观，让村民更加一目了然，他们心里更加踏实。

到了春天插秧和夏天抢收抢种的“双抢”季节，里陂上村采取了“按件计酬”的方法来记工分，村民俗称“包工”。记得有一年春天插秧，村里分成了三个耕作组，各组根据当天插秧的田亩多少，到我这里来记工分，每插一亩田，记十个工分。因为是“按件计酬”，所以村民的积极性很高，原来工作一天能够拿十个工分的人，现在可以拿到十五分以上。

可是各组的耕牛有多有少，有强有弱，于是村里规定，用耕牛来耖田或者耙田的人，按照三组中间的那个组的标准来记分。

我在学校里，只学过“平均数”的概念。给耖田的村民记工分时，我把三个组拿十分的劳动力当天的工分数（19分、17分、12分）相加，再除以三，得到16分。

耖田的村民不高兴了，说这是“平均分”，不是“中间分”，中间分应该是17分，我给他少记了1分。

在美国，我发现美国人在房价和工资的统计上，多半采用“中位数”，（英文是“Median”），和当年里陂上村民“中间分”的概念，真是不约而同。

记工员每年有一百个工分的额外补贴，但是我没有要。

毕竟我算工分的那两天，已经算是出工，在队里记了工分。

那几年，我们里陂上村只有队长还是村民在当，其他的各种职务全部由我们上海知青担任，这在鹿冈公社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突然成了鹿冈公社知青的先进集体，李桂英作为代表去县里开会，后来她还当选了县团委的委员。县团委的吴书记有文化，懂宣传，把我们里陂上知青的事迹总结为“做贫下中农的‘红管家’”。

李桂英去吉安读书以后，原本要姓张的村民接任会计，

可是他提出另外要二百个工分作为补贴，村里有人反对。结果由我担任会计。

这时候，记账制度已经恢复了“复式记账法”。这可是一个法国的修道士在四百年前研究出来的，我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学生，绝对是一窍不通。幸运的是我在上海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里，买到了一本书《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详细介绍了复式记账法。我真是如获至宝，回到里陂上村以后，我反复研读，不断练习，完全按照书上的要求来记账。

每年的年终决算，是生产队会计压力最大的时候。

有一年，我们先锋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新会计上台了，他年终决算的结果，是队里每十个工分合到 0.91 元。已经离任的老会计却认为新会计算错了，他出面重新算过，变成 0.93 元。另一个更老的会计跳出来再重算，又变成 0.90 元。

这中间自然有家族之间争斗的原因，但是记账不规范也是硬伤。他们最后是采用了最高的 0.93 元的那个算法。每户人家的收入增加了，那是皆大欢喜的事情。至于将来会不会因此发生亏空，那到将来再说吧。

又有一年，先锋大队各生产队的会计，集中在大队部做年终决算，为期五天。大队希望会计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切磋交流。其实各队的会计在各自的村子里都是头面人物，到了大队里是互相不服气，根本不会切磋交流的。

我因为有事耽搁了，第二天中午才带着账本和算盘赶到了大队部。一进屋，没有人和我打招呼，只听见算盘在噼噼啪啪地响。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了里陂上村的年终决算。

“老夏，你是‘后跳起（起床），先屙尿’啊。”袁家村的会计说。

按照当地的习俗，村民会在睡觉的房间里放一只尿桶，供起夜的时候用。早上先跳起的人，理所当然地先占据了尿桶来排尿。

后跳起的人居然先屙尿，这出乎意料，有悖常理。



先锋大队（现为鹿冈村）各生产队的会计，曾集中在这大队部做年终决算。

1975年，我在当选生产队长的同时，提出要辞去会计的职务。队长兼会计，很容易发生贪污行为，这才是真的是有悖常理。里陂上的村民们议论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要我暂时先顶一阵，等到有合适的人选再说。后来我培养了张富魁当队长。我辞去队长的理由，就是会计不能兼任生产队长。

上级领导最终同意我辞职，但是他们觉得让我“削职为民”，好像我犯了错误似的，所以领导通知我担任大队的支部委员，可以合法地兼任生产队的会计。

我在做队长兼会计的时候，冯金生是民兵排长兼出纳。因此，我们名义上勉强还可以称作“贫下中农的‘红管家’”。

村里有线广播的喇叭里，时常会传出永丰县广播站表扬我们里陂上知青班、表扬“红管家”的声音。可是半数以上的里陂上村民听不懂普通话。即使是气象预报里的“阴到多云”，他们费了半天劲，勉强能理解成“黑天乌云”，更不用说“红管家”了。广播对农民的宣传效果实在很有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在迅速消退，一半以上的知青已经离开了农村。我们“红管家”也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我并不像有些知青那样热衷于政治，相反我还会选择避让。可是政治往往会主动找上门来。

永丰县“乡办”的领导找到我，要我写稿介绍里陂上知青班，说是《江西日报》要用。我想，这并不是吹嘘我个人，我就尽量据实写吧。我在县乡办的厨房里靠着一杯极浓的茶，熬了一个通宵，交稿完工以后赶回了里陂上。不久以后，《江西日报》有整版的篇幅来报道我们“红管家”。我一看报纸，居然报社的编辑没有改动，照登了我这个初中生的稿件，心里不由生出一点小小的得意。

1977年初，井冈山地区（吉安市）要出一本书，介绍辖区内知青的“先进典型”。我到吉安参加了组稿会。我把给江西日报的稿件作了一些修改，交了上去。（按现在的说法是一稿二投，当年可没有稿费。）组稿的负责人是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看了我的稿件，说：“通过了。”然后问：“你在上海读什么中学？”

我说：“华东师大一附中。”

他说：“哦，怪不得。”然后转身忙着给其他写手审稿，指点他们应该怎么写。

而此时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吉安师范学校，我要去找马立平了。

此书的书稿《一代新人在成长》出了清样，我们在书里面还是“红管家”。后来因为上层激烈的政治路线斗争往下延烧到吉安市，负责此书的人倒台了，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

当我听着鹿冈公社广播站转播的节目里有我们的“先进事迹”，在心里有一点高兴的同时，也会想到：“明明里陂上村的‘红管家’都快走光了，我们的名头在外面却越来越响亮。我作为写稿人，当然也有自己的责任。幸亏里陂上村民听不懂有线广播的喇叭里说的普通话。”

1979年初，在我从永丰中学回上海以前的最后一个月，我向学校请了一天假，利用周末的时间赶回了里陂上村。我做好年终决算以后，把账本移交给了新的村民会计。

里陂上村历时七年的“红管家”时代结束了。

34. 评工分

在里陂上村，一天工作十小时，最好的男劳力可以拿十个工分，女劳力最高是六分。你在生产队里出工劳动，究竟可以拿多少工分，要在队里开会的时候来决定，叫作“评工分”。评工分的原则是“自报公议”，觉得自己出工一天可以拿多少个工分，先自行申报，然后由其他人公开、公正地评议。工分多，收入就多。

解放以前，有田的农民种自己的地，不用评工分。没田的农民受雇于地主，作为雇农种地主的田，也不用评工分，收入按水稻的收成拆账，一般是农民拿 40%，地主（村民的称呼是“财主”）拿 60%。

解放以后有一段分田单干时期，共产党的政府把地主的田分给穷人，大家都种自己的田，种得好就收成好，跟别人没关系，没有评工分这一说。

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重新把田地集中起来以后，大家一起劳动，到了秋天，田里的收成怎么分配到各家各户成了问题，于是便产生了按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记工分的制度。这很像工厂和公司里的考勤制度，上班下班都要打卡，记下你的上下班时间，顺便看看你有没有迟到早退。

可是同样长的劳动时间，有人做得多，有人做得少，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差，就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工分。这也像工厂和公司里的工资制度，奖勤罚懒，要分出工资高低来。

评工分的制度和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制度一样，看起来很合理，具体做起来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管怎么样，对里陂上的村民来说，评工分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我第一次参加评工分是在 1969 年的 5 月，春天的栽禾结束了，里陂上村开会评工分。

我想，不是说“同工同酬”么？按照我栽禾的速度和质量，估计我出工一天，至少可以拿八个工分。

评工分的会议开始了，队长根据“自报公议”的原则，要求大家自报。会场上很多人低着头，眯着眼睛，好像在打瞌睡，没有一个人说话。偶尔会听到磕烟袋的声音。

队长催促了好几次，村民张顺喜突然抬起头来，用他一贯沙哑的嗓音说：“我，我要拿十分。”

会场上一阵轻轻的骚动，响起了轻轻的咳嗽声。那是为了润一润喉咙，提一提精神。那些眯着的眼睛都睁开了。大家心里清楚，顺喜不配拿十分，可他是五兄弟的老大，在村里有一定的实力。沉默，还是沉默，依然没有人发言，大家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果然，他家的老五，张五喜，开口说了两个字：“制得（行/可以/同意）。”

队长问了几遍，问不出反对意见，张顺喜便拿了十分。

队里做农活的头把好手周恩绍终于忍不住了，大声说：“我拿十分半。”

会场里爆发出一片赞同声。虽然突破十分的上限是违反了规定，可是不这样做，那次评工分的会议是开不下去的。

接下来很顺利，男劳动力你报十分三厘，我报十分四厘，很快评完了。说是“评”，其实就是自报，每个人的能力和在村里的地位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自己报低了，虽然吃亏的是自己，但接下来评自己老婆孩子的工分时，大家会让一点，至少不会用长长的沉默来让你难堪。反之，如果自己的工分报高了，大家楞一下，但是碍于人情，没人愿意出头反对，一般也会让你通过，甚至你接下来为老婆孩子争工分，大家沉默以后你也可以得手。可你受得了平日里劳动时众人冷言冷语的挤兑吗？受得了背后别人指指点点说你吗？如果和别人吵架，人家会指着鼻子骂你不要脸。

最后评我们知识青年——上海佬的工分，会场一下子又安

静下来。队长说，知识青年刚来就学会了栽禾，很好，可以评到四分。

啊？我们和那些十来岁的孩子一样？

队长的一句话就定了乾坤，结果是我们的女生评到四分，男生四分四厘，张发茂说我栽禾好一点，更重要的是我在九个上海佬中间年龄大一点，我拿了四分五厘。

村民周恩绍在会后气愤地说：“想出这个评工分的办法的人真是缺德！”他知道自己脾气急，以他一个外姓人，在评工分的会上得罪了张顺喜兄弟，心里有些后悔。

的确，中国的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人情社会，特别是在农村，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好撕破脸呢？评工分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让你我兵戎相见，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老周说的缺德，是指设计评工分制度的人不懂和缺少传统的道德。

里陂上的这次评工分受到了批评，先锋大队要求我们下次评工分时最高不能超过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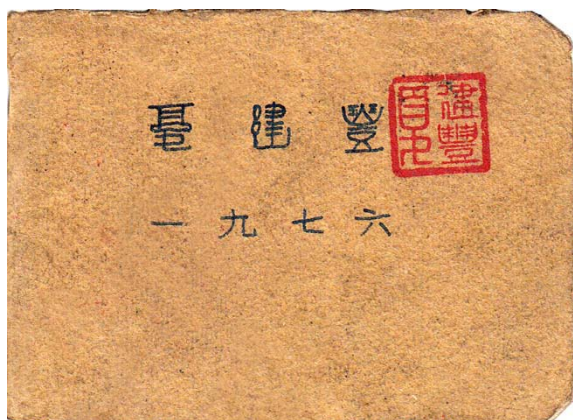
虽然上级要求我们，最好一个月评一次工分，至少一年评两次，可是谁都怕评工分。我们下一次评工分已经是第二年了。

评工分的会议是最沉闷的会，可是忍久了，偶尔也会是最火爆的吵架会。

四年以后的评工分，经村里的实权人物之一张清魁提议，我拿了十分。

后来我当里陂上村的生产队长，当选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评工分的会。

我一开场就说：“大家都知道队长最辛苦，所以在整个鹿冈，甚至整个永丰县，每个生产队长都拿十分。现在你们可以拿十分，但是我拿九分八厘。我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现在开会评工分顺利一点，我要有最后的决定权。二是为了我今后派工的时候容易一点，不希望发生派工派不下去的事情。”



作者1976年自制的工分簿。我曾经到上海的长江刻字社，要求刻一枚篆字的印章，对方说那是“四旧”，未果。后到永丰县城的刻章社，刻成这枚名章，印出来的“夏”字却在左边，和传统不甚合。那钢笔写的“夏”字，参照了我父亲的某一枚篆字名章。

直到我卸任队长以后，我的工分才恢复到十分。翻开我在1976年自制的工分簿，可以发现我5月份赚了400多个工分，5月31日那天临近端午，我还帮生产队杀了猪。

76年		76年	
3	栽 车	28分	
4	~	29分	
5	~	27分	
6	~	29分	
7	~	29分	
8	~	28分	
9	~	25分	
5月10	栽 车	25分	
11	~	25分	
12	~	20分	
14	~	3分	
15	~	9分	
16	~	7分	
18	栽 禾	7分	
5月17	修 抱 拉 机	7分	
20	栽 禾 示	9分	
21	~	9分	
22	~	9分	
23	开 会	9分	
24	~	9分	
25	~	9分	
26	栽 禾	9分	
27	~	9分	
28	~	9分	
29	~	9分	
30	~	9分	
		5月21日 426分	
5月31	杀 猪	5分	

工分簿，作者1976年5月的出工记录。

1979年我回到上海，开始学习做钳工，学徒期是三年，每月工资17.83元。每逢单位里加工资的时候，我的工龄短，自然没有我的份。可是我还是必须要参加类似农村评工分“自报公议”的那种评工资的会议。

如果有5%的人可以加工资，像我一样估摸自己属于加不到工资的工人，在开会时多数默不作声。只有那些觉得自己有希望加工资的少数职工，在会上火力四射，大谈自己的功劳和苦劳，努力想把别人挤出去。会场上的气氛，和里陂上村民评工分时候的沉闷不一样，发言的人要多一些。

大家明明知道“自报公议”只是做一下表面文章，单位领导早就开过会，基本上定好了谁加谁不加。可是加工资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绝少有人会退让。即便这次加不到工资，也要为下次加工资创造条件。

于是，有的人会到领导的家里做工作，声泪俱下地叙述自己的困难。有的人会在班组里面合纵连横，为自己造声势。甚至有人会采用“乌贼战术”，找出对手在工作上和生活中的缺点错误，大肆抹黑。

等到尘埃落定，领导宣布最后的名单以后，这一场混战才算结束。加到工资的人会在班组里或者请客，或者发糖，总之是要出一点“血”，毕竟以后大家还是要天天见面，在一起干活的。

在农村评工分要自报公议，听起来很民主，很公平，可是被农民骂成“真缺德”。让平时好讲一点面子的农民在评工分的时候面对面厮杀，实在是太为难他们了。

在单位里评工资也要自报公议，也很民主很公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成绩，改正错误，有什么不对呢？每个单位的领导平时希望能通过加工资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可是真的有了加工资的指标，他们又愁坏了。等到加工资的风波过去了，许多领导会叹气说：“还不如不加工资呢。”

在单位里干活的时候，没加到工资的人会气乎乎地说，某人加了工资，这活让他干吧。加到工资的人也气乎乎地说，

我每个月才多拿了几块钱，凭什么把活都推给我干？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单位里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并不怎么高过“一盘散沙”的农民。

我做钳工学徒的第二年，每月的工资增加了 2 元。

从 1980 年 9 月开始，我读了三年“上海电视大学”，每天有老师在电视里给我们学生上课。读书的前两年，我仍旧是拿学徒工的工资。直到 1984 年，那是我回到上海的第六年，我作为大学专科的毕业生，每月的工资提高到 45 元，终于超过了自己在里陂上村当农民时的收入。

我个人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只需要“喻以利”，在经济收入上有所提高，他们就高兴了。只有极少数有理想有道德的人，才需要“喻以义”，直到产生一些“舍生取义”的人。

在农村评工分和城里评工资的过程中，泛道德化地“自报公议”，其结果常常是和原先的设想南辕北辙。

现在的农村早就取消了评工分，城市里也取消了评工资。每个人的工资多少，成了同事之间不可以随便打听的个人隐私。有人说，这样做的结果是资本的力量能够更方便更有效地控制其他的力量。但是和“评工分”、“评工资”相比较，好像还是好处多一些，坏处少一些吧。

至于如何来约束资本的力量，使其不能太过分，那应该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35. 开会

好像只要人一多，就要开会。

到了中学里，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我们经常要开会。会议开头，照例是大家一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再一起读一段毛主席的语录。这些倒也罢了，最讨厌的是要每个人发言，对照毛主席的话，谈学习的体会。总之，我很厌烦开会时的那种空话和套话，常常要借口上厕所而离开会场，出去溜一圈。

到了美国以后，一开始是有朋友拉着去教会的“查经班”开会。读了圣经上的一段话，要每个人谈学习的体会。这种场面似曾相识。我参加了数次以后，再也不去了。

美国人开会也不少。无论是我女儿在美国学校里教书，或者是亲戚在美国公司里工作，抑或有朋友自己创业办公司，都经常要开会。

回忆起来，在里陂上村务农的十年里，开会有些不一样。

一、生产队开会

里陂上生产队一般是晚上开会。队长开会的哨子吹了好几遍，才稀稀拉拉地来了几个人，因此经常开不成会。等到队长沮丧地宣布不开会了，他要会场里等着开会的那几个村民回家去的时候，有的人斜坐在那里，在昏黄摇曳的灯光里，已经睡得淌了一滩口水。只有开评工分的会议，村民是到齐的，工分就是票子（钱）啊。

有时候天上下大雨，白天不能出工了，队长趁机宣布，十八岁以上的男劳力来开会，可以记工分。这一下，该来的人都来了。

如果是公社来村里“蹲点”工作的干部召集开会，村民会来得多一些。要是队长在吹哨子喊开会的时候，吆喝得再凶狠一点，威胁说不来开会的人要如何如何，村民还会来得

更多。

队里开会，村民多数用竹根自制的“烟筒斗”来抽旱烟。烟叶是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的，黄了以后晒干，用刨子刨成烟丝，加一些茶油润一润，就成了。旱烟的味道比店里买的香烟要呛得多。

竹根做的烟筒很小，每次只能加指甲盖那么大一撮烟丝，吸几口就完了。村里的男孩子有时问起，睡女人是怎么回事，大人就笑嘻嘻地打马虎眼说，没什么，就是抽一筒烟那么久的事。



竹烟筒

二、生产队长开会

生产队长经常要在晚上去大队开会，很少有队长缺席。队长开会的时候，经常会为了自己队里的一点点利益，和大队干部争得面红耳赤。

有时候，县里来了工作队，或者是公社来了领导，生产队长会集中到大队部去开一整天会，可以记工分。

如果是在冬天开会，外面很冷，会议室的门窗都关上了。上午会议一开始，各位队长就从身上摸出纸烟来，发给大家抽。等到每个人身上的烟都发光了，就派一个人出去，到商店里买烟。会议室的门一开，里面的烟雾往外涌，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屋里着火了。就这样，开一天会，每个人可以抽掉三包烟。

我一天也可以抽三包烟，还把大部分的烟吸进肺里，我才会觉得浑身舒坦。可是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烟瘾。抽烟的时候觉得舒服，不抽烟的时候不会想抽，看起来，让人成瘾的尼古丁在我身上不起作用。

奇怪的是，在大队部开会到了下午，总有几个生产队长会嚷嚷着说：“坐不惯，坐不惯，才坐了半天，脚就肿了。”

我开始不相信，用拇指去试着按他们的脚踝，果然一按一个窝，这才信了。后来发现，我坐久了，脚也有些肿，但是没有其他人那么厉害。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中间的道理，好像和血液循环不畅的关系也不大，也许人的身体结构更适合于站立而不是坐下？

公社几乎每年要开一次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为期一天。上午照例是公社领导作报告，下午照例是各大队分组讨论。我们生产队长最盼望的是中午照例加餐吃肉。开会的那天，公社杀几头猪，分到各大队，算是感谢我们辛苦一年，给我们的犒赏。

每次吃肉，每人大约有二斤，大队派人煮成红烧肉的模样，又香又软，装在大盆里，放在厅堂的中间，十分诱人。我们先到饭甑里盛半碗饭，再围着放肉的大盆，尽快拿到舀肉的木勺，把肉堆在饭碗里，在厅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赶紧动筷子吃肉。我们喜气洋洋地一边大嚼，一边时不时地瞄一下那放肉的盆，生怕盆里的肉已经没了。

有一次，吃到肉足饭饱，肉盆里没肉了，一个生产队长拿筷子轻轻地敲着饭碗，感叹地说：“就是我家屋里杀猪的时节，也有像现在这样吃肉啊。当队长真是好，我这一世真是有白过！”

我作为生产队长，参加了 1976 年的永丰县四级干部大会，印象最深的也是吃饭。

大会报告一结束，我们就一路冲锋到饭堂。饭堂的门还没有开，很多人就从开着的窗口跳进去。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坐满了就吃。我有手表，我们这一桌从开吃到结束，只花了四分钟。然后我们兴高采烈地拍拍肚子，满意而去。

三、知青开会

1971 年，鹿冈公社开过一次全体知青大会，为期三天。男知青全部在公社礼堂打地铺。夜晚躺在黑乎乎的礼堂，有

人唱歌，有人讲笑话，很热闹。

开全体大会的时候，批斗了两个“反动知青”，还有人上去打他们。后来才知道，这里面有一点故事的。全体大会以后是各大队分组开会，先锋大队是我和张志诚成为“帮教对象”，其实完全是误会。

张志诚的绰号叫“师长”。他胆小而略有结巴，刚进中学时，同学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是……张……”于是便成了“师长”。大队领导听说他是师长，以为有什么秘密组织，可是看着又实在不像，就要他说清楚。为此，师长和他的同班同学在大队里吵吵闹闹，把“帮教”我们的时间都耗掉了。

我的问题是自己不好。有一次正逢端午节，我发高烧，去大队保健站找“赤脚医生”看病。没想到那天公社加杀了一头猪，保健站的人都去抢购猪肉了，根本没人理我。我一气之下，找了一张纸，写了几句生气的话，留在了桌上。糟糕的是我画蛇添足，临走的时候又在我的名字下面画了一把指甲大小的匕首，惹事了。

保健站的人把纸交给大队书记，说是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大队书记想，还不至于吧。但是“赤脚医生”这边也不好交代。正好公社要开知青大会，我就成了“帮教对象”，而我当时并不知道。

一直到崔应辉从修铁路的工地上回来，他和大队书记说明了情况，这才消除了误会。

马立平心里很早就有一个疑问：毛主席一直提倡要“一分为二”，任何一个问题、一事物、一个人，都要从两方面来看。那么，对毛主席能否一分为二呢？

这样的疑问只能心里想，可是马立平说出了口。于是那次的知青大会，她也成了村前大队的“帮教对象”。

1972年，鹿冈公社召开过一次特别的会议，除了各生产队的队长来参加以外，各知青班也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的名称也改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其实是表扬会

或自我表扬会。大队可能是觉得过去误会我了，要给我一点补偿，推选了我在会上发言。对我来说，我是真心觉得在农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还有很多事情不懂，值得自己继续学下去。

当我看到会场有那么多的生产队长，他们都是农民中的头面人物，是佼佼者，我就情不自禁地用鹿冈的方言，也就是“老俵的土话”说开了。结果所有的与会者都对我那“纯正”的老俵话感到吃惊。特别是公社的领导说，从小夏说的老俵话，就知道他“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得很好。

后来我知道，大凡听见外人说自己的乡音，自然会感到亲切。

四、知青代表开会

1974年李桂英走了以后，当初知青班的九个人，只剩下我和冯金生常年呆在村里，我开始代表里陂上知青班去参加各种会议。

1976年，在永丰县知青代表大会上，古县公社的上海知青姚建新的母亲作为家长代表参加了会议，她在上海的纺织厂里工作。我想起了在回上海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关于布料的新名词“中长纤维”我不懂。问了很多人都说不出所以然。

我请教了姚建新的母亲，她告诉我，作为化学纤维，中长纤维的长度在7—11厘米之间，超过11厘米就是长纤维。中长纤维的织物软硬适中，很适合做衣服。后来我告诉马立平，什么是中长纤维，她觉得十分新奇。

在这次会议上，我发现有个老者，他花白的头发，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身上是不甚合身的中山装，双手十分粗糙，一看就知道是整日在田里劳作的人。他也是来开会的代表么？怎么老是坐在角落里，很寂寥的样子，一直默默地抽烟呢？

我问组织会议的张主任，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你们到农村来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应该有贫下中农的代表来开会才对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者，他是参加过毛主席指挥的‘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老红军呢。”

我心里很吃惊，连忙过去和老者攀谈起来。我的猜想没错，他的确是自食其力，在沙溪公社的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的农民。我问他：“像你这样的老红军，国家难道就没有一点补助么？”

“过年的时候，县里民政局会给我二十块钱。”老者一边说，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几乎空瘪的香烟，“你看，我每个月还可以到沙溪的商店去拿两条烟，不花钱的。”

我看出来那是河南省许昌市出产的“黄金叶”牌香烟，鹿冈商店有卖，每包0.27元，两条烟价值5.40元。

1977年的春节，我参加了永丰县“乡办”组织的知青慰问团，到各个公社和知青座谈。我当时知道一个消息，说是唯一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结婚生子。董必武给孙子写了字，意思是说，你爸爸是个农民，你长大以后也当农民。

我在座谈会上就说了这个不知真假的新闻。后来才知道这传说是真的。当然，如今形势变化了，董必武的儿子现在肯定不是农民了。

我一直觉得，种田是我的工作，我已经准备好了当农民。但是我很讨厌“扎根农村”这个说法，我绝对不说自己要“扎根”。那时候高喊“扎根”就是革命，就是先进典型，就容易离开农村到“更重要”的地方去。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自己是农民，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谁要是看不起农民，我就会生气。

1977年的秋天，我到吉安参加井冈山地区的知青代表大会，见到了一些以前只听过名字的人物。新干县和峡江县是“知青大县”，有很多知名的杰出的革命的先进的知识青年。比如新干县鸡峰公社的金苗林，她在毛主席发号召以前就带着一些人下乡了，据说是在吉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职位上

退休的。

又比如峡江县仁和公社的王建华，他原来是上海的中学生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在毛主席发号召以前就带着一些人下乡了。我们班级的班长杨世雄和红卫兵小队长陈熙翔，在上海听了王建华的一次报告，就早早地到峡江县插队务农了。不像我们这批随大流的人，要等到毛主席发号召以后才下乡。

我佩服的是王建华从农村去读了大学，毕业后又主动带着妻子回到农村，这太不容易了。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听说王建华因为文革初期的事情，好像还受过很严厉的审查。

我们永丰县知青的知名度比峡江县和新干县要差很多，不过我们永丰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峡江的知青常常会到永丰的地界上来买菜。

在吉安开会期间，我最兴奋的是有一天晚上到剧院，看一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秋收起义”五十周年的演出，由井冈山地区文工团和吉安师范学校联合表演。关键是马立平也会在舞台上出现。我一直记得她是身穿军装，脖子上有一条擦汗的毛巾，肩上挑着一对箩，扁担一闪一闪地，挺着胸走上了舞台。

演出结束的时候，突然有演员化妆成毛主席走了出来。我看着总觉得不像，可是潮水般的掌声把我的思绪淹没了。据说这是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真人扮演的毛主席，化妆师花了好几个小时呢。



1977年10月，到吉安市开会的永丰县代表。

1978年，我作为知青代表，在南昌参加江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大会的时候，座位的安排形式变了。原来开各种大会，坐在同一排的是同一地区来的人，互相之间至少是很面熟。现在左右都是生面孔，前后排坐同样一列的，才是同一地区来的人。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人坐在最后排，他可以看见前面同一地区的人有谁在会议中间溜走了。

五、到北京

很奇怪的是当时像我这种干农活很努力、政治上不积极的人，居然坐过专列上北京。这是怎么回事呢？

1975年，我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要把冯金生送走，所以没有报名去读书。按理说1976年我应该报名了，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可是最后我还是改变了主意。

永丰县政府有个袁副主任，他的老家是我们先锋大队的袁家村。老袁一直对我们上海知青非常关心。我们刚下乡，带领我们下乡的工人师傅觉得，鹿冈公社对知青的安置工作做得不好。工人师傅到县里的会议上说，永丰县没有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要求办，知青在乡下的处境还不如正常的移民。

老袁后来对我说，当时是他主持会议，他在会上说：“虽然我们还是国家的“贫困县”，县里的财政状况并不好，但是我们要将心比心啊。请问在座的各位同志，如果你们家里有十几岁的孩子离开了家，一个人到几千里外去了，你们想不想要当地的人对你们的孩子好一点？”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永丰县作为接受知青的一方，决定基本按照上海方面提出的要求，永丰的上海知青由县民政局管理，按照国家移民的标准，发放半年的商品粮和安家费。真是难为老袁他们了。从此以后，县民政局的刘局长经常来看望我们，和很多知青成了好朋友。几十年以后，刘局长从永丰县纪委退休以后到上海游玩，还是有许多当年的老知青热情地请他吃饭。



2014年，作者在永丰县城拜访老袁。

老袁的大女儿在县城中学毕业以后，就回到老家，成了知青，这女孩平时的表现也很好。听村民说，女孩的母亲是县里某个局的副局长，她专门到鹿冈公社来了一次，好像在一个星期之内，老袁的女儿就在鹿冈入党了。

1976年的学校招生开始了。我一打听，老袁的女儿报名了。我想，去读书的名额很少，竞争十分激烈，我的条件不如她，先锋大队今年肯定是推荐她去读书，我也不用报名了。

大队书记遇到我，问我为什么又不报名，难道真的要扎根农村了？我据实说了自己的想法，表示我明年一定会报名。可惜没有明年了，从1977年开始，学校招生就取消了“自愿报名，组织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恢复了传统的高考。

后来很多人都说我很傻。他们认为，要是我当时也报名的话，老袁的女儿和我肯定都能去读书。可那是马后炮，没用了。

1977年，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在对公众开放以前，中央规定，各省先派遣一个由各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乘坐专列上北京，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主席遗容。我们永丰县得到了十个上北京的名额。

一天，我正在里陂上村的连作田里干活，远远看见公社的团委书记小艾一路小跑着过来。他一反常态，不是站在田

腾上，而是“扑通”一声跳进水田里，兴奋地走过来，嘴里大声说道：“老袁，刚才县里来通知，你要去北京了。”

据说是老袁在县里开会的时候，提出来应该有知青参加这个代表团，并且直接提了我的名字。我猜想，他的女儿去读书了，我没有去。尽管是我自动放弃了机会，但老袁是个好人，他心里也许会有一点压力，又或许有一点过意不去。所以他主动提出让我去北京，可以让我得到一点补偿。

我们一行十人由县委书记刘国琳带队。县里的人都说，刘国琳书记是清朝道光年间永丰的状元刘绎的嫡系后裔。我们从新余上了火车，专列转道京广铁路向北疾驶。专列上最舒心的是丝毫不用担心，绝对没人会来偷我随身携带的行李。

十一年前，文化革命初期学生“大串联”时，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到各地去串联，更没有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现在，我坐专列第一次到了北京。

一进毛主席纪念堂，迎面是毛主席的汉白玉坐像，有一面墙上好像是他生前的手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记得当时心里说，只争朝夕。这些年来，毛主席好像太性急了一点。

我双脚第一次踏着地毯，感觉像是走在草地上。我还不时抬头，欣赏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和装潢。到了水晶棺的前面，我低头看着水晶棺里的毛主席遗容，感觉化妆还是浓了一些，似乎显得不太自然。

瞻仰毛主席遗容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有的悲痛，有的沉思，一片肃穆。哎呀，我只顾自己的好奇，没有作出应有的表情，我犯错了。

在北京期间，我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对面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看见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穿了几十年的打了补丁的浴袍，以及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因为双脚肿胀，没穿过几次的特制的宽大黑布鞋。总理用过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玻璃杯，里面放满了总理批示文件用的铅笔，杯底是五角星的形状，和我小时候在上海喝水用的玻璃杯一模一样，一角五分钱就能

买一个。我对国家领导人的简朴生活早有耳闻，所以没有特别惊讶。

我在一个展柜前停留了很久，里面是毛主席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每个字有核桃那么大，笔迹歪歪扭扭，不记得有标点符号。据说这是毛主席为了某件事，专门写给华国锋总理的。看来主席写字的时候似乎病得很重，颤颤巍巍地写这几个字，一定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我眼睛看着那六个字，心里想到的却是毛主席在三十年里，曾经先后三次正式选立和废除了自己的继承人。他在病重的时候，仅仅用这样的上面没有抬头，下面没有署名，更不是会议记录的铅笔字“你办事我放心”，就算是交班了？

展出这六个字，无非是要告诉大家，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合法的接班人。但是于我而言，展览并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效果，反而增加了我心中对国家领导人传承制度的忧虑，感到有一种无名的淡淡的悲凉。



1977年9月，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结束后，作者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回想起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我在村前大队的知青林场。村前小学的马立平老师也来了，她说，文化革命到此算是结束了。接下来大家猜测毛主席的遗体会如何处理。

多数人，会像苏联的革命导师列宁那样用水晶棺，可以让人民瞻仰。我说，以前中央好像有过决议，中央委员以上的干部去世以后，一律要火化，毛主席也不应该例外。

没想到过了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人民的心愿》说，建造纪念堂，让毛主席在水晶棺里接受瞻仰，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我心想，嘿，我不属于全国人民了。

里陂上的村民周恩绍认真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接下来不知道是谁来做皇帝了。在他们眼里，毛主席和皇帝是一样的。在村民的婚娶大礼上，司仪往往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0 年”这样的年号，来代替“光绪三十年”或者“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先锋大队的袁家村有个村民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他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在田里干活的时候表示说，毛主席早就该死了。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大队领导。各级干部都不敢隐瞒这样的事情，逐级向上报告。结果这个村民被判了几年刑，发配到九江市的劳改农场去了。

我私下里问大队干部老高：“如果毛主席活着，听到有农民这样说他，他会同意把这农民判刑吗？”

老高想了一会儿，说：“不会吧。”

过了一会儿，老高话锋一转，说：“原来听得有人算过，毛主席以后掌权的应该是山东人。现在却是山西人了。”

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不禁一愣。山东人指的是江青和张春桥吧？山西人当然是指现在的华国锋主席了。

几十年以后，我看见报纸上说，毛主席的遗容有两套，一套是真的，一套好像说是蜡像。不管看到的是真的遗容还是蜡像，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实在是小事一桩。

可我心里还是会嘀咕，我在 1977 年到北京瞻仰的毛主席遗容，是真的那一套吗？

36. 不合作、撤职和查账

我在里陂上村的日子，经常会感到鹿冈公社和我们先锋大队之间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摩擦。鹿冈公社是代表政府，比较侧重于贯彻上级的决定，落实上级的政策，应付上级的检查。先锋大队在实质上还是历史上村民自治机构的延续，所以比较侧重于村民的切身利益。

鹿冈公社的领导认为，自己贯彻上级的决定，完全是为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幸福。他们作为上级，往往是强势的一方。而先锋大队作为下级，有时会觉得公社领导脱离了农村的实际情况，无意中损害了村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处于弱势，他们不能公开反对公社领导，只能经常采取推脱和拖延的办法，有时甚至对上级的决定阳奉阴违。我当队长时，和其他的生产队长一样，以村民的利益为先，和大队干部配合得相当默契，以至于公社领导会说我们先锋大队的工作“很难推动”、“不合作”。

其实先锋大队的“不合作”，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就是鹿冈公社的驻地就在先锋大队（如今的鹿冈村）。

公社干部喝着鹿冈村的水，烧着鹿冈村的柴，吃着鹿冈村的米，嚼着鹿冈村的菜。他们的饮食起居，一举一动，都在村民的眼里，没有丝毫的神秘感。这使得先锋大队敢于在一定程度上“不合作”。如果不准确地套用一句古语，则多少有一点“近之则不逊”的意思。

一、不合作

每年插秧的时候，公社都要求我们“合理密植”，他们强调“密植”，我们强调“合理”。

有经验的村民知道，如果种得太密，没有足够的肥料来支撑，粮食产量并不高。况且密植很费工，会耽误农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容易造成粮食歉收。

等到公社干部来村里检查，发现我们种得稀了一些，就会要求我们返工。这时候的村民和村干部，任谁都不吱声。干部发现没人理睬他们，脸上挂不住，就会亲自动手拉人，来把刚插下去的秧苗耙掉。可是在村民看来，这是要遭天谴的行为，谁也不愿干这种缺德的事。最后往往是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连推带拉地拖住一个村民，强迫他耙了马路边的一二坵田里的禾苗，我们只在这一二坵田里重新栽禾。这样一来，我们不用大量返工，干部也算是有所作为，大家都可以交差了。

1975年，邓小平还在中央发号施令。到了1976年，他就成了批判的对象。为了批判邓小平，县里派工作队来到先锋大队，召集队长和党员开会，要求人人表态。



1976年，报纸上的宣传来势汹汹。

自从文化革命以来，大家对反复无常的政治局势早就厌倦了。好不容易邓小平重新出山，出手整顿，刚刚恢复了秩序，又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多人心里不高兴。大队会计老袁发言时说漏了嘴，他说：“我拥护党中央，拥护邓小平。”

这本来就是不久以前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但是现在形势变了。工作队里有个年轻人很不高兴，他板起了脸，一定要批判大队会计。

我一看场面十分紧张，连忙打圆场说，会计的表态是“拥护恨邓小平”。在鹿冈乡音中，“恨”和“邓”的发音相同，都念作“横”。在座的人纷纷笑着附和，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一下子变得又轻松又滑稽。看得出工作队的那个年轻人心里

恼怒却又没有办法，于是他一定要会计再重复几遍“拥护恨邓小平”才作罢。

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的妇女主任，她把我留下来谈话，说我混同于落后群众，居然还是党员，又是队长，一点觉悟也没有。

过了几天，公社的人告诉我，工作队把我在会上捣蛋的事汇报上去了，他们说我“不合作”。

有一次，县里的一个副主任来里陂上村检查工作，我刚吃过早饭，在村民张发茂家，商量村里的事情。主任一屁股坐下来，他没说几句话，发现脚边有一只黑母鸡在咯咯地转悠，就用他铮亮的皮鞋踢了鸡一下，歪过头来看着我，挤挤眼睛，下巴颏朝着那只黑母鸡动了两下，说：“很好吃的，今天中午，怎么样？”

我一直盯着主任的皮鞋，那是我第一次在农村看见有人穿皮鞋，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我当然明白主任的意思，他要在村里吃午饭，要吃鸡，特别是要吃发茂家的那只黑母鸡。可是黑母鸡正在下蛋的时期，发茂家里还指望着把鸡蛋卖了，来换些零花钱呢。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这样啊，怪不得洋坳知青农场的场长夏元麟说，他们做了一批枫木的砧板运到县城里，挨家挨户地送给有关的领导，没有一个领导拒绝收下。

我装聋作哑，没有接主任的话茬，而是故意岔开去，说些其他的事情。主任明显地不高兴了，过了不到十分钟，他就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走人了。

这年秋天我去吉安开会，这位副主任恰巧是永丰县的领队，我俩一见面，他就说：“你不行，上次我们没有很好合作。”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我只能一笑了之，没有对那次的“不合作”作出任何解释。

二、撤职

不合作是要付出代价的。

到了 1978 年，公社选定里陂上村作为杂交水稻的育种基地，准备第二年全面推广杂交水稻。为此，有一位去海南岛参加过杂交水稻育种工作的公社干部，指挥着育种工作队的十来个人，全年在里陂上村坐镇，教村民种田。

工作队一来，气势非凡，事无巨细，统统都管。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传统的那一套耕作方法基本作废了，我们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培育出杂交水稻的种谷。我是大队的支部委员，倒也落得清闲，每天听从工作队指挥，跟着出工而已。当时张富魁是队长，他也只比我多了一项工作，出工之前要吹哨子。

可是育种工作队的工作作风有点粗暴。村民不懂特殊的耕作方法，工作队却不太会讲道理。很快就有不少村民到我这里来抱怨。我心里有一些想法，但是在言语上，还是劝村民们像我一样，跟着工作队做就是了么。

不久，工作队就找我谈话，说是以我为中心，里陂上村有一批落后群众在消极抵制杂交水稻。他们也说我“不合作”，一点也不像党员，忘记了入党宣誓。我想，这真是莫名其妙。再说了，我入党的时候并没有宣誓这个仪式，我没有宣誓。你们说我不合作，我不在乎。但是这些想法是不能说的，依我的脾气，只能一声不吭。

我不作声，也没有表示要积极合作。在工作队看来，我不合作就是在顽固抵抗。工作队很快通知我，公社撤销了我的大队支部委员职务。这是对我的惩戒，让我的不合作付出了代价，也确实让里陂上的村民乖了不少。

撤职在我眼中的分量很轻，我看重的是为村民谋利益，用时尚的话来说，是为人民服务。我心里想不通的是，怎么上面的压力一大，村民中连一个公开为我说话的人都没有。甚至还有人‘反戈一击’，去工作队那里说我不好。

我和大队会计老袁在大队部聊天，说到世态炎凉时，他安慰我说：“老夏，我们为什么叫‘农’民？就像是人身上长的‘脓’包，那是有一点用的东西。你见过地上的蚂蚁么？我们农民就是那蚂蚁。要是上面有一只大脚踩过来，我们这些蚂蚁能做什么？只能快快逃命。”他一边说，一边还用脚重重地踩了一下地面。

袁会计又分析说：“这一次搞杂交水稻育种，工作队人多势众，里陂上老俵每天和他们一起下田干活，毕竟老俵要谋生，只有这唯一的路，只能服从工作队。而知青只剩下你一个了，势单力薄，老俵当然要疏远你了。再说了，你们知青不就是住在里陂上的‘客籍’么？”

是啊，我自以为村民会像过去那样跟着我搞“不合作”，其实谁的力量大，村民自然就跟谁走。怪不得有个过去和我走得很近的村民朋友，现在离我最远。想来他是为了避嫌，趋利避害是绝大多数人的本能，我不应该责怪他。这样一想，我心里平顺了不少。

再者，我们知青的确可以算是外来的客籍。从历史上来看，个别的客籍迁徙到一处繁衍生息，其后代不是被赶走，就是被融合，总之是会消失。相对于客籍，土著在潜意识里有着天然的心理优势。我们上海知青在里陂上村，归根到底，还是外来的力量。

过去在鹿冈，因为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所以我们有一定的心理优势，是一股力量，村民在心底里对我们有一些忌惮。

现在毛主席已经去世了，激进的知青运动在具体实践中，也已经眼睁睁地看着它无可挽回地败落了。至于它在思想上和历史中的地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至少得过几十年才能看出来。

历史的钟摆向左已经摆到了头，正在向右面回摆。我不禁想起了公社的邮递员老徐，他是江西省邮电系统的先进代表。有一次，老徐和鹿冈商店的职工吵架，对方咬伤了他的

手指，还恶狠狠地说：“我就是咬你这个先进，咬你这个党员。”



2014年，作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年的邮递员老徐。

鹿冈乡有的村子里，村民吵嘴打架的时候，已经有人大声叫嚷：“就是要打你这个共产党！”

我觉得自己在理论上已经想通了，但是在感情上还是有些郁闷。当时还没有到农闲的时候，我就回了上海。这是我十年农村生活中，唯一的一次。

父母见我回来了，既惊喜，又奇怪。我怎么会在这时候回来呢？父母很快猜到了我在乡下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怕我烦心，他们没有发问。可我还是听见了他们悄悄的议论。

这时的上海，已经有不需要用肉票购买的“议价猪肉”，每斤一元三角。父母知道我喜欢吃肉，他们能做的就是每天让我吃一大碗红烧肉。

我吃了一个月红烧肉，想到我还是里陂上村的会计，得回去工作了。母亲舍不得我走，父亲说：“让他去吧，年轻人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呢？遇到困难他自己会解决的。”

我始终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三、杂交稻种

我在杂交水稻育种的关键时刻离开里陂上村，去永丰中学教书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应该与我无关了。

可是到了 1979 年的秋天，我从上海请了事假，回到里陂上的时候，接任的会计就说，我交给他的账目不清，有些项目只有进项，没有出项。我一看，还是和杂交水稻有关。

按照公社的规定，1978 年的秋天，各个生产队必须挑着他们当年生产的普通稻谷，到里陂上村来换取第二年的杂交水稻种子。这些普通稻谷，就是给里陂上村民当年的口粮。有几个生产队挑来的稻谷不够规定的数量，他们把杂交水稻种子挑走的时候承诺说，很快会补上所欠的稻谷。

我在年终决算的时候，自然把这些稻谷作为当年的收入，参加分配，列入了“应收”项目之下。

于是我对接任的会计说：“要人家再送稻谷到里陂上来是不大可能了，你们应该挑着箩到那几个生产队去，把他们欠里陂上村的稻谷给要回来，账目就平了。”

会计说：“那不可能。人家从我们这里拿去了假的杂交水稻种子，会把我们打回来的。”

这是几笔收不回来的烂账。

1979 年秋天那次回到鹿冈，让我最意外的事情，是那位到里陂上村种杂交水稻的工作队长，已经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正在不停地写着检查。

杂交水稻工作队 1978 年在里陂上村种出来的杂交水稻种子，按照规定要分成两类。一类种子的产量高，来年的出苗率也高。二类种子的产量很低，来年的出苗率也低，只能作为备用的种子。没想到在里陂上杂交水稻育种的结果，是一类种子很少，根本不够 1979 年在全公社使用，而二类种子却很多。很明显，是杂交水稻的育种工作失败了。

工作队为此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把二类种子冒充成一类种子，又把一类种子称作二类种子。他们心存侥幸，希望

能够瞒天过海。

到了 1979 年的春播时节，如果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都播下了那假冒的“一类种子”，都是稀稀拉拉地发了芽，那完全可以假托是天气不好造成的。可是偏偏有几个生产队糊里糊涂，播下了“二类种子”，那是真正的一类种子，长势很好。这一下可就露馅了。

我不和这位工作队长合作，他曾经撤过我的职。现在他受了处分，倒霉了，我心里一阵高兴。可是又想到鹿冈公社受了这么大的损失，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如果当时我和杂交水稻工作队紧密合作，会不会在最后关头和他们狼狈为奸，一起欺上瞒下呢？

我应该是会挺起身来，不和他们合作的。

四、查账

我没当生产队长以前，村民说什么话都不避我，可当了队长就不一样了。明明听见一伙人在议论某件事，我一走近，他们就不说了。我很是感慨，连我这种根本不是官的“官”，都不能听到村民真实的声音，更不用说那些在位置上的各级官员了。

有一次，我远远听见一个张姓村民说：“我就不相信他不拿队里的一点好处，要不然谁愿意那么吃苦受累……”

他一看见我来了，便停了嘴。我想，这是在说我呢。我看着那个村民，心里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你毒死了我的狗，我一声都不吭，不和你计较。你咬牙切齿地说，村里让外姓人掌了权，我坐得正行得直，村里只是你一家反对我，只当没听见。你儿子刚担任记工员，就给自己多写了一百五十个工分，被我发现了，只是改正过来，并没有额外处罚你……你现在说我贪污，有本事你叫人来查我的账么。

没想到我的“大队支部委员”撤销以后不久，公社真的派人来查我的账了。他们大概是觉得我这块骨头可能比较难

嘴，于是集中了很多大队的会计来到里陂上村，命令我交出所有的账本。先锋大队的会计没有来，估计公社觉得我们是一伙的，不让他来。

查账进行了两天，我照常出工，在田里干活，自然免不了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到了第二天的午饭过后，青山大队的会计老金悄悄来到我的房间里。我问他：“你怎么可以独自来见我，不怕别人怀疑吗？”

老金说：“昨日就查完了，有发现问题。上边还要求查，今日只是消磨时间。不过我有点不懂，在你的账上，公社送给你们手扶拖拉机的那笔账，是怎么做的？”

老金是聪明人，他既是青山大队的会计，还是开拖拉机的司机。我向他说明情况，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十五分钟以后，查账小组把账本还给了我，大家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们旋即回公社汇报去了。



1970年代，农村的账本。

37. 械斗

2013年，我们和陆禹平全家一起回永丰的时候，在县城的饭店里订了两个包房，请朋友吃饭。我们房间里的一桌，主要是马立平以前在村前小学的学生，有十来个，现在都在县城里工作了。陆禹平的包房里，都是他以前在鹿冈知青综合场的同事和下属。

我到陆禹平的包房里敬酒，一个人走近我，说：“我是下放在你里陂上村隔壁的潺陂村的知识青年，我姓刘。”

我困惑了：“你们村一半姓刘，一半姓张。可是当年只有我们村的知青崔应辉去了潺陂，没有其他知青啊。”

他急忙说：“我父亲是刘凯旋。”

我感慨万分：“啊，你父亲原来在教书，后来作为‘历史反革命’，带着五六个儿子下放到潺陂村里种田。你父亲和几个兄长比你长得高大。每年的年终分配，你家赚的工分最多，永远是工分榜上的第一名，弄得潺陂老俵都眼红死了，心里很不平衡。”

小刘说：“文化革命一结束，我父亲就回到永丰中学教书了，我后来作为知青，进了鹿冈知青综合场，在陆禹平手下。”

我问小刘：“说起潺陂，那年我带着里陂上村民和潺陂械斗，我动手的时候，你在吗？”

“我就在现场，你们里陂上赢了，我们潺陂输了。”小刘说。

我大笑，高高举起酒杯，对他说：“如今，谁也不相信我这样文绉绉的人会动手打人，你一定要为我作证啊。干杯。”

一、械斗的传闻

1969年我们刚到农村，就听说了在上永丰的藤田公社，有大规模宗族械斗的事。

从地图上看，永丰县的形状从北到南，像是一个拉长了

的“S”，北面地势低，习惯上称作下永丰，南面地势高，是上永丰。



江西省示意图



永丰县示意图

上永丰有很多二三千人的大村庄，村民性格比较强悍，素来有“上永丰蛮，下永丰奸（读如‘甘’）”的说法。据里陂上的村民说，永丰县衙门之所以驻扎在永丰北面的“下永丰”的恩江镇（县城），也是当年下永丰人奸猾的结果。

可是我对村民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保留。江西省在长江以南，地势南高北低，造成很多江河从南向北流，北面是下游，水路交通比较发达，容易集中人口，形成较大的城镇。因此，江西的省会南昌市，是在江西的北面，赣江的下游。永丰的县城恩江镇，是在永丰的北面，恩江的下游。

说是在 1967 年夏天，上永丰的藤田公社有两个大村庄起了冲突，要以打仗来决定胜负，于是下了战表，定好了战场，约好了开仗的日期。

按照传统，准备打仗的村子要通知自己村里在外的族人，不管是在外工作、经商还是求学，都要赶回来。确实不能回来，或者在规定日子赶不回来的人，必须多缴纳钱财，作为族里的公产。如果有族人在冲突中死亡了，其子女用族里的公产抚养，直至成年。如果有人受了伤，也是用公产支付疗

伤的费用。

开战时，双方要列阵、要擂鼓，兵器则主要是扁担、锄头和梭镖之类。妇女也会提供后勤支援，准备好救护伤员。

据说其他地方的人届时可以去战场，从旁观战，只要撑一把伞作为标识，就不会受到作战双方的伤害。

真是不能想像，在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农村里还会有这种传统的宗族械斗。虽然都是用冷兵器，那还是和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很不一样，传统的宗族械斗更有规矩，组织更严密。

后来我问公社武装部的姜部长，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姜部长说，当然是真的。他当时正是县城所在地恩江镇的武装部长。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死了多少人？”我问道。

部长说：“最后没有打成。我们县的人民武装部调动了一百多杆枪赶到了藤田的现场，把双方的人马隔开了。那几天，县城里的人可兴奋了，人人都在说这事，有人还真的拿着油纸伞去观战呢。”

后来有一年，知青陆禹平作为民兵，一度荷着步枪，在鹿冈林站门前的马路上设立关卡，不准偷运贩卖木材的村民经过。俗话说“荷枪实弹”，但陆禹平荷的却是空枪而无实弹，上级没有发放子弹。鹿冈公社民兵的枪和子弹是分开存放的，子弹由公社的武装部长负责保存，就放在部长睡的那张单人床下面的铁盒子里。

我很后悔没有当面请教姜部长，那年赶到藤田阻止宗族械斗的那一百多杆枪中，究竟多少杆枪里面带有子弹。



油纸伞

过了几年，听说离我们三十里路的峡江县流源村有一个司机，开着拖拉机在离流源村七十里路外的水边镇，与人起了争执，被人打伤了。

流源村是峡江县数一数二的大村，怎么可以受这样的欺负？村里决定兴师问伐，出动了几百人，拿着家伙，向水边镇进发。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在就近的村子停下，要这些小村子杀猪宰鸡，招待他们。

如此折腾了两天，这支人马才挪动了不到四十里，就被迎面赶到的人民武装部的力量赶了回去。

这次械斗也没有打成，最倒霉的是被流源人一路上荼毒的那几个村子。

二、我动手了

印象中是在1977年，我带着里陂上的村民和潺陂械斗，我只动了一拳，就打赢了。

那年初夏的一天早晨，我正在离村最远的芮源水库脚下干活，突然听见好像有人在叫我。抬头一看，只见远处有个几寸高的人影正朝我飞奔而来。人影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清晰了：“老夏快来，出事了！”听声音，这是村民张富魁，我的接班人，继任的队长。

原来，富魁他们早上在村口的马路边干活，遇上潺陂村里的十几个人（前面所说的刘凯旋的儿子就在里面），每人挑着一担松树劈柴路过。富魁把这些人拦了下来，一口咬定这些柴是在里陂上的山岭上违禁偷伐的。里陂上的村民已经回村拿了扁担，准备把这些柴没收了，挑回村里去，双方在马路上僵持着，快要打起来了。

我连忙从水田里上来。从这儿到村里，即使一路小跑，也要十多分钟呢。我一边跟着富魁往村里赶，一边暗暗叫苦，这下麻烦了，双方手里都有扁担，搞不好要械斗了。

里陂上和潺陂两村相邻，解放初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搞土地改革，把田地和山岭分给了农民，曾经颁发过土地证和山岭证。等到合作化运动一来，田地和山岭归集体所

有了，土地证和山岭证成了落后的象征，一把火烧掉了。

两村的田地之间，有一条河相隔，倒也相安无事，山岭就不一样了。我当队长期间，很想把里陂上村的山岭界限弄清楚，曾和两村的代表一起上山踏勘过。因为时间长了，更主要是山岭证烧掉了，连发证单位的底本也找不到，双方在山上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不清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如果富魁他们不挑起事端，让人家过去了，也就是十几担柴的事么。俗话说捉贼捉赃，在人家偷伐的当场捉住他们，确认是在里陂上的山岭上，那他们无话可说。现在人家挑柴下了山，离开了砍伐的现场，事情就复杂了。要是双方拉扯着一起上山查看，他们尽可以说是在潺陂的地盘上砍的，我们毫无办法。

富魁说潺陂人砍的是松树劈柴，现在我们只能以他们违反禁令砍伐了松树为由，来没收他们的劈柴。但是我们区区一个生产队，没有这个权力。

如果为了这等小事，引起潺陂所在的巷口大队和我们先锋大队闹到公社去的话，我知道如今这类山林纠纷实在太多了，任谁也处理不了，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

里陂上和潺陂的人口相仿，双方在我们的地盘上僵持着，我们人多，他们人少，我们有优势。即使要回村搬救兵，也是我们来的快。潺陂没有知青，而我是知识青年，又是先锋大队的支部委员，多少有一点点“背景”，反正现在我是不得不出头了。

谁能把柴挑走，谁就赢了，一定要把他们的劈柴扣下来。最好是速战速决，出奇制胜，让事情尽快过去。

我边走边想，心里拿定了主意。

我问富魁：“他们谁闹得最凶？”我心里想的是“擒贼先擒王”。

“是姓张的麻子。”他回答。

“到时候，你注意招呼大家跟在我身后，听我的命令行事。”我说。

我先回到住处，穿上了捐竹时才穿的解放鞋，摘下眼镜

放进口袋里，然后跟着富魁向不远的出事地点跑去。富魁一边跑一边大喊：“老夏来了……”

刚才还是吵吵嚷嚷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我怒气冲冲地大声叫道：“谁在这里吵闹？！”径直朝最前面那个还在呀呀叫的张麻子快步走去。没有等他反应过来，我一拳朝他的脸上打去。他本能地把头一歪，颧骨上吃了一拳，朝后跳了一步，一只手捂着脸，惊恐地说：“你？你打人？”我们的村民端着扁担，一下子围到我的身后来保护我。

我第一次打人，事先没有练过，全然没有准头，打在人家颧骨上，自己的拳头也疼得厉害。我又举起拳头，完全是一副上海滩上“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派头，恶狠狠地说：“你们违反禁令，乱砍松树居然还有道理了，我就是要打！”

张麻子见状，急忙逃到了潺陂人群的后面。他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吓得把手中端起的扁担放下了，完全不知所措。我朝前走一步，对方就一阵骚乱，往后退一步。他们放在地上的劈柴就离我们近一步。

我在里陂上村民的簇拥下，朝前走了几步，一挥手，说：“富魁，你带几个人留在这里，其他人担柴回村。”我盯着潺陂人，口里喊道：“看你们谁敢动！”

一眨眼的功夫，地上的劈柴全数被我们挑走了。从我出拳开始到现在，恐怕连一分钟都不到，真可谓是快刀斩乱麻了。

我对潺陂人说：“你们可以找公社派人来解决问题。”然后一挥手，说了声“走”，领头从马路上往村里撤退，就像现在电影里黑社会的老大一样。富魁他们几个马仔跟在后面。

富魁说：“老夏你看，潺陂的队长沿着马路去公社了。”

我说：“没事，我等着呢。”

一群老者和妇女守候在村口，迎接我们得胜归来。为首的老者快步迎上来说：“老夏，多亏有你，你受累了。”富魁的母亲拉住我，一定要到她家里吃饭。里陂上村人人十分兴奋，个个激动异常，大家喜气洋洋，纷纷述说着刚才马路

上的一幕。

看着眼前的场景，我想，现在潺陂村里可能是沮丧、气愤和无奈的景象吧。

过了不到一小时，公社武装部的宋部长来了，他说：“嘿，看你夏建丰文质彬彬的样子，居然还会打人？不会吧。”

我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最后说：“要不是我被迫果断出手，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呢。”

宋部长笑了笑，说：“这样吧，你把说的情况，写个报告给我就行了，我好有个交代。”

我写了报告交上去，没有人再来找过我。宋部长以前问我借的那本医书《蒲辅周⁷医案》，也没有还给我，可能是他忘记了。

潺陂的张麻子去鹿冈卫生院验伤，医生检查以后，说他没伤。

几天以后我在公路上打架的现场，正遇上张麻子要去鹿冈。他一见到我，一脸惊恐，返身就逃，慌乱中掉了一只鞋。他回转身来，慢慢下蹲，想去捡鞋，眼睛一直看着我。我板着脸，微微一抬下颏，表示可以。张麻子捡起鞋，一溜烟地跑回潺陂去了。

其实我遇到张麻子，心情也很复杂。那天自己仗着人多，又是突然袭击，张麻子吃亏了。这事要是搁到现在，他应该可以得到精神损失费的。

这次械斗传得沸沸扬扬，其实只有我打了一拳。不过这一拳更加提高了我在里陂上村的威信。怪不得说，将军的威信是打胜仗打出来的。

三、村民的枪伤

⁷蒲辅周（1888—1975），现代中医学家，初习儒，后改从祖父习医，十八岁时即悬壶应业。后又深入钻研《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著作。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医术益精，名噪一时。其著作有《蒲辅周医案》等多种。

械斗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打仗。前面说到械斗，说到瀑陂，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件和瀑陂相关的事情。

那一年，瀑陂的村民董道德被枪打伤了，不过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的械斗，而是被解放军击中的。

下面是几种传说中比较可信的一个版本。

1970年代，解放军0487部队的团部驻扎在永丰县城，部队的崔参谋长喜欢打猎，据说他有空的时候，经常会带着卫兵，坐上军用吉普车，到乡下去猎取野物。

那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凌晨四点钟左右，崔参谋长的座驾沿着永丰到乐安的公路，进了鹿冈公社的地界以后，便放慢了速度，缓缓而行。到了瀑陂的村口，大雾弥漫，在吉普车头灯射出的光柱中，参谋长隐约可见村口有小片竹林和树丛，里面好像有野物在活动，看那动物的大小，很可能是野猪。

参谋长振奋起来，命令司机停车，摇下车窗，举枪便射。他的枪法不错，那野猪应声倒地。参谋长兴奋地打开车门，跳下车，飞奔过去，没想到野猪那里传来了“哎哟，哎哟！”的叫唤声。参谋长上前，用手电筒一照，发现他打中的不是野猪，而是一个农民，正捂着自己的大腿在叫唤。

参谋长知道出大事了，一边进村叫醒了村民问清情况，一边叫卫兵赶紧把受伤的农民抬上吉普车，直接开到了0487部队的卫生队，对那个受伤的农民进行枪伤的急救处理。幸运的是子弹没有打在农民的要害部位，也没有击中腿上的骨头和大血管，农民受的是轻伤，身体痊愈以后不会落下残疾。

受伤的瀑陂村民董道德，原是乐安县牛田乡人，客居在瀑陂村，他是里陂上村的女婿，素来以做事勤快而出名。里陂上村和瀑陂相邻，那天早上我们在田里干活，董道德的家人就来报信，说是老董被解放军打伤，已经送到永丰去了。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人民解放军怎么可能开枪打伤了老百姓呢？等到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反应最快的是里陂上村里的年轻后生，他们七嘴八舌地说道：“应该要解放军赔钱，老董弄个千把块钱来花花。”“董道德的

崽（儿子）可以要求去当兵，不用再种田了”……

老董在部队的卫生队里住了一个多月，农历十二月底以前从永丰回到潞陂，在家里过年。

过年以后的正月里，董道德父子俩来里陂上村的亲戚家里吃饭，我也受邀入座，坐在了老董旁边。我打量着身边的老董，他在永丰休养了一个多月，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了，变得又白又胖，这使我想起非常流行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面，那些在抗日战斗中受伤的新四军战士，在农民家里疗养枪伤时所唱的：“……心也宽，体也胖……”

饭桌上的主要话题，自然是听老董亲口讲述，他自己是如何突然变成了野猪，倒在了枪口下面。

老董说，那天夜里他醒得早，想起自己为了弄点小鱼来吃，在村口马路边的“障子”上安装了竹制的捉鱼器具“簏子”，已经两天过去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收获，该去查看一下才好。

董道德摸索着穿好衣服，拿着手电筒出门了。出门不远就是“障子”，那“障子”是很多年以前，为了护住村子的“风水”而修筑的，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树丛和竹子。董道德钻进障子，拿手电筒一照，捉鱼的簏子有些歪斜，水没有流进簏子，里面自然没有鱼。他关熄了手电筒，弯下腰来，双手用力，重新安装那个簏子。

老董说：“就在这时候，马路上有两束白光射了过来，我转动眼珠瞟了一眼，晓得是有汽车来了。潞陂村口经常过汽车，所以我一点也不在意，继续做手里的事情。只是心里有点奇怪，怎么听不到汽车马达的响声呢？这时候我听到‘呼’的一声，只觉得腿上一麻，吃不住劲，就倒下了。”

老董嘬了一口碗里的糯米水酒，继续说道：“在去永丰的路上，一个年纪大的解放军一直说对不住我，后来我晓得他是崔参谋长。参谋长说，他是听说鹿冈公社的贯前那边有野猪，而野猪喜欢在下半夜出来活动，他是出来打野猪的，实在没想到距离贯前还有十多里路，就把老俵当作了野猪，实在是的对不住，对不住了。”

老董的儿子气呼呼地在一旁插嘴说：“光说对不住有什么用！我爹真是蠢，应该提出来让我去当兵，我就可以不再种田了。”

董道德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一拍，大声叱骂儿子：“你个冇良心的东西。我们在瀑陂是客籍，如果不是共产党来了，我在瀑陂哪里会有今天这么好！我这回在永丰养伤，每天有肉吃！崔参谋长差不多日日来看我，政委也来看过我，想不到我这一世还能看到这么多的大官！还能和大官说话！我养好了伤，他们还给我送礼，我可是坐着吉普车回到了村里！以前国民党来村里抓壮丁，我见过国民党的兵，要是被他们打伤了，那就是白白的受伤，冇人来管你！”

儿子不吱声了。老董缓了一口气，对儿子说：“我知道你要利用这个机会，我当然跟崔参谋长说过要你当兵的事，他说不容易，很困难。人家那么大的官都说很难做到，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就不再跟他说这个事了。”

儿子像是要说些什么，他张了张口，看着父亲董道德的脸色，又看了看我，他什么也没有说。虽然饭桌上的光线比较暗，我还是看见老董的儿子涨红了脸。

我坐在董道德旁边，生怕他父子俩再起争执，赶紧招呼老董别再说了：“吃酒吃酒，多吃点菜。”本来么，大过年的，生气吵口不吉利。

可是我一边喝酒，一边却在想：要是崔参谋长答应了老董的请求，让老董的儿子参军当了兵，要是万一有人追究起这个新兵的来历，参谋长因违反军纪私自打猎而误伤老百姓的事情就很容易暴露出来。解放军一向以纪律严明著称，到时候参谋长自己就麻烦大了。这也许是他不愿意帮忙让老董儿子参军的原因吧。

董道德后来怎么样了？听说在 1980 年代初，瀑陂村实行土地的承包责任制，开始分田到户的时候，老董得知可以在乐安老家的村里分到承包的田地，他便结束了在瀑陂村的客籍生活，回乐安的老家定居了。

当时的鹿冈地区有些农民觉得，老家的村子毕竟是同一

个宗族，同一个姓氏，相对客居在别处而言，理应比较自在一些，只要能够在老家分到承包的田地，他们就迁居回去了。

比如客居在我们先锋大队袁家村的高发宗和里陂上村的高发有，他们两家都回到了上袍村，上袍村姓高。里陂上村张绍生的弟弟原来住在巷口村，后来回到里陂上，里陂上姓张。村前大队开拖拉机的高祥发，他回到了佐龙乡的老家坪下村以后，跑运输赚了钱，在坪下盖起了两幢大房子。高祥发当年和上海知青的关系很好，他只要知道有熟悉的上海知青回到永丰，一定会热情邀请知青到他坪下村的新家去作客。



2014年，作者在坪下村高祥发的新屋里小坐。

也有人不回老家居住。里陂上村的周恩绍到吉水县的老家去询问，老家不答应给他分田，结果他只能参加里陂上村的土地承包。而董道德的小儿子娶了潺陂村的女子为妻，就留在潺陂村里繁衍子孙，生生不息。

这是后话了。

38. 报纸和广播

“Media”这个英文词汇翻译到中国，对应的中文是“传播媒介”，简称传媒，或者是“媒体”。现在它好像包含了报纸、杂志、书籍等“平面媒体”，也包括了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网络上的博客、微博、微信，等等。以后一定还会有许多新的成员加入到传媒这个队伍中来。

我在里陂上做农民的日子里，要接触外界的信息，主要是通过报纸和广播。

一、报纸

在记忆中，我家在上海一直订阅报纸，不是《解放日报》就是《人民日报》，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一个很大的信插，让邮递员能够方便投送信件和报纸。这个信插从1962年开始，一直用到2006年整幢楼拆毁为止，整整用了四十四年。

我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前夕，母亲叮嘱我，到了江西要订一份报纸，多看看多想想，就不会说错话了。怪不得母亲在上海，每天都要仔细看报，她还要教会父亲到单位里应该说些什么话呢。

我在里陂上村安顿下来以后，就去鹿冈公社找邮递员老徐，要他帮我订一份《江西日报》。老徐说：“上级邮电局最近有通知，每个生产队都要订阅一份《江西日报》，全年的订费十二元，由生产队集体支出。有知识青年的生产队，我们一律投送到知青的住处。公社已经同意了我们的方案。”

这太好了，在江西省会南昌出版的《江西日报》，第三天就能在里陂上村看到了。看过的报纸还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给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当作手纸。我知道中国人历来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可现在顾不上了。如果没有报纸，我们就得学习村民古老的习俗，用竹篾片、石头或者稻草扎成的小卷来擦屁股，那实在太难学了。唯一要注意的是使用以前一

定要检查一下，报纸上千万不能有领袖的形象，否则被人报告上去，有可能惹上大麻烦的。



江西日报，报头乃毛泽东主席所题写。

过了几个月，村里唯一能看报的村民有意见了，说我们知青垄断了集体的报纸。我觉得他说的对，就到鹿冈商店买来了铁丝，请村里会做一点木匠活的村民张梅发做了一个活动的报夹，挂在仓库边的墙上，让村民随意阅读。我负责每天更换报纸。

那个村民很高兴，几乎每天都要抽空去看报。他有时到我这里来讨论时事新闻和政治形势。我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是这个村民的看法和见解还是常常让我有些郁闷，很多事情实在无法向他解释清楚。

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其他的村民开始嘲笑他，说他肚子里有一点墨水就自以为了不起，每天装模作样地看报，只是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而已。他老婆也说家里的干柴剩下不多了，他有看报的时间还不如上山去砍柴。这个村民一生气，和别人吵了一架，就再也不去仓库边的报夹那里看报了。

既然没有村民看《江西日报》了，我每天去报夹更换报纸，倒显得多此一举。在村民好意的提醒下，我把报夹收了起来。

大约是 1975 年，邮递员老徐通知我，生产队可以自愿订阅一份《参考消息》。这是一份中文的日报，是“内部报刊”，每天刊登很多国外的消息，但是个人无权订阅，只能由单位集体来订。在上海，我父亲的单位就订了一份《参考

消息》，他常常在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捎带回来，下午上班的时候就带回单位了，我只能在父亲午休的时候抓紧时间浏览一下。

我和老徐商量说，以前上级强制队里订了一份《江西日报》，村里已经有很多人不高了。现在既然《参考消息》必须以队里的名义订阅，我是队长，就由我个人出钱行不行？老徐答应了我的请求。



参考消息，报头乃集了鲁迅先生的字而成。

从《参考消息》上面，我可以看到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大报和美联社刊发的消息，也有美国的敌人苏联的塔斯社和《真理报》的报道，还有全世界各种主要通讯社和报纸发布的新闻和评论。总之，《参考消息》的内容虽然经过了中国政府一定程度的过滤，还是很及时地反映了世界各地的真实情况。

二、杂志

和报纸类似的是杂志。伴随着我的成长，母亲在上海分别给我订过《小朋友》、《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杂志。如今我一想起这三种杂志，就感到无比的亲切。

1975年我在鹿冈公社学习了简单的农机修理以后，回到上海买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学习。过了不久，我觉得还应该了解中国农业机械的最新发展情况，就去找邮递员老徐，请他帮我订一份《农业机械》杂志，这是一份月刊，每个月一期。我1979年回上海的时候，在鹿冈公社把这份《农业机

械》杂志停了。

后来我在上海订阅了一份杂志，也是一份月刊，名叫《读书》，是它的早期读者。我到美国以后，请弟弟继续帮我订阅这份杂志。有朋友回上海了，我会请他们把我弟弟处积存的《读书》杂志带到美国来。我自己回上海的时候，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读书》。它是我的枕边书，每每在晚上睡觉以前翻阅和思索。记得有两篇介绍天体物理学最新发展的文章，我反复看了五六遍，才算有点懂了。



1979年创刊的读书杂志

过去的“电报”似乎也可以算是一种“传媒”。记得有一篇文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19年在法国的“巴黎和会”上，强国要把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殊权益转让给日本国。“弱国无外交”，中国派去开会的外交官员气不过，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在会场外的梁启超先生。梁启超跑到巴黎的电报局，以他惯有的当时极具魅力的文笔，洋洋洒洒地给国内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把“巴黎和会”的情况传到了中国。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后来几十年中间，中国政界和军界的许多大人物，也经常把长长的电报稿件刊发在报纸上，用来阐述自己的政见。

即使在文化革命期间，全国各地也会给毛主席发出“致敬电”，并且登在报纸上，向毛主席报告喜讯。毛主席去世以后，各地还给北京发去“唁电”，向党中央表忠心。“致敬电”和“唁电”都是电报，但是我始终不明白，具体操作的时候，发电报的人是先到报社要求登报纸，还是先到邮电局拍发电报。在我想来，既然这些电报的内容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了，还有必要花钱到邮电局拍发电报吗？

对于平常百姓来说，使用电报虽然速度很快，但是很贵，一个字要三分钱，另外再加半分钱的译电费（翻译成电报码的费用）。只有发生紧急事情，才会到邮电局拍发电报。比如电报的内容是：“上海某某路某某弄某号某某某母病危速归”，共18个字的电报，要六角三分钱，另有两角钱的“流水费”，合计八角三分钱，比寄信时用八分钱的邮票要贵多了，但好处是速度快，一般是第二天就能收到。



1970年代电报的纸质封套

1970年代，我们在上海住的一幢楼里，十来户人家中，有十多个孩子到农村去了。后来弟弟告诉我，每到过年以前，楼房里收到的电报会突然多起来。只要听见摩托车的响声，那一定是邮电局来送电报了。内容多半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孩子要回家过年了，请自己的家人届时去火车站接车。

我回上海的时候，从来不打电报通知父母，总是自己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可以带给家人一个很大的惊喜。

三、收音机

我们里陂上知青班的班长崔应辉是极其聪明的人。他以

满分的成绩考进中学，据说在文化革命前的“教育改革”中，他还以中学一年级学生的身份，到别的班级教过语文课，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

文化革命的初期，崔应辉比较积极，参加了学校里最大的红卫兵组织，跟一批很聪明很能干的高中同学在一起。据他说，组织里要开会讨论重要事情的时候，为了防止别的红卫兵组织来偷听，就索性搬了椅子到空无一人的大操场里，在操场中央开会，四周情况一目了然，自然不会有人偷听了。

到了农村，崔应辉还是很活跃。我们第一次从队里领到每人每月十五元的安家费以后，第二个月他就去领出了三个月的安家费，到鹿冈商店花了三十五元钱，买来了店里唯一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也是里陂上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台收音机。

当天晚上，我们四个男知青围在这台米黄色的收音机旁边，慢慢地转动拨盘，搜索各种频率，收听各种电台的广播。

信号最强的当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电台要对台湾海峡对面的“蒋军官兵”喊话，有在大陆的父母喊台湾的儿子快点回家吃饭。我想，要是当初我父亲真的在1949年孤身一人跟着大批人撤退到了台湾，说不定我母亲会在收音机里喊丈夫回家呢。不过那样的话也就没有我了，我是1950年出生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也非常清楚。上海的几个电台中，只有990千赫的电台能听到微弱的时断时续的声音。

令人惊奇的是能听到“美国之音”的广播，这是敌人的电台。“收听敌台”是不允许的，如果有人揭发报告的话，可以成为一项罪名，要坐牢的。

在里陂上村，“美国之音”的信号很强，不像在上海有专门的电台发送干扰信号，所以收音机的声音非常清楚。

除了“美国之音”以外，还有两个“敌台”。

一个是“中华民国”的“自由中国之声”，收听效果不

很好。老蒋在台湾没有搞民主，只能说自己是“自由中国”。这个电台有一点是与众不同的，经常会提请大陆某个地区的“某某同志”注意收听抄写，然后播报一系列的数字。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给潜伏在大陆的“美蒋特务”发暗号。

真有这么多种潜伏的特务吗？我怀疑这是老蒋的心理战。不过多年后我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国民党的抗日英雄、特务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后，在他死后好几年的1950年代，国民党通过潜伏的特务，把戴笠在大陆的家人辗转接到了台湾。特务？看来还真有。后来我知道，即使在解放以前，老蒋派到延安的特务也很厉害，使得毛主席的住处遭到飞机轰炸。周恩来的车队也曾遭到伏击，有几名警卫的战士牺牲了。

另一个敌台是只有晚上七点半到八点钟播音的“解放军之声广播电台”，信号不强，频率也游移不定。这个电台总是说“毛林小集团”是“官僚军事小集团”，总是为被毛主席打倒的刘少奇鸣不平。

还有一个电台是苏联的“和平之声广播电台”，声音清楚。以前中国和苏联友好的时候它是“友台”，中苏交恶以后，也可以算成敌台。“和平之声”虽然批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态度比较温和，比较克制。

总之，在里陂上村听收音机，能听到的电台不多，其中大约有一半是所谓的敌台。一开始听到这些电台，感到十分新奇和刺激，每天听到很晚。我们知道这是违禁的，心里多少有些害怕。所以收听的时候大家心照不宣，神情严肃，静默不言。事后也绝不议论和分析，就像没有发生这件事。

过了几天，一方面因为新鲜期过了，另一方面天天熬夜听收音机，体力撑不住，影响了白天出工干活，我们收听敌台就少了很多。崔应辉走了以后，我从上海买了一台不错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里陂上村，也是偶尔听一下，主要是听“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的播音时间长，内容也很丰富。它除了播报新闻和专访以外，还有后来风靡全国的学习英语的节目“英

语 900 句”，主持人周幼康以及何丽达的名字就是这时候听到的。“美国之音”还会用粤语播报新闻。

1971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随意地打开收音机。“美国之音”报道说，最近中国杭州附近的军用机场发生了异常情况，原先负责警戒和保卫机场的陆军高炮部队，把炮口对准了机场内的飞机。报道还说，中国的上空连续几天没有一架飞机了，这说明中国内部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

如果这是真的，那中国一定是出大事了。

过了十来天，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是林彪要“抢班夺权”，结果出事了。

我虽然心里有准备，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震惊。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已经载入了宪法，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毛主席以前看中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台才五年，怎么林彪又出事了？毛主席已经78岁。林彪才64岁，他还年轻，又有宪法的保障，按常理他是毫无必要“抢班夺权”的。

又过了十几天，我们集中到鹿冈公社，听了中央文件。文件里正式宣布了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党叛国的罪行。听说有的地方在宣读中央文件的时候，会场内外都有民兵拿着枪站岗呢。

不久就到了年底，鹿冈有干部告诉我一个流传很广的有关林彪事件的段子。

说是传达中央文件以后，连农村里的老婆婆都知道林彪是个坏人。两个老婆婆聊天的时候，一个老婆婆说：“你知道林彪吗？”

另一个老婆婆说：“听说了，他是个坏人，好像是什么副总理呢。”

“不对，好像是副主席。他做了很多坏事呢，你听说了吗？”

“听说他偷了三只鸡。”（林彪偷了三叉戟飞机出逃）

“不对，不是三只，他是偷了一群。”（叶群，林彪的

夫人)

上层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就消解成这样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编成了笑话，并且能流传开来，这在三四年前的文化革命初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做的人一定会变成“反革命分子”。这个笑话至少表明，中国人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已经开始厌倦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第一次是在听收音机的时候，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的。美国之音报道说，虽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消息，但是北京街头已经有零星的庆祝游行了。

美国之音后来专访了远在加拿大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问他中国会不会因此而发生分裂。张国焘说，我们过去发生分裂，是因为我们太年轻，党也太年轻。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了，不会分裂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过了两年，美国之音分析了将来中国总理的热门人选。他们认为李鹏和田纪云最有可能当总理，李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时他们二人还名不见经传，根本不在国家的领导层里，因此，美国之音还专门介绍了他俩的成长背景。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预测得很准确。

从1974年开始，上海市为了做好各地上海知识青年的工作，抽调了一大批干部，组成上海知青的“学习慰问团”，常驻在各个县，帮助知青解决困难。驻在永丰县的慰问团的组长姓陈，是上海虹口区公安局的正科级干部。

1976年的一天，陈组长到里陂上村来找我。我们寒暄、吃饭以后，他正式提出来，要我到沙溪公社的一个知青农场去担任负责人。知青扎堆在一起，虽然便于加强管理，但是能深入了解农村吗？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再说，我已经很熟悉里陂上，不会轻易离开的。于是我找了种种理由来搪塞。

我对陈组长说，村民的俗语有“江西地土轻，五里十八

声”的说法，比如马立平所在的高坑村离开我们里陂上村大约五公里，高坑村民说话就有些不一样了。假如我去了九十里外的沙溪公社，总免不了和当地农民打交道吧，可是我几乎听不懂沙溪人说话，难道还要我再从头学习沙溪话么。

这是我找到的不愿意去沙溪工作的理由之一。现在想想，我当时的这种借口不但显得幼稚，要是套用里陂上村民的说法，更是有点属于“讲蛮经”，不讲道理了。

人是很难被说服的，我也极不愿意去说服别人。陈组长和我磨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不断进攻，我坚持防守，他最终没能说服我。他太困了，就在我的床上过夜，我到隔壁房间的床上去睡了。

陈组长一定是看到了我枕头边的半导体收音机，叭的一下顺手打开了开关，传出来的是“美国之音”的节目。他听了几分钟，关上了收音机。



半导体收音机

这一来，我在隔壁睡不着了。

知青在鹿冈收听美国之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嘴上不说而已。鹿冈公社广播站还曾错放过它的节目，让全公社的人“收听敌台”，也没见处罚过什么人。再说了，自从1972年美国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中国和美国的的关系已经大大好转了。

不过陈组长是公安局的干部啊。他是否知道很多人私下在收听这种节目呢？明天早上他是否会为难我，或者跟我提出我很难接受的要求，比如说要我到沙溪公社去呢？

第二天一早陈组长起来，我煮好了早饭。他什么也没说，

吃了饭匆匆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

1989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政治风波，从北京戒严到后来开枪，局面非常混乱，各种消息满天飞。这时候，上海的很多人家会通过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来了解一些情况。他们唯恐别人不知道，常常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也许是他们在感情上有些同情学生，就用此来曲折地表明态度吧。

我到了美国才知道，美国的老百姓不知道有美国之音。美国之音隶属于美国新闻署，是政府的电台，而美国很多大电台都是私营电台。美国之音成立的时候，美国国内的电台老板们害怕美国之音会抢走他们的市场份额，就去国会游说。结果是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

法律规定，美国之音只负责对美国境外广播，用来介绍美国的价值观，让世界了解事情的真相。

美国本土的人就听不到美国之音了。

四、有线广播

大约在1972年，我们在里陂上有了和收音机这种无线广播不同的新型广播，那就是有线广播。鹿冈公社成立了有线广播站，要求村村户户都要接通有线广播，每户人家都要花费一块五角钱买一个喇叭安装在厅堂里。

接通有线广播并不难。我们从山上砍了二十多棵杉树回来，剥去树皮，每隔五六十米挖坑埋好，电线杆就做好了。然后去鹿冈商店花了二百多元钱，买了两大卷铁丝当作电线，从公社广播站拉出来，一路钉在电线杆上，一直通到里陂上村，接到各家各户的喇叭的一个接头上，再把喇叭的另一个接头用铁丝接到泥土里，就成了。因为铁丝是裸线，没有胶皮的绝缘层，所以遇到下大雨的天气，喇叭里的声音会轻一些，还有沙沙的噪音，村民说那是



有线广播的喇叭

下雨的声音。

每天晚上七点钟，喇叭里就有声音了。在开始曲“东方红”结束后，公社广播员用带着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宣布：“鹿冈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下面请听革命烈士（历史）歌曲。”接着就听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了。公社广播站很少有自己编排的节目，除了播放革命歌曲，就是转播永丰县广播站、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公社广播员最后说：“鹿冈公社广播站，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束）。”

可惜的是，里陂上的村民大多数听不懂普通话，所以有线广播的作用很有限。

有一次下大雨，天上响了一个炸雷，把几户村民家里的喇叭打坏了。村民说，反正听不懂广播里说什么，他们就再也没有花钱去买新的喇叭。（新喇叭贵了很多，要三块多钱才能买一个。）到后来，里陂上村里的广播喇叭有一半以上不会响了。

五、空飘汽球

说到敌对双方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从台湾方向飘过来的空飘气球，一种特殊的媒体。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天，村民朋友张寿仁拿了两张纸给我，神情异常地说：“老夏，你看看，我在田里捡到的。”这是两张白色的纸，32开大小，纸很厚实，表面很光亮。

一张纸上画着我从未见过的一幅人像漫画，毛主席被画得像一头猪一样，既狰狞又丑陋。另一张纸上写着“毛周斗争又在开始”，下面有两群人，也都画得十分难看。左边的以华国锋主席为首，后面跟着汪东兴等人，右边以叶剑英为首，身后有邓小平等几个人，两群人正在吵架。

我到大队去，想打听究竟是怎么回事。书记说，这两天已经收到不少了，听说禹山大队和前村大队也有。他反而问

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和国民党还在打仗，福建前线还经常开炮呢。好像台湾会用气球带着宣传品升上天空，顺着气流飘到我们这边，从空中把传单撒落下来。据说巨大的气球可以带几百斤东西呢。

后来我知道，我们也会放气球到台湾去。除了宣传品以外，还会送一些小瓶的茅台酒过去，让“蒋军官兵”喝了茅台酒以后思念家乡。而台湾的气球更是离奇，有一次随着强大的气流居然飘到了印度，引发了印度的外交抗议，抗议“中华民国”入侵印度。

我们从小看见的毛主席像，都在和蔼慈祥地微笑着，哪里知道敌人会把他画成这样。当天晚上我梦到了这张纸，从睡梦中吓醒了，心脏剧烈地跳动，出了一身冷汗。仔细想想，我们从小看惯了蒋介石的漫画像不也是这样吗？他的额头上还贴着纱布和橡皮膏呢。

一直到海峡两岸交流以后，这才发现蒋介石也算是个身材高挑，其貌不俗的人。记得有一本命理书上一开始就说，南人北相者贵，男人女相者贵，到后面才讲正官格、偏财格什么的。我试着按照命理书分析，毛和蒋都是南方人，却是南人北相，身材都很高。但是毛还是男人女相，比老蒋要更贵一层。

一个多月以后，还有村民在水田里捡到这样的传单，拿来交给我。这该死的纸张真是好，在水里浸泡了一个多月，一点也不烂，纸上那该死的图案还是那么清楚。

不知道我们用空飘气球送到台湾去的宣传品的质量如何，应该不比他们的差吧。

39. 生老病死

好像古今中外的任何人类社会，一个人自从出生以后，或多或少总会生病，最后总会老死。人生病了，会想办法治疗，知道治不好了，才会听天由命。

然而在上海和在里陂上村，同样是人，两个地方的“生老病死”却不大一样。

一、生

在上海，我们都是医院里出生，可是里陂上的村民，却都是在家里出生的。

里陂上村民在家里生孩子的时候，烧好一大锅开水，准备好竹制的躺椅，然后到大队把接生婆叫来。接生婆是一个村妇，曾经接受过人民政府简单的培训。她平时得在队里干活，接生是她的第二职业。因为从事接生的时间长了，她处理顺产的经验很丰富。

村里顺产的妇女和美国的妇女一样，没有坐月子的习俗。村民周恩绍的老婆上午出工的时候肚子痛，回家生孩子了。中午我们回去吃饭的时候，她生好了孩子，头上扎一条毛巾，已经在灶台旁边忙着张罗全家的午饭了。

如果遇到难产，接生婆处理不了，她就要求村民赶快把产妇送到二十里路外的沿陂镇卫生院去，那里的设备比鹿冈卫生院要好很多。记得里陂上有一个产妇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脚先出来了，是难产。三四个村民马上把竹躺椅做成担架，抬起产妇就朝着沿陂镇飞奔而去，终于保住了产妇的性命。



竹躺椅是妇女临产时的产床

村民生了孩子，长辈自然要给孩子取名字。若生的是男孩，得根据族谱上的辈份，认真给这些男孩取的正式名字。比如“茂”字辈的有贡茂、发茂、柏茂，“绍”字辈的有绍远、绍生、绍裘，等等。

如果出生的是女孩，女孩长大以后早晚要出嫁，成为别人家里的成员，不像男孩那样要传宗接代，女孩不能上族谱。所以长辈给女孩子取名字时，普遍比较随便。正月里出生的女孩，就是“正英”，九月生的，便是“九英”；如果是大女儿，就叫“长英”或者“大英”，等等。

按照村里的习俗，孩子满月的时候要“做酒”，周岁的时候也仅仅是“做酒”，不叫“过生日”。至于过生日，要等十年才有一次。村民一辈子活到八十岁，才做八次生日。不像在上海，我们年年要过生日，吃碗长寿面，加几个菜，弄点小礼物，庆祝一下。

我反复询问村民，为什么孩子要到十岁，才第一次过生日呢？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孩子到十岁的时候还活着，那才算是观音娘娘赐给了孩子的真正的“生日”，这孩子就很可能会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医疗条件差，农村婴幼儿的死亡率太高了，所以要到十岁时，才放心地第一次庆祝生日。



传统的婴儿座椅

孩子出生以后，有观音娘娘来保护，可是阎罗王也不闲着，时不时会根据长辈给孩子取的大名，来索要孩子的性命。怎么办呢？按照村民的习俗，特别得给男孩取一个低贱的小名，希望能够迷惑或者瞒过阎罗王，使得孩子比较好养活。

于是，里陂上村和鹿冈地区的许多村庄一样，就有了称作“贱狗”、“逃荒”、“叫花子”、“捡的”的男孩。这

些小名一直伴随着他们，时间一长，根据族谱上的辈份认真给这些男孩取的正式名字，村民反而会觉得有点生疏。

二、计划生育

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期，中国政府只是提倡计划生育，并没有实行强制。我们里陂上的知青李桂英1974年去吉安市卫生学校读书，她毕业以后不久，就到了沿陂镇卫生院工作。这时候，大规模的强制计划生育开始了，农村里一对夫妇只允许生两个孩子。

有一次，我为队里采购物品，到沿陂镇赶墟集，在卫生院和李桂英聊天。我问李桂英，她都诊治一些什么样的病人。李桂英叹了口气，说：“唉，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不让小三子下地’。全公社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又怀了第三个孩子的孕妇都往这里送，我们整天忙着给这些妇女做人工流产和输卵管结扎，其他几乎什么都不做。这样下去，我的医疗诊治水平怎么能够提高呢？”

1979年，我到上海工作以后，秋天回到里陂上，有村民对我发牢骚说：“过去国民党为了抓壮丁去当兵，搞什么‘两丁抽一’，只要家里有两个符合征兵条件的成年男子，必须有一个去当兵，害得村里的后生逃走了不少。现在共产党不搞‘两丁抽一’是好事，却管起生小孩的事情来了，上面来人要强迫计划生育，堵住了村口，村里的妇女也不管有没有路，就急忙从屋背岭逃上山去。这真是有名堂。”

村民接着说：“老古话说，生长，生长，有生就有长，生了才会长，只怕不生，不怕不长。这就像天上降下了一粒露珠，地上自然会有一片叶子来托住。”

（后来，立平在美国读书期间怀孕了，我们相信农民说的“有生就有长”。立平的同学觉得我们不可思议，为我们详细计算抚养孩子的昂贵费用。可是我们觉得，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下一代在其一生中对社会的贡献和“产出”，

应该高于对他们的“投入”才对，否则人类很快就要灭亡了。)

又过了两年，村民告诉我，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超生”家庭要罚款。当时农民到外地打工的“外出务工率”还不高，村民交不出“超生”罚款的话，有的村子会派人到农民家里去扒了稻谷来充作罚款。

有的村民躲过了计划生育，生了第三胎，偏偏又是个女孩，无奈还想生个儿子，就在半夜里把女婴抱到邻近的村子里，偷偷放在相熟人家的大门外。这家人第二天清早一开门看见女婴，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抱起女婴当作自己的女儿，抚养在家里，等她长大以后，就出嫁到外村去。

到了 1990 年代，听说村里超生一个男孩罚人民币 1500 元，女孩罚 1200 元。到了 2000 年代，这个数字水涨船高，变成了超生一个男孩罚人民币 4000 元，女孩罚 3500 元。

到后来，农民到外地打工的“外出务工率”成了永丰县各级干部的考核指标之一。政府鼓励更多的人到外地去打工，可以为永丰的家乡汇回更多的钱款（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变成了计划生育的罚款）。

据最近到过鹿冈的上海知青回来说，按照目前农村计划生育的政策，村民第一胎生了女孩，还能允许生二胎。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就不能生二胎。如果超生，村民要上缴罚款。（罚款是 19000 元人民币。要是超生了二胎，罚款加倍，要缴纳 38000 元。）我有亲戚在浙江的农村，听说也有类似的政策。

二十多年来，里陂上村民超生罚款的数额从一千多元一路上涨了大约十倍，上涨的幅度很大。

我想，政府在考虑罚款的数额时，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如若罚款的数额太低，村民无所谓，起不到阻吓的作用。要是罚款的数额太高，村民觉得反正缴不起，便索性不缴了。政府如果强行征缴，恐怕会有官民冲突，政府也很麻烦。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计划生育罚款数额上涨的幅度很大，似乎间接地说明了，这些年来村民的收

入在不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还很快。

可是村民的收入多了以后，有些人开始不怕超生的罚款，他们照样生孩子，起码要生到有了儿子为止（但愿这样能提高女婴的出生数量，从而扭转新生儿的性别比例失调）。上面要罚款，罚就是了，这钱就当是孝敬给各级官员的。

而政府除了罚款这一招，又有了新的规定。凡是村民上缴了罚款以后，如果产妇不去做上环或者结扎的绝育手术，新生的孩子仍然不能上户口。

我不免担心，这种没有户口的孩子长大以后要读书和工作，也许会遇到困难。长此以往的话，很可能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印度社会中的“贱民”阶层，他们的地位比一般的村民还要低下，对国家的和谐发展很不利。

可喜的是，感觉上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听说有几个省市已经把计划生育和户籍管理脱钩，没有准生证的新生儿照样可以上户口了。

三、病

上海是大城市，有比较完善的现代医疗系统。孩子在医院里出生不久，就去卫生防疫站注射疫苗，防止各种传染病，比如天花、白喉、百日咳、肺结核，等等。如果生病了，就到医院去看病。化验、照X光、打针、吃药、甚至住院治疗。

我自幼体弱多病，别人感冒只要两三天就好了，我要一个多星期才会痊愈。我经常因病缺课，不过考试成绩却很好。我肺部感染了结核杆菌，休学了一年，后来在复学的时候跳了一级，回到了原来的班级里。

有一次我高烧不退，住院治疗，医生怀疑是脑膜炎，施行了腰椎穿刺，抽取了我很多骨髓，结果发现我得的是当时还很少见的流感。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在铁路医院的病历卡已经因为太厚，换了新卡。

总而言之，我没有下乡以前，是拜访医院的常客，铁路

医院的很多科室我都熟悉。很奇怪，我到了里陂上村以后，生病少了很多。

到了里陂上不久，一向自诩身体好的知青崔应辉突然高烧不退，急忙到鹿冈卫生院去看病。卫生院设在鹿冈老墟上，原来是村民的住屋，有四五个房间，其中还包括医生的住房，可以说是简陋至极。

卫生院的郁医生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到鹿冈不久。她根据症状，判断崔应辉得了伤寒，鹿冈无法医治，要去永丰县医院。崔应辉在县医院住了几天，我去看望过他。最后还是应辉在南昌工作的大姐，得知消息后把他接到南昌去了。

鹿冈公社的各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俗称保健站，里面有几个“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其实是穿鞋的，“赤脚”的意思是他们不拿国家的工资，只拿工分，农忙的时候还要赤脚下田割稻插秧。

在教育水平低下、缺医少药的鹿冈，很多大队都有知青在做赤脚医生。知青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但是他们都带了医学书籍，有一定的医学常识，又比较认真负责，所以口碑都不错。

我们先锋大队的保健站最兴旺的时候有四个人。其中没有知青，倒有两个正规的中医师，所以比较传统，以开药方抓药为主。他们有时也会上山采集草药，晒干以后或碾或切，配成方剂，给村民服用。按照规定，村民应该每人每年交五元钱合作医疗费，可是没人愿意交付，他们还是情愿在医生诊病的时候当场交付医药费，心里才比较踏实。

好像是 1970 年的一天早晨，村民张五喜提着一只空空的尿桶，进了我们男知青的房间。五喜说，他唯一的儿子老是咳嗽，请医生来给儿子诊了病，开出的药方是用童男子的尿来煎鲫鱼。

五喜恳请我们在他带来的尿桶里撒尿。

我一听就笑了起来，说：“我们已经是成年男子，不是

童男了。你生病的儿子不到十岁，他才是童男，用他自己的尿就行了。”

可是五喜坚持说，我们知青没有结婚，也没有睡过女人，当然是童男子。而且医生说了，不能用病人自己的尿。

文化革命以前，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旁的公共厕所里，我见过收集尿液的简易装置。报纸上说，从尿液里可以萃取出有用的化学物质。不知那化学物质可否用来治疗咳嗽。

眼下撒尿可以治病救人，五喜最终满意地提着有尿的尿桶离开了。过了几天，五喜告诉我，他儿子坚决不吃那充满尿骚味的煎鲫鱼，不过儿子的咳嗽倒是慢慢地好了。

记得作家鲁迅先生曾经抱怨，当年医生给他父亲开的药方中，有“原配蟋蟀一对”之类的东西。那可比童男子的尿要难找多了。

大队领导知道我哥哥在云南省工作，在他们的印象中，云南是出药材的地方，于是由我出面，请哥哥建新帮忙，为大队的保健站采购了一批人参、天麻之类的名贵药材。

一般的村民当然用不起这些药。有一次在鹿冈，公社的乡办主任问我：“先锋大队的保健站来了一批好药，听说是你买来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哈，我去你们先锋搞了一点子药了。”

这些名贵药材的大部分应该是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享用了。

在里陂上，村民生了病，要找医师诊病。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他们开的药片或者药丸，一律叫作丸子（读作圆子）。中医开的药如果是需要煎服的，则叫作“茶”。而我们上海知青所说的喝茶，村民称之为喝“茶叶水”。

有一年，我听到了一个有趣的段子。说是有一个人读了一点书，懂得多一些，变得斯文起来。到了过新年，大家互相拜年的时候，那人做一个长揖，对人说道：“请到我屋里吃茶。”

对方一听，心想我又没生病，干嘛到你家吃茶？大过年

的，你这不是咒我生病吗？但因为是在拜年，他只能回应道：“哪里哪里，还是请到我屋里吃丸子（圆子）。”意思是才生病呢。

小时候在上海，好像每个人都刷牙，刷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家里把刷牙叫作漱口，漱口的工具是牙膏、牙刷和漱口杯。

到了里陂上以后，我发现村民没有刷牙的习惯，但是他们会漱口，就是在吃早饭以前，把水含在嘴里咕噜几下再吐出来。我这才意识到，漱口是中国人的传统，刷牙是从外国传来的。是我家里把漱口和刷牙混为一谈了。

我们刚下乡，住在祠堂的后厢房里。每天早饭之前，我们在祠堂的天井里刷牙的时候，经常会有村里的男女青年好奇地来围观。渐渐地，有些女青年也希望自己的牙齿能白一些，她们到鹿冈商店去买了牙膏和牙刷，偷偷地学习刷牙。

个别的女孩子特别爱美，唯恐别人不知道，专门挑人多的时候站在门口刷牙，刷得满嘴都是白沫，还有丝丝的红血渗出来。

村民如果牙齿疼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我眼见着村民张贤通因为牙疼，半边脸都肿了。他呲牙咧嘴地倒吸着冷气，努力地揪按着自己拇指和食指交会之处的“合谷”穴，希望能够减轻一些疼痛。

我在上海的时候补过牙，在里陂上过了几年，有一颗补过的白齿又不行了。我到永丰县人民医院，发现和上海铁路医院不一样，县医院没有口腔科，整个县城里找不到地方补牙。有人提醒我说，可以到 0487 部队的卫生队去试试看。

0487 部队是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一个团，团部驻扎在永丰县城。我转弯抹角地找到了团部的卫生队，说明自己的牙坏了，希望能够补牙。解放军很愿意为驻地的老百姓服务，军医很热情地让我坐在一张普通的靠背椅子上，检查了我的牙齿，然后从墙角里拖出来一台满是灰尘的设备，擦干净了，装上牙钻，用脚踩了几下踏板，牙钻转动了。

军医不停地踩着踏板打磨我的坏牙。我一边张着嘴巴，一边想着，原来这就是野战部队的补牙设备。打仗时，野战医院并不能保证一定有电力供应的，所以才有这种用人力来驱动的牙钻吧。补好了牙，我要付钱，军医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不收钱。你的牙齿现在就是嚼炒黄豆也没有问题了。”

我回到里陂上，真的炒了一点黄豆来咀嚼。刚补好的白齿嚼黄豆，还是会轻微地发酸。当天晚上我开始发烧了，过了两天才好。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到卫生队补牙加上回到村里嚼黄豆，引起了我自己免疫系统的反应。

我在农村的十年，每次回上海都要设法带一些药到里陂上村，除了自己生病的时候服用以外，还经常“非法行医”。村民生了病来找我，我根据自己过往生病的经验，再翻阅两本厚厚的医书，判断村民大概得了什么病，要不要到鹿冈卫生院去医治。如果我能确定村民只是一般的伤风感气或者拉肚子，就给他们服用一些类似复方阿司匹林或者黄连素、土霉素之类的药物，并且关照他们，要是病情不见好转，就得去鹿冈卫生院找医生看病。

曾经有一个传闻，说是某个大队有个农民便秘，按理可以服一些药用的蓖麻油来通便。可是有人在没有蓖麻油的情况下，自作主张让患者吃了几颗蓖麻籽，结果中毒了（成人的蓖麻籽致死剂量为八颗）。此事在知青中间传得很广泛。

我在美国，有很多年就像当年在里陂上村一样，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家里人生病了，我总是说先要观察一两天。

有一次儿子高烧两天，不见退烧，我正准备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突然发现他头上开始出现了红色的疹子。我还是做农民时的老习惯，连忙翻阅医书，觉得这是类似“猩红热”的病毒性疾病，只要时刻注意观察，应该可以自行痊愈。

儿子身上的疹子从头到脚出了一遍，烧也渐渐退了。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学校上学的第一天，就拿回来一张学校的通知，说是最近学校里有“fifth disease”（第五病，又称传染性红斑，由病毒传染），一个人终生只会得一次。儿子

得的就是这种病。

四、死

我到里陂上不久，就发现村里婴幼儿的死亡率不低。

据村民说，1946年麻疹大流行，村里的俗称是“犯娘娘”，或者“顶娘娘”，意思是冒犯了观音娘娘，娘娘生气了。村里十岁以下的小孩差不多“走”了一半，很多人家忙着用装土的竹篮攀，装了小孩去山上埋掉。

过了十年，麻疹又来一次。谁谁的老兄，谁谁的姐姐，谁谁的两个老弟，都是那次“没有”的。某某人家不是没生崽（儿子），生了几个呢，只是没有带大就走了。

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永丰县才成立了卫生防疫站，开始给婴幼儿注射疫苗，服务的范围还仅限于永丰县城。鹿冈卫生院的郁医生调到永丰工作，她是防疫站的负责人之一。

我到里陂上以后，村里还有零星的婴幼儿死亡。明明是生了孩子，家里欢欢喜喜的，过了半个月，说是没了。再一问，是拉痢，才两天就不行了。我问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带了黄连素和土霉素啊。她说不知道。

记得是1974年，村里有个幼儿发烧才两三天，鹿冈卫生院的医生说，是脑膜炎，太晚了。又过了一天，这孩子就走了。这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孩子的母亲在家里抹了两天眼泪，第三天就正常出工了。鹿冈卫生院只有体温计、听诊器和血压计，连常规的化验设备也没有，更没有像我过去在上海铁路医院那样，施行腰椎穿刺，我不懂医生为什么说那孩子是脑膜炎，也许仅仅凭借高烧和颈项僵直，就可以确诊了。

鹿冈卫生院后来搬到了公社的对面空置了多年的“红卫兵接待站”里。卫生院多了一些房间，于是在一个房间里设置了两张病床，却基本没有病人住院。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鹿冈，病人和老人99%以上都是在自己家里去世。而

绝大多数的上海人既是在医院里出生，也是在医院里去世。

如今的鹿冈卫生院坐落在鹿冈的直街上，分别开设了内科、外科和儿科等科室，另外还有化验室、超声波和心电图室，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2014年，鹿冈卫生院有化验室、超声波和心电图室。

当年我在村民张贡茂的家里搭伙期间，正逢他六十岁生日。那天贡茂老人心情特别好，他喝了不少酒，平时蜡黄削瘦的脸上泛着红光。送走客人以后，贡茂感慨地对我说：“老夏，里陂上村姓张的两房里，我这一房已经几十年没有活过六十岁的男人了，我是第一个啊。”

1974年，贡茂六十三岁。那年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是全家团圆的节日，可是贡茂老人已经卧床多日，奄奄一息，随时可能离世。我在中秋之前赶到大队的保健站，买了一根上等的红参（那批人参本来就是替大队买来的），煮了人参汤，给贡茂灌了下去。到了八月十九那天，贡茂老人去世了，村里人都说，是那碗参汤让他活过了中秋。

老人去世的前一天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知道我来了，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已经不会说话了。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特别气味，屋顶上有乌鸦在叫。据说乌鸦飞到了谁家的屋顶上呱呱地叫，是很不好的预兆，往往是这家人要有大难，甚至要死人了。我想，乌鸦是一种会吃腐肉的鸟类，可能是它们敏锐地闻到了某种特殊的气味，这才飞过来了。

贡茂去世了，他安详地躺在棺材里。令我有些惊讶的是，他平日里永远的驼背不见了，却是一位身材修长的老人。

贡茂老人的灵柩在厅堂里停放了几天，我为老人篆刻了墓碑。到了入葬的那天，厅堂里有了另外一种特别的气味。多年以后我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时，他写到当年“闹红”（闹红军），农民占领了县城，政府的军队开来镇压，杀了几千人，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县城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甜的腥气。对了，我当时闻到的就是一股甜甜的腥气。

里陂上的村民从小就常常经历家人的夭折和故去，他们的神经好像相对要坚强一些。我在前面已经写过，这里又忍不住想起里陂上村民张绍生的母亲。她生平第一次去永丰县城，是去看病。县里的权威医生说，她的病没治了。结果这位曾经裹小脚的老婆婆回到村里，安排好了后事，果敢地一仰脖子喝了农药，长眠在了里陂上村的屋背岭上。

在里陂上村，只有成年人死后才能埋在山上的祖坟里，立上墓碑。依制不能葬入祖坟的小孩夭折以后，就草草地埋在荒山上，成为孤魂野鬼。

入葬的时候，先挖好墓穴，穴内四周砌上一层单砖。送葬的队伍过来了，一律是头戴白巾，腰缠白带，鞋上蒙白布。领头的人朝空中撒着纸钱，村民的俗称是“钱纸”。那是到鹿冈商店买来毛边纸，裁成一元的人民币那么大，用笔套蘸了红墨水，在纸上印些红圆圈，就成了“钱纸”。

后面是六个男人用三根杉木杠子抬着棺材，慢慢地小心地走上山。空中有零星的钱纸悠悠荡荡地飘下来，碰到了杉木杠子，滑落在棺材上，停了一会儿，飘落到地上。如果有年轻的后生第一次抬杠，得在怀里揣上一块红布，用来压住邪气和阴气。

逝者的家属大大小小，跟在棺材后面。女性家属一出村口，就扯开嗓门，开始哭丧，声音悠远绵长。她们念叨着逝者生前的种种故事，述说着自己的思念之情。她们一脸愁苦的模样，但大多数不流眼泪。

待得到了山上，棺材入穴以后，哭丧停止了。用砖砌穴，做好墓门，立上墓碑，堆上封土，撒上钱纸。最后燃响一挂爆竹，那是告知列祖列宗，有子孙来报到作伴了。

里陂上村张姓人家的祖坟主要是在屋背岭上，所谓风水好的地方并不多。有时候，村民会把远祖的老坟处理以后，做成新坟，埋葬刚刚逝去的先人。记得1970年代有一个村民过世，就利用了一百三十年前，清朝道光年间去世的祖先的坟墓。道光帝就是那位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打了败仗的清朝皇帝。

在屋背岭上仔细看看各种墓碑，清朝乾隆皇帝时代（1735—1795年）的墓几乎没有了。

总之，我在里陂上村的时候，还是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破除旧风俗，反对封建迷信，所以村民入葬尚算简单，那墓门还是平房的样子。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鹿冈山岭上的坟墓越建越高大，墓门看上去成了楼房，四周贴上浅黄色的瓷砖，上覆深色的琉璃瓦，远远望去显得突兀扎眼。在我看来，这远远不如先前的青砖墓门，颜色和山林的黛色相仿佛，隐入山间林下，与山林浑然一体，似乎更符合传统文化的理念。

想来村里现时的葬仪，也一定繁复许多了。



里陂上村里的坟墓

左：1988年建，传统样式。 右：2010年建立。

让两个墓门的底部基本持平，可见它们的大小差别很大。

前几年我和女儿聊天的时候，说到里陂上村里凡是稍微宽裕一点的人家，大多早早地为家里的长者准备好了棺材。

比如村民张柏茂还不到五十岁，家里的境况不错。他曾笑眯眯地对我说：“老夏，我和老婆的棺材十几年以前就做好了，平时放在楼上，过两年就请油匠来上一遍油。”（村民总是把漆匠说成油匠，上漆就成了上油。）看着柏茂那满意的样子，我心里想，一个人能够预先知道自己死后将睡在什么样的棺材里，会葬在什么地方，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没想到女儿听了以后，建议我也提早把自己的墓地决定好。她说：“爸爸经常念叨自己是里陂上村的农民，就按农民的规矩办吧。”

我们居住的小城里有一个公墓，小城的居民去世后多半葬在那里。

女儿带着我们去公墓选址。墓地的导购员是一位白人老太太，她热情地为我们介绍有树荫的地方，说是死人也怕晒太阳。这恐怕是某些白人生前怕晒太阳的风俗延伸到了死亡以后。我们汉人的习俗正好相反，我们觉得墓地的阴气比较重，所以最好是葬在向阳的地方。

按照里陂上村民的习俗和我们有限的风水知识，墓地最好是在斜坡上，前低后高，后面有屏障，前面很开阔。女儿帮着选定了墓地，我和立平都很满意。

这个小城是我女儿和儿子的家乡，但愿我的子孙后代将来能有机会到这个公墓来，看看他们在美国的第一代祖先。

从此以后，每逢有熟识的老友来访时，我会兴致勃勃地带朋友去一个新的“景点”，到小城的公墓里去查看我最后的归宿。在那里，我感到身上有一种农民式的满意和安详。

现在城里因老病而亡故的人，大多是进了医院出不来了，所以城里人从小到大，直接面对的死亡少了，无形中增加了死亡的神秘和对死亡的恐惧。恐惧死亡、希望长寿，可以说是我们普遍而正常的情感。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

在的医疗技术发展很快，加上很多人重视“养生”，已经是“人生九十不稀奇”了。

但是我常常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普遍追求长寿，十分讲究养生的国家和民族，是不是真的有很强的生命力呢？虽然说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但是总要有人愿意做出牺牲吧。只有“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这句话能流传二千多年，引领了许多中国人慷慨赴死，应该自有其道理。

五、算命

生老病死，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生命中遇到的跌宕起伏、或灾或福，有太多的事情不能预测，不能解释，因而产生了“算命”这个古老的行业。

我小时候在上海，很小就听其他的小朋友说过“算命”这个有点神秘的字眼。我回到家里问母亲，算命是什么东西。母亲很严肃地操着常州口音说：“不许瞎说八道，现在是新社会。”

我从二年级开始，连蒙带猜地阅读各种长篇小说，发现一些小说里面，常常有五花八门的算命方法和相关的场景。

常读到的场景是一个人戴着“瓜皮帽”，在街上摆个小摊，有一个小招牌，上面写着两个字：“测字”。有人前来测字，那“测字先生”便让你随意说一个字，他写在纸上，开始详细分析解说这个字和你命运的关系，你目前遇到了什么困难，最近的将来会有什么危厄，应该如何消解，等等。

有的算命先生利用“看相”来给人算命，其中又分为看手相、看面相和看骨相。

看手相是根据手掌心里各条纹路的走向、粗细和贯通情况，来分析解说你的命运。“男左女右”，男人看左手，女人看右手。

看面相是从额头开始，看一个人的童年，一直看到下颏所代表的晚年。

看骨相的人会来摸你的头骨，然后头头是道地算出你将来的命运。我不禁想到《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他很可能给手下的魏延将军看过骨相，知道他后脑上有一块“反骨”，将来一定会反叛，投奔到敌人那边去。于是诸葛亮早早安排好了应对的计策。

还有一种算命方法是以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为基点，所谓的“四柱”，排成“生辰八字”，以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而进行命运预测。据说，这种算命先生因为帮助别人算命而泄露了“天机”，自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他们常常是瞎子和聋子，甚至有的算命先生会暴病而死。

然而这一切都是书上的东西，现实中的“算命”属于封建迷信活动，被人民政府禁止了，旧社会的算命先生都得改行做其他的工作，才能够谋生活命。



算命先生虽然有了高科技的手机，上门者依然寥寥。

我到了里陂上村以后，发现村民也有“算命”的说法，听说有一个会算命的瞎子，多年以前来过村里，这些年不知道去哪里了。

应该是在 1977 年初秋的一个中午，我吃完午饭，突然听见窗外有人说：“瞎子，瞎子！”“算命的，是算命先生！”

我心里一激凛：算命先生进村了，我得去看看热闹。

等我找到这个算命先生，他已经在村民富魁家的厅堂里坐下了。他两鬓的头发足有一寸多长，大概有半年未曾剃头了，乱蓬蓬脏兮兮的头发虬结在一起。他的两只眼珠会转动，是真的瞎子么？是全盲还是半盲？他既然是独自拄着竹杖走到村里，可能是半盲，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光感吧。一根竹杖靠在他身上，他的上衣是一件油光锃亮的破旧中山装，很不合身，不知道是哪里弄来的。记不清他穿着什么裤子，只记得他脚上是一双张着嘴的黑布鞋，满是尘土的脚趾间或一动，好像是在东张西望。

我想看看，他是如何给村民算命的。可是等了很久，没有人来请他算命，我有些失望了。

富魁的母亲说：“老夏，有人来。你要算一下么？”

是啊，只要我请他算一下，就知道他是哪一种算法了。我答应道：“可以。”

我的话音刚落，“五角钱。”那瞎子说。

嘿，他的听觉真好，怪不得说，盲人的听觉、嗅觉和触觉会特别发达，可以用来弥补视觉的不足。我有点相信他真的是瞎子了。只是他说话的口音听起来很费力，绝对不是本地人。我皱了皱眉头，富魁的母亲插嘴说：“算命先生很多年以前来过村里，他是乐安那边的人。”乐安县和永丰县相邻，在永丰的东面。

我对他说：“你先算命，我再给钱。”

他要了我的生辰八字。在上海时，我只知道自己出生的公历年月日。到了里陂上村以后，我曾经借到过一本破旧的所谓“万年历”，才知道了自己出生的农历年月日和出生的时辰。

他嘴里开始喃喃自语，右手的拇指在其他四个手指尖上来回移动。这应该是他们的专业动作，书上叫作“掐指算来”。

过了不大一会儿，他对我说：“你爹娘……早……”

我打断他：“你慢一点，我听不懂。”

他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重新开始说：“你爹娘死

得早，所以你二十五岁才成家……”我一听就想笑，但是忍住了。

他继续说：“你会有一个女儿两个崽（儿子），但是你一个荷包有两粒眼，有票子（钱）进来，有票子过年……”

我要他把这一段再说一遍，弄明白了他是说我装钱的荷包有两个洞，钱都漏掉了。意思是我能挣钱，但更会花钱，会弄到没钱过年的境地。

我忍住笑，一边问他：“我能活到几岁？”一边盯着他那油叽叽的起码半年没洗过的中山装的口袋，想看看那口袋上有没有两个洞。口袋上没有破洞，钱装进去应该不会漏掉。

他嘟嘟囔囔地算了一会儿，开口说：“算到六十六岁，以后冇数算。”

我问他：“冇数算，是啥意思？”

富魁的母亲又插嘴说：“就是你可以活到六十六岁。”

看来他已经算完了。想到他的一番胡说八道，我朝富魁母亲挤了挤眼睛，不禁笑出声来。我该付钱了。

我的手伸进裤子口袋，已经摸到了放钱的那个天蓝色的塑料“皮夹子”，村民叫作“荷包”。可是我忽然想到一件事，糟了。

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大队的党支部委员，怎么能够带头请瞎子算命，搞封建迷信活动呢？我真糊涂，无意中犯了大错。我马上想到的是，不可以付钱给他。

我从裤袋里抽出手来，说，我没钱。

“冇钱就吃饭。”他平静地说。

我很无赖，说自己不会做饭。

“冇饭吃就拿钱。”他还是很平静。

如此反复了几次，我希望他能够让步，可是他一直很平静地说着那两句话。我急了，提高了声音，说他骗人，我的父母都在世，我二十七岁了还没有讨老婆，等等。

听我说完了，他一脸的愕然，可怜兮兮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看着他，想到自己本来答应了给钱，

却又赖账了，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便逃出门去。

回到自己的住处，我一下子醒悟过来，那瞎子不是真正的算命先生，而是一个乞丐，是假托自己会算命的到处讨饭的乞丐。听说在乐安县那边，有时几个瞎子会结伴而行，拿着破旧不堪的胡琴等乐器，到各个村子里给人家表演。他们演奏的水平很低，其实就是去讨饭。可怜的瞎子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尊，想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呢。而我呢？唉。

我回到富魁家的厅堂，富魁母亲正在给那个盲人吃饭。我知道他吃完饭会出村，出村的那条路离我种菜的地方很近。

离下午出工还有一段时间，我掬起镢头到菜地里除草，时不时地抬头观察，看那个盲人是不是出村了。没过多久，我看见他拄着竹杖，摸摸索索地到了出村的木坎边，艰难地抬腿，跨过木坎，打了一个趑趄，站稳了，继续慢慢地往前走，走过了村边的池塘，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放下镢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五角钱，快步走过去。盲人一定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知道有人在向他走来，他停住了脚步。我走上前去，一言不发，飞快地把钱塞进他的中山装口袋里。我先前仔细看过那口袋，没有破洞，钱不会漏出来。

我怕别人看见，返身就走，又不放心地回头张望。那盲人从衣服口袋里抽出了手，拄着竹杖，摸索着，一步一步地离开了里陂上村。

他一定摸到了我给他的钱，那是他费了心思，胡编乱造的劳动所得。

那个中午，我由于好奇而算命，慑于政治而耍赖，出于良心而补救。最后我好像是处理妥当了，可我心里却还是不安和愧疚了一两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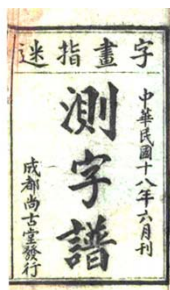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请人算命的经历。

1979年我回到上海以后，偶然借到了一本用“生辰八字”来算命的书。这本书的体系比较严密，除了有理论，还有实践。书中特别举出了蒋介石、冯玉祥、虞洽卿等名人的生辰

八字作为实例，来说明什么是“正官格”，可以当大官，什么是“偏财格”，可以发大财。



作者曾看过同名的算命书，这里的可能是新版本。



1929年发行，测字先生用的工具书。

我心里生了疑惑：老蒋官权熏天，却败走台湾；冯将军位极人臣，却无奈出洋，暴毙于船舱。为什么要用他们来举例呢？我翻看那书的出版日期，原来是1946年，正逢他俩的官位和威望登峰造极的时候。那写书的人有拍马屁的嫌疑。

当然也可以说，用“生辰八字”来算命，只是负责预测蒋冯二人的一生中会官运亨通，但是“官场有风险”，并不能保证他俩最终的结局一定会很好。

巧合的是，借给我那本“算命书”的人，居然是书中提到的名人、发了大财的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孙女。

当年那位“算命先生”给我算命，可以说是一派胡言，什么都没有算准。但是很快我就虚岁六十六了，他当年说“有数算”，我只能活到六十六岁。他会不会“一语成谶”呢？

我想起了有名的画家齐白石，算命先生说他在七十六岁那年会有大难。齐先生便及时宣布，自己直接从七十五岁跳到了七十七岁。我似乎可以效仿他，跳过六十六岁。但是我不那么做。

《论语》中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按照里陂上村民的说法，终会有一天（不管是不是在我六十六岁的那一年），掌管人们生死的阎罗王派遣的“无常夜鬼”，会如期来拘我去阴间。在阴间，我要从容地对阎罗王说，自己回首往事，

并没有像以前有人说的那样，投身于多么伟大而最宝贵的事业，但多少做了一点点自认为有益于众人的事情。

另外，我父亲认为，孩子只是暂时羁留在父母身边，由父母抚育他们成长。因为孩子长大以后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所以父母必须把子女培养成合格的人才。

当我在阴间和父母再次团聚时，我会告诉父亲，我已经把他的理念，传给了我的后代。

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像孟子说的那样，“仰无愧于天，俯无作于地”，此生无愧。



2014年，鹿冈的直街，教人浮想联翩，有种“生生不息”的感觉。

40. 娶亲和嫁女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上至总统议员、皇帝公主，下至贩夫走卒、丑女村姑，大多是这样。要是反过来试着想一下，男大不婚，女大不嫁，几十年之后，整个人类会演变成什么样，还真不好说。

在里陂上村，男大当婚是指娶亲，多是由父母来决定婚姻，帮着把儿子的老婆娶进家门。女大当嫁是由父母做主，把女儿嫁出去。

一、娶亲

我们上海知青刚到里陂上村的第一年冬天，就遇上村民张清魁结婚，那年他二十一岁。新娘鞠黑兰，高坑村的女子，十九岁。

当时正值文化革命的高潮刚过不久，农村里提倡新风俗新习惯的风头正劲，鞠黑兰穿着一身崭新的红衣裳，自己走进了里陂上村。清魁家里没有大摆酒宴，只是家人开了两桌，聚在一起吃了一餐。

鞠黑兰在高坑时，和高坑村里的上海知青年龄相仿，大家一起下田劳动，彼此之间很熟悉。黑兰婚后不久，高坑村有个男知青到公社办完事情，顺便弯到里陂上村看望鞠黑兰，他们在厅堂里聊了一会儿天，正到了午饭时间，清魁夫妇便留那个知青在家里吃了一餐饭。一切都很正常。

没想到清魁的母亲很生气，怎么可以随便请高坑的男青年在家里吃饭？她觉得情况不对，便在村里四处嚷嚷，还专门派人到高坑村，悄悄地打探那个男知青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最后终于明白，那仅仅是一个误会。只是那个当事者男知青，他当年在里陂上村搅起了一场小风波，可能至今依旧浑然不觉呢。

到了 1970 年的夏天，里陂上村的张贤通结婚时，过去

的旧风俗有一部分回来了。

张发茂是村里的实权人物，忙着操持贤通的婚礼，他从生产队仓库的墙角里找出来两面黑乎乎脏兮兮的大铜锣，擦拭干净，由两位老者提着，分别站在里陂上的村口和贤通家的大门口。

在村口执锣的老者目力所及，远远地看见了新嫁娘，便“当、当”地敲响了大铜锣。低沉的锣声传进村里，大家知道新娘马上就到了，顿时忙碌起来。兴奋异常的孩子们一会儿蹿到村口张望，一会儿又紧张地急奔回来，气喘吁吁地报告最新的消息。

一阵急促的铜锣声传来，随即是响亮的鞭炮声，表明新嫁娘已经迈过村口的木坎，进村了。孩子们涨红了脸，一边从村口往贤通家急冲过来，一边涨红了脸高声喊着：“来了，来了！”

当新娘出现在巷子口，站在贤通家门口的老者看见了，立即敲响手里的铜锣。发茂取下嘴里的香烟，随时准备点燃那特别长的一千响的鞭炮。新娘离贤通家还有十来步远，围观的村民“哦、哦”地叫了起来，开始起哄。就在这时，鞭炮响了，新娘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跨过了门槛。新娘身后，是贤通家里派去接新娘的几个后生，挑着新娘带来的嫁妆。

平时不怎么抽烟的新郎张贤通穿着一身黑色灯芯绒的新衣服，头戴一顶黑呢帽，耳朵上夹着一支香烟。他手里拿着一包打开了的香烟，正在喜气洋洋地给大家发烟。

当时吹唢呐迎亲的旧风俗还没有恢复，村里知道我和薛志民会吹一点口琴，我俩的任务便是用口琴代替唢呐，在新娘进门时开始吹奏革命歌曲。可是鞭炮声实在太响，我根本听不出自己吹口琴的声音。



老旧的铜锣

新娘进到房里歇息了一会儿，就和新郎一起，来到了厅堂。我和志民赶紧呼噜呼噜地吹着口琴，具体吹的什么歌曲，已然淡忘了，不外乎是高亢激越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我俩的乐声一停，婚礼正式开始，发茂是司仪，他红光满面，高声礼赞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千九百七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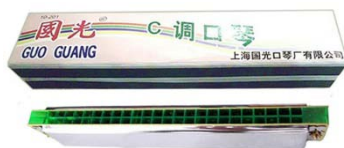
等到新郎新娘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以后，发茂又朗声祝福：“……生个儿子状元郎……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厅堂里很快摆好了三桌酒席，我们迫不及待地上桌坐好，刚刚酒过头巡，就有村民大喊：“新娘新娘，快来酩（读作‘筛’）酒。”要新娘出来给我们添酒。全场静默片刻，每个人的眼睛紧紧盯着洞房的房门。新娘子没有出来。

直到厅堂里酒过三巡，千呼万唤以后，换了装的新嫁娘才款款地迈出门槛，施施然接过锡酒壶，面带羞涩，来为我们斟酒。有调皮的村民在新娘酩酒时，故意把酒碗闪开，水酒洒在了衣服上，把衣服弄脏了。那村民就乘机嚷着，要新娘给他洗衣服，好像新娘是他的老婆一样。厅堂里的笑声好像把屋顶上的瓦片都震动了。

第二天下田干活时，有村民对我说：“老夏，昨天贤通结婚，你吹的那个东西，很好听。”

其实我和志民心里明白，我俩吹口琴的水平不高，用上海人的说法，实在是“呀呀污”。村民说“好听”，那是他们很少听过，新奇而已。



国光牌C调口琴

二、嫁女

住在我们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对于贤通的婚事十分感慨，他说：“新娘的父亲居然没有向贤通家要彩礼，真是奇怪了，

或许因为他是共产党的缘故，不作兴收彩礼吧。”

“什么是彩礼？男方要给女方彩礼？”我好奇地问道。

老周说：“那当然。就比如我的女儿年英，从小到大，我们做爹娘的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要给人家做媳妇了，怎么能不要彩礼呢？年英今年十七岁，我已经请人写了礼单，把她许给了巷口村的刘家。只要刘家的彩礼按照礼单的要求给齐了，到明年，我女儿一到十八岁就出嫁。”

我听了，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变相地把女儿卖了么。我问老周：“礼单上都写了些什么？”

老周笑着说：“礼金六百块，猪肉一百二十斤，中秋饼十斤，卡其布新衣裳两身，灯芯呢（绒）新衣裳两身，呢帽两顶……还有一点别的东西，记不清了。”

老周停下，想了一想，又说：“老古话有‘养女算不得饭钱，供猪算不得糠钱’，女婿家给我的这点东西，能把年英从小养到十八岁么。唉，就生生地把我女儿拿走了。”

里陂上村里的女子，一定得在老公家里过二十岁的生日。如果她嫁不出去，二十岁生日那天，只能到山上去躲一天，不能呆在自己的家里。

到了来年，周年英按时出嫁了。周恩绍是里陂上村的外姓人家，女儿出嫁并没有什么仪式和排场，女婿带了几个巷口的后生来里陂上，把年英接走了。

年英出嫁以后，没过多少日子，村民张柏茂的女儿三英要出嫁了。柏茂的家境不错，家里早早地准备好了嫁妆。

三英出嫁的前一天，有一个“开面”的仪式，开始“绞面”。绞面时，待嫁的三英坐在条凳上，她母亲用双手把一根细线框成三角形，不断地移动着，把三英脸上的汗毛绞干净。三英从此正式成为妇女，可以用绞面来为自己美容了。

出嫁的那天早上，厅堂里放着三英的嫁妆，记得好像有箱子，有妆奁。三英起床以后，按照村里的习俗，女孩子出嫁的这天，不能踏上自己家的地面，她只能呆在床上。家人给三英洗漱完毕，在床上用毕早餐，换上了新衣服。母亲坐

在床边，以过来人的经历，叮嘱女儿到了婆家以后，应该如何处理和公公婆婆的关系、和老公的关系，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等等。说着说着，意识到即将要离别了，母女二人的眼眶都红了，女儿先流下眼泪，哭出声来。

只听得大门外一阵喧哗，说是男家迎亲的队伍到了。母亲在房里听见了，连忙擦干眼泪，整理发髻，拾掇衣襟，出了房门，急匆匆地迎上前去。

男家按照礼单带来的最后一笔彩礼，也放在厅堂里，几只狗正围着彩礼转悠，好奇地嗅一嗅，瞅一瞅。男家来的几个后生，围坐在饭桌边，喝着酒，抽着烟，嚼着落花生和糕点。领头的后生抽完了一支烟，站起身来，说：“该走了，回去还有很多事，不敢耽搁了。”

那几个后生应声站了起来，挑起嫁妆往外走。母亲哇的一声哭了，但是她马上用手巾抹掉了眼泪，依着村里的传统，高声唱起了女儿出嫁时传统的哭词：“女儿你命真苦啊，一出生你娘就没奶水啊……”开始述说三英从小到大的经历。房里床上的三英顿时嚎啕大哭起来。穿戴整齐的二英父亲进到房里，给女儿穿上新鞋，背起三英，出了大门，朝村口走去。母亲跟在后面，继续哭唱：“那年你跌落水塘啊，亏得我來救你啊，抓住我衣衫不放啊……”

村口的木坎外停着一辆擦得铮亮的自行车，那是传统花轿的替身。自行车旁边站着男家的那几个后生。父亲背着三英跨过木坎，把女儿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母亲站在坎边唱道：“孝敬公婆要早起啊，招呼老公要仔细啊……”

这时候，三英母亲脸上的眼泪已经干了。

木坎外面，一个会骑车的后生载着新娘上了公路，其他的后生挑着嫁妆，一路小跑着跟在后面，渐渐地去远了。

女儿出嫁后，在婆家住两夜，到第三天一早，就回娘家住一天，这叫“走三朝（读作‘招’）”。女儿回到娘家，那份高兴自然不用说。虽然分别只有两天，但是初为人妇，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母女之间有说不完的话语。里陂上村里

三英昔日的女伴，大多已经许了人家，待字闺中，这时她们早已等候在门外。待得三英一出大门，她们一窝蜂地围上来，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怎么样？老公待你好不好？”“公公婆婆对你凶不凶？”“你做的饭菜，他们喜欢吗？”

对三英的父母来说，“走三朝”结束，女儿回到婆家，这个女儿才算是完全嫁出去了。

到了我在里陂上村的后期，恢复了传统的唢呐（村民俗称“喇叭”），遇到娶亲这样的大事，村民需要的当然是“喇叭”，又响亮，又激昂，祖祖辈辈听惯了，听着就觉得喜庆，再也没有人要我去吹口琴了。

传统恢复得越多，里陂上村民嫁女儿的礼单也就越写越长，越写越繁复，光是礼金一项，就涨到了八百块。猪肉要得更多，不是二百斤，就是三百斤。

卡其布不时髦了，改要的确良（涤纶）。中秋饼一开口就是一百斤，男方问：“一百斤？怎么吃得完？”

女方家长回答：“那就折价，给我六十块钱。”

怪不得有人说，中国人个个会经商，和阿拉伯人一样，是天生的商人。好像还真有一点道理。

我有过一份礼单的格式，曾应村民的要求，在红纸上为他们写过礼单。那份礼单格式如今不知去向，四处搜寻，却了无踪迹。希望它正躲藏在某个角落里，有一天会突然蹦出来，给我一个莫大的惊喜。



唢呐，村民俗称“喇叭”。

三、相亲

里陂上的村民娶亲或者嫁女，都是由双方的家长主导。家长之间初步谈妥意向之后，男女青年会有一个简单的相亲过程。

男青年在父亲带领下，来到邻村女方的家里，在厅堂里的方桌边坐下，喝水或者喝酒，吃些干果，说些客气话。

等到气氛融洽以后，女方的家长会把女儿从房里叫出来。女青年红着脸，低着头，穿着一身整洁的衣裳，袅袅地走出来，远远地坐在厅里的矮木椅上，偷偷地瞅一眼坐在方桌边的未来的丈夫。

男青年目不转睛，看着自己未来的妻子。可是女子始终低着头，看不清。厅堂里很暗，仅有的光线是从大门里射进来的，从方桌边往厅里看过去，是逆光的方向，女方的身材也只是一个轮廓，又是低头坐着，也是看不清。太遗憾了。

过了不大一会儿，女青年进房去了，男方起身告辞，相亲结束了。如果男女青年不反对，那就是同意。

接下来双方家长就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开始商量礼单怎么写。写礼单的过程中，双方免不了要“讲斤搏两”，为各种彩礼的数量争论一番，在谋取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互相妥协，最后写在红纸上，就是一纸契约，没有重大变故是绝对不能反悔的。在这一点上，能说里陂上的村民没有西方人所谓的“契约精神”么？

说起来，我也曾去相过一次亲。

我有个表姐在南昌附近的进贤县工作。好像是在1974年，表姐带着县林业局长的太太到上海看病，到过我家。我母亲请局长太太想想办法，看是否能够把我从永丰调到进贤去。毕竟进贤距离上海近一些，而且就在铁路线上。

到了年底，母亲来信了，要我回上海时到进贤的表姐家去一次，说是调到进贤工作的事情有了一些进展。

母命难违。反正是顺路，我到了进贤，受到表姐和姐夫的热情款待。姐夫告诉我说，林业局的局长觉得直接把我从永丰调过来有些困难，建议我先在进贤找一个女朋友，确定关系以后再调动，就很方便了。因此，我到进贤的主要任务是相亲，对方是进贤县某个副局长的女儿。

哎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第二天上午，那个女孩子来到表姐家，表姐给我俩做了介绍，她就离开了。

女孩低着头，脸上红扑扑的，一声不吭，就像里陂上村的女孩相亲时的表情一样。我问他任何问题，都得不到回答，只能一个人东拉西扯，说些废话，自己觉得十分无趣。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相亲结束，女孩离开了。表姐进来，问我感觉如何。我只能如实相告，并表示自己并不急着要离开永丰，请她不要再为我介绍女朋友了。我讲了自己在永丰的收入情况，完全可以自立。我还告诉表姐，有一次在杭州工作的姐姐通过邮局寄了钱款给我，我和鹿冈邮局的老徐商量以后，给退回去了。我并不缺钱，所以请表姐尽管放心。

这是我唯一的相亲经历。

在进贤相亲期间，表姐带我去拜访了那位局长太太，她和表姐相熟，一见面就对表姐说：“最近，来家里送礼的人太多了，光是各种糕点就吃不完，你拿些去吧。”

表姐连连谢辞，局长太太又说：“实在没办法，我家里的一群鸡都在吃那些糕点呢，要不然糕点就坏了。”

我听了以后，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哎呀，这不是‘朱门酒肉臭’么？”

41. 教育

我们的后代要传承长辈的经验和技能，就得学习，就要教育。

前面说过了我们在农村的住房，自然联想起那里的教育。

永丰县的沙溪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老家，著名的“泷冈阡表”静静地竖立在西阳宫中。



西阳宫

恩江镇的下西坊，出过清朝状元刘绎。即便是鹿冈，也出过习虚庵，是明朝建文帝的老师。里陂上张姓的族谱里，唐朝名相张九龄的画像赫然在目。说起来，永丰历来的文风很盛，直到今天，永丰中学的毕业生中，几乎每年都会有人会考上北大或者清华这两所中国最好的大学。

一、村小的起落

可是我在里陂上的时候，村里学历最高的是张四喜，简易师范毕业，相当于初中。其次是张柏茂，小学毕业。其余的村民都属于文盲，只有几个人能认极少量的字。村里的孩子到了该读书的时候，也会去先锋大队的小学读书。他们读了一二年书，就辍学回家种田了。等到他们长大，除了会认自己的名字，其他的都还给了老师。

这有点像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子弟学习中文，不少人小时候到中文学校学了一二年就放弃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学会。

我问村民，为什么要放弃读书呢？他们说，读书太难了，“作田就怕草，读书就怕考”，考试考不出来，还是回家作田算了。

是啊，不是什么人都会读书的，也不是什么人都会种田的。他们觉得种田很容易，读书太难了，就像我觉得读书比较容易，种田实在太深奥了。

但是里陂上的孩子读书的辍学率实在太高了。

我当队长以后，有村民提出来，可以在村里办一个学堂，孩子在读书之余可以帮家里做点事，很多家长就愿意送孩子来读书了。这个想法不错，我们就在空闲的祠堂里，把一间厢房的墙上用石灰水刷白了，要两个稍微会一点木工的村民打了一些条案和长凳作为课桌椅。村民一看这是来真的了，一下子有十几个孩子报了名。

我间接地问了两个在别村当老师的知青，都不愿意到里陂上村来教书。另外有一个知青很想来，我却看不中。开学的日子一天天地近了，老师却还没有着落。我骑虎难下，无奈之中到公社去找乡办的主任，请他帮忙想办法。过了不久，乡办主任介绍了一个知青到里陂上来教书。我们村的学堂按时开学了，孩子的入学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

学堂里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这是很常见的，叫作“复式教学”。学生理所当然地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当时没有第二种选择。

教过书的村民张四喜拿来过一本破旧的初级语文教材让我看，那教材里有“锅灶饭甑、风车晒簟、舂耙齿耙”等词语。我这个初中学生虽然不认识其中的某些字，但很容易明白，它是在介绍江西农村日常生活和劳作时经常用到的各种器具。再翻看一下出版说明，原来那是1950年代的初期，江西省在“扫除文盲”的运动中，为成人编写的识字教材。

但是学堂的好景不长，过了两年，我已经不是队长了，

教书的知青杭老师也回城了。这个从来没有起过正式名字的学堂关闭以后，孩子们只能再回到先锋小学去读书，这一来辍学率又上升了。

张四喜的孩子张逢生当时在里陂上村的学堂里读一年级。很多年以后，他是永丰中学高中的化学老师了，还和我提起当年在祠堂里读书的事。

张梅发的孩子张发根，虽然不曾在祠堂里读书，现在是永丰县城里佐龙中学的校长。

逢生和发根是里陂上村出来的最体面的人了，他们都在永丰县城里居住，很少再回里陂上的老家。他们既然都在教育界，我希望他们能多关心村里的事，特别是教育。他们一致摇头，说：“村里太复杂了，太难了。”

看来是我受旧传统的影响比较大，总会想到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常常想，连逢生和发根这些土生土长的人离开里陂上以后，都不关心村里的发展，我们这些外人瞎操心什么呀。

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关心，要担心，要操心，要忧心。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二、永丰中学教书

从 1977 年开始，中国的大学招生恢复了考试制度。当年到永丰县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的二千五百个上海知识青年中，这时候还留在永丰农村的大约不到一千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到县里的文教局去，要求报名参加高等教育院校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简称高考）。

永丰县文教局说，既然是“恢复”高考，就是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次高考，那是 1965 年。按照 1965 年高考的规定，超过二十五周岁的青年就不能参加高考了。这条规

定把绝大多数的上海知青挡在了门外，他们已经超龄了。

有些没能报名参加考试的上海知青坚持在县文教局门口不肯散去。临到考试的前几天，江西省教育厅突然来了通知，说是参加高考的年龄限制放宽了。很多上海知青因此赶上了考试，但是也有一些人从县城回到乡下以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

洋坳大队的夏元麟和他的妹妹夏元洁都参加了1977年的考试。夏元洁是初中生，考进了江西中医学院。她哥哥夏元麟是高中生，考了高分。但是正逢吉安地区要筹办一所大学“吉安师范专科学校”，结果把夏元麟他们这批考试最好的学生拦了下来，统统进了吉安师专。

1978年夏天，我刚从上海回到里陂上村，村民就告诉我，永丰中学有人来找过我，我不以为意。

没想到过了几天，永丰中学的王老师真的跑到田里来找我了。他说，从明年开始，高考的外语成绩要计入总分了，永丰必须要加强英语教学。他听说鹿冈公社的知青是从上海比较好的中学来的，便跑到鹿冈来找人。只是当时鹿冈的多数知青已经回城，剩下的人寥寥无几了。

我跟着王老师到了永丰中学的外语教研组，他让我用英语读了一篇课文，我就成了永丰中学的英语代课老师，每个月工资三十三元。



永丰县百货商场，作者当年一拿到工资，便去百货商场买热水瓶。

学校里有食堂，我不用自己种菜砍柴煮饭了。学校对面是电影院，转一个弯就是百货商场和永丰饭店。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到百货商场去买了两个绿色塑料外壳的热水瓶，每天可以到食堂去打两瓶开水。久违了，热水瓶！这热水瓶至今还在我上海的家里。学校里有电灯，在电灯下看书可比用油灯舒服多了。

永丰中学的校园里面有一座以前留下来的空无一人的天主教堂，大门紧锁着。教堂旁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楼，曾经是神父的住处。我就住在这小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窗口正对着篮球场。



1998年，小楼拆毁之前不久。二楼右面的窗户是作者当年住过的房间。

从窗口望出去，远处是校门。校门旁边是新砌的青砖墙，有一扇小门和学校相通。小门那边原来也是永丰中学的地方，但是永丰中学归县文教局管，文教局在墙那边盖了一幢二层的楼房，文教局机关就设在那里。楼房前面还挖了一个养鱼的池塘。

最重要的是在文教局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住着刚从吉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马立平。早晨刚过六点钟，我站在窗口可以看到，早自修的学生都进了教室，文教局通往学校的那扇小门打开了，马立平一如既往地梳着整齐的短发，穿着白色的跑鞋来到了永丰中学的操场上，开始晨练。她沿着跑

道，匀速地奔跑。在我心中，温馨的浪潮一阵接一阵地涌来，把我淹没了。

我负责教初中一年级的英语，每天要上五到六节课，加上备课和批改作业，工作并不轻松。比工作更大的压力是我深深地知道，虽然我在读书的时候曾经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但是自己的英语水平确实很低。

我在上海只学过二年英语，当时流行一种“听说领先”的外语教学法，比较注重练习英语的听力和说话。我所在的学校很重视外语学习，实行“小班教学”。我们班在上英语课的时候分成两半，有两个老师分别施教。我们这半个班级的学生要到专门的外语教学小教室去上课。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永丰中学的王老师只让我读了一篇课文，就笑着要我留下来教书的原因。王老师自己的英语有浓重的上永丰藤田的口音。

我请人从上海带来了父亲在美国买的英文打字机，以及英国有名的“灵格风”英语课本。我做了很多生词卡片，每天晚饭以后开始诵读或者默念。晚上睡觉醒来，赶紧开了电灯，摸到枕头边的英语生词卡片，继续学习。我再睡着的时候有时忘了关灯，以至于学校的教导主任找我谈话，要我晚上及时关灯，以节约用电。

永丰中学的学生，学习十分刻苦。

早晨六点到七点钟是早自修，学校要点名，学生必须在六点以前到校。一到六点钟，校门就关上了，迟到的同学不能进学校，急得在校门外直打转，有的同学还急哭了。

我教的初一学生，是在窗子还没有配上玻璃，也没安装好电灯的新教室里上课。冬天到了，早自修的时候天还没亮，同学们一进教室，首先从书包里或者课桌里取出蜡烛放在课桌上，划火柴点亮蜡烛，开始看书学习。

一阵寒风吹来，所有的同学用手护住蜡烛，不让烛光熄灭，才能继续学习。

过了不久，实在太冷了，教室里此起彼落的轻微的跺脚

声越来越响，终于连成了一片。

我经常到教室里去检查早自修的情况。有个调皮的小男生坐在第一排，因为蜡烛老是熄灭，他老是忙着点蜡烛。后来他把短小的蜡烛点亮了，和课本一起放进课桌里面，双手伸进去，做出烤火的样子。

他微微低着头，颧骨冻得通红，亮闪闪的眼睛一会儿盯着火苗，一会儿四下里瞅瞅，脸上满是笑容，他在为自己的新发明而得意。

突然，坐在他旁边的同学尖声叫了起来，其他同学透过烛光，看见一缕青烟从他的课桌里冒了出来，那是他的课本烧着了。我赶紧跑过去，和他一起把火灭了，罚他到和教室里面一样冷的教室外面站了一会儿。

晚上七点到九点钟是晚自修的时间。

幸好学校规定，初一年的同学年龄还小，晚上需要早睡，第二天才能早起，所以没有安排晚自修。

永丰中学的英语教研组连我在内，一共有六个人，其中四位是国家的正式老师。

坐在我对面的秦老师也是上海人，巧的是他和我上的是同一所中学，是我的学长。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系学习“经济地理”专业，毕业以后分配到永丰中学教地理，因为缺少英语老师，临时要他来教英语。当时他正在积极活动，设法调动到南昌去工作，几乎要成功了。

没想到他搭便车去南昌的途中出了车祸，当场就去世了。秦老师的妻子余老师也在永丰中学教书，后来她在副县长的位置上退休以后，回到了上海。

我所教的班级的班主任，是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的王老师，她后来设法调到上海市奉贤县工作，又到上海市人事局的“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任所长。

我在永丰中学只教了一学期英语。

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父母在上海按照政策为我办理了回城的手续。我从永丰中学回到里陂上村，把村里的工作交

接完毕，处理完我个人的财产和家当，然后跟着浩浩荡荡的知青返城大潮，回到了上海。

2010年我回到永丰中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位领导说，他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我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提醒我说，当年我教英语没有永丰口音，是“标准的美式英语”，这着实令我吃了一惊。他又说，当年他的班主任老师是王欣，我口头上只能认了，脑子里还是反应不过来。当天晚上，他带着在永丰中学读初中的儿子来见我，我从他儿子的形象，一下子想起了他当年的模样。他是坐在第一排，但并不是当年那个调皮的小男生。



永丰中学已经迁到新址

42. 人心思走

从文化革命中的 1968 年开始，全中国先后有一千七百万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务农，正式成为中国农村里的一个新的特殊群体，叫作“知识青年”。其实文化革命以前，下乡和支援边疆建设的中学生也有一百多万，可是一直到 1980 年代，国家才承认他们是知识青年。

鹿冈公社是永丰县东北部比较边远的地方，面积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当时全部人口只有六千多人，却来了三百五十多个上海知青，另外还有江西本省的南昌知青、吉安知青和永丰知青等各路知青。

如今鹿冈乡每平方公里有八十多人，仍然是永丰县人口密度最低的乡。

鹿冈并不是很穷的地方，当时最差的生产队里，工作一天挣十个工分，也能合到四角钱左右。我所在的里陂上村，村民的收入在鹿冈属于中等偏上，根据每年的收成不同，十个工分的收入在八角到一元之间摆动。

里陂上村有一对村民夫妻，生育了四个子女，孩子都还小，最大的才六岁，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光靠夫妻二人工作，一年挣的工分在五十分左右。要是这年的收成不好，以十个工分八角钱计算，他们在生产队劳动的全年收入有四百元钱。一家六口全年实际得到的口粮有三千来斤稻谷（平均每人每月有三十斤白米，很不少了），要从他们的收入里扣除三百元。余下的一百元里，再除掉生产队里分的茶油、猪肉、牛肉和活鱼，剩下的钱就只能买些烧菜用的盐和做衣服用的棉布。总而言之，这对夫妻能够养活全家六口人。随着他们的孩子渐渐长大，能帮上忙了，全家的生活也会渐渐地好起来。

下乡到鹿冈公社的知青，年龄小的十六七岁（比如夏元麟的妹妹夏元洁，她生于 1953 年，去插队时，还未过 16 岁的生日），大的才二十刚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知青不像当地的农民，我们尚未成家，没有家庭负担，“一人吃

饱，全家不饿”。我们只要能依照中国的传统，像村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菜砍柴、挑水煮饭，下田劳动，自给自足，养活自己应该是绰绰有余（就像我在里陂上村十年的生活）。只是有些知青出工不多，不能养活自己，要依靠远在上海的家人寄钱寄物来接济他们。

知青下乡以后，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亲眼目睹了鹿冈农民的辛苦生活，亲身参加了插秧和割稻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多数知青一想到自己可能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永远过这样的生活，没有其他的出路，没有其他的希望，就感到痛苦，他们很想离开农村。

有个知青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我当然和他们一样，就是种田的命。可是我偏偏出生在大上海……要我呆在这里，那怎么受得了？”

的确是这样。就看文化革命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里，即便是鹿冈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孩子，一旦发现到大城市打工比在农村种田的收入要高一些，便纷纷离乡背井，南下深圳，北赴上海，到城里去了。

在整个鹿冈公社，当时好像只有一位担任大队副书记的知青，向公社领导表示过要“扎根农村”。后来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县里的领导劝他回上海，他还觉得会违背自己说过的话，很是犹豫了一阵。

可是我们上海知青的户口已经转到了农村，要想离开农村，回到城里，必须得有办法，正规的渠道不外乎是参军、招工、读书，还有病退。

参军

要想参军当兵，当地必须得有征兵的名额。比如在1974年，部队来鹿冈公社征兵，整个鹿冈地区有两个上海知青成功参军。后来一个知青转业回到上海，最终成了处级干部，另一个在退伍后成为比较成功的老板。

招工

江西的工业不甚发达，工厂很少到农村来招工。一旦有

了招工的机会，除了各路知青以外，还有本地的农村青年参加竞争。

在里陂上村务农的十年中，我所在的先锋大队有七个男青年通过正规的招工离开农村，当了工人。其中四个是知青，三个是农村青年（大队干部的女儿）。里陂上村的知青相对比较老实，等我们听到招工消息的时候，往往是招工已经结束，新招的知青工人去上班以后了。

读书

1972年中国的大学恢复招生以后，主要是在工农兵中间招收学生（即后来的“工农兵学员”），在鹿冈公社主要是招收知识青年，竞争很激烈。记得有一年招生的时候，青山大队有个表现不错的女知青报名读书，大队把她推荐到了公社，听说公社也准备批准她读书，一切顺理成章。没想到有知青到公社贴出了“大字报”，表示反对。那时候文化革命的高潮早已过去，好几年没有大字报，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公社领导见了大字报，可能是心里一慌张，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那位女知青没能去读书。

我们里陂上村的知青平时十分勤快，在先锋大队的口碑很好，公社干部也都知道。何况大学招生还有一个“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过程，比较公开透明，不像招工那样偷偷摸摸。这使得里陂上村的知青有了一定的优势。

在1977年恢复传统的“高考”以前，从1972到1976年的五年里，先锋大队每年能去读书的名额通常只有一个。五个去读书的人中间，里陂上村的知青就占了三个。按照很多人的说法，如果我1976年报名报读书的话，很可能就是里陂上第四个出去读书的知青。反过来说，里陂上村的知青使得我们先锋大队其他知青去读书的机会大大减少了。

病退

先锋大队三十几个上海知青中，最终通过招工和读书离开农村的一共只有八个人，大多数知青只能另外想办法。办

法之一就是“病退”，因病而退回上海，这是一条正当合法的途径。薛志民在1965年考进中学的时候，学校发现他是深度近视眼，曾派老师到他家里去，试图劝他退学（未果）。到了1974年，志民因为深度近视眼，成功办成了病退，重新报进了上海户口，不久以后有了工作。在其他知青的眼里，他可以算是“因祸得福”，用当时的上海话来说，属于有福气有运气的“阿福哥”。志民后来成了虹口区政府的处级干部。

许多知青向往着能够“病退”回上海。他们觉得只要能回上海，哪怕是做马路上扫垃圾的工人，也比在农村当农民要好很多。一时间，某某知青因为生“红斑狼疮”，病退成功；某某得了糖尿病，因病回上海了……我时常能听到这一类消息。其中不排除有少数人回到上海以后，病就好了。他们可能是有门路，通过熟人搞到了相应的医生证明。

有知青说，要医生的证明并不难。在医院里测量体温以前，先嚼一块上海人常吃的大白兔奶糖，体温计就会显示出你发烧了。也有知青说，先按照医书上的症状，对医生说自己得了肾病，医生就会要求化验小便，只要在尿液里偷偷加一点牛奶，就成了蛋白尿。如果戳破手指在尿液里滴一点血，那就是血尿。如果在尿液里加一点糖，就有了糖尿病。又有知青说，从锡管的牙膏皮上剪下很小的一块，用橡皮膏贴在背上，然后对医生说自己咳嗽很厉害，医生通过X光检查，就会诊断出肺病。不过这些都是传说，我自己没有试过。

我又听说，医院里有很多医生非常同情我们知青的遭遇，说不定他们自己的孩子就在农村受苦。这些医生明明知道事有蹊跷，却也眼开眼闭，装作不知道，有心放我们知青过关（可见‘附录一’的记载）。

不能通过上面这些正规途径离开农村的鹿冈知识青年，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鹿冈公社有的知青家长是上海的干部，他们的级别不一定很高，位置却很重要，能够帮助永丰县买到一些紧俏的物

资。这样一来，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调离鹿冈农村，到县城里工作。有的知青的亲戚在其他的城市有办法，能够为他们安排工作。总之，上海知青一个接着一个，从鹿冈公社消失了。他们有的去了江西省的南昌市和九江市，有的去了湖南省，有的去了河南省，甚至有人到几千公里外的云南和新疆去了。

还有的知青从鹿冈公社转到自己的老家，继续当农民。这样做并不容易，老家的亲戚必须有一定的权力，才能使村里接受一个新来的人。知青则希望能在老家亲戚的帮助之下，能够比在鹿冈更快地离开农村。

留在鹿冈的知青中，有些人当了大队的小学民办老师，或者是大队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

每个大队都有小学，校长往往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公办老师，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工资。除了公办老师，小学里还有民办老师，由大队挑选读过书的村民来充任。我们知识青年虽然只是中学生，在鹿冈公社已经属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有的大队的五六个民办老师中，有一半是上海知青。



2013年6月，鹿冈中心小学。建丰楼的意思“建设永丰”，是一幢三层的学生宿舍楼。

民办老师平时教书，农忙时下田，每年拿固定的工分，比一般的村民在体力上要轻松一些。我认识的洋坳大队夏元麟、村前大队马立平，都是大队的民办老师。在鹿冈公社，

即便当时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还是很大，“天地君亲师”，农民依然十分尊敬有知识的人，特别尊敬老师。

每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类似民办老师，平时为村民治病，农忙时下田，每年拿固定的工分。“赤脚医生”的数量比民办老师少，所以知青当“赤脚医生”的人也较少。

有的知青在村里十分努力地劳动了两三年，觉得没有离开农村的希望，就回到上海，一呆就是半年一年。直到上海的居民委员会派人上门，催促他们下乡，他们才极不情愿地回到鹿冈乡下，也很少出工劳动了。我们里陂上村就有一个工作非常勤奋、和村民关系很好的女知青回上海探亲以后，再也没有回到里陂上村。我至今不知道她在哪里。

对于这些知青的家长来说，孩子已经二十几岁，老大不小了，无论是躲在上海还是下到鹿冈，都要靠家里养着，给家里带来了负担。这些知青成了几十年后“啃老族”的前辈。他们的家长很希望国家能够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让知青回到城里来，像以前那样正常地读书和工作，不要再到鹿冈去种田了。

留在村里种田的知青左右环顾，发现知青越来越少，不免人心惶惶，愈加是人心思走了。

到了 1975 年左右，各地政府的上山下乡办公室为了让知青安心留在农村，开始把各村余下的知青集中起来，加大了支持的力度，希望能提高知青的生活水平，维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局。

鹿冈公社洋坳大队的大部分知青集中在一起，成立了知青农场，还有了一台五十马力的“上海-50”拖拉机，我熟悉的夏元麟任场长。村前大队办起了知青林场，弄到了一辆“上海-130”的轻型卡车。

在鹿冈公社办公楼的旁边，成立了鹿冈知青综合场，从贯前、禹山、罗家、前村等大队调来了很多知青，有一台“上

海-35” 拖拉机。

我的好友陆禹平也从罗家大队那三五个农民的林场场长摇身一变，成了鹿冈知青综合场农业组的组长，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归他掌管。



右起：当年的陆禹平、陈福忠和陈伟裕。
远处可见“上海-35”拖拉机和拖斗（车）。
陆禹平提供



左面：2013年6月，原鹿冈知青综合场的水塔还在。
右面：陆禹平当年负责过该水塔的维护保养。
陆禹平提供

后面“附录一”中的资料表明，当年上海市给在各省农村的上海知青场，提供了大小拖拉机 7000 余台、拖斗 800 余只、各类汽车 50 余辆，以及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价值 5500 万元。

无论是在大队里当民办老师和赤脚医生的知青，还是在

农场、林场和综合场工作的知青，他们的收入比较稳定，生活也比较方便，至少不用自己动手种菜砍柴、挑水煮饭了。然而，他们虽然比留在村里和农民一起种田的知青要好一些，但终究还是在农村。

人心是不容易满足的，“人往高处走”，总是好了还想更好，最好是彻底脱离农村，回到城里去。再加上白马过隙，光阴如梭，悠悠岁月不饶人，随着知青的年龄越来越大，他们想离开农村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了。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传说，说是当年女知青想要离开农村，得先和公社或者大队干部“上床”，有了亲密关系以后才行，把那时的干部描述得犹如恶魔。然而在农村十年，据我所知，在鹿冈公社，有些男女知青之间确定了恋爱关系（先锋大队有，禹山大队有，村前大队也有）；也有男性青年村民追求女知青（先锋大队有二例，均未成功）；更有鹿冈公社干部和当地女性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许是在里陂上村偏居一隅，得到的信息有限，我没有听说鹿冈有干部霸占女知青，以及女知青用身体来贿赂干部的事情。

在鹿冈公社范围内，唯一的例外好像是，有一个大队的年轻书记虽然已经成家，却在大队部里经常夜不归宿，和一个女知青几乎是公开同居。我的印象中，他俩是真心相爱，只是这个书记有重婚罪的嫌疑。结果他被公安局以“污辱女知青”还是别的什么罪名逮捕以后，押解到永丰县城的广场上，全县开了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最后听说是判刑十五年。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负责管理知青的各级“乡办”干部，应该是最方便也最容易和女知青有染。可是鹿冈公社的乡办主任，却只敢和一个管理电话总机的当地女青年要好。乡办主任很明白，染指上海女知青的后果很严重。

在鹿冈以外，我知道有一个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广播站的上海女知青有了亲密关系，结果武装部长丢了官，调到别处做了几年一般的干部。另一个地方的党委书记和上海女知青有了婚外的恋情，这个书记停职写了半年的检查。

不管怎么说，从各省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到鹿冈公社的“乡办”，都有责任保护知识青年，特别是保护女知青不受侵犯。所以不光是干部，就连鹿冈的老俵都知道，“嫖一个上海女子（女知青），等于是破坏军婚，要坐牢的。”

恕我孤陋寡闻，当时所知确实很有限，几十年后在一次聚会上，我听一个鹿冈的知青说，当年上海派出的知青慰问团常驻永丰县，把藤田公社一个大队干部霸占了的女知青救出来了。

在我的感觉中，相对于我们这些分散在各地“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来说，当年那些有下乡知识青年的军垦农场和国营农场等相对封闭的单位里，少数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利用女知青希望离开农村的急迫心情而为非作歹、搞“权色交易”的情况，反而要多一些。

虽然说“食色性也”，但是任何人若要利用职权来为非作歹，搞“生活腐化”，这些人即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一定要狠狠打击的对象，属于“坏分子”，要批判、要斗争、要坐牢。

在高兴地看到和由衷地赞叹中国这些年来经济飞速增长，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我忍不住要轻轻地问一句：这几十年来，如果仅仅就各级干部搞腐败、搞“权色交易”这方面来说，情况是不是比我在里陂上村当农民的那些年更严重呢？

令人高兴的是，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近来加强了反对腐败的力度。

在 1970 年代的中期，知识青年开始人心思走。六七年前开始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走入了困局，即将进入残局，等到政治形势变化以后，知青大返城是其必然的结局。

43. 知青大返城

1971年9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已经载入宪法的毛主席的正式接班人林彪副主席突然坐飞机逃跑，飞机在蒙古国的上空掉下来了。从那以后，事情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1972年春节我回上海探亲，正赶上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和毛主席握手了。这很清楚，中国和苏联交恶快十年了，现在中国正向美国靠拢，用大洋彼岸的美国来牵制近在身旁的苏联。用我母亲当时的话说，这是传统的“远交近攻”策略。



1972年2月，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

我家住在铁路局的职工宿舍，宿舍楼在解放以前称作“中国花园”。每个星期四的下午，居民学习小组要在宿舍楼的天井里集体学习。居委会女干部说话的声音很大，我在楼上听得一清二楚。

女干部说：“尼克松为什么会到中国来见毛主席？第一，他是被我们在朝鲜打怕了。第二，我们搞了文化大革命，他要想和平演变中国是没有希望了。所以，他是举着白旗来投降了。”意思是我们中国赢了。

哈哈，我笑坏了。美国一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居委会干部现在居然用这样的自圆其说，让居民的思想转过弯来。

无独有偶，二十年后我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白宫旁

边的一幢大楼里。看了美国官方的一个摄影展览。最后是一幅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和美国总统卡特在一起的照片，依稀记得下面的说明里有：……Our new allies—China. 翻译成中文，大概是：中国是我们的新盟友。意思是我们美国赢了。怪不得 1979 年邓小平从美国一回来，就开始和越南打仗，要给越南一个教训。现在看来，很像是因为美国在越南失败了，所以我们要为美国报一箭之仇，以成为美国的新盟友，有点像递上“投名状”的意思。我揣摩着，从国家战略来说，中美两国交好以后，我们的外部安全环境大大改善，至少原先投放在中苏和中蒙边境的几十万知识青年的作用，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些年里，随着国家政治局势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学毕业生一律要上山下乡的政策也随之有所改变。

从 1970 年开始，上海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全部到农村去，而是恢复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有一部分学生可以分配到上海的工厂。因为我已经在农村，父母身边只有我弟弟建原了，所以他按照政策，分配到海运局工作。半年以后尼克松访华，中国要向美国出口轻工业产品，建原就调到了轻工业局下面的工厂做学徒工。

母亲一直很喜欢我，经常和弟弟唠叨：“你能进工厂，是用你哥哥换来的，他在农村种田呢。”

我在里陂上村种田，第一次听说“病退”是 1970 年，我们先锋大队有个姓茹的知青生了脑炎，他回上海后，说是因为生病，户口退回上海，不用再来种田了。过了几年，听说病退的条件放宽了。不光是在农村生了重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知青可以回上海，那些以前在上海就有病，比如眼睛近视在八百度以上，本来就不应该下乡的人，也可以病退回上海。

大约从 1974 年的下半年开始，又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凡是兄弟姐妹都在农村，父母在上海，身边却没有子女陪伴照顾的家庭，可以从农村调一个子女回到上海工作。这样，

陆禹平的姐姐从吉林省的农村、马立平的妹妹从安徽省的农村，回到了上海。夏元麟因为大妹妹已经在上海工作，元麟和小妹妹元洁只能继续呆在鹿冈公社洋坳大队。

1975年，毛主席要邓小平副总理负责全国的日常工作。邓小平采取的一些整顿措施，被一些人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仅过了一年多一点，他又一次受到批判，被停职了。到了1977年的初夏，我们到鹿冈公社听领导传达中央文件，中央决定正式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仍旧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公社领导特意补充说，小平同志犯过错误，他曾经向毛主席保证过，今后永不翻案。



毛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

邓小平一上台，马上恢复了大学招生的考试制度。鹿冈的知识青年奔走相告：“可以考大学了，可以考大学了。”但是从1966年到1977年，正规的学业已经荒废了十一年，原来握笔杆的手改握锄头把和镰刀把已经太久了，考试又是迫在眉睫，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和复习，考大学又谈何容易。

1977年，夏元麟和夏元洁兄妹同时中榜，进了大学。那是十年来的第一次正式高考，据说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

1978年的下半年，我在农村听说，有个副总理表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取代了华国锋主席。他名义上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成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报纸上开始批评文化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这一来，在知青中积压了多年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在中央开会前，云南省有个上海知青写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据说有六千多人签名。信中写了云南知青当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知青感到生活枯燥，思想空虚；二是多数知青逐渐消沉，对前程失去信心；三是有的知青草

率早婚，只顾小家庭；四是许多女知青为了离开农村，纷纷到外面寻找对象结婚，留下的男知青难以找对象；五是有的知青长期呆在家中靠父母生活，荒废了青春年华；六是有的知青终日想回家，消极怠工。信中要求能让知识青年回到自己的家乡。

到了年底，他们组织了北上请愿团，打着“我们要回老家去”的旗帜，步行北上。他们到了云南省会昆明以后，要到北京去，就在昆明卧轨拦火车，造成铁路运输中断。最后云南省的领导请示了中央，答应让知青尽快回城。



1978年12月，云南知青北上请愿，要求回老家。

几乎是在同时，1979年的春节期间，有数十万知青回上海探亲，上海的政府举办了各种慰问活动，希望能够安抚心情不好的知识青年。然而，还是有一大批知青走上了街头，集会游行，卧轨拦火车，要求到北京去请愿。

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

母亲来信说，居委会到家里来通知她，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为我办理“病退”，回到上海。母亲已经为我办好了一切手续，材料正在寄往永丰的途中。

过了十天左右，我收到的并不是母亲寄来的办理病退的材料，而是她的另一封信。母亲告诉我，铁路局机关前几天通知父亲，他可以办理退休手续，把用工的名额空出来，让我“顶替”父亲的名额，到铁路局当工人。现在父亲退休和我顶替的手续已经办完，材料已经挂号寄出。母亲还说，六

十四岁的父亲依旧每天上班，工资分文不少，还是和原来一样。

变化太快了，我有点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心里既有说不出的高兴，又有几分道不明的怅然。

知青大返城开始了。

我是永丰中学的代课老师，收到母亲寄来的“顶替”材料以后，我和学校交割清楚，便回到了里陂上村。（我始终未收到那份办理病退的材料，看来是寄丢了。）

里陂上村有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已经五十多岁，他是村里唯一在外面工作，领取国家工资的人。当时正是春节期间，他在里陂上村的家里过年，听说我要回上海了，专门来找我，严肃地对我说：“前几年去大学读书的都是你们知识青年，我们农村人就有意见。现在你们上海人都回了上海，我们农村人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不是工人农民的国家吗？国家这样做是不是有问题？”

我心里知道，中国这座大钟的钟摆正在急速地向右面摆动，但是不知道怎样向他解释。面对他的困惑和质疑，我哑口无言，只能向他介绍一些“顶替”的情况。后来我知道，他很快就办理了退休手续，让他在里陂上村种田的大儿子按照“顶替”的政策，参加工作，拿国家的工资了。我们都是芸芸众生，没有力量抗拒时代的大潮。

里陂上的村民知道我要走了，他们来到我的住处，向我表示祝贺。老队长张发茂提议说：“老夏在村里这么多年，村里要谢人家才对哩。”清魁和四喜等村里的头面人物纷纷附和。四喜读过书，他建议村里送一面锦旗给我，大家同意了。发茂去买锦旗，四喜来写字，由一个手巧的女孩负责剪贴。

发茂和四喜拿着做好的锦旗来给我，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镶有黄边的红色锦旗并不大，上面用白布剪贴了三行字。上款是“夏建丰同志留念”，中间是“遗爱待民”，落款是“里陂上全体社员敬献 79.2”。

我指着锦旗上的字，打趣地对四喜说：“亏你还是做过老师的人，这里建丰的‘建’字和留念的‘留’字都写成了异体字，遗爱的‘遗’字和社员的‘员’字又写成了繁体字。”

发茂和四喜走后，我对着锦旗中间的“遗爱待民”四个字发呆，目光许久不忍离去，鼻子有些发酸，眼眶里渐渐湿润了。

“遗爱待民”这颇有古意的四个字，我受得起么？这锦旗是不是有点像过去的“万民伞”呢？

记得书上说过，过去的清官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离任的时候老百姓为了表示感谢，往往会送给清官一把伞。打开这把伞，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老百姓的名字。那是“万民伞”，表示当地的百姓万民有清官这柄大伞在为他们遮风挡雨，他们在大伞的庇护下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书上还说，因为万民伞是清官的标志，所以有的贪官在离任的时候，会强迫当地百姓给他们送万民伞。

后来我查了《辞海》，“遗爱待民”的“爱”通“惠”，是“遗惠待民”的意思。

我做过里陂上村的生产队长，自己觉得尚算“清廉”，可这生产队长根本不是官啊。

当天晚上我睡不着，脑海中零零散散地出现了各种场面。……在水库冒雨抢挖溢洪道……摘秧栽禾时酸痛的腰……蚂蟥和牛蝇的叮咬……帐子顶上老鼠在赛跑……被红毛豺狗吓得要屙尿……栏里的猪饿得直叫……我的黄狗在面前欢跳……掬着毛竹一路小跑……扛着麻袋差点跌倒……村民端来热腾腾的菜肴……

我开始整理行李，才发现有那么多东西是无法带走的：水缸水桶、饭桌长凳、猪栏鸡窝、谷仓睡床……还有饭篮食橱、陶盎陶钵、镢头毛镰、尿桶尿勺……

里陂上村有二十六户人家，我把不带走的东西分成二十六份，每户人家送一份，算是留作纪念，也是感谢他们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和抬爱。

整理下来，我带回上海的行李并不少，除了十年前下乡时带来的棕红色人造革箱子以外，还有几个樟木箱和一个苦楮木做的圆台面。为了防止行李在托运的途中损坏，村民帮我搓了无数的稻草绳，把行李密密匝匝地捆了起来。

到鹿冈银行办理转账，我的帐户里还有二千多元人民币。我开了一张二千元整的中国人民银行转账支票，余额如数取出了现金。银行的会计啧啧地感叹道：“如果知青都像你老夏这样就好了。听说你这次还给里陂上每户人家送了礼？”

银行会计知道，以往里陂上的村民急需用钱时，会手持我写的条子到银行来，在我的帐户里取钱，算是借用。这是我和鹿冈银行的约定。个别村民借钱以后无力偿还的，我并不去追讨。

作为最后一个离开先锋大队的知识青年，我到先锋大队的大队部，请求大队用拖拉机把我送到乐安县的江边村火车站。大队书记告诉我，他们已经讨论决定，我随时可以用大队的拖拉机。为了表示对我十年来工作的感谢，大队免去了我应该缴纳的五十元钱柴油费用。

书记特别强调说，我为大队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了那五十元钱，之所以免费，只是为了表达先锋大队对我的一点心意。

离开里陂上村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好，村里派了四个人和我一起坐拖拉机到火车站去。

里陂上村慢慢地移动着，越来越远，看不见了。

前面是鹿冈桥，每年铲茶山摘茶籽的时候，经常会在桥上歇一下肩。

这里是大队的榨油坊，仿佛感到了油坊里的热气，我正光着膀子在榨油。

离榨油坊不远，是通往村前大队的简易公路，曾经沿着这条路去看望马立平。

“禾岭”来了，缓慢地向我挤过来，这是村里的油茶岭。

狭窄的“旗坑排”一晃就过去了，排上有人在铲山么？

怎么会有悠扬的山歌传来？



1998年，公路边上先锋大队的榨油坊。

前面的高山我叫不出名字，它不是先锋大队的山岭。但是我知道这山上曾经有过白云庵，纵是天气再热，人一到庵里就会息汗。可惜我没有上去过。

拖拉机轰鸣起来，努力地往贯前大队的山上爬去。

别了，里陂上。在你的山上滴过血，在你的田里流过汗，在你的河里作过陂，在你的塘里摸过鱼。

别了，鹿冈。虽然受过些许的屈辱，却也带给我点滴的荣光。

个人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然而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毕竟是留在了这里。

我一定还会再回来，只是再来时的身份不一样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啊。

拖拉机停在江边村，火车站里空无一人。有一张看来是新写的告示，凑近一看，却是“因本站的库房已满，即日起停止托运行李和另担货物。”仔细查看日期，署的是五天以前。看来是走不成了。

旁边来了个知青模样的人，一问之下，果然也是回上海的，因为等待托运行李，已经在此等了三天。

“回城的人太多，铁路吃不消了。听说明天会开放托运，只能碰运气了。”他说。

“你要托运的东西呢？”我问。

“喏，那里。”他努努嘴，“我每天来车站看两次，没人偷。”

是的，碰碰运气吧。我一边想，一边招呼村民把行李卸下来，和那人的东西放在一起。

村民们爬上拖拉机，回鹿冈去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江边村火车站里的窗口开了，我顺利地买好火车票。最高兴的是，可以托运行李了！

在向塘站转乘另一列火车，终点站就是上海。我坐在火车上，车厢轻轻地摇晃着。车轮经过轨道的接缝处，依旧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不由得想起十年前，时代潮流裹挟着我坐上火车到江西。一晃十年过去了，时代的大潮又推着我坐上了同样是绿色的火车，但是方向不一样了。是的，火车走的方向不一样，中国走的方向也不一样了。

车厢里的广播响了，列车播音员用她经过训练的柔软声音，亲切地说道：“各位旅开，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站到了。”好像列车的女播音员都会把“旅客”说成“旅开”，记得1950年代还曾有过相应的相声段子。而铁路局则表示，列车播音员都经过了培训，要的是那种柔软而亲切的效果。

回到上海，父亲告诉我，因为知青大返城，今年铁路的春节运输特别繁忙，运送的行李和另担货物太多，连上海站那么大的库房也不够用，临时在车站的站台上加建了库房。

到派出所去申报上海户口的时候，年轻的警察办完手续，抬起头来对我说，很巧，你1969年的2月下旬迁往江西，1979年2月下旬迁回上海，整整十年，不容易。

上海人都不知道，十年来，上海市区的六百多万人口中，先后有一百十万知识青年注销了上海的城市户籍，上山下乡。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确不容易。

可是很多上海人不知道，中国有很多农民就像里陂上村的村民一样，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祖祖辈辈守着土地，他们更加辛苦，更加不容易。

中国广袤的农村中，还有很多农民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远远不如里陂上村的村民，那些农民尤其不容易。

仔细想想，我能够在里陂上村插队落户，当十年农民，还是很幸运。

有些知青一下水田劳动，皮肤就发痒溃烂，当时称作“稻田皮炎”。我很幸运，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我后来知道，自己到了海拔 1500 米以上，就会有高山反应。我很幸运，里陂上村的海拔高度只有 100 多米。

更为幸运的是，我在相对富裕的里陂上村当农民，只要自己动手，努力工作，就能丰衣足食。

知青大返城的时候，之前能够离开农村的知青其实已经走了，全国当时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七百万，约占知青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很多是像我和陆禹平这样，没有什么门路的人。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七百万知青的绝大多数都回城了。

1981 年，各地的上山下乡办公室陆续撤销了。鹿冈公社的乡办在撤销之前，乡办的那个老主任跑到各个村里，要求把当年为知青建造的住房很便宜地卖给村民，希望能够收回一些国家投入的资金，可是收效甚微。

多数村子知道，即使一分钱不出，这房屋也是村里的。连乡办都要撤销了，国家怎么可能把房子搬走呢？不过里陂上村的村民张贤宗和张四喜，还是应了乡办的要求，出资买下了我们知青的住房。

公社的乡办主任听说还有最后一个上海知青留在青山大队，他不愿意回城，老主任便赶去看他。

原来这个知青觉得留在农村很好。他根本不用出工劳动，上海的父母按时给他寄来生活费用。他从村里买粮食，向村民买蔬菜，日子过得悠哉悠哉，是一个典型的“宅男”，天天享受着“农家乐”。

乡办主任没有办法，只得买好车票，派人把这个鹿冈最后的知青送回了上海。

江西省永丰县鹿冈乡的历史上，有关知识青年的那一页，翻过去了。



2013年，原鹿冈公社“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处，成了灵华山茶场的会客厅。

乡办的老主任送走了最后的知青，不久便退休了。很多鹿冈知青应当记得，老主任那间不大的卧房兼办公室里，除了一床、一桌、一椅而外，还有一个小文件柜，据说里面放着我们知青的“档案材料”。

如今老主任的办公室已经和隔壁的房间打通，变成了浙江人开办的灵华山茶场的会客厅。

我曾当面问过茶场的经理：“灵华山在哪里？”

经理可能对很多客人介绍过灵华山，他一挥手，指着窗外李家村的山岭说：“这就是么。”我不由得暗暗发笑。

灵华山是永丰县境内最高的山，位于永丰、宁都和乐安三个县的交界处，距离鹿冈乡54公里，可以说和鹿冈没有关系。灵华山海拔1454米，据说是种植优质茶叶的理想高度。可是灵华山茶场的2000多亩茶叶树，坐落在鹿冈乡洋坳那边的山坑里，海拔只有200米左右。

马立平喜欢喝茶，她说这茶场出产的白茶，质量不错。

附录一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⁸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一、上海百万高、初中生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两年，本应毕业的 1966、1967 届学生仍滞留在学校。从 1968 年开始，上海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分配。

1968 年 7 月 2 日，市革命委员会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 1966 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据统计：上海 1966 届初中毕业生共 149,669 人，高中毕业生共 30,970 人) 7 月 8 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9 月份办公室的工作划归市革委会郊区组)，各区县和街道、镇也先后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知青工作组，各中学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组，开始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 月 27 日，上海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出发。8 月 9 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务农的红卫兵出发。这两届中学毕业生共 44.5 万人，经动员上山下乡的有 22 万余人。但 66、67 届毕业生仍统一实行“四个面向”的政策，即有部分毕业生进入工矿企业。

1968 年 12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几十万上海人连夜上街游行，热烈欢呼“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上山下乡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驻各学校的工宣队也立即行动起来，趁热打铁，为做好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宣传和组织准备。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通过上山下乡安排 3 年来积压下来的数十万大、中

⁸选自《上海青年志》，上海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2 年 4 月第一版。

学校的毕业生。决定 68、69 两届中学毕业生（共 46 万人）和前两届（即 66、67 两届）余留下来的符合分配条件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共 50.7 万人），即实行“一片红”政策。

1970 年 11 月 7 日，上海根据外省市已改变中学生面向农村的单一去路，上海的工矿业也存在劳动力缺口，故对 70 届中学毕业生恢复按“四个面向”进行分配，实行以兄姐去向为依据，决定本人分配到工矿或农村、上海或外地、全民或集体的“按档分配”、“对号入座”的办法（1970 届毕业生共 21 万人，其中 11.5 万人去外地农村，9.5 万人分配进市区工矿企业）。这一办法延续到 1978 年。

1971 年 8 月 17 日，上海安排 7 万名知识青年作为外地代训学徒到工矿企业培训。上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地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和郊县国营农场。这部分知青在那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据 1968～1970 年统计：各类农场安置上海知青 25.6 万余人，另一种是去江西、安徽、吉林、云南、贵州、内蒙古、黑龙江、辽宁、浙江、江苏等地及市郊农村插队落户，一般 4～10 人建立“知青点”，参加当地社队的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经济情况不好，劳力过剩，生产门路狭窄，所以工分很少，生活也很艰苦，这部分知青达到 31.8 万人。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1968～1978 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为 1,112,952 人，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等 10 个省的广阔地区。1968 年开始，许多家长为使子女有所照顾，通过在农村的亲友，把子女送往家乡插队落户。1968～1972 年，去江苏、浙江等省投靠亲友的下乡知识青年

共有 8.3 万余人。

1968~1978 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 单位：人

去向	总人数	插队人数	建设兵团、农林场人数
合计	1, 112, 952	513, 671	599, 281
跨省（区）下乡	615, 517	401, 147	214, 370
其中	黑龙江	165, 186	27, 046
	江西	118, 805	106, 856
	安徽	149, 421	137, 374
	云南	55, 944	10, 065
	贵州	10, 491	10, 491
	吉林	23, 815	23, 815
	内蒙古	7, 963	1, 608
	辽宁	594	594
	江苏	51, 200	51, 200
	浙江	32, 098	32, 098
上海郊县	497, 435	112, 524	384, 911

说明：上海郊县有 15.6 万（其中 1968 年 9.3 万，1969 年 6.3 万）名农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回到所在社队务农，未记录入上山下乡人数。

至 1975 年 4 月，据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报告：当时上海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人数统计情况，

总人数计 398,908 人（江浙等省回乡探亲及郊县插队农场知青不计）。

1975 年上海知识青年在外省市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 单位：人

所在省市	总数	插队	兵团农场
总计	398,908	216,395	182,513
云南	42,407	1,726	40,681
贵州	3,109	3,109	0
江西	87,640	75,896	11,744
安徽	113,090	104,322	8,768
吉林	11,286	11,286	0
黑龙江	134,690	19,494	115,196
内蒙	6,686	562	6,124

当对毕业生实行“一片红”上山下乡政策时，除有一批响应号召的积极分子外，部分青年和家长有抵触情绪。于是学校、机关、街道、里弄、工厂、企业举办学习班，开展“大批判”，制造政治压力，有的甚至采取强迁户口，断绝口粮供应等手段，逼迫动员。市红代会常委则带头上山下乡。铁路运输部门每天安排三个专列，有关部门甚至还动员海军舰船将知青从上海运往大连，再转运至吉林、黑龙江。

1970 年开始，上海市中学生恢复实行“四个面向”政策，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仍然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被分配上山下乡的部分知青及其家长不满。

1972 年 8 月 29 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反映：最近上访人数增加，尤其独生子女和多子女

家庭全部下乡的家长来办（公室）申诉情况集中，平均每天多达 100 多人。主要反映子女下乡后家庭发生父母患病、父母双亡等困难。同时社会上传言外地独生子女已调回。个别家长认为“同一个市革委会同一条路线，相隔一年就采取了两种绝然不同的做法”，要求“还我唯一的一个孩子！”但因上山下乡运动已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本大计，因此尽管有人不满，每年仍有大量的上海知识青年被送到全国各地。

1973 年 3 月 31 日，有 800 多名中学生赴黑龙江边疆地区上山下乡，全市组织了 10 万人夹道欢送。

1975 年 12 月 29 日，市红代会在市革委会大礼堂召开“上海红卫兵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向 1975 届红卫兵发出倡议，要“以实际行动回击教育界出现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到上山下乡运动后期，每到年底都有一批知青返城不归。1974 年底回沪探亲的上山下乡知青有 91,241 人。1975 年 4 月 26 日，市革委会召开各局负责人会议，布置动员返沪知青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另据中央文件，当时上海的中专、中技、半工半读毕业生一般按“四个面向”的原则进行分配。至 1972 年底，全市各大专院校在文革前招收的大学生基本分配完毕，共计分配毕业生 21,220 人。

二、知青安置政策及其演变

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去市郊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不包括回乡投亲插队的知识青年），政府规定发给安置费，主要用于修建住房，购置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下乡知青的单程路费、行李运费和第一年的生活困难补助。知青口粮，在下乡第一季度由当地粮管部门供应。第二季度开始，由生产队按社员口粮标准供应。吃菜由当地社、队分给每人自留地一至二分，供知青种菜。疾病医治，参加当地合作医疗，对少数重病者，按照自力更生、各方资助的原则，

除自己承担外，由合作医疗负担一点，家长单位补助一点，医疗部门减免一点，下乡经费补贴一点，共同帮助解决。

去外地农村集体插队的知识青年，除按国家规定拨发给安置费外，根据不同去向，发给每人不超过 25~35 元的行装补助费，并发给布票、棉花票和每人一顶蚊帐券。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严寒地区插队的，供应草绿色的军大衣、棉袄、棉帽和取暖胶鞋。1973 年又规定另外补助 40 元冬装费。下乡知青的单程路费按实支数报销。一般下乡的头一年由国家供应统销粮，由社队供应柴草或燃煤，并分给供应种菜用的自留地，以后则参加集体分配，并辅以必要的照顾。去外省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一般参加当地农村的合作医疗，重病重伤的由安置部门统筹补助解决。对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插队的，插队期间按规定享受两次探亲路费。去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林场、牧场、茶场的，生活由场部安排，工资待遇按国家规定办理。

上海知识青年到全国各地农村上山下乡后，满怀激情地参加农村体力劳动，想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各地农民也给予了上海知青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贫穷落后，随着下乡知青的不断增长，也发生了诸如知青和当地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问题，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生活困难负担过重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婚姻恋爱问题，知青在农村受打击遭凌辱的问题，甚至一些地区发生了对下乡女知青逼婚、强奸等严重摧残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引起了知青及其家长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林彪叛国事件后，上海知识青年普遍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

1973 年福建省一位知青的家长“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地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包括他自己儿子在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艰难状况。4 月 26 日，毛泽东给这位家长复信：“寄上 300 元，

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复信后，中共中央于6月21日发出了[1973]21号文件，国务院也于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此后，一批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被法办，上海下乡知青的情况有所改善。1973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下乡知青中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其家长所在单位给予补助，被称为“聊补”。还有一些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生活不能自给，需要上海家长接济。1973年下半年，组织知识青年家长所在单位，每年普遍对知青家庭进行两次访问，并对生活困难的家庭酌情补助。补助金额平均每户30元左右，补助面在30%以上。1973~1974年，合计补助2,300余万元。1975~1977年，平均每年补助1,500万元。

1974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对市郊农村插队知青的一次性补助费由每人230元提高到480元。去国营农村的知青每人400元、分别由各县和上海市农场管理局统筹使用。对于插队知青的口粮、食油、须按城市居民标准供应。疾病医疗办法也有所改进。生产和生活用具统一由公社采购、发给。

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对教育界进行了整顿，恢复了大学对工农兵学员的招生考试⁹。1974年初，上海市教育部门组织16所大专院校先在安徽阜阳、江西上饶、黑龙江黑河、吉林延边、云南西双版纳5个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开设政治理论、语文、历史、农业生产、农用机械、医疗卫生等23个专业，招收学员2.8万余人，其中上海下乡知

⁹1968年7月，毛主席发出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到了197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从1972年起推广到全国，从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那几年并没有举行招生考试。

1973年的考试由于各种原因，最后不了了之，学员还是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程序入学。——夏建丰注

青约占 50%。1975 年，又扩大到大兴安岭、井冈山、宿县、滁县等地区，学员增加到 6 万余人。另有很小部分上海知识青年参加了全国各地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或被直接选送到大学学习，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1974~1975 年，上海知青回沪探亲时，上海各区街道和企业事业单位协作，举办电、木、泥工、农机维修、农药使用、医疗、缝纫、理发等 560 多个短期技术培训班，培训下乡知青 1.6 万余人。与此同时，1968~1975 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印《上山下乡》小册子 43 辑，共 628.8 万余册（其中资料 61 种，145 万册），内容主要反映下乡知青的成长和他们的“先进”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近千人的写作力量，为下乡青年编写自学读物 20 多种，出版其他农村读物 36 种，合计 284.3 万余册。通过上海驻各地的学习慰问团向去外省、区下乡的知青赠送图书 4 批、41 种；向上海郊区下乡的知青赠书 4 批、51 种，共 425 万余册。

从 1975 年 6 月开始，上海为江西、安徽、吉林 3 省安置上海知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扶持创办了 550 余个小作坊、小工场。其中江西 335 个，安徽 187 个，吉林 28 个。以后又为黑龙江、辽宁、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协办 257 个。这些工场、作坊，有农机修配、农副产品加工、竹木制品、铁锅生产、制砖、缝纫、补鞋等为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等多种项目。这些项目推动了当地集体经济的发展，帮助知青克服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吸收安置了 1 万多名生活比较困难、不宜参加农业生产的病弱青年，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解决了生活自给问题。再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1968~1973 年，上海市对安置省、区提供价值 1600 多万元物资。

到 1975 年，上海市给在各省农村的知识青年提供大小拖拉机 7,000 余台、拖斗 800 余只、各类汽车 50 余辆，以及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价值 5,500 万元，还提供无息贷款 500 万元，最后

全部免于归还。

三、学习慰问团

1969年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提出“五七”干校干部“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农村、工矿和文教基层系统）借以驱散原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8月27日，市革委会召开动员大会，并层层分配指标。当时的口号有“四个面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成部分”、“四个面向是又一次路线站队”。结果，上海市革委会派出2,000多名干部组成的“学习慰问团”（共分7个总团，55个分团，233个小组）分赴黑龙江、云南、贵州等上海知青安置地，既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又帮知青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与此同时，市革委会还与黑龙江革委会达成协议，派出1,700名干部带着户口、粮油关系和16万知青一起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干革命”。

1973年11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索要各省市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名单事宜，发出正式通知成立上海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69年10月，上海市革委会曾成立市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军宣队张芳信为主任。1981年1月1日，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宣布撤销，其业务并入市劳动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任组长，黄克、吕美英，张芳信任副组长。

1973年11月10日，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王一平主持并讲话。会议通过三条建议：（1）建议向各省派出由670名干部参加的慰问团，分头赴各省慰问上海知识青年，帮助当地安排知青的生活。（2）建议召开第二届送子女上山下乡革命家长代表会议。建议农口召开上山下乡先进分子集体代表会议。（3）建议上山下乡办公室增加一个大组，下设宣传动员，城乡联络、信访接待、办事4个小组，处理经常工作。1973年12月16日，上海市知青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海的有关领导外，还有中共安徽省委、

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讨论上海知青在外地的情况，还决定派代表去贵州研究上海知青安置落实问题。

1974年上半年市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学习慰问团”事宜，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当时，全市共动员2,000多干部组成8个“学习慰问团”，分赴有上海知青的9个省（区），深入265个县、3782个公社，54.9万多个生产队及兵团、农林场，对46.8万多下乡知青进行慰问。至1975年“学习慰问团”的干部进行了轮换，具体安排如下：工交系统540多人去江西、安徽，少数去云南。科技系统50多人去内蒙、黑龙江。郊区系统50多人去云南。财贸系统90多人去贵州。文教系统100多人去吉林。市革委会机关和公安系统130多人去黑龙江。同时，市委决定：今后“学习慰问团”不再搞春节回沪整训，两年内，可分批安排干部回沪休假一次，为期20天。批示声称“学习慰问团”不仅是“教育干部、锻炼干部的有力措施，对坚持上山下乡的方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重要意义”。以后随着知青的返城，这项工作也就自然结束。值得一提的是曾去黑龙江插队的那批干部，因上海方面不接收，暂只得转向安徽铜陵新桥矿、江苏大屯和张家洼，后又在地待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陆续返回上海。

四、知青返城

1978年春，国务院批转文件，放松了知识青年病、困、退的限制，一些因本人身体健康，家庭困难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回上海。不少身体健康的上海知青为了回沪向当地医院“开后门”获取假病历，当地医院也出于同情为其出具可返沪的证明。1978年10~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知识青年政策做出了调整，终止使用上山下乡这一方法安置城市知识青年，要求对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其间，上海出现了知青要求返城的游行请愿活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会见了知青代表，了解情况。团市

委广大干部深入到第一线做疏导工作。与此同时，1978年12月4日，云南景洪东风农场4分场以全体上海知识青年名义致电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劳动局，要求为“广大知识青年平反昭雪”，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要求立即派调查组去云南。

1979年1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提出贯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因春节期间，各地知青回沪串联。1979年2月5日，即春节后第九天，上海发生部分知青（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青）为达到返沪目的的聚众游行活动。当日下午，部分知青聚集到上海共和新路道口，部分人员竟采取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将上海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堵塞。6日凌晨，在国务院下达电话指示后，在有关方面的耐心劝说下才撤离现场，少数不听劝说者，被警察带入公安局，交通恢复畅通。这次卧轨使上海站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滞留旅客8万多人，始发晚点和停运晚点累计达632小时27分，仅此一项损失219.56万元。2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识青年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全市各单位也要求知青家长配合做知青工作，稳定在沪知青情绪，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汪明章也邀铁路、公交、财贸、地区各方面的青年和回沪知青代表座谈这次事件的教训，要对青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一方面做耐心的劝说工作，肯定广大知识青年赴外地上山下乡，为祖国建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对他们不顾大局，集会闹事，造成严重后果，进行了严肃地批评。随后，上海从实际出发，研究了知青问题现状，加快了对知青问题的解决。

1979年5月28日至6月3日，上海召开各方参加的统筹安排知青工作会议，确定“全党动员、广开门路、统筹安排、择优录用”的方针，在全市企业生产任务不足，增人指标有限的情况下，主要采取子女顶替、发展集体所有制（包括企业大集体、区建劳动服务公司、街道集体所有制）等方

法，发挥各局、区的积极性，采取任务到局、区，条块结合，统筹安排本系统、本地区职工的回城子女。还具体规定，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退职时，可招收 1 名符合招工条件上山下乡子女回沪“顶替”工作。对按政策批准回上海的知识青年，原则上采取“归口包干”的办法，以知青父母所在单位主管面为主，规划组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安排回沪知青，并承担安排部分父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回沪青年。各区、县也广开门路，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安排知青。据统计，仅 1979 年上海就安排返城知青 30.3 万人，基本上解决了因知青返城带来的压力。

至 1983 年底，“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除已在当地安排工作和已与当地职工、农民结婚成家者外，基本上回上海安排了工作。同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某些遗留问题作了善后处理。

为适当帮助仍在外省区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解决其子女就读、就业方面的实际困难，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劳动局、教育局、公安局、粮食局于 1989 年 3 月 21 日联合发出《关于允许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子女来沪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规定仍在外省区工作的每户知识青年允许 1 名 16 周岁或初中毕业以上未婚、未就业的子女来沪就读入户，来沪就读入户的必须有知青在沪父母、兄弟姐妹做知青子女的“监护人”，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符合这些条件的知青子女，由知青和知青子女的“监护人”，向知青原户口迁出地所在街道、镇的劳动部门填报《申请表》，经区、县劳动局审核批准后办理来沪入户口手续。当年经批准来沪的知青子女 35,955 人。1990 年批准 15,205 人。

附录二

全国的上山下乡人数¹⁰

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单位：万人

年度	合计	插队	集体场队	国营农场
全国总计	1,776.48	1,282.21	203.08	291.19
1962年 ~1966年	129.28	87.06		42.22
1967年 ~1968年	199.68	165.96		33.72
1969年	267.38	220.44		46.94
1970年	106.40	74.99		31.41
1971年	74.83	50.21		24.62
1972年	67.39	50.26		17.13
1973年	89.61	80.64		8.97
1974年	172.48	119.19	34.63	18.66
1975年	236.86	163.45	49.68	23.73
1976年	188.03	122.86	41.51	23.66
1977年	171.68	113.79	41.90	15.99
1978年	48.09	26.04	18.92	3.13
1979年	24.77	7.32	16.44	1.01

¹⁰选自《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二版。

后记

我写《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并不是写小说，只是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下来。但是那段经历已经过去了四十年，纵然有再好的记忆力，也仍然会有许多讹误。所以最近两年归国期间，我都回到里陂上村，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来核对事实。

感谢当年同在鹿冈乡插队的知青朋友帮我纠错，其中最认真的是夏元麟先生，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列出了近五十条意见。

我想介绍一些当年的器具，可是老物件的实物很难找了，网络上也找不到永丰县传统的农业器具的图片。实在不得已，我开了一张很多老式器具的大单子，请求鹿冈乡的领导当作工作任务布置下去，发动村民“按图索骥”，使我能够拍到一些比较像样的照片，作为插图放到书稿里。

写出初稿以后，感谢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社长，她在百忙之中居然读完了书稿，给予我巨大的支持。

因着发达的技术，我和立平通过电子邮件把书稿发给诸多朋友，请朋友广为传发，在频繁的电邮交流中得到了真诚而不是敷衍的肯定和鼓励。现从朋友往来的电邮中，选取四篇。

电邮之一

马立平、夏建丰：你们好！

这几天我忙里偷闲，看完了夏建丰的长篇回忆录《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邝荣才还没有看完）心生感慨。此书勾起了我们对那段久远而又刻骨铭心的往事的回忆，因为很多是我们的共同经历，感到非常亲切，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写下来，夏建丰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真不容易！向你们表示敬意和谢意！

我一直比较喜欢看知青自己写的上山下乡回忆文章，夏

建丰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十年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对里陂上村，对“三农”的了解之深，已经不亚于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文章对知青、老俵和干部等人 and 上山下乡运动的描写，客观而有情有义，很细腻，很生动。

对于我们逝去的青春，我的感悟是：“无悔”和“有悔”其实是并存的。现在老了才认识到，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两面的，积极与消极，真善美与假恶丑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个体，生活的社会和时代是不能选择的，关键是自己要有定力，就看你怎样去想，怎样去做。

我也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给自己和后人一个交代，可是力不从心，说没有时间是借口，主要是语文水平和文学素养不够。看以后能否争取写一些。

夏建丰的汉字功底了得的，很多方言都能找到相应文字，例如“墩”字，在我们村前，过了小桥的一片开阔地，老俵叫“墩上”，我知道有这个字，但最近要标在照片上，就是想不出，类似还有很多，学习了。另外，书中我名字非“萍”，而是和马立平一样的“平”，这可不要想当然哦。

还有很多感想和感慨，等见面再谈吧。

祝你们一切顺利！

陈亚平¹¹、郇荣才 2014年3月9日

电邮之二

立平：

你好！最近很忙，但还是被夏建丰的插队回忆录吸引住了，一打开就难以释卷，到今天看完了，还觉得兴犹未尽，希望他还能再写下去。虽然老夏的文字多是平铺直叙，没有很多的修饰，但内容的翔实、生动，更显示了这本书的真材实料。尤其是其中对各种工艺农艺的具体描述，让我想起《天工开物》。由于科技的发展，很多老的手工艺都已经失传，

¹¹陈亚平，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已退休，曾和马立平在同一所乡村小学任民办教师。

或者即将失传了。能够记录下来，是很珍贵的史料。书里面的许多小故事，非常有趣，没有具体的生活经验和一颗敏感的心，是不可能编造出来的。类似于他一脚踩到牛粪里，却因为那温度而不肯拔出脚来的情节，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看到这里让人忍俊不止。

总体来说，这本书也反映了老夏的为人和个性。作者既不掩饰对自己的好学、聪明、坚忍、仗义自豪，又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没有把自己写成高大全。从书中能够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政治的淡漠（也正因此，这本书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相对来说描写得少了一些），还有对你马立平的崇拜——书中对你的具体描写不多，但通过那几笔剪影式的描写，他刻画出了他心目中的女神！

倪培民¹²

电邮之三

立平：

夏建丰的书稿是新鲜出炉的，让我先读为快了。一本好书。好学、善学，才能有如此好的记忆。把平凡的农村生活写得有棱有角，有声有色，不容易。没有虚构，没有塑造，所以从本质上讲是历史记录，属于口述史、传记史一类。这类史往往可以有文学上的发挥。夏先生的书稿又一次证明了文学上的一条真理：生活是文学的源泉。

插队生活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记录它们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也有一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共鸣之处颇多。如杀牛过节、踏水车、耙田、锄草、插秧、建屋上梁……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很有知识的事。

谢谢夏建丰唤起我不少文革中在农村（皖南休宁）的美好记忆。

丁证霖¹³

¹²倪培民，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教授。

电邮之四

读夏建丰《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

首先，这是一本和我以前读过的有关下乡知识青年的书非常不同的书。上大学的时候，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读过一些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都是伤痕文学。那些都是文学，不是历史，所以虽然和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不同，也不能说人家写得不好。前几年主流媒体好像又在上演有关知识青年的电视剧，仅看看广告就知道在“歪曲历史”，根本就没有兴趣再看。而《插队十年》能够吸引我一直读下去，原因是什么？

1、读这本书，让我想起《天工开物》。我没有看过《天工开物》，仅仅是在读一些科普书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介绍古代各种技术的。《插队十年》中有对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在江西农村从事各种农业、副业活动的相当详细的介绍，包括使用的工具和操作的方法。其中有些活动，例如挑水、烧柴灶，我小时候在安徽南陵也经历过。所以书中的描述激起我的同感和兴趣。

2、作者写的东西很客观，而且能让人体会到他对那十年生活的一种乐观和达观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这本书很不一般。他这种态度尤其令人佩服。不知道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的人读了他的书会不会有深切的体会，我插队两年的经历和他的经历相比，绝对可以用“幸福”、“幸运”来形容，这也使我能感觉到书中平静描述的一些事情其实惊心动魄。即使没有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十年漫长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也不是“艰难”二字就可以概括的。现在的励志书常说“态度决定一切”，《插队十年》就是一个极好的实例。

3、最近读了梁漱溟的传记才知道梁在1930年代就对乡

¹³丁证霖，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博士，师从刘佛年教授，是马立平的同门师兄，文化革命中的大学生。

村建设有相当成功的尝试。梁是要用知识来帮助农民，并拯救中国的传统社会。《插队十年》对农村社会的描写，虽然不多，但是很真实。对那个年代的真实记述非常少，官方的记述不会这么详细，历史学家或许也不屑或顾不上记述，农民自己也不会记述。作者的记述就一定非常宝贵了。因为当时那样的社会和民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胡闰莓¹⁴2014年11月12日

最后、我感谢永丰县人大、教体局、侨办、侨联、驻沪办的朋友们，每次我到永丰，都受到你们热情的接待和帮助。

念兹在兹的依然是里陂上村的乡亲们，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夏建丰 2014年11月

¹⁴胡闰莓，加拿大皇后大学博士，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已退休。1976.3—1978.2在北京昌平插队两年。

